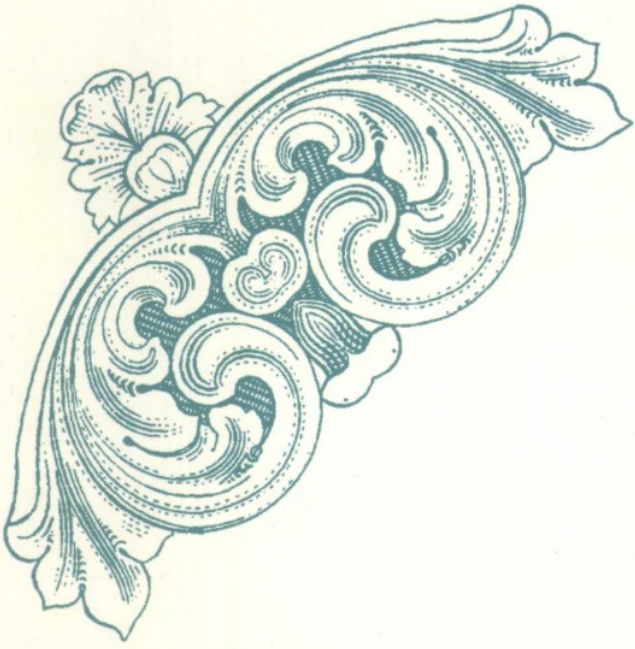

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朝鲜半岛汉学史

刘顺利　著

學苑出版社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朝鲜半岛汉学史

印章篆刻：郑怀宝
责任编辑：杨　雷
封面设计：徐道会

ISBN 978-7-5077-3361-7

定价：35.00元

北京语言大学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朝鲜半岛汉学史

刘顺利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半岛汉学史/刘顺利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5

（列国汉学史书系/阎纯德，吴志良主编）

ISBN 978-7-5077-3361-7

Ⅰ.朝… Ⅱ.刘… Ⅲ.①汉学—研究—朝鲜②汉学—研究—韩国 Ⅳ.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8686号

责任编辑： 杨　雷

责任校对： 黄　勇

封面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河北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05 × 96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数： 1500 册

版　　次： 2009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本书系之出版获澳门霍英东基金会资助

列国汉学史书系
编辑委员会

顾　问：季羡林　李学勤　汤一介　王路江

主　任：崔希亮

副主任：韩经太

主　编：阎纯德　吴志良

编　委：乐黛云　安平秋　许光华　刘顺利　吴志良
张国刚　严绍璗　李明滨　李海绩　陈开科
侯且岸　柴剑红　钱林森　耿　昇　阎纯德
阎国栋　熊文华

序

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汉学史的著作及论文。实际上，公推为中国最

早的汉学史专书，是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尽管是通史体裁，也包含了分国的篇章。这本书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这正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的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的原因。

阎纯德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汉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我在这方面的同行和老友，曾给我以许多帮助。他为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学术界周知的。在他的引导之下，《中国文化研究》季刊成为这一学科的园地，随之又主编了《汉学研究》，列为《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直敬服无地。特别要说的是，阎纯德教授这几年为了编著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所投入的心血精力，可称出人意想。

在《汉学研究》第八集的《卷前絮语》中，阎纯德教授慨叹：“《汉学研究》很像同人刊物，究其原因是因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是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面孔。”现在看“列国汉学史书系”，作者已形成不小的专业队伍，这是学科进步的表现，更不必说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了。希望“列国汉学史书系”的问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个学科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一个界标，让我们在此对阎纯德教授、这套书的各位作者，还有出版社各位所做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李学勤

2007年4月8日

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序 二

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

历史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是浩瀚无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会让我们兴奋，也会使我们悲哀，有时会令人觉得它又仿佛是一个梦。但是，当我们梦醒而理智的时候，便会发现——自然史、时间史、太阳史、地球史、人类社会史，一切的一切，不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还是至今还在生生不息的蚂蚁社群，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历史。一切都有过发生，一切都还在发展，一切都还会灭亡。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孕育过程，“汉学”(Sinology)也是这样，其孕育和成长，就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交媾浸淫的历史。这个历史，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汉代所开通的丝绸之路，接下来是7~8世纪的大唐帝国、14~15世纪的明代、清末的鸦片战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潮时起时伏直到今天。这是历史，是汉学的昨天和今天，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显现出的文化精神。但是，昨天有远有近，我们可以循蛛丝马迹探讨，找回其真；而今天，只是一个过渡，一俟走过，便成为昨天的陈迹。写作汉学史是一件艰难的劳作，尤其对象是遥远的昨天，尤其是“遗失”在异国他乡的昨天，更非一件易事。时至今日，朦胧面纱下的汉学还不为一些学人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取下面纱，让人们看个究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90年代以降，“汉学”(Sinology)便逐渐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中国大陆重提“汉学”(Sinology)至今，汉学就像隐藏在深山里的小溪，经过30年的艰辛跋涉之后，才终于形成一条奔腾的水流，并成为中国文化水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变化是时代和历史变迁带来的结果，也是文化自己发展的规律。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学（Sinology）呢？首先，这里的汉学非指汉代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的“汉学”，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这起码已是200多年来世界上的习惯学术称谓。李学勤教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①] Sinology一词来自外国，它不是汉代的“汉”，也不是汉族的“汉”，不指一代一族，其词根sino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是中国。

在历史长河里，汉学由胚胎逐渐发育成长。虽然在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才有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但指代汉学的“Sinologie”（英文“Sinology”）一词则出现在18世纪末，早于由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t）主持第一个汉学讲座的时间，更不会晚于1838年。从此之后，“Sinology”便成为主导汉学世界的图腾，约定俗成的学术“域名”。在世界文化史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造诣深厚的学者称为“汉学家”。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要标新立异，根据西方大部分汉学家的习惯看法，“Sinology”发展到如今，这一历史已久的学术概念有着最广阔的内涵，绝不是什么“汉族文化之学”，更不是什么汉代独有的“汉学”，它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既有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敦煌学”、“满学”、“西夏学”、“突厥学”以及“藏学”和“蒙古学”等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学的理解和解释相左，因此便有了“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不同的叫法；如果咬文嚼字，推演下来，一定还会有“国内汉学”、“国内中国学”，甚至“北京汉学”、“河南汉学”等。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已经出现相互兼容并包状态，就是说Sinology可以准确地包含Chinese Studies的内容和理念；

① 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从历史上看，尽管 Sinology 和 Chinese Studies 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了。话再说回来，对于这样一个负载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学术“域名”，我以为还是 Sinology 最好，因为，Sinology 不仅承继了汉学的传统，而且也容纳了 Chinese Studies 较为广阔的内容。另外，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称为国学，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学问则称为汉学。这样，汉学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学术规范，又符合世界上的历史认同与学术发展实际。

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外国学者阅读、认识、理解、研究、诠释中国文明的结晶。汉学作为外国人认识中国及其文化的桥梁，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撞击后派生出来的学问，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但是，汉学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既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又是可以照见“中国文化”的镜子，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Sinology’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它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① 以上两种表述虽有不同，但学理一致，基本可以厘清我们对于 Sinology（汉学）的基本学术定位。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说过：“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也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审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② 他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提出：“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为了获得一个“外在的视点”，他才从遥远的视点出发，并借此视点去“解放”自己。这便是一个未曾断流、在世界上仅存的几种古老文化之一的中国文明的意义。中国文明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

① 严绍璗：《我对 Sinology 的理解和思考》，载 2006 年《世界汉学》第四期。

② ［法］于连（François Jullien）：《迂回与进入》，香港：三联书店，1998 年。

去，以自己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就是说，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抑或说是一种亦中亦西、不中不西有着独立个性的文化。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跨文化性质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它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

汉学研究系指对外国汉学家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反馈，也是对外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凡是对历史或异质文化进行研究，都有一个价值判断和公正褒贬的问题。因此，对于外国汉学家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研究，必得有我们自己的判断，然后做出公正的褒贬。我们说汉学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但是这句箴言并非只是适用于中国人，对外国人也是一样。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人类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文化语境的不同，思维方向和方式也会不同，因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讲出不同的道理。“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① 汉学的学术价值往往不被国人重视，并利用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误读贬低汉学的价值。其实，这并不公平，有些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其独到的见解，能发中国人未发之音。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对中国上古文化和上古宗教的研究就有独到的贡献，被称对中国宗教研究有“先河”之功。他研究中国宗教的宗教社会学的方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学者采用宗教社会学来研究中国宗教，被称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终生的最高成就是根据研究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日朝越诸语言中汉语借词

① 季羡林：《汉学研究·序》第七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译音构拟汉语中古音和根据中古音和《诗经》用韵、谐声字构拟古音，写出了著名的学术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中古音与古音概要》、《古汉语字典重订本》、《中日汉字形声论》、《论汉语》、《诗经注释》、《尚书注释》和《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等，他对汉语音韵训诂的研究是不少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并深刻影响了对于中国音韵训诂的研究。20世纪著名的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述甚丰，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事本位文化"，其核心是"帝王文化"，其他认识上尽管有偏颇，但也有其独异性和深刻之处。这就是"他山之石"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可否认，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或歪曲也是常见的，诸如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n Gunnar Andersson)于1921年10月对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之后，便说中国彩陶制作技术源于西方，并在他的《甘肃考古记》和《黄土儿女》著作中反复强调他的这一错误观点。这一观点亦为"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提供了说辞。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也推波助澜，闭门造车地推测出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甚至连我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也被"忽悠"得认可了"中国文化西来说"。① 美国现代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尤其近代史的研究独具风采，为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搭建了一座桥梁；但他在研究上的所谓"冲击—回应"模式，却近乎荒谬，认为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文明，是西方的侵略拯救了中国。综上所述，对于汉学成果的研究，只有冷静、公正、客观、全面，才能在沙中淘得真金，拥抱"他山之石"。

在中国，汉学的接受与命运，诚实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基本上是无视它的学术价值，更没人把它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此外，由于民族心理上的历史"障碍"，我们还曾视汉学为洪水猛兽，甚至觉得它是仇视中国、侮辱中国的一个境外的文化"孽种"。这种"观点"，虽嫌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自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偌大的中国曾经惨遭蹂躏，整个历史写满了炮火压迫和宗教怀柔，其间也不乏为列强殖民政策服务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学者"深入中国腹地，以旅行、探险、考古之名而实行搜集社会情报、盗窃和骗取中国大批文

① 《章太炎全集·〈訄书·序〉·〈种姓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思念祖国〉·〈华夏篇〉·〈国土原始论〉》。

物。

人类思想的飞翔，是受社会和历史禁锢的，山高水远的阻隔也使得人类互相寻找的岁月特别漫长。交流是人类文化选择的自然形态，汉学就发生在这种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之中。

公元前后，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Seres），中国叫赛里加（Serice），这是陆路交往关于中国最初的叫法，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把中国人称为秦尼（Sinai），中国叫秦（Sin），这是海路交往关于中国的叫法，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Seres 和 Serice 两字系由阿尔泰语所转化，是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 Serikon、Sericum 两字简化而来。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则是源于秦朝。①

人类在互相寻找的初级阶段，中国和西方试探性的商业交往还很原始，那时的人类，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族群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状态，人类各个角落的不同文化还处于相对不自觉或是相对蒙昧的历史时期。在人类最早的沟通中，中国人走在最前边。公元前 139 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越过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等地，直达地中海东岸，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各国，历时十多年，开创了古代和中世纪贯通欧亚非的陆路“丝绸之路”，为人类交往开创了先河，也为汉学的萌发洒下最初的雨露。

在文化史上，以孔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最先影响朝鲜半岛，然后才是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这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复杂，甚至被说成同种同文，因此可以说它们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公元 522 年，中国佛教渡海东传日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典籍便大量传入日本，但这只是一种“输入”，只是日本创建自己文化的借鉴，并没有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研究。及至唐代，由于文化上承接了汉朝的开放潮流，那时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相对更加频繁，商贸往来和文化沟通有了发展，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域的人士通过陆路和水路进入中国腹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都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汇的重要都会，尤其是前者，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文化之都；而后者，由于东南沿海经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第 3 页。

济崛起，人口增多，手工业发达，农田水利的改善，为海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再由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切断了陆路“丝绸之路”的缘故，曾称为“鲤城”、“温陵”、“刺桐城”的泉州，便成为联结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第一大港”，是那时以丝绸、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为主的国际贸易之都。通过频繁的往来和交流，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汉学也便在这种交流中不知不觉慢慢衍生。

但是，源远流长的汉学，人们习惯地认为其洪流和网络在西方，西方是汉学的形象代表。这一看法一是源自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人的崇洋心理，二是西方汉学的某些特征也确实有别于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汉学。其实，如果我们从世界汉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学要早于西方的汉学，比如日本在十四五世纪已经初步形成了汉学，而那时西方的传教士还没有进入中国。因此，对于汉学的研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我们都不能顾此失彼，要以同样的关注和努力探讨其历史。当然，汉学的历史藏在文献里，而隐性源头却在文献之外。

文化往往伴随经济流动，其交流也会在不自觉或无意识状态下发生。到了明代初年，郑和率舰队出使西洋，前后7次，历经28年，到过30多个国家，最远抵达非洲东岸和红海口，真正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在公元八九世纪至十六七八世纪期间，关于中国，多见于西方商人、外交使节、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文化人所写的游记、日记、札记、通信、报告之中，这些文字包含着重要的汉学资源，因此有人把这些文献称为“旅游汉学”。这些人的东来源于文艺复兴，因为思潮的开放影响了欧洲人的思想和生活，他们或通商，或传教，或猎奇，但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却是一致的，于是汉学便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主要的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

这类游记和著作较早的有约在公元851年成书的描述大唐帝国繁荣富强的阿拉伯佚名作者的《中国与印度游记》、吕布吕基斯的《远东游记》（1254）、意大利的雅各－德安克纳的《光明城》、贝尔西奥的《中华王国的风俗与法律》（1554）、《利玛窦中国札记》、亚历山大－德－罗德的《在中国的数次旅行》（1666）、南怀仁的《中国皇帝出游西鞑靼行记》（1684）、费尔南－门德斯－托平的《游记》、李明的《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回忆录》（1696）

和《中华帝国全志》(《中国通志》)等,以及罗明坚、金尼阁、汤若望、卫匡国等名士的著作,还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的各种记述,都成为日后汉学兴旺发达的必然因素。这类著作主要涉及中国的物质文明,较多描述、介绍中国的山川、城池、气候,以及生活起居、饮食、服饰、音乐、舞蹈,也涉及到一些中国的观念文化。这些"旅游汉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可·波罗纪行》(《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1275年随父亲和叔父来中国,觐见过元世祖忽必烈,1295年回国后出版了这本书,它以美丽的语言和无穷的魅力翔实地记述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政治、物产、文化、社会与生活,第一次向西方细腻地展示了"唯一的文明国家"——"神秘中国"——的方方面面。

这些包罗万象的文献,不仅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中国,还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最初的碰撞。作为文献,这些游记、日记、札记、通信和报告,有赞美,有误读,也有批评,但因为其中包含大量中国物质文化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科举等多方面的文化记载,而成为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史上有重要价值。

汉学的发生、发展与经济、政治、交通以及资讯分不开。有学者把汉学的历史分为"萌芽"、"初创"、"成熟"、"发展"、"繁荣"几个时期,也有的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阶段。但汉学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末兴起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互动之中。

从16世纪到十八九世纪,在数以千计的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中,有不少人成为名载史册的汉学先驱,他们为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自1540年罗耀拉(S. Ignatins de Loyola)、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等人来华,开始了以意大利、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第一时期的耶稣会的传教活动。接着,意大利的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罗明坚(Michel Ruggieri)等著名传教士来华。1583年,即明朝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将利玛窦神甫(Matteo Ricci)带到中国,从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宗教活动无论是对于西方或是东方,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班牙的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于1588年问世,这部世界汉学史上的第一部汉学著作,名副其实地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字、教育、科学、军事、矿产、物产、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做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以七种文字印行,风靡欧

洲。以利玛窦为核心的耶稣会士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开垦”，不仅著书立说，还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中国文化经典译成西文，不仅开西学东渐之先河，也推动了中学西传，使中国文化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这位思想家当仁不让地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与其先后到达中国的著名的传教士，都著书立说、传播中国文化，对推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做出了贡献。在世界汉学史上，除了以上提及的，还有许多汉学家的名字十分响亮，诸如曾德照、柏应理、卫匡国、殷铎泽、南怀仁、汤若望、龙华民、金尼阁、罗如望、熊三拔、李明、张诚、白晋、马若瑟、宋君荣、钱德明、翟理斯、安特生、雷慕沙、儒莲、德理文、安东尼·巴赞、蒙田、冯秉正、尼·雅·比丘林、巴拉第·卡法罗夫、瓦西里耶夫、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斯文赫定、马礼逊、斯坦因、理雅各、翟里斯、李约瑟、韦利、霍克斯、卫礼贤、福兰阁、孔拉迪、高本汉、卫三畏、费正清、戴密微、石泰安、谢和耐、欧文等。他们和东方日本、朝鲜半岛的富有建树的汉学家以及当今散布在各国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铸造成汉学史上的思想学术之碑，开垦了汉学成长的沃土。

“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但是，在欧洲全面研究中国文明的问题上，“法国的先驱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① 戴密微把以上三个国家誉为汉学的先锋，“他们于16世纪末叶，为法国的汉学家开辟了道路，而法国的汉学家稍后又在汉学中取代了他们”，真正建立起作为学术的汉学传统。就传统汉学而言，法国是汉学家最多的国家之一，有许多汉学界的学术巨擘，不断为汉学的崇高而添砖加瓦。

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外化”的传播，也意味着异质文化对中国文化“内化”的接受。汉学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也是人类和谐与进步的推动者。

汉学诞生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交流和相互浸淫之中。这个结果无异于一枚果子的成熟，只有“风调雨顺”才生长得好。和谐、宽容、理解与尊重，是异质文化彼此借鉴的保证。作为文化形态的汉学，其成长和生存离不开良好的国际语境。就中国而言，历史上凡是开放的时代，文化交流多，汉学

①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就发展;反之,汉学就停滞,这似乎成为一种规律。

作为学术公器的汉学,文化上有其自己的成长过程。汉学是发展的,这一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生存于异国他乡的文化,同样深受不同时代语境的极大影响。这里所说的语境,既包括中国的历史演变,也包括异国和世界的历史变化。就是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汉学的发展方向和内容;换句话说,汉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制于中国历史的更迭,也受制于他者社会的变化。这就是以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发展的基本轨迹。

汉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总体上可以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而现代汉学兴显于美国,20 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其他国家葆有传统汉学的同时,现代汉学也很繁荣。随着中国与世界政治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拓展,现代汉学有了显著的发展。

虽然 20 世纪的后 50 多年,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接触开始多了起来,但就整体而言,1949 年后约有 30 多年是一个相对"闭关锁国"的时期。公正地讲,这道意识形态的"长城"也并非就是中国的政策,是那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对我国全面封锁的结果。这个时期的"汉学"涂满了政治色彩,以法国为代表的汉学较多地保持着传统汉学的学术精神,而美国的"中国学"却成了充满政治意识的现代汉学的代表。美国的"中国学"所关心的不是中国文化,更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问题。这种政治特征,是那个时期美国汉学的基础,这一特征也影响了其他国家汉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由于中国与世界的隔离,由于西方与中国少有交流,因此汉学家不了解中国最新的文化进展(比如新的考古发现),致使汉学处于断炊或"无米之炊"的状态,没有中国文化的支持,西方汉学要想取得研究上的突破也很困难。陌生感和神秘感困扰着汉学家,这不仅是文化的尴尬,也是汉学家的难堪。

人类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等。物质文化表现在衣食住行生活方面,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又极易变化的"具象"文化,即如饮食、服饰、住房、音乐、舞蹈等;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表现在人的价值观、

道德观、家庭观、宗教观等诸多方面，以及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经过高度抽象后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它通过文化灵魂——哲学、文学、语言、宗教、历史等来表达。[①] 观念文化，一俟进入外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野，他们的研究也就进入了对中国文化核心的深层研究。

汉学家从对中国物质文化到观念文化的研究，其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现在，汉学不仅包括对中国的哲学、文学、宗教、历史领域的研究，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Sinology（汉学）和 Chinese Studies（中国学），它们已经发展到可以"异名共体"的地步。

时至今日，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这两种汉学形态不仅同时存在着、共荣着，而且还互相浸透着。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汉学悄然嬗变为中国学，并以自己独有的个性特点和极强的生命力出现在世人面前。美国汉学始自 1830 年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建立，这个学会虽然代表了欧洲那种对东方学文学的兴趣，但这个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②] 这个特点也与"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向中国派出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旨相一致。可见，美国汉学一开始就和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48 年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观》就带有较为浓厚的社会科学特点，与欧洲具有人文科学特征的汉学颇有差异，但它依然属于 Sinology 的范畴。

美国从南北战争后的统一中走向强大，加入强国之列。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是列强联合的第一次尝试。从那时起，承担着相当"政治"角色的传教士进入中国。真正美国式的"汉学"——中国学，就从那时开始，而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之后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为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他的中国学研究不仅影响了美国，也对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或中国学研究都有强烈的影响。

---

① 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载《中华读书报》2001 年 9 月 19 日。

② 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载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在西方，费正清的魅力在于，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以更清晰、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来表述中国。“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不安的近代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像他那样大。”费正清等一批知名的美国中国学家都参与过战时情报工作，在战后作为美国政府的智囊而直接为制定对华政策服务。费正清的研究虽然充满了实用和功利色彩，立场和观点也有偏见，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历史上作为一个贡献巨大的汉学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光辉。美国学者从事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使命感”、“学术个性”和“反唯理智论倾向”，“蔑视学问，更为强调实用性知识”，“更为明显同自己以外的社会，即政治家、实业家及其实践家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① 这就是美国中国学家的基本心态，他们讲究功利和实用，不理会学术上的理智倾向，这与法国汉学家的学术心态、学术个性与学术传统几乎大相径庭。

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它们包括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而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中国学）则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其兴趣根本不在那些负载着古典文化资源的“古典文献”，而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但是，汉学发展到21世纪，其研究内容和方式已经出现了融通这两种形态的特点。这种状况既出现在欧洲的汉学世界，也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中，可以说世界各国汉学家的研究中，都兼有以上两种汉学形态。

汉学（Sinology）对中国研究者来说，被尘封得太久，所以它的空白很多，浩如烟海的资源还有待于深入开掘。这种开掘，不仅可以收获汉学，还可以无意中发现被历史“放逐”和“遗失”在异国他乡的中国文化。编撰“列国汉学史书系”的目的和宗旨，不仅是为了梳理已有的汉学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追踪中国文化的外传历史状况、经验及影响，同时探究汉学的产生、成长、发展与繁荣，还要尽可能厘清这块“他山之石”对于中国文化的作用。当然，“列国汉学史书系”还期望对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有所裨益。

“列国汉学史书系”作为一个文化工程，其撰写的难度非一般学术著

① ［美］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作所能比拟。严绍璗教授谈到 Sinology 的研究者的学识素养时提出四个“必须”：一、必须具有本国的文化素养（尤其是相关的历史、哲学素养），二、必须具有特定对象国的文化素养（同样包括历史、哲学素养），三、必须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基本学理素养（特别是关于“文化本体”理论的修养），四、必须具有两种以上语文的素养（很好的中文素养和对象国的语文素养）。这几点确实都是汉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文化和语文素养，否则很难进入汉学研究的学术境界。

写作“列国汉学史”艰难，而出版可谓难上加难。1995 年曾经“落实”的出版经费，因故而一风吹。人间的事好像天上的云地上的风，飘忽不定没有根，铁板钉钉是没有的，因为钉子可以用“权力”拔出来，一切承诺和协议，都可以化为乌有。虽然“列国汉学史书系”的生长不断受到寒风的袭击，但它终没有自毙于摇篮之中，冬天之后是春天，接着便是收获的季节。这套富有创意和价值的书系，将对中外文化交流和汉学的发展及其比较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说到这里，“书系”编辑委员会同仁和作者，要感谢学苑出版社所给予的支持，尤其要感谢社长兼总编孟白先生和不久前病逝的总编辑助理郭强副编审，由于他们慧眼识金才使这一书系得以面世。

有人认为“汉学史中国人写不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立论”。日本人石田幹之助写了《欧人的中国研究》（1932），莫东寅写了《汉学发达史》（1949），接下来又有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1991），张国刚的《德国的汉学研究》（1994），张静河的《瑞典汉学史》（1995），何寅、许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2002），刘正的《图说汉学史》（2005）和李庆的《日本汉学史》（2005）相继面世。在人类的文化长廊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各种史书琳琅满目，这其中有外国人写中国的各类历史，也有中国人写外国的各类历史。历史，是往事，是记录，是选择，并有相对独立的评论和褒贬。但是，事实上任何一部历史都不是最后的历史，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演进，修史很难一步到位，它需要一代代学者“积跬步”才能“至千里”，只有“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方能“风雨兴”、“蛟龙生”。学问之事非一夕之功，非得有前赴后继者敢于赴汤蹈火“流血牺牲”，才会达至光明顶峰。

开拓者也许会在某个时候将自己的真诚劳作化为欢乐，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定会有人踏着自己的肩膀或是踩着自己的鼻子和头顶攀上高峰，以鸟瞰美丽风光。21 世纪是经济的大空间，对汉学来说也是一个“大空

间”。但是，要探索这个“大空间”，需要有个和谐的“太空站”，需要大家联袂共建；当然世界上需要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历史语境，共同创造彼此接近、认识、理解、尊重、沟通、借鉴与融合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汉学研究发展的机会。

时间在行走，历史在行走。人类创造过历史，书写过历史，但是没有最后的历史。汉学有历史，而且还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汉学及其研究将以自己的品格和个性在人类文化的世界里放出异彩。

阎纯德

2006年12月5日于北京半亩春

代前言:在相互借鉴中发展中韩文化

——与韩国学者李济雨教授的对话

笔者从1996年开始,与韩国学者李济雨进行了多次对话。在近八年的时间里,或者我们在韩国首尔市,或者他带学生来中国的北京、天津,我们的对话几乎总是离不开中国与韩国的文化问题。李济雨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首尔市的崇实大学任教,专门研究我国的晚明小品与中国笑话。2002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一年。现任教于韩国崇实大学中文系。李济雨教授一家都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据李济雨自己介绍,他祖父在上海参加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工作,并且在金陵大学英文系留学;其父也是一位大学教授,曾经来过中国。笔者1996—1998年在崇实大学任教的时候,我们两人的研究室就相隔不远。2002年8月至2004年,笔者再次到韩国崇实大学任教,我与他的研究室还是比邻。本对话是李济雨先生应我的邀请,在2003年12月15日到18日分别进行的。地点在韩国首尔市崇实大学李济雨教授研究室。该对话由笔者整理,并经李济雨先生审阅。

(一)韩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尤其是首尔奥运会后

笔者:从1996年开始,我们两人有许多次关于中国与韩国文化方面的对话。1988年首尔奥运会对韩国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我国的2008年奥运会正在准备中。韩国为中国提供了借鉴。在经济方面,韩国的三十年腾飞以及“汉江奇迹”对于中国的知识界都是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因为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也正好是连续30年的经济大发展时期。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保持我们的持续发展,我们都交换过意见。我们还多次谈到过朴正熙总统。听说,最近很多人又开始怀念他。

李济雨:是的。朴正熙总统当政的时候,就是我们韩国经济开始腾飞

的时期。在我国,上世纪的50年代里,大家的生活还很困难。和中国一样,韩战结束以后,我们也要发展经济。但是,李承晚政府当时很不得人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腐败。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很苦,但是李承晚与他的内阁长官们却搜刮了许多钱。朴正熙虽然是靠武力上台的,但是他与其同僚没有李承晚政府的那些贪污与腐败的现象,可以说是很得民心。他上台初期所施行的三个"五年计划"使得韩国的经济开始了腾飞的阶段。到了1968年的时候,韩国的农村里也开始了改革。以后几年的时间里,农村的草屋顶就几乎看不见了。我国的工业化在朴正熙总统当政的开始阶段,制订下的方针是大力支持重工业和外贸出口。韩战时期,我国的许多基础设施都被破坏了,我们几乎是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设。大约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初几年,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了1970年代,我国的经济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了。也就是在这些年里,我国的文化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中国与中国文化,在韩国国内也出现了两种主张。一种要继续发扬和学习中国文化,因为我们的许多古代的文献都是用汉字写出来的;一种则是要弘扬我们的国语文化,也就是要少用汉字。因为我们的现代韩语可以拼写任何语言。但是,不管是哪一派,都不考虑当时的中国大陆文化。因为我们只是与当时的台湾交往,与中国大陆不仅没有交流,而且在文化上有许多敌对情绪。

(二)从相互妖魔化与误解中走出来

笔者: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文化误解与文本误读吧?我记得1996年我到首尔的时候,在过期的报纸上看到有"共匪"的字样,还感到心惊。可仔细想想,在战争期间或者是战争之后的冷战时期,大家都是有意识的把对方"妖魔化"的。

李济雨:是啊。我们小时候唱的儿歌里就有"中国是胡人"这样的歌曲。在报纸上、广播电台里把中国共产党或者其军队称为"共匪"是经常的事情。

笔者:这都是历史,要让两个国家的人民从战争的互相敌对的情绪中走出来,走向对话与协商,是需要时间的。我不太明白的是,现在首尔市厅①旁边的"大汉门"三个大字,据德寿宫的宣传资料介绍,是在日本占领

① 韩国所说"市厅"即市政府。

期间由当时的汉城府府尹所书。而以前,这个门并不叫“大汉门”。我每次经过那里,看到那三个遒劲的汉字,都有一种感觉。我以为,当时的朝鲜官员心目中,还是竭力把自己的文化与日本的文化区分开来。“大汉门”三个字是面向东方,而朝鲜的东方就是日本。我想,大约这位府尹是在向日本占领军宣布,我国的文化从来就是与日本文化不一样的,我们已经与中国人民一起继承和发展汉文化上千年了。

李济雨:也许有这样的意味吧!刘老师在景福宫大约也看见介绍了,当初,日本的督政府就设在我们的景福宫的前面。其目的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国民看见自己的宫殿。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我们的秘苑那里大作文章,把本来的成片的建筑割裂开,中间划出一条道路来。甚至在许多高一些的山峰上也要钉上很大的铁钉子。据分析是要割断我们的风水。这些铁钉子到现在还有的没有拔出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笔者:是啊。大约只有在我们这样的东北亚国家才会出现类似的侵略者在被侵略的国家里干如此勾当的“文化”行为。起码,是当时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一样,大家都相信风水,才会有如此的举动。

李济雨:不仅是这些,日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侵略,那就是不让我们韩国人接触自己的历史。在韩国,当时与后来的中国“满洲”一样,都要普及日语教育。学生们从小学开始就必须学习日语。我们的历史文献被日军和督政府控制着。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历史研究都是日本人说了算。朴正熙总统当政的时期,曾经展开对于“事大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事大主义”这个词,也是从日本人那里搬来的。日本人故意矮化我们的文化,说我们的文化是从中国学来的,说我们上千年就是在奉行一种“事大主义”。

笔者:据我所知,朴正熙总统的汉学水平是很高的,他的毛笔字写得也很好。按照我的理解,他应当是比较清楚地知道古代高丽、朝鲜与中国的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的。起码,朝鲜王朝从太祖开始,就把“事大”当成是自己的基本国策。太祖之所以反对与中国军队作战,而毅然带兵从威化岛班师,与他的这个思想有直接的关系。而那些被国王派来中国的使臣则是把“事大”与“字小”连用的。也就是一方面朝鲜国王纳贡称臣,另一方面,中国皇帝对于朝鲜王国采取的是“字小”的策略。但是,也就是在朴正熙当政期间,出现了禁止使用汉字的命令。这也与讨伐“事大主义”有关吧?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韩国建设现代化的解答

李济雨：有直接的关系。日本人把我们韩国人骂倒，他们说我们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说我们从古代就一直“事大”。朴正熙总统的态度很坚决：我们韩国人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他支持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韩国的历史文献，在日本占领期间也还都是汉字。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把它们整理、翻译成现代韩语。这个工作的劳动量很大，到现在还在进行。同时，我们的国语经过政府的提倡，很快就成了国民都能够掌握的语言。以前，不懂汉字的人是不能读书的，但是现在，我国几乎没有文盲。任何人都可以读书，任何人都可以写信、写文章。朴正熙时期的文化政策与他的经济政策一样，都是成功的。他也并不是要废除汉字，而是规定国民必须掌握一定的汉字的识别与书写能力，这些汉字是必须掌握的，其他的汉字，就留给专门研究的人员去掌握了。这样，我国的文化最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语言和文字方面，也就基本上完善了。

笔者：但是据我所知，后来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因为毕竟韩语里将近百分之七十的词汇与汉语是一样的。

李济雨：是的。因为韩语里的许多词汇是从汉语里借用的。这个比重太大。例如古汉语的词汇，有些我们已经使用了上千年。这些词汇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进行韩语的对译。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要全面改变，自然会有一些问题。现代韩语是拼音文字，其字形并不具有表意功能。而汉语则具有表意的功能。最麻烦的就是同音的字与词。在人名方面尤其麻烦。我国的姓氏不像中国那么多。我们的许许多多的人都姓朴、金、李，名字也都是表示吉祥、发达、进步的字眼，因此重名的人很多，字音方面相近的就更多。所以，朴正熙总统的时期，法律文书与正式文件，还是要求加上汉字。

笔者：我注意到，在朴正熙总统当政的时间里，包括《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的汉字都还不算少，而在朴正熙总统被刺杀以后，尤其是上世纪的90年代，韩国报刊上的汉字越来越少了。而在韩国与我国于1992年建交以后，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非常想学汉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

李济雨：我们国家的语言与文字是直接对应的。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距离很小。可以说，会说的人就会写。而在现代语言里，英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我们的“韩格儿”（“韩语”的音译）拼写起来就十分方便。朴正

熙总统时期,虽然限定了汉字的数量,其实并不是不要大家学汉字。最重要的是汉字写起来、学起来太费时间。至于那些有很高汉学修养的人,在什么时候都一直很受大家的尊重。对我国的学生来说,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说,与其花费十年的时间学好汉字,不如用这个时间与精力去学习他们要学的现代科学技术与英语。特别是在朴正熙时期,我们所接触的中国,就是台湾与香港。台湾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我国从台湾那里学不到什么,我们的经济需要也不是那里可以满足的。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学生们,包括小学生,都急切地要学习欧美的先进技术与科学知识。所以说,朴正熙总统的"命令"不是强迫国民执行的,而是符合了大家的心愿的。刘老师现在看见的报刊现象,也不是哪个政府官员强迫大家不写汉字。而是现在的读者,知道很多汉字的人越来越少。这种情况是自然形成的。朴正熙的年代,不管政府如何要求,还是有许多人接受的是旧式的教育,他们学汉字学过几年,甚至是十几年。那时候的报刊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因此,报刊上出现很多汉字是正常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上学的时候就没有学过多少汉字,走在大街上也看不到许多汉字,他们对于汉字普遍有一种畏难的情绪。报刊上的汉字也就跟着少起来了。

笔者: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自从中国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在韩国希望学习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汉语热"从我第一次到首尔市到如今八年了,依然是经久而不衰。更重要的现象是,来中国学习和创业的人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根据《朝鲜日报》的报道,仅是在我国的山东青岛附近,就有十万以上的韩国人。韩国的学生们告诉我,在上海与南京地区、北京与天津地区和沈阳附近,以及延边附近,都有大批的韩国学生和其他人员。李老师在北京五道口和天津万德庄附近,可以看到很多韩国餐馆和其他类似的商店。就是那些不是韩资的商店,也都纷纷打上韩语来招徕顾客。韩国学生们说,在北京五道口和天津万德庄,你可以不说汉语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如此大规模的交流,不要说高丽时代的几十个在中国的"高丽村"无法与之相比,就是朝鲜时代的大规模使团,也无法望其项背。甚至我们也可以说,1992 年的时候,韩国政府与中国政府都不敢想象,我们两个国家在十几年以后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交流。

笔者:在中国的韩国人可以不说汉语,确实很方便。但是,也还是有相当多的韩国人希望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流。因为毕竟他们到中国来是来学习、来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在首尔看到,还有许多韩国人希望学习汉语。

但是，由于环境的关系，目前韩国青少年的汉字认读能力已经与上世纪的老人们无法相比了。我记得本学期内，“KBS”[1]举办的中学生知识比赛中，有一道题目是写出“自由”两个汉字。结果，有许多人写不出来。也有的学生写的是“子由”，有的写“自曲”。这些被淘汰下去的学生，与他们所处的环境不能说没有关系。除了课堂上，学生们见到汉字的机会太少。对于中国人来说，到韩国旅游也很不方便。记得有一篇文章，大约是发表在北京的《国际商报》上吧？作者说他去过欧洲与北美，都没有感到不方便。因为他懂英语。而恰恰是在自己国家的近邻韩国，他感到很不方便。不要说韩语他看不懂，就是那些翻译成英语的地名，他也很难查对。我的一个朋友，在首尔费了很大的劲也无法读出著名的“乙支路”，因为那英语是按照韩语的读法拼写的，除非他懂得韩语，否则他没有办法知道那是什么路。我给他一张中文的地图，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三个汉字！

李济雨：我们韩国的学生在中国的“方便”不是好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在中国可以到处找到自己的同胞，到处说韩语，他们的汉语水平就很难提高，也就失去了留学的意义。很多学生的家长也关照孩子们，不要到那些韩国人集中的地区去留学，尤其不要整天和韩国人在一起。否则还留学干什么？刘老师说到的汉字少与学生不会写汉字的现象，在我国的学者们也早已经注意到了。我国的汉语水平，从整体上说，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最初进入到20世纪的时候，虽然是在日本的占领之下，也还是有很多人在考虑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建设问题。韩战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对于中国文化，虽然说我们与中国有过上千年的交往，但是，中国文化不能给我们建设现代化的解答。我们的古代文化可以用中国文化来建设，但现代化的韩国却不能还是这样。对于学生们来说，他们要学的东西很多，研究自己的古典只是毕业以后很小的一个出路。至于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他们的就业出路就更窄。我们国家从1950年代开始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贫困，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建设一流的国家。学生们能不能写出汉字，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教育界必须思考的问题。就拿现在我们的中文系来说，刘老师也知道的，学生们毕业找工作，汉语水平并不是可以包办一切的指标。他们也必须会英语。大公司对于他们的英语水平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如果他们只是会汉语，只是会写汉

① KBS即“韩国放送公社”，是韩国最大的电视台。

字,他们照样找不到很好的工作。这就是现实。我记得我和刘老师在几年前就讨论过,我们韩国四面被大国包围着,北面是俄国,东面是美国,南面是日本,西面是中国。我们要求发展,就往往没有办法面面俱到。对于今天的韩国来说,经济发展依然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文化要是脱离开这个主题,就不会发展。我们国家的文化选择,也是这样。在建设我们国家的民族文化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与中国一致的东西。我们要的是可以体现我们的国家与民族特色的文化。当然,我们也没有刻意去抛弃和批判中国的文化。中国有"五四运动",还有批判封建的"文化大革命",我们韩国没有这样的运动。对于传统,我们的保护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传统的礼仪,传统的音乐,传统的手工艺,都是我们韩国人的骄傲。说到汉字与汉语,我们的主要考虑还是交流。最近几年,我们韩国与中国的交流多了,来中国的人也多了。韩国国内的学汉语的人也多起来了。现在很多的中学甚至小学都开设了中文的课程,就是适应这个需要的。再加上在中国的这些留学与从事商务的人,相信几年以后,我国的汉字水平很快就可以有大的提高。

(四)韩语是完全拼音化了的语言

笔者:我在这里强调个人在韩国感到的不方便,也许有些自私的意味。但我们假如从韩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也会发现目前的状况与韩国的发展不太适应。首先,我在韩国的报刊和电视上,经常听到要把韩国建设成东北亚的金融与物流中心等的提法。我不知道韩国国民对于这个口号是怎么想的。从我的角度看,这里首先就有一个李老师所说的交流问题。既然是东北亚,就要有东北亚的特点。要想把韩国建设成东北亚的金融与物流的中心,就要考虑语言的交流问题。CJK[①]的流通语言按照国际惯例为英语,我们也要考虑到,汉字是中国、日本、韩国从古代就就共同使用的交流符号。目前三国正在联合开发基于汉字基础上的电脑操作平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不管是处于什么样的主张,我们看到,日本人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都没有放弃使用汉字。其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实际上与韩国的"韩格儿"一样,都可以拼写任何汉字。据我所知,日本的假名比韩国的"韩格儿"出现要早很多年。但是,他们没有放弃汉字

① CJK是中国、日本、韩国的英文字头。

的使用。这既不影响其现代化的进程,也没有对于其国家存在的合理性构成任何威胁。从韩语的发展来看,汉字的引入并没有中断韩语自身的发展历史。世宗大王与其臣子修出的巨著《训民正音》,其本意我认为也不是要废弃汉字。我个人的看法,世宗大王自己的名气盖过太祖,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对于一个王朝来说,通常太祖的地位是最高的。而世宗大王在古代与现代韩国的地位,都超过了太祖。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创建了韩国的文字。现在,在韩国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见世宗大王的塑像。国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他的肖像。因为他的肖像就印在一万元韩币上面。我在拜读世宗大王近臣们的文集时就感到,这位大王为自己的子民作了千秋万代的设计。他派使臣到我国的东北地区,反复去请教一位被明朝流放的大臣。这位大臣的名字叫黄瓒,是明朝的一位大学士。其中,世宗派的使臣申叔舟(1417—1475)来往辽东与首尔之间有十三次之多。申叔舟等为什么来往那么多次?世宗大王既然要创建文字,完全可以不管中国的汉字如何发音,就按照自己的体系来建立韩语文字就可以了。他考虑的应是交流问题。韩国不管如何发展,也还在东北亚,不会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东北亚的国家里,中国的汉字是发展最成熟的文字。日本也在用汉字。这样的大背景下,世宗大王是不会对于汉字轻言放弃的。不仅当时不放弃,以后的时间里,也没有放弃的意思。这就是尽管创造了"韩格儿",而朝鲜王朝的文人们还是使用汉语作为其书面语达几百年之久的原因。我认为,汉字在我们东北亚具有不可替代的亲和力。

李济雨:世宗大王的说法很明确:"我国语言与中国不同。"我们是借用了汉字。这并不是说,汉字就可以完全把我们的语言里的内涵都表达出来,就是在文人们使用汉字的时候,民间的老百姓,以及不是正式文书的口语里,我们国家的语言还是自己的韩语。我们借用的汉字所表达的观念,与同样汉字在中国所表达的观念并不一定一样。我记得刘老师在1997年的时候就告诉我,韩国的"礼"与中国的"礼"虽然是一个汉字,其内涵却有着根本的不同。我记得当时刘老师在研究《礼记·乐记》。在古代,我国的书面语与口语是分开的。书面语所表达的,是朝廷与国家的大的事情。或者是民间的诉讼、契约等特别的事情。一般的生活里,是不用书面语的。对我们整个韩国来说,可以掌握书面语的毕竟是少数人。大多数的古代韩国人说的还是韩语。虽然在韩语里也有许多从汉语里借用的词汇,但是那些真正具有韩国自己的特色的东西,真正属于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语汇,

汉语的方块字是表达不出来的。

世宗大王之所以要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是否有废除汉字的意味在里面,我们不好猜测。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要考虑到。那个时候不管是韩国、中国还是日本,大家的交流范围只是东北亚。美国还没有出现,俄国的发展对于我国既构不成长期的威胁,也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东西。为了更好的在这个小圈子里活动,我想,我们的世宗大王也许没有考虑废除汉字。正如我刚才说到的,就是现在,我国的政府也没有设想过要废除汉字。需要的时候就使用,不需要的时候就不使用,为什么一定要废除呢?更何况我们还有那么多的汉语词汇。正如刘老师所说的,在整个东北亚,汉字是具有特殊的功用的。不管你是来自中国,来自韩国,还是来自日本,只要你会写汉字,大家的发音可能根本不一样,也就觉得很亲切。汉字本身确实是具有亲和力的。至于刘老师说的我国要建立东北亚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的事情,商业上的语言选择恐怕也有它们自己的具体要求。就目前的情况看,今后的三国贸易等方面的文书,我们别无选择的还是要用英语。尽管现在能用英语来表达并且十分流畅的人还比较少,作为正式的贸易与金融方面的来去文书,还是要用英语。确实,我们处的东北亚有自己的特点,韩、中、日这三个国家都使用汉字。但现在的贸易与金融的正式文章,如果使用汉语也会造成混乱与麻烦。我们可以在那些不是正式的文书的地方,尽量多使用三个国家都可以看的明白的文字。这时汉字就派上了用场。例如货物包装等,可以尽可能都写上汉字。汉语叫“方便面”的食品,我们韩国可以写上“拉面”,这样三国的人都可以看懂了。这样的产品流通起来,总要比那些印着阿拉伯文或者其他什么文字的货物更让东北亚的人们容易明白。说到东北亚的语言特色,我认为三个国家还是各有自己的特色的:中国的汉语是没有走向拼音化的语言,中文里的拼音与语言是分离的;日语是半拼音化的语言。它有一半是拼音,一半还是汉字;只有我们韩语,是完全拼音化了的语言。这三种语言各有自己的特色,也各有其长处。当然,也各有其不足。

(五)“礼”的观念在韩国已经深入人心

笔者:我见过不少韩国人在电脑上打字,确实比较快。还有许多人可以“盲打”,他们不看键盘就可以把韩语打出来。这功劳应当归于世宗大王。据我所知,早在新罗时期,在汉文的影响之下,新罗人就用汉字作为自

己语言的记录之载体，而创造了“吏读”。据我国学者杨昭全先生介绍，所谓“吏读”，就是用汉字的语音或者语义来表示新罗人自己的语言发音。作为粘着语系的朝鲜语，是需要表音文字的。而因为新罗接触的汉语不是表音文字，所以，在借用汉字来表达朝鲜语言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在公元692年（新罗孝昭王元年），新罗的著名学者薛聪与强首二人就创造出来了“吏读”。吏读不仅是用汉语表达朝鲜语的发音，也用汉语的意义。例如，在朝鲜语中的“哈够”是汉语“做”的意思，在吏读里就借用了两个汉语文字“为古”。因为“哈”这个语音表示“为”，而“够”表示的是“古”，因此，“为古”就成了“哈够”的吏读。“吏读”是新罗王国的汉语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产物。可以说，假如薛聪与强首的汉语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要想利用汉语来为自己的民族语言来提供记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吏读”是朝鲜自己创造的民族语言的第一个符号标记，它为后来的朝鲜语的发展，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为朝鲜半岛自己的语言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可以说，它是后来朝鲜“谚文”的直接的先导，也为世宗大王的《训民正音》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在首尔大学奎章阁参观的时候，见到了许多版本的汉文与谚文并存的书。像孔子与孟子的著作，几乎都有“谚解”。我自己这次还特意在首尔的仁寺洞买了一本线装书，就是《孟子谚解》。大约是上世纪20年代的印刷品。我还注意到，在现在的首尔大街上、地铁入口处，有一些人在卖《古文真宝》《明心宝鉴》之类的书。这些书上有汉文原文，也有韩语。主要是一个叫做“恩光社”的出版社出版的。从中国的情况看，假如一本书可以摆到“地摊”上，这本书通常都是很畅销。由此推断，这类书在韩国的市场还很大。那么，韩国的读者学习这些书里的什么呢？是汉语还是里面的观念？

李济雨：也可以说都学吧！正如刘老师知道的，我们韩国的现代生活里也有许多古代的观念。例如“忠”“孝”“礼”等等。那些在地摊上卖的书里，就宣传的是这些观念。我们韩国是一个很讲究“礼”的国家。现在的首尔市南大门就是“崇礼门”，它是我们的第一号国宝。在我们的国家里，国民的信仰是自由的。大家可以凭自己的爱好去信仰佛教、基督教等等。也可以参加任何社团。而不管他参加什么活动，有一点是大家都一样的。韩国的国民都深深地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我们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国民有共同的祖先，在韩国，我们全体国民都是骨肉同胞。所以，中国

儒家的“忠”、“孝”、“节”、“义”等观念在我国很容易被接受。而且,这些观念深入人心。刘老师去过的成均馆大学里,还有一个“儒教”。在中国,是“儒家”,在我们韩国就是“儒教”。在我们韩国,不管你信不信仰儒家,其实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儒家思想的影子。正如刘老师说过的,我们国家的“礼”与中国的“礼”也是不同的。在我们的国语里,对于不同的人的称呼不同,连动词也要因为辈份的不同而改变。日常生活里很简单的动词,例如“吃饭”、“睡觉”、“走路”等,在我们的韩语里都要根据对方是长辈还是同辈选择不同的词语。如果动词用错了,那就是“失礼”了。失礼是很没面子、很丢人的事情。古代的中国儒家著作,可以把我们的“礼”的一部分内容表达出来,所以很受欢迎。到了今天,这些韩国古代的文人编辑或者著作的书,就成了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所以至今还很受重视。

韩国与中国的“礼”不一样。在中文里,没有韩语里那么复杂的表示尊敬的词汇变化。中国人也没有韩国人对于长辈尊敬得那么厉害。举个例子来说,在中文里,“哥哥”就是哥哥,对于弟弟和妹妹都是一样的。可是,对于我们韩国人来说,弟弟称呼哥哥与妹妹称呼哥哥要用不同的词汇。在中国,学长就是学长,有些尊敬就可以了。在公开的场合,不表示尊敬也没有关系。但是在我们韩国,学长对于学弟、学妹的权利与地位几乎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我们称呼他们为“先辈”。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对于长辈与长者要服从、谦让。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民族的成员,我们要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不仅如此,我们还教育自己的下一代,要尊敬长者,服从师长。

笔者:韩国的“家礼”体系有其明显的长处:第一,“礼”的观念很容易建立。檀君神话虽然具有某种虚幻的特色,但是他所具有的全民族共同血缘之始的象征意义是十分重要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思考“我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问题往往表现为个体的文化认同。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在汉文里的“礼”字还没有传到半岛上的时候,那里的韩民族就应当有自己的“礼”的观念。汉字的出现,把此种观念固定下来,变成了可以复制、传播的文化符号。“礼”的观念也因此更加清晰、更加完备。这个时期,大约也就是我国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说的谦谦君子之国,有凤翱翔的“东方之国”的时期吧?至今韩国总统府的标志还是凤凰。第二,因为是单一民族的国家,韩国的礼比较稳定。我们可以在历史文献上看到,在韩国,无论社会生活有什么变化,大家认为家族关系不会变。父

亲永远是父亲，儿子永远是儿子。家族、民族之内的亲情不会改变。在一个血缘关系十分清楚的国家内，“礼”所规定的“高”、“低”、“上”、“下”、“远”、“近”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定位。尊老与爱幼的良性互动，可以为长者与幼者提供“双赢”的生活模式。处于社会的地位低下者把自己的权利与利益委托给长者，同时，社会把相应的义务委于这些长者。要他们把自己的权利、利益与义务、责任同时肩负起来。类似“先辈”那样的带有些夸张的称呼，其实放大的是社会成员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距离与差距。本来，在大韩民国建立以后，宪法赋予公民以平等的权利。“礼”与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之间的平等原则是矛盾的。但是，在我们东北亚却普遍存在“礼”与“法”并存的现象。我个人的感觉，在韩国所存在的“礼”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大题目。为什么在韩国的西方式的法律规定下，其“礼”还可以照样存在？而且，还有那么大的感召力？就我个人的观察，在适当的范围内，“礼”在韩国的社会生活里是与“德”比较接近的一种东西。它是法律的补充，也是法律的完善。比如，我经常看见的是，一个司机与另一个司机在狭路上会车。谁该向后退？这个时候恐怕交通警察也不一定说得清楚。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去多说什么。这个时候的一个默认的原则就是，长者先行。这样的原则可以解决许多麻烦问题。对于一个单一民族的社会来说，每一个年幼者、年轻人都会成为长者。所以，大家在生活里的表面的、暂时的不公平，是期望着维持一种更加长久的公平。而如果仅仅依靠法律，也许就只能是表面上得到了公平，而实际上这种“公平”是预支的、或者是透支了的。法律的公平在韩国是依靠全体国民的介入来维持的。对于任何一个韩国国民来说，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一份。所以，当需要资助、需要奉献时，韩国人可以齐心协力去干任何事情。可以出现1997年的捐献奇迹，出现世界杯时期的“红魔”，出现抗议美军轧死女中学生的“蜡光游行”。这也是去韩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感叹的地方：韩国几乎很少看到外国汽车！大街上都是韩国自己的汽车产品。“身土不二”的口号也很有韩国的特色。韩国在三十年创造的“汉江奇迹”，应当说，与这些都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长，也有其短。韩国的“礼”比起中国的“礼”来比较容易建立，也比较稳定，至今还在韩国的生活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韩国的礼是建立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之上的。而我国的礼从古代就不仅仅是“家礼”而是礼乐之礼。我们的礼不是为一个民族设立的。就如同

韩国只有檀君而我国有黄帝与炎帝两位祖先一样。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整体。孙中山就提出过"五族共和"的主张。我国的礼乐之"礼"在处理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的关系、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上,我认为比韩国的礼更方便。

(六)讲究"礼"是古代朝鲜君臣治理国家的一种艺术

李济雨:我们的"礼"是在自己民族内形成的。但是,正如刘老师在文献里见到的,我国从新罗开始就与中国有许多的往来。我国与日本也有许多往来。在高丽时代和朝鲜时代,我国的君臣与中国在往来的时候,都要遵循"礼"的。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与中国、日本、蒙古等国家往来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我们国家的礼也是能够很好地处理与外国、外民族的关系的。对于任何外国和来我们国家的其他民族,我们都是以礼相待的。我国来中国的使臣给当时的中国文人的印象,也都是文质彬彬、很讲礼仪的。

笔者:我同意李老师的说法。不仅如此,在高丽和朝鲜时期,来中国出使的使臣往往是以其文才、其礼仪之邦的风度,让中国君臣刮目相看的。例如,整个朝鲜时代的使臣来中国的时候,都是把自己的地位做"退一格"处理的。他们对中国的朝廷称自己是"陪臣",不把自己当"外藩"而看作是"内服"。朴趾源随其族兄来中国,到达东北地区的时候,说自己在"异域",就受到了其他使臣的嘲笑。而中国的明朝政府与清朝政府在处理与朝鲜关系上也同样做的是"退一格"处理。不仅把朝鲜当成外藩,还当成外国来处理双方关系。这在当时是礼的要求,也可以看成是朝鲜君臣高明的统治艺术。对于中国来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才不会被来自君子之国的使臣看不起。从这一点上看,起码朝鲜王朝的君臣是很会处理与本国以外的人如何施"礼"的问题的。清朝让朝鲜保留明朝衣冠,就是明证。

但是,当朴趾源一行被礼部要求拜见西藏班禅的时候,朴趾源的族兄坚决不肯给班禅下跪,他们所代表的朝鲜政府与清政府在文化上就发生了冲突。

李济雨:古代朝鲜在与中国交往时很讲究"礼"。讲礼也是其治国艺术的一部分。但是,朴趾源一行代表的是我们的朝鲜政府。他们认为,我们来中国是因为这里是中国,是箕子的故乡,是当时最发达的汉文化的故

乡。我们来中国拜见满族的皇帝就已经是不情愿的,是被迫的了。对于远在西藏的班禅,我想朴趾源他们认为班禅是“胡人”,是不值得为他下跪的。

笔者:这就是朴趾源的真实想法。乾隆自然很不高兴。所以,朴趾源等从北京到热河的时候,一路上几乎所有的军民都为他们让道,过河的时候也是先让朝鲜使臣先过。但是,回北京的时候,清朝官员的接待就很冷了。这里我觉得就有一个文化冲突在里面。乾隆要的是兼收并蓄的文化。否则他的满族统治就会很快瓦解。他拜班禅为师傅,要皇子、贝勒、大臣们为班禅叩头,意在暗示我们的礼不是仅仅为汉人设立的。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只要你站在了大清的旗号之下,你就是大清国的子民,也就可以享受“礼”所带来的尊敬与关怀。朴趾源等以朝鲜的礼来理解中国的礼,当然会出摩擦。清朝礼部官员很生气,也是有原因的:班禅是胡人,我们满人是什么?

(七)韩国要学习和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李济雨:(笑)是这样。朴趾源还是很开明的。就是他明确主张要学习满人,学习清朝。他在其小说《许生传》里批判了朝鲜士大夫的保守主义思想。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我们韩民族的白色服装是殷朝的遗留。因为殷朝是尚白色的。并且,那些士大夫们很以此为自豪。他们认为自己的服装是正统的汉文化的依存。就连中国也改了,成了“胡服”的模样了。乾隆年间的中国士大夫,尤其是汉族的士大夫,有许多人确实还留恋明朝的服饰。这些也让那些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沾沾自喜。朴趾源的小说《许生传》里,就借人物的口批判这些现象。朴趾源亲自看到了中国在康熙、乾隆等皇帝的治理之下的成就,他也看到了中国文化在满族统治者统治之下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衰落下去,而是焕发了新的生机。这大约就是近年来中国学者所说的,满族用武力征服了中原,而中原用文化反过来征服了满族吧?康熙的汉文功力还很让朝鲜文人看不起,但是乾隆的汉字、汉诗他们就不敢小看了。朴趾源借许生的口说,我们朝鲜使臣的衣服在中国人看来怪模怪样,很滑稽。这些衣服在中国都是戏台上才穿的衣服。朝鲜使臣一定要夸耀自己的服装是白色的,是殷朝太师的遗制。实际上在中国白色的衣服是丧服。顺便说一句,我们韩民族的服装,其实与殷朝没有关系。韩民族喜欢白色衣服的历史可能比箕子的历史还要长。无论如何,朴趾源的

看法开启了韩国的“实学”。其根本宗旨就是要打破成见,全力学习和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与中国、俄国、日本相比,我们是小国。我们有危机感,我们一定要向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看齐,否则就没有出路。以前汉文化是韩国所知道的最先进的文化,好,我们学习它并且掌握它。朴趾源的时候,清朝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我们也要学习它,掌握它。不是一般的学习,而是要掌握。1970 年代,德国的科学技术很发达,我们就有很多人学习德语,到德国去留学。到现在,我国与德国的外交关系还是很好。至于学习英语的人、学习日语的人就更多了。因为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我国才会在各种资源都比较缺少的条件下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现在才会有三星集团、LG 集团这样的跨国公司,才会有世界上一流的电子产品生产线。

现在,我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商贸往来已经很多了。以后还会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韩国的许多厂商也把自己的业务拓展到了中国。韩国的文学艺术还在中国掀起了“韩流”。

(八)两国文学艺术交流的基础

笔者:中国的观众对于韩国的文学艺术有亲切感。韩国的电视剧在我国掀起“韩流”,其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家庭关系让中国人看了觉得很亲近。我在首尔看的第一个电视剧是《初恋》。虽然当时对白听不懂多少,我还是被晓京、灿赫和灿宇的故事打动了。电视剧里男主角的使命感、对于家庭的责任感,以及对女孩子的爱护,都带有明显的东方特色。这样的电视剧与美国好莱坞大片里个人至上的主人公不一样。从《天桥风云》《星梦奇缘》到《蓝色生死恋》,韩剧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其内在的文化底蕴是流行的基础。尤其是宋慧乔、宋承宪和元斌主演的《蓝色生死恋》,到今天还很受欢迎。就是比较“另类”的电视剧与电影,例如《我的野蛮女友》,在中国也深受欢迎。郭在容导演在此影片里塑造的是全新的女性形象。全智贤、车太贤的表演让我十分感动。我看的是该片的 DVD 。我感到,影片的成功说到底还是我们亚洲尤其是东北亚的文化使然。“野蛮女友”是因为前男友的去世而发生的行为上的变化。其内心一点也不野蛮,她的可爱之处恰恰在于此。韩国的女子比中国的女子还要东方。而这才是该片成功的文化语境。我不知道北美和欧洲的观众如何看待这部片子,我只知道在中国、在日本,全智贤成了特别受欢迎的演员之一。

李济雨:在韩国,中国的电影与电视剧也很受欢迎。现在我们的电视台还在播放着《还珠格格》。现在的年轻人,休息的时间里不愿意看书的人很多。他们愿意看电影和电视剧。记得刘老师刚来我们韩国的时候,还不知道“黄飞鸿”是谁,可是许多韩国人知道。(笑)张艺谋、刘德华、巩俐、成龙等人,在韩国都有很高的知名度。韩国与中国在文化方面的摩擦还会有,交流是主导的方面。

笔者:我完全赞同李老师的意见。不要说两个国家,两个家庭、两个人还免不了吵架呢。只要我们不断地沟通,就可以化解各种摩擦与冲突,达到双赢的目的。谢谢李老师。

目　录

代前言:在相互借鉴中发展中韩文化
——与韩国学者李济雨教授的对话 …… (1)

第一编　从箕子到崔致远:半岛汉学的发轫 …… (1)
第一章　高丽王朝之前的半岛汉学 …… (5)
第二章　汉字对古朝鲜乐舞与口头诗学的颠覆与重构 …… (11)
第三章　高丽王朝之前的半岛汉文学 …… (22)

第二编　高丽王朝的汉学 …… (30)
第一章　高丽时代的汉文学 …… (33)
第二章　高丽的宗教与汉学 …… (51)

第三编　朝鲜王朝的汉学 …… (79)
第一章　朝鲜王朝的汉文学 …… (80)
第二章　朝鲜王朝的性理学 …… (93)
第三章　“燕行录”的汉学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 (108)

第四编　当代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 …… (122)
第一章　韩国学者的中国散文研究 …… (123)
第二章　韩国学者的中国小说研究 …… (133)

第五编　韩国现存汉文作品 …… (150)

后　记 …… (205)

第一编

从箕子到崔致远：半岛汉学的发轫

汉学在朝鲜发轫之前，整个半岛还没有文字。据史料记载，周武王攻下殷商的都城以后，于公元前1066年封箕子到朝鲜。箕子到了平壤以后，建立了一整套文物制度。其中的“八条之教”一直流传到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主义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箕子的遗迹还有一部分是可见的。古代朝鲜的许多文献里对箕子也有记述。“箕子率中国五千人，避地朝鲜……遂都平壤”①。“平壤府……本三韩旧都。唐尧戊辰岁，神人降于檀木之下，国人立为君，都平壤，号檀君，是为前朝鲜。周武王克商，封箕子于此地，是为后朝鲜。”②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释箕子之囚”。箕子朝鲜与周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十二年朝贡一次。周武王十三年，箕子回到镐京，与武王共同讨论治国安邦之道，还作《洪范》一文。周武王很满意。③ 箕子在半岛“设八条之教，一变夷俗”。假如我们从汉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则箕子的“八条之教”就是当时朝鲜半岛汉学兴起的起点，是半岛汉学的发轫点。

箕子朝鲜是汉学的发轫期。尽管在箕子之前，朝鲜半岛就与我国有着许许多多的文化联系。考古证明，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陶罐与韩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土的陶罐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它们都是“筒罐”。至于后来的红山文化对于朝鲜的影响就更大了。韩国的百济王陵里，居然有大量的与中国红山文化几乎一模一样的遗物。这些显然说明，尽管半岛在箕子之前没有如箕子朝鲜时代的系统文物，也还是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之所以把箕子朝鲜看作是半岛汉学的发轫期，是

① ［韩］《东国史略》。

② ［韩］《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大王实录》。

③ 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第12－1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因为在此之前虽然在那里有汉文化的痕迹，但是直到箕子朝鲜建立以后，才出现了系统的汉文化研究与应用。箕子是殷商王朝的太师，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为朝鲜半岛带去了已经在中国发展得相对成熟的青铜时代文化。对于箕子的研究与崇敬，是朝鲜半岛三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正如世宗大王在1428年的教谕中所说："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师于我邦，遂其不臣之志也。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华，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赖。顾其祀宇隘陋，不称瞻式。我父王尝命重营。予承厥志而督之。今告成矣。宜刻诸石，以示永久。史臣其文之。"①世宗大王是朝鲜半岛的一代英主，也是文化英雄。他的头像至今还印在韩国一万元面值的韩币上。"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华，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赖。"世宗大王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箕子八条之教在半岛开启了后世的汉学。其标志性的特点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为后世的崇"礼"打下了基础。现今韩国的第一号国宝是首尔的南大门，也就是"崇礼门"。时至今日，朝鲜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对于"礼"保持着最严格的要求的民族之一。这起码说明这个民族在任何世界风潮的影响之下都不会丢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而从社会心理学的积淀看，则说明了箕子之教对于后世影响的深远。

第二，为后世的儒家文化在朝鲜半岛的长期兴盛打下了伏笔。相对于箕子，孔子是后学。他们的生活年代距离有近千年之久。在箕子朝鲜已经把汉学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时候，孔子以及其儒家还没有出现。但是，孔子对于周先王的怀念与景仰以及儒家所抱定的"克己复礼"的生活态度，都使得儒家与箕子在整个文化价值取向方面并不矛盾。从高丽时代到朝鲜王朝的读书人，都把箕子与孔子并称为"二圣"。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圣人门徒，但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不同，朝鲜半岛的读书人以箕子门生自居，并且为此而十分骄傲与自豪。

第三，为后世朝鲜半岛的各个王朝与中国不断进行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箕子之所以被封到朝鲜，是因为周武王尊敬箕子，让他十三年朝觐一次。这在礼制下属于"外藩"而非"内服"。也就是说，在周武王的心目中，箕子所在的平壤并不是自己治理的地方，而是境外的方国。而在箕子看

① ［韩］卞季良《箕子庙碑铭并序》，《韩国文集丛刊》，第8卷，第147页，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

来,他之所以可以活命,完全是周朝统治者宽宏大量的结果。他到了朝鲜以后,也有义务来反思殷商灭亡的教训,帮助朝鲜半岛的居民尽快地走向富强之路。后来,箕子曾经回到周朝,与周武王会谈并提出了自己治理国家的有关设想,并得到了周武王的高度评价。这些历史文献记载都说明,箕子即使身在朝鲜,依然思考着如何才能避免走殷商统治者灭亡覆辙的问题。而经过了文化变革以后欣欣向荣的西周,恰恰是朝鲜半岛的统治者最切近的参照系。后世的朝鲜王朝从来也没有向箕子那样十几年朝觐一次,而是每年三次朝觐,甚至一年中六次派使节到中国来。究其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与箕子之教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的。

第四,建立了以汉字为唯一载体的书写规范。从箕子到平壤直到日本人强占朝鲜,其间半岛汉学的基本载体一直是汉字。后来在半岛出现的韩语、日语和英语,就文字的使用时间而言,几乎与汉字没有可比性。

朝鲜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是世界上唯一的粘着语言。其发音并不容易用单音节为主的汉字来模拟。但是由于箕子的倡导与实践,汉字成功地在朝鲜半岛使用并传播开来。不管是文学、史学、哲学,还是佛教与道教教义,在半岛的传播与研究都是以汉字书写的。由于发音与书写的不一致,半岛各个王朝的文人都要付出比中国人更加艰辛的劳动。但是从现存的文献我们就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文人为此发出过抱怨。文人们乐于书写,而且创造了在中国境外唯一的一个汉字书写的王国。不管是日本还是越南、蒙古,都没有古代朝鲜的文人那样痴迷于书写。假如说欧洲从古希腊、古罗马就逐步产生了著名的"语音中心主义"的话,那么,世界上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另外一种东方文化里,就产生了十分明显的"书写中心主义"倾向①。这样的一种倾向,在中国由于书写与发音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不十分明显。而在朝鲜半岛那里,则是十分明显的。

第五,确定朝鲜汉学始终是与实践不可分割的学问。综观世界汉学,不管是欧洲的利玛窦、马可·波罗、伯希和、玛克思·韦伯、李约瑟,还是北美洲的费正清,都没有把汉学广泛地应用于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实践。他们的研究仅仅是研究。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者未必会作汉诗,研究中国政治的人根本就无法在其国内进行中国政治的实验。他们是学者而不能学以致用。而朝鲜半岛在古代素有"小中华"之称,汉学家们

① 参见拙著《文本研究》,第3-7页,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在朝鲜半岛不仅是学问家，也是大臣甚至是国君。他们是观念意识形态的制造者，也是上层建筑的构建人和掌控者。我们不能确切地说，“政教合一”的东方传统在半岛是由箕子建立并流传下来的，但起码箕子之教为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箕子遗教是“小华”汉学之根。汉学以及相应的实践，改造了朝鲜半岛的精神境界，也改变了那里的物质世界。从官僚建制到建筑、语言、文学、美术、书法、服饰等各个方面，无不显示出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第一章
高丽王朝之前的半岛汉学

古朝鲜接受的最早的汉文化,是以箕子为代表的殷商巫术文化。殷商文化与井田制度一起,被箕子和他的随从带入了朝鲜。在半岛上一直占有很大势力的萨满教、民间祭祀和宗教等与殷商的国家专有巫术结合起来,形成了日后根深蒂固的民间传统。这个时代之所以没有文字遗留下来,恐怕与文字的"不可普及"有直接的关联。箕子是商朝的太师,代表的是殷商文化的最高水平,但也代表了最典型的殷商书写风格。殷商的奴隶主贵族才有机会接触文字,而这些文字本来就不是给大众使用的,而是极其神秘的。从我国的情况看,殷商的国家建立是在"绝地天通"的文化大变革以后。这第一次大的文化变革,是在颛顼时期完成的。《国语·楚语下》记载说:"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箕子所带领的庞大队伍,熟悉与掌握的恰恰是在国家收回了民间的巫术权利以后的殷商文化。箕子作为殷商的文化代表,是不会在朝鲜放弃其复兴原有文化的使命的。现今平壤火车站附近即使到近代还一直保存着的井田就是明证。

按照史书记载,箕氏朝鲜一直代代相传。到了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燕人卫满逃到了朝鲜。此时的朝鲜是箕子的后代箕准为君。箕准封卫满为"博士"。次年,卫满驱逐箕准,自立为王,建立了卫氏朝鲜。此时的朝鲜汉文作品,在中国的《史记》《汉书》《三国志》以及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史籍中有所追记。朝鲜文人洪大容于1765年(朝鲜肃宗四十一年,清乾隆三十年)来北京时,对中国朋友介绍说:

东方初无君长。有神人降于太白山檀木下，推以为君，号曰“檀君”。其元年乃唐尧戊辰也。其后中衰。箕子东封，设八条之教。杀人者偿其命，盗窃者没入为奴婢。箕子之后分为三国，曰辰韩、弁韩、马韩也。三韩之后，汉武帝尽灭之。置四郡。有玄菟乐浪等名。宣帝五凤年间，朴氏建国曰新罗，又有百济、高句丽三国并立。隋炀帝、唐太宗征之无功者，高句丽也。唐明宗时遣苏定方往征之，新罗使其将金庾信夹击之，遂灭。丽济地尽属新罗。新罗享国千年。王氏建国曰“高丽”。高丽享国五百年。洪武二十八年，为本国。太祖皇帝①命名以“朝鲜”。此国朝沿革之大概也。

箕子都平壤，今平安道。新罗都庆州，今庆尚道。百济都扶余，今忠清道。高句丽亦都平壤。高丽都松京。本国都汉阳。白头山在宁古塔之南。此一国山势之祖也。南走千五百余里为铁岭，又百里为金刚山。又南为五台山、雪岳山、太白山、小白山、乌岭、俗离山、秋风岭。又南数百里为智异山。距于南海。入海千余里为济州汉拏山。此山脉之大干也。白头山上有大泽，西流为鸭绿江。行千余里入于西海，东流为豆满江。数百里入于东海。两水为中国界。铁岭之水西流为临津江，太白之水西流为汉江。由国都南入于海。乌岭之水南流而洛东江。中分庆尚道而入于南海。此水源之大派也。

江原咸镜多山少野，其余山野相间。近山民贫而俗淳，近野民富而俗薄。其势然也。大抵无百里之野，鲜万金之富。但三面濒海，鱼盐甚饶。土地多沃，农桑有业，亦可谓海左之一乐土也。……

文章则新罗有崔孤云志远，唐时入中国。登科后居高骈幕下。讨黄巢时为檄文，黄巢见之惊倒榻下。语在中国选赋中。高丽时有李相国奎报，以诗名。及其末有李牧隐穑，诗文并著。其提岳阳楼诗曰：“一点君山落照红，(一句忘未记。)长风吹送黄昏月，银烛纱笼暗淡中。”

荫仕者，内监郎署，外典州府。此外国有庆事则设科取士。(另)有增广别试、庭试、谒圣等名(目)。初试则或有或无。皆赋表策论，临时出一文试取选。初试者未登会试，则并消其初试。此亦异于中国也。此外学校月课，小小科名，不可尽记。武科与文科并设，其制亦大同。但试取倍多，无小科进士之名。步射骑射使枪放炮，略如中国制。每岁郡邑荐行谊特异

① “太祖皇帝”指明太祖朱元璋。

者转闻于朝。择其优者授以官，谓之“乡荐”。林下读书之士，名德著闻，则招延礼使，授以“风宪”“经筵”之官，谓之“儒贤”。每一人至，则百僚震肃，一国想望其风采。大学养士，常数百人。待之极其丰厚。国有大事，学生皆缴本论之。卿相以下皆畏惮之。书院遍国中，殆过千数。皆妥享名贤，仍为讲学之所。为士者稍失行检，则斥罚纷然。

故迹则平壤有箕子陵。有井田遗制，可数百千亩。阡陌虽湮废，而沟路正方，尚有余制之可考。山川则汉阳之三角山，松京之天磨山，黄海之九月山，咸镜之七宝山，平安之妙香山，江原之金刚山五台山雪岳山，庆尚之太白山，忠清之俗离山，全罗之智异山，济州之汉拿山。峰峦水石之胜，北京以东，无可与比。其中金刚、智异、汉拿号称三神山，多灵异故迹。而金刚其最奇秀者也。中国人曾有诗曰：“愿生高丽国，一见金刚山。”本国人有诗曰：“银阙晓开金琐钥，瑶空秋束白芙蓉。”盖山有一万二千峰而皆白石峻拔；九层之潭，千尺之瀑，洞府幽邃，岩壁苍润。琳宫佛寮，罗络上下。秋则满山枫叶，如张红锦，以此又号“枫岳”。江原咸镜东皆濒海而无潮汐，此则中国人所不知也。江原濒海，有关东八景。沿海七百里山势明媚，海棠遍于白沙。亭台相望，窈窕爽豁，为国内第一胜景。家室之制，京城外大抵草舍，十之八九寝室皆温埃。四旁为壁，皆设窗户。与中国炕制不同。室外以木板为厅事。凡屋皆曲折逶迤，虽百余间或有几尽相连者。

有三相，曰领议政、左右议政。六曹判书、参判、参议，犹中国之六部尚书、侍郎。每曹有郎八员。又有大将五员，分统卫卒。此官方之大略也。公服有兰与绿两色。三品以上红袍。凡有官者，公服皆着纱帽。别有朝服，红色黑缘上衣，下衣蔽膝，后绶。金冠玉佩象笏皆具。二品乘轺轩，独轮，高丈许。一品乘平轿子。凡官人驺从甚盛，行辟人。不如中国之简率。无论有官无官，非公事则皆着大竹帽，衣道袍，带兰丝。正三品以上带红丝。居家则戴方巾，或幅巾。其余纶巾。程朱遗制皆在焉。军中及仆隶皆着毡笠，妇人衣狭袖长及腰，承以裳及地，髻甚大。①

看来，洪大容的介绍就是一个朝鲜简史。其中的“檀君”很少有文献记载，在和中国文人交流时，绝大多数朝鲜文人多是从箕子说起。关于箕子的遗迹，在明清时期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那里多有记载。嘉庆八年（1803

① ［韩］洪大容《湛轩书·外集·杭传尺牍》卷二。

年)随使节团副使来我国的朝鲜文人李海应在《薊山纪程·九畴坛》中记载说:

平壤,古箕圣都也。其遗风余躅,犹有存者,则不得不搜剔其奇览。遂由朱雀、含球两门出。盖城有内外。而各一城一门也。路出外城,访井田旧址。田路旁午,井井如画,四无崖眷,一望无际。夫隅立石,标一井之制。田畔有箕子宫旧基,殿宇岿然。洞口竖"仁贤里"之碑。殿门揭"八教门"之扁。由洞入门,则设坛筑石,刻于坛面曰"九畴坛"。又竖碑而刻"箕子宫旧基"五字。碑有阴记,故观察使李廷济所撰也。自此又前行数步,有箕子井,井傍立石,刻曰"箕子井"。井之深,可十许丈。俯井栏视之,只见苍苍者水色。由九三门入内殿,堂级之制,京城庠舍。北曰"三益斋",南曰"养正斋"。左右斋房曰"依仁斋"、"志道室"。斋中有经义生,奉一大簇展示,是《井田沟洫图》也。

按照洪大容的解释,朝鲜半岛的汉学在箕子之后还有辰韩、弁韩、马韩三国的发展时期。但若依照下引金允植所说,"其后世都平壤,四十二代孙箕准为燕人卫满所逐,避地南徙,称马韩;同时,又有秦人避乱来者,自成聚落,称辰韩;又有弁韩之称。是为三韩。其后称为三国。"则箕子的后人一直在平壤为王,被燕人卫满驱逐的箕准是箕子的四十二代孙。箕准离开平壤,在半岛其他地方再次建立的政权,这就是"马韩"。而"辰韩"其实就是"秦韩",是从秦朝流亡到那里的中国人建立的政权。假如洪大容与金允植所说成立,则这个时期内朝鲜半岛的汉学应当是已经达到了一个的发展程度。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到,朝鲜最早出现的汉字是春秋燕国的"明刀钱"。据杨昭全的统计,仅仅在朝鲜西北部所出土的明刀钱就有4,694枚之多,其中有铭文汉字3,021个①。洪大容所说"三韩之后,汉武帝尽灭之。置四郡,有'玄菟''乐浪'等名"是指汉武帝刘彻在平壤附近建立四郡的事情。由于直接统辖于汉朝中央政权,这四个郡里的汉字书写与汉文化建构不能算作域外汉学。我们所说的朝鲜古代汉学,至少应当是在半岛人民自己独立建立并行使政管理下的研究与建制。尽管从箕子时代朝鲜就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藩属朝贡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日本帝国主

① 杨昭全《中朝关系简史》,第25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义强行吞并朝鲜为止。历史上都不是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朝鲜政务。所以,汉武帝建立四郡范围内是没有汉学的。但是,四郡的管辖范围并不能涵盖整个朝鲜半岛。四郡之外半岛其余的地方依然有汉学在发展。

我们不知道朝鲜半岛在箕子到来之前的具体情况,只可以从现今考古发掘的文物推知其大概。现今韩国汉江南岸的"先史博物馆"展示的,是在文字出现以前的半岛先民生活情况。先民们在没有文字之前,可以在自己居住的用野草编成的屋顶下点火,在房子的附近溪流里抓鱼,在聚集地附近的山上打猎。他们的生活范围极狭小。大自然对于他们来说,是恐惧的存在。饥饿、野兽和疾病以及附近存在的他族都是自己的威胁。这与已经经历了殷商辉煌的箕子以及从人们的理念大相径庭。一然《三国遗事》卷一《纪异·古朝鲜》追述说:"坛君王俭,以唐高(尧)即位五十年庚寅(唐尧即位年戊辰,则五十年丁巳,非庚寅也,疑其未实),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一作方)忽山,又今弥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坛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御国一千五百年与寿一千九百零八岁显然都是传说。而这样的传说,在一然的著作里显然又是来自文字的记载,同样还是在《三国遗事》卷一《纪异·古朝鲜》赫然写着:"《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坛君王俭,立都阿斯达(经云:无叶山。亦云白岳,在白州地。或云,在开城东,今白岳宫是)开国,号朝鲜,与高(尧)同时。"开城即现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开城市。箕子带来的不仅是文字,还有相对的理性,客观的眼光以及相应的生产记述。有了这些,半岛的居民才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对抗大自然,才可以在与自然和其他民族的竞争中立足。

但即使有僧人一然的记述,类似"坛君"或"檀君"的故事在先于一然的高丽文人金富轼那里并没有追述。

与之相对照的是,高丽王朝与朝鲜王朝的文人们几乎都要提到箕子,尤其是那些到中国来的使节们。朝鲜文人安邦俊在《重峰先生东还封事》刊印后记里说:"先生生于嘉靖甲辰,而以万历甲戌,奉命观周。则是时先生年才三十。而其见识学力,已造高明正大之域。则实吾东土箕封以来数千载间,间世钟英杰出之真儒也。"《重峰先生东还封事》是明天启丙寅的秋天,在顺天县曹溪山松广寺刊印的。重峰先生赵宪(1544—1592)是在公元1574年出使中国的。而安邦俊还把此行称作"观周",显然用的是箕子

故事。于雍正十年(1732年)来北京的朝鲜使节李宜显记录说:“生员王天寿者呈名帖。盖以山西人,留此地教学资生者也。其名帖云:套言不敢妄呈。窃窥君之衣冠文物,真不愧圣人之裔。宛然箕子如在也。吾辈忝生中华,虽与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遗风为快也?”“余又书示曰:吾衣冠何如?即书曰: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见大人也。余又书曰:吾衣冠,乃是箕子之旧,即古中华礼服也。渠即叩首拱手以致敬恭之意。”①其说法里虽有自夸的成分,但也透露出一个信息:朝鲜时代的许多文人都认为自己从箕子那里继承了汉学传统。

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朝鲜文人河演所作“箕城三十韵”说明,井田的遗迹在平壤附近一直保存到15世纪还很完整。河演自己是看到了的。这也说明箕子时代的文物流传很久。

一直到1882年,朝鲜高宗派到中国的“领选使”金允植还这样阐述自己国家的历史:“刘曰:西汉以前,上溯箕圣,有史书否?余曰:犹中华书契以前,不可详考。箕圣东来之前,檀君都平壤,与尧并立。在夏禹时,送其子扶娄,往赴涂山之会。伊后世派,更不得详。敝邦权近号阳村,尝入朝。前明太祖高皇帝以檀君为题,命近作诗。云:‘传世不知几,历年曾过千’。太祖亟称其老实。箕圣东来,设八条之教,一变夷俗。班史称仁贤之化。然亦无本国史乘。其后世都平壤,四十二代孙箕准为燕人卫满所逐,避地南徙,称马韩;同时,又有秦人避乱来者,自成聚落,称辰韩;又有弁韩之称。是为三韩。其后称为三国。所有自三国始有史。然亦疏略,无可考。高丽并有三国,其史始详备。②”这是金允植与天津军械所负责人刘含芳对话时的记录,记录者就是金允植本人。这一天是公元1882年4月8日。可见,在金允植的心目中,“箕圣东来”是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情。

① [韩]李宜显《陶谷集》卷三十。

② [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

第二章
汉字对古朝鲜乐舞与口头诗学的颠覆与重构

朝鲜半岛的汉学在最初的发展阶段里，是在与当地有着悠久历史的非文字乐舞文化与口头诗学竞争中发展起来的。朝鲜民族是世界上著名的能歌善舞的民族，其乐舞文化传统渊远流长。我们这里所说的朝鲜半岛的汉学，从一开始就是以文字为基本载体的，是与半岛原有的非文字传承的乐舞与口头载体有矛盾的。如今没有多少乐舞与口传的作品流传，只能说明当时无法记录，并不能说明当时此类作品不够丰富。现存朝鲜民族最早的作品是文学。其内容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原始宗教信仰。这类作品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乐舞文化的遗存，如最古老的四言诗《箜篌引》和《迎神歌》。这两首歌可能是后代用文字追记的口头歌谣。《箜篌引》出自中国汉乐府，据晋人崔豹《古今注》的记述，它是古朝鲜人所作。这一类作品在高丽王朝建立以后，还有许多流传与新制。如汉城女子师范大学金根洙教授《校注丽谣》里，就收录了18首。金根洙教授是在上世纪60年代搜集整理这些歌谣的。他用蜡纸刻写了全本《乐学轨范》，并将《校注丽谣》作为附录加进去。而在这些文学类作品的背后，还应该有十分复杂并且在艺术水平上达到了相当高程度的其他作品。上古朝鲜的各种乐舞资料，在箕子到来后开始被文字记录下来。也就是说，三韩自己的文献，并不是从箕子时候就有的。只是这些文献并不能被人们记录。正如李奎报《白云小说》里说的："我东方，自殷太师东封，文献始起。而中间作者，世远不可闻。"公元5世纪的时候，才出现了三韩的作者与作品。不管古代朝鲜文人使用汉文字创作的作品是否出现了，在那里都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巫歌。巫歌是指巫俗仪式上巫女所唱的歌谣。它们是有咒术性能的歌谣。

"包括使神降临的请拜歌、使神离去的还位歌、为人祈福的招福歌和避免祸灾的防灾歌,以及使神欢愉的赞神歌或颂德歌。"[①]巫歌还可以分为抒情巫歌、教述巫歌、叙事巫歌和戏曲巫歌。不仅如此,朝鲜民俗剧里的三个种类里,也有两个与巫术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古代一直流传到近代的民俗剧有三种:巫剧、假面剧和木偶剧。巫剧不用说是与巫术有直接的关系的,就是假面剧,按照赵东一的解释,也是农乐巫术的衍生物。[②] 假如我们认可崔南善的解释,则朝鲜巫歌的历史应当是从檀君时代开始的。但是,在儒家思想被大量介绍到朝鲜以后,这些巫歌和其背后的巫术都成了非主流意识形态。在各个朝代都是被排斥、被禁止的。直到1920年以后,孙晋泰开始系统地搜集与整理这些巫歌作品,并且把它们当作重要的文化资料来研究。

新罗时代出现了借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乡歌",它们是用汉字记录本国口语创作的最初尝试,也是朝鲜国语文学的汉字记载。和纯粹的汉文作品相比,乡歌有特殊的价值。首先,这是半岛自己的文学的记录,也是用汉字对于传统口头诗学作品的记录。其次,这些歌曲虽然没有乐谱,但有明显的歌曲的痕迹,虽然现今的韩国人也不一定读得出来,但它们是没有录音机时代的乐曲的记录,是诗歌与音乐交融的产物。乡歌有极大的局限性,不懂汉文的人无法理解它,懂得汉文而不懂朝鲜文的人也无法读懂它。就是都懂得的现代人,也需要翻译与猜测才可能破译其中的含义。现存的新罗乡歌只有14首。一然的《三国遗事》里记载说:"释永才性滑稽,不累于物。善乡歌。暮岁将隐于南岳,至大岘岭,遇贼六十余人,将加害。才临刃无惧色,怡然当之。贼怪而问其名,曰'永才'。贼素闻其名,乃命作歌。其辞曰:'自矣心米,儿史毛达只将来吞隐日远鸟逸,过出知遣,今吞藪未去遣省如,但非乎隐焉破,主次弗,史内于都还于尸朗也。此兵物叱沙过乎好尸曰沙也内乎吞尼,阿耶,唯只伊吾音之叱恨隐陵隐安支尚宅都乎隐以多。'贼感其意。赠之绫二端。"[③]其实,不仅在新罗有乡歌,在百济也有类似的用汉字记录下来的童谣。一然记载说:"第三十武王名璋,母寡居。筑室于京师南池边,池龙文通而生。小名薯童,器量难测。常掘薯蓣,卖为活

① [韩]赵东一等著《韩国文学论纲》,中译本第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韩]赵东一等著《韩国文学论纲》,中译本第80-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韩]一然《三国遗事·永才遇贼》。

业,国人因以为名。闻新罗真平王第三公主善花(一作善化)美艳无双,剃发来京师。以薯蓣饷闾里群童,群童亲附之。乃作谣,诱群童而唱之云:'善化公主主隐,他密只嫁良置古,薯童房乙夜矣卯乙抱遣去如'。童谣满京,达于宫禁。百官极谏,窜流公主于远方。将行,王后以纯金一斗赠行。公主将至窜所,薯童出拜途中,将欲侍卫而行。公主虽不识其从来,偶尔信悦,因此随行。潜通焉。然后知薯童名,乃信童谣之验。"①

一然《三国遗事》卷五之《避隐·信忠挂冠》还记述说:"孝成王潜邸时,与贤士信忠围棋于宫柏树下,尝谓曰:'他日若忘卿,有如柏树'。信忠兴拜,隔数月,王即位赏功臣,忘忠而不第之。忠怨而作歌,帖于柏树,树忽黄悴。王怪使审之,得歌献之,大惊曰:'万机鞅掌,几忘乎角弓!'乃召之赐爵禄,柏树乃苏。歌曰:物叱好支栢史,秋察尸不冬尔屋支堕米,汝于多支行齐教因隐,仰顿隐面矣,改衣赐乎隐冬矣也,月罗理影支古理因渊之叱。行尸浪,阿叱沙矣以支如支,貌史沙叱望阿乃,世理都,之叱逸乌隐第也。"

一然记述的乡歌与童谣,在今天都很难破译,但是它们是用汉字记录下来的朝鲜半岛的口头创作,因此非常珍贵。

还有一类是口头传说。其中,《檀君神话》是朝鲜最古老的神话传说。它叙述的是神人檀君建立古朝鲜国的故事。上引洪大容与金允植的文字里已有记述。显然,《檀君神话》也是朝鲜传入汉文书写后记录下来的。这一类的说话作品,是口头诗学指导下的产物,在朝鲜历代王朝里都有大量创作。现今可见《韩国说话文献全集》十大卷就是明证②。韩国学者崔南善编译的《三国遗事》里,对一然著作里所涉及的神话传说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檀君(至乃解氏)熊的传说、赫居氏(朴氏)白马的传说、脱解(昔氏)鹊的传说,以及阏智氏(金氏)白鸡的传说里,都有图腾的痕迹。③如果按照布伊哥夫斯基的说法,则韩国古代的图腾制度与我国的一样,是为了在狩猎与采集的资源不足的时候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布伊哥夫斯基说,图腾制之最初形态即由于猎取对象物之具有共通性的各生产集团的

① [韩]一然《三国遗事·武王》。

② 参见韩国东国大学附设韩国文学研究所编《韩国文献说话全集》,太学社,1991年版。

③ [韩]崔南善编译《三国遗事》之《三国遗事解题·十二、民俗与说话》,瑞文文化社,1999年版。

联合,抑制集团间食物分配的矛盾。如鹿的图腾集团包括鹿、马等较为接近的种类动物为猎取对象的生产集团。此时图腾制完全担负维持其集团内共同制的任务。到了社会关系之矛盾性更行发展的程度,禁止食物个人自由使用的禁忌(Taboo)就出现而再次缓和。[①] 从后来的图腾崇拜情况来看,韩国的崇拜物从最初的多元崇拜逐步向檀君的单一崇拜发展,显然图腾制度具有的化解功能与团结功能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因为在图腾制度里,族外婚姻是其重要的、与原有的原始生活形态不同的长项。韩国的著名神话传说说,在神雄时代,"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著,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檀树下,祝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檀君王俭。"[②]一然的记录,显然是远古时代的图腾部落相互兼并与共同生活的写照。在这个传说里,被矮化了的虎图腾主要的罪行是没有遵照禁忌行事。然而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两个图腾之间是具有紧密关系的,他们都处于穴居的时代。传说刻意以一成人类而另一还是兽类的对比,强化的是对于神雄以及他赠予的"灵艾一著,蒜二十枚"的信仰。在强化信仰方面,不仅是用权威与暴力,还需要使用几乎所有的手段。一然的《三国遗事》里还记载说,智哲老王时代发现了于陵岛。但是,岛上的人自恃水深,骄傲不臣。"王命伊喰朴宗将兵讨之。宗作木偶师(狮)子,载于大舰之上,威之云:不降则放此兽。岛夷畏降。"[③]被威吓而投降的于陵岛上居民,自然也不能继续沿用他们的信仰,而需要与古代韩国的其他人民杂处混居。尽管在这个故事里,人为的因素十分明显,但是这个故事内在的精神信仰与熊、虎的传说是一致的。

我国史书《隋书·高勾丽传》也记载有类似的半岛传说:"高勾丽之先出自夫余,夫余王尝得河伯女,因闭于室内,为日光随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壳而出,名曰朱蒙。夫余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请杀之,王不听。及壮,因从猎所获居多,又请杀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弃夫余东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孙,日之子也,今

① 岑家梧《图腾艺术史》,第3页,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

② [韩]崔南善编译《三国遗事》,第34页,瑞文文化社,1999年版。

③ [韩]崔南善编译《三国遗事》,第55页,瑞文文化社,1999年版。

有难,而追兵且及,如何得渡?'于是鱼鳖积而成桥,朱蒙遂渡,追骑不得渡而还。朱蒙建国,自号高勾丽。"而在一然的笔下,朱蒙则是与周的始祖后稷有着类似的传奇身世的君主:"先是北扶余王解夫娄,既避地于东扶余。及夫娄薨,金蛙嗣位。于时得一女子于太伯山南优渤水。问之,云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神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而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于此。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光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五升许。王弃之与犬猪,皆不食。又弃之路,牛马避之。弃之野,鸟兽覆之。王欲剖之而不能破,乃还其母。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①]显然,这里的朱蒙的身世,与《史记·周本纪》里描绘的后稷的身世十分类似。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后稷的母亲就是姜嫄。"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牛马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嫄以为神,遂收养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朝鲜半岛的口头诗学最著名的"建国神话"里的檀君神话,还有很浓重的卜筮之风,但它是依靠汉字记录下来的,这是无可否认的。

井田的存在证明了箕子推行的就是殷商的文化。而正是殷商文化在朝鲜的被接受,才使得汉字的书写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被推广开来。因为被引进到朝鲜的汉字原有的发展基础被剥离了,它自身无法与中国周朝的文化发展相互衔接。周公封建所带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冲击,在朝鲜半岛的隐士们是感觉不到的。箕子与其中国与朝鲜的部下所醉心的,仍然是殷商的甲骨文。而甲骨文本来就不是人与人交流的工具,而是现世生活着的人与其已经逝去了祖先对话的工具。加之原本在殷商就只有极少数奴隶主贵族才参与王室的占卜与祭祀活动,甲骨文在朝鲜半岛无法普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即使在我国,殷商甲骨文也是十分神秘而且很少见的文字。它们的书写是极少数王室贵族的专利,即使是一般的奴隶主贵族,也是很难通晓的。现今可见到的甲骨文里,只有"非王卜辞"是王室之外的文字,其余皆为王室专有。[②] 甲骨文即使不是王室的书写,也大多是贵族

① ［韩］崔南善编译《三国遗事》,第40－41页,瑞文文化社,1999年版。

② 参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17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增订本。

的书写，而且，参与书写的是极少数人。正因为如此，甲骨文的发现才是中国近代的一件大事，也是专治旧学的文人们不可理喻的事情。因为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原有文献里，几乎找不到关于甲骨文的记载。也正因为此，郭沫若才把甲骨文的书写看成是“法书”：“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①]郭沫若所说的“实一世法书”，就是指甲骨文乃是殷商时代书法大家的作品。而推究起来，这些书法作品，并非是整个殷商时代的作品。现今已经发现的十五万片甲骨文，其时代大致上至盘庚下至帝辛，时间跨度大约是270年（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192年），也就是从盘庚东迁到商朝灭亡。这些法书的作者，是主持占卜的“贞人”。

从这些回顾可以看出，最初的甲骨文是极少数人的书写作品，其书写人数之少，几乎等于中国自西周以后只有书法大家而没有一般的书写者，就如同现今中国只有书法家协会会员才书写，其他的中国人是不写字的一样。殷商书契的神秘性可见一斑。

书写专有与神秘对于朝鲜半岛的直接影响恐怕就是它不仅没有限制而且推动了当地的卜筮之风，并且在“书写神秘”的文化旗帜下，为古朝鲜的原有民间口头文本的昌盛提供了广大的空间。

首先，卜筮之风在后来的历代朝鲜王国都是崇尚儒家的士人们所猛烈抨击而又无可奈何的。即使如最著名的“建国神话”里的檀君神话，也有很浓重的卜筮之风。

在现今韩国的学术界，对于檀君神话的解释里，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檀君是认真地履行了对于桓雄的承诺而变化为人的熊女与桓雄所生的儿子。这种看法把桓雄看作是崇拜天神的外来部落的代表，熊女则是崇拜熊的土著部落。檀君是族外婚的产儿。[②]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桓雄从桓因那里得到的三个“天符印”是古代巫师们所持的神圣标志：镜子、铃铛和刀。桓雄自己从上界带来的部下——风伯、雨师和云师，则是巫师具有的呼风唤雨的能力。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崔南善等。他们分别在1954年和1972年发表的文章里阐述了自己的主张。[③] 需要提出的是，在一然法师

① 郭沫若《殷契粹编》，《自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② ［韩］金贞培《韩国民族文化的起源》，高丽大学出版部，1973年版。

③ ［韩］赵东一等著《韩国文学论纲》中译本，第30－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的著作里,“檀君”与“檀树”里的“檀”本是“坛”字。由此可见,在檀君的身上,还有很明显的“卡里斯玛(charisma)”①的色彩。作为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檀君所推行的当是口头文化而不是书写文化。其时古朝鲜的口头传说与口语流传,也应当是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的。保存至今的《龟旨峰迎神歌》显然是原始卜筮的祝辞。一然法师《三国遗事》里记载的《解夫娄》《朱蒙》《昔脱解》《首露》等神话传说的神秘性以及传说过程中带有的虔敬感情亦自不待言。对于檀君来说,其民众就是其信众。就是对那些口耳相传的人来说,也不是简单的把《解夫娄》《朱蒙》等看作是故事,或者是看作是现代意义上的神话,那是自己祖先的传说,是自己伟大的先人具有神性的证明。它们绝不仅仅是故事,更不是可以当作茶余饭后来消遣的传说。这些口语传说的故事是由具有极高声望的人来说唱的,而且,他们往往具有被听众崇拜的特质。著名藏学家斯坦因说:“很清楚,演唱艺人的本质是纯粹属于宗教性质的,他处于神灵附体的状态中。”②斯坦因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朝鲜半岛在文字出现和被广泛接受以前的口头诗学。

其次,从朝鲜语言本身的特点以及自有的符号体系来看,朝鲜半岛并不一定适宜于接受汉文书写。在三千年的时间里逐步在那里发展起来的书写文化,实在是由于与中国地理上的接近而将大陆文化输入的结果。朝鲜半岛有自己的音乐体系,也有相当完备的口头歌唱与传说体系。即使是现今流传下来的口头诗学资料,也依然蔚为大观。这应当是在朝鲜半岛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其书写并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朝鲜半岛的口头诗学并非是与汉字书写格格不入的,汉字书写在箕子被封到朝鲜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不能普及,原有的口头诗学并不一定是作为反对的力量而存在的。只是因为该口头传统在那里已经根深蒂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由神秘观念支撑着的符号体系。

朝鲜语属于粘着语,其语词里有大量的象声词,也有许多词是从象声发展而来的,例如“大海”与“母鸡”等。在引进大陆文化并进行书写的时候,这些词汇是不容易被汉字替换的,其中的许多细微含义,也几乎是无法翻译为汉语的。朝鲜王朝建立以后,世宗大王要颁布《训民正音》,这是一

---

①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译本,第3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② [法]斯坦因(R. A. Stein)著作节译。见叶舒宪《英雄与太阳》,第5-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个很重要的原因。

假如从纯粹记录语音的角度来说，朝鲜语最初应该使用的是硬笔而不是中国的毛笔。但是，中国的汉字书写也有适宜于朝鲜文化人的地方，那就是书写是趋近于艺术的。

中国传统的笔是毛笔，毛笔属于软笔。毛笔写的字可以如行云流水，变化多端。毛笔适合于艺术书写。其书写出来的文本通常都是艺术品。汉字书写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书法艺术，与毛笔的使用是不可分开的。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中说：

> 中国人写的字，能够成为艺术品，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由于中国字的起始是象形的，二是中国人用的笔。……殷朝人就有了笔，这个特殊的工具才使中国人的书法有可能成为一种世界独特的艺术，也使中国画有了独特的风格。中国人的笔是把兽毛（主要是兔毛）捆缚起做成的。它铺毫抽锋，极富弹性，所以巨细收纵，变化无穷。这是欧洲人用管笔、钢笔、铅笔以及油画笔所不能比拟的。①

与中国传统的毛笔相对的，是西方所用的鹅毛笔。鹅毛笔不能在笔迹的粗细、浓淡、急缓上做许多变化。鹅毛笔的长项，是它适宜于划直线和规则的曲线。鹅毛笔以及其后来的衍生笔（钢笔、铅笔、油画笔等）的笔迹本身并不一定参与文本的建构，其书写文本主要是由其书写出来的符号构成的。或者，也可以说，西方的鹅毛笔在书写的时候是在建构超越了书写本身的文本。除了特殊的时候，笔迹本身是可以不必考虑在文本中的因素。其典型的情况就是，假如按照“点动成线，线动成面”的数学规定，则书写者画出的点是不考虑大小的，画出的线段是不考虑粗细的。可以说，以毛笔为代表的东方软笔书写特别推重书写本体。书写本身不仅是在复制符号，书写出来的符号自身也是符号。而以鹅毛笔为代表的西方硬笔书写则要超越书写本身。它也要复制符号，但是书写的笔迹自身不是符号。西方的书写显然更加实用，它比较适用于走向科学的书写。但是，这种硬笔把书写者自身从书写里排除出去，这就造成了书写的人与外在的符号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书写出来的文本对于书写者来说是异化的存在。

① 宗白华《美学散步》，第1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的毛笔书写,倾向于走向艺术而不是走向科学。由于毛笔的笔迹也是符号,而这个符号是属于书写者自己的。中国的书写是书写者自身与外在的符号之间的统一。它不仅是作为符号的存在,也是书写者的情感、追求、气质的写照。正如宗白华所说:"所以古人所传的'永字八法',用笔为八而一气呵成,血脉不断,构成一个有骨有肉有筋有血的字体,表现一个生命单位,成功一个艺术境界"。[①] 欣赏中国传统的书法,人们除了在符号里周游外,还可以见到生命的流动。这样的生命跃动,在鹅毛笔书写里就很难出现。

箕子时代的古代朝鲜所使用的甲骨文属于"书契",其书写速度相当缓慢,这对于记录语音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而且,尽管它们需要使用刀具,也不是西方的硬笔书写,而是属于中国的书写。这些中国书写不是为语音而存在的,它们自己就直接带有意义在内,因此,中国的书写属于"写意语境"。[②] 在中文的书写里,"话语"与"文字"尽管都可以表意,但是它们是两套符号系统,呈并列关系。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提出"为什么在中国言语会因文字的出现而黯然失色",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一点。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都是在强化文字的表意功能。在这一价值预设中,言谈必须从书写那里获取存在的意义与根据。文字书写是第一性的,语言言谈是第二性的。这与埃及君主阿蒙对"书写之药"(pharmakon)的蔑视态度相反,[③]东方文字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神圣地建构着。[④]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朝鲜的口头诗学逐步被文字所改造,就是水到渠成的了。古朝鲜最古老的《箜篌引》和《迎神歌》,可能就是使用文字后记录下来的口头歌谣。前者在中国汉乐府有收录,据晋人崔豹《古今注》记述,它是古朝鲜人的作品。

在现代化的录音与录像设备出现以前,借用汉字来标记朝鲜语的发音,在高丽文人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是古朝鲜文化人的唯一选择。例如现存的"乡歌",本来是朝鲜人用本国语言进行创作的,它们是建立在朝鲜语

① 宗白华《美学散步》第1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杨乃乔《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第22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法]雅克·德里达著,汪家堂译《论文字学》,第13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参见卢庆侠《书写范式的转型》,《中国语文论译丛刊》,2006年第一期。

口语基础之上的。用汉字记录下来的乡歌，不是汉文作品，但是不懂汉文的朝鲜人依然无法理解它。即使是懂得汉文的人，也不见得就可以理解“乡歌”。现存的乡歌中有一首名为《得乌谷慕竹旨郎歌》：

去隐春皆理米，
毛冬居叱沙哭屋尸以忧音，
阿冬音乃叱好支赐乌隐，
儿史年数就音堕支行齐，
目烟迥于尸七史伊衣，
逢乌支恶知作乎下是，
郎也慕理尸心未，
行乎尸道尸，
蓬次叱巷中宿尸夜音有叱下是。①

一然所著《三国遗事》里，共记载了15首这样的乡歌。用汉字记录下来的歌谣，则是三国时代大量的口头歌谣中仅存的汉文记录。三国时代的民间歌谣，著名的有《来远城歌》《井邑词》《会苏曲》《薯童谣》《风谣》等。《会苏曲》已收入《续东文选》卷四。

被统称为“说话”的各类传说故事在朝鲜也有悠久的历史。不管是建国说话、英雄说话还是民间说话，都把三国开国的始祖和功勋卓著的将军作为最主要的描绘对象，由于是民间的创作，平民百姓也可以是“说话”的主人公。不管是乡歌还是说话作品，它们都是以语音为主的，属于与书写不一样的口头诗学。书写代表了更加晚近的文化，口头则与远古直接相关。它们之间不可能没有文化方面的冲突。高丽著名的僧人一然所著《三国遗事》里的《万波息笛》故事，就很耐人寻味：

龙曰：比如一手拍之无声，二手拍则有声。此竹之为物，合之然后有声。圣王以声理天下之瑞也。王取此竹，作笛吹之，天下和平。②

① ［韩］崔南善编《三国遗事》，第78页，瑞文文化社，1999年版。
② ［韩］崔南善编《三国遗事》，第76页，瑞文文化社，1999年版。

显然,“圣王以声理天下之瑞也”是在为口头诗学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化论证。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字的书写活动范围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因此,尽管汉文书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浸润着古老的朝鲜口头诗学,直到三国时代,朝鲜半岛的汉文著作依然很少。这些著作大致有:

无名氏《黄鸟歌》(四言诗)
定法师《孤石》(五言诗)
乙支文德《遣隋将宇仲文》(五言诗)
《留记》(史书)
《新集》(已佚,史书)
高兴《书记》(已佚,史书)
成忠《狱中上书》(散文)
兴首《上义慈王文》(散文)
真德女王《太平颂》(五言排律)
薛聪《花王戒》(寓言)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散文巨制)
金后稷《谏猎文》(散文)
崔致远《桂苑笔耕》(诗文集,20卷)

新罗统一三国之后的强首、金仁问、金大问、良图、薛聪、慧超等散文家和崔致远、王巨仁、朴仁范等诗人的著作多数只存其名,文本已不存。崔致远是朝鲜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朝鲜历代文人都奉他为朝鲜汉文文学的奠基人。他也应当是朝鲜本国最初的书写文化的代表人物。汉字书写可以突破人体能的局限而将口语文献记录下来,汉字书写本身具有艺术性。高丽文人最终选择书写,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文化发展之路。高丽王朝建立以后,由朝廷出面来最终确定发展书写文化,也仍然是文人们的建议。必须注意的是,此时的中国早已经不是贞人法书的年代了。周朝初年的中国文化大变革,已经把书写从神秘的巫术活动中彻底解放出来。书写是读书人的事情,在晚唐早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信念了。

半岛进入三国时代,汉学开始成为半岛的显学,朝鲜汉学在其后的两千年中一直是中国本土以外最大的汉字文化体系。

第三章
高丽王朝之前的半岛汉文学

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是其汉学体系建立之始。文人们借用中国的汉字书写官方文书,也著书立说,并进行文学创作。原本属于口头诗学的朝鲜国文学逐步退居次要的地位。

公元1世纪前后,朝鲜半岛逐步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如果说,箕子时代还是属于奴隶社会的话,那么,此时的半岛三国均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尽管三国之内还有很明显的奴隶社会的影响。三国之间的相互攻伐,最终是在公元7世纪由新罗实现了半岛的再次统一。虽然在此后还有"后三国",但是半岛的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10世纪初,高丽王朝太祖王建称王,并建立了空前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从三国时代开始至高丽王朝建立,半岛汉学在千年的时间里缓慢而不间断地发展着。

最近几年内,中国与韩国的历史学家就高句丽属于中国还是属于朝鲜有一些争论。中国的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高句丽的统辖范围,大致就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设立的玄菟郡,它理所当然的就是中国的地方政权。而韩国历史学家则激烈地反对此种说法,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高句丽是朝鲜的地方割据政权。公元前37年,生活在西汉玄菟郡内的高句丽人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当时的高句丽人生活的玄菟郡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鸭绿江中游和浑江流域。该政权传28代王,历时705年。从公元3年至427年,曾以现今我国吉林省的吉安市为都城。后来高句丽迁都到平壤。① 高句丽在三国里首先使用汉文。无名氏的四言诗《黄鸟歌》以及定法师的《孤石》和乙支文德的《遣隋将宇仲文》等五言诗。在历史作者著作方面,高句丽还有前后两次的史书《留记》和《新集》(已佚)的编纂。

① 参见方起东《好太王碑·解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据最新的历史学家的考证，高句丽属于中国，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则其汉学也就不存在，而是中国文献。

百济建国之初，并没有关于使用文字的记载。其汉字文献留下来的很少，但是，其汉学方面的成就，是很突出的。百济的许多文化传统是从辰韩那里继承下来的。而按照传说，辰韩就是“秦韩”，是从中国秦代逃亡出去的人组成的政权。如果此种说法成立，则百济使用汉字至迟是在辰韩时期。我国的史书里记载说，百济人称“国”为“邦”，称“弓”为“弧”，称“贼”为“寇”，把行酒称为“行觞”，彼此称“徒”。这些都与秦国人很相像。[①] 百济近肖古王三十年（375 年），博士高兴撰写了名为《书记》的百济史书。日本曾经三次接受百济使节，从其学习汉文。据《日本书记》卷十记载，日本应神二年（百济古尔王三十八年，公元 271 年）“命荒田别使于百济，搜求有识者。百济国王择宗族，遣其孙辰孙王随使入朝。应神喜焉，特加宠，以为皇太子之师。”这是百济第一次派学者到日本传授汉文，也是日本人第一次接受汉文和儒学。到应神天皇十五年（百济古尔王五十一年，284 年），“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②]当然，这两次派遣的人都是读书人，但都不是百济国里的佼佼者。次年，百济博士王仁东渡日本，在那里讲授《论语》等汉文著作，把儒学和汉文传到日本。日本的同一书里记载说，“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故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③]看来，百济派出的王仁博士是一位饱学之士，他于中国诸典籍莫不通达。百济三次派人渡海赴日，传授汉文经典，说明了百济国的汉学水平之高。到了 4 世纪，学者高兴著国史《书记》。可惜该书早就不存了。在文学方面，成忠的《狱中上书》和兴首的《上义慈王文》是流传下来的文章。640 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百济武王四十一年）百济派子弟来中国，在太学学习。“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

① 《三国志·东夷传》。

② ［日］《日本书记》卷十。

③ ［日］《日本书记》卷十。我国学术界多采用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稿》的说法，把王仁赴日时间定为公元 284 年（见该书第 8 页，第 311 页，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但韩国学者认为，王仁到达日本的时间为公元 405 年。参见韩日文化亲善协会编《学圣王仁博士》，弘益斋，2001 年第三版。

寄》写道：

上国羁栖久，多惭万里人。
那堪颜氏巷，得接孟家邻。
守道唯稽古，交情岂惮贫？
他乡知己少，莫厌访君频。①

诗歌句子里透露出的是很大气的感慨，给人以回肠荡气的感觉。崔致远在中国日日与文人切磋琢磨文艺，有唐朝文人的文笔与气概是很自然的事情。朝鲜王朝文人洪万宗（1643—1725）在其《小华诗评》中说："我东之通中国，远自檀君、箕子，而文献盖篾篾。隋唐以来，始有作者。如乙文支德之献规仲文、新罗女王之织锦颂。功虽在于简册，率皆寂寞，不足下乘。而至于唐侍御史崔致远，文体大备，遂为东方文学之祖。"②洪万宗《小华诗评》里评价崔致远的作品时，引用了崔的《泛海》《江南女》《赠智光上人》等诗，称赞崔致远的作品"辞语宏肆"。的确，崔致远的《泛海》意境很开阔，语句也铿锵有力：

挂席浮沧海，长风万里通。
乘槎思汉使，采药忆秦童。
日月无何外，乾坤太极中。
蓬莱看咫尺，吾且访仙翁。③

新罗的汉文文学，前有真德女王织锦诗，后有崔致远的作品集。这两个人，一人贵为君主，一为文坛魁首。他们对于新罗汉文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真德女王的织锦诗，在唐朝就已经作为两国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事件被史官记载了。该诗歌现在还可以在《旧唐书》与《全唐诗》里找到：

① ［韩］《东文选》卷九。
② ［韩］洪万宗原著、安大会译注《小华诗评》，第78－79页，国学资料院，1995年版。
③ ［韩］洪万宗原著、安大会译注《小华诗评》，第81页，国学资料院，1995年版。

大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
止戈戎衣定，修文继百王。
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
深仁谐日月，抚运迈时康。
幡旗既赫赫，钲鼓何煌煌。
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大殃。
和风凝宇宙，遐迩竞呈祥。
四时调玉烛，七耀巡万方。
维岳降宰辅，维帝用忠良。
三五咸一德，昭我皇家唐。①

在这个时期，汉文在朝鲜半岛还不普及。儒、释、道三教都传入三国。佛教在新罗最盛，并创造出灿烂的佛教文化。但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儒家思想。文人们竞相讲究的，是诗歌创作的精益求精。

对于诗歌的精益求精，崔致远早在新罗时代就已经开了先河。崔滋记述说："金山府黄山江，沿流而下六七里，苍崖斗起，面峰挟江，有烟村十余户，皆竹篱茅舍，如在画图中。唐侍御使崔致远尝累石为台，名曰'临镜'。题诗石壁曰：'烟峦簇簇水溶溶，镜里人家对碧峰。何处孤帆饱风去，瞥然飞鸟杳无纵。'岁久台坏，壁画漫灭，后人移书于黄山楼，所瞩物象与诗反。如县额州榜，何其背矣！公凡所留咏，率不过绝句一首。就中嘉景，无不破的。故过客见之，吟玩不足。寄赠亦多绝句，清婉可爱。如《赠桧谷独居僧》云：'除却松风耳不喧，结茅深倚白云根。世人知路应翻恨，石上莓苔污屐痕。'"②崔致远筑台的黄山江，在金海的洛东江下游。《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二十二记载说，"临镜台一名崔公台，在黄山驿西绝壁上。崔致远游赏之地。"

新罗文人与老百姓一样，沉醉于"音"与"乐"，尤其是他们自己民族的音乐。这些音乐不仅是"乐"，更是"音"。但是文人们与老百姓又有所不同，他们还醉心于把自己的想法用文字表述出来，从而达到"声"的追求。高丽文人崔滋记述说："东都本新罗。古有四仙，各领徒千余人，歌法盛行。

① ［韩］洪万宗原著、安大会译注《小华诗评》，第81页，国学资料院，1995年版。
② ［韩］崔滋《补闲集》，第115页，圆光大学校出版局，1995年第三版。

又有玉府仙人,始制曲调数百。本朝闵仆射可举,传得其妙。尝一日独坐弹琴,有双鹤来翔。因作《别调》云:'月城仙迹远,玉府乐声微。双鹤来何晚,吾将伴汝归。'皇龙寺雨花门,是古仙徒所创。风物荒凉,过者无不伤感。学士胡宗旦乘使轺过其门,见进士崔鸿宾留题:'古树鸣朔吹,微波漾残晖。徘徊想前事,不觉泪沾衣。'胡瞿然惊曰:'真不世才也!'及复命,上问东都遗事,遂以此诗以为警。皇祖以绣衣巡北塞,曰:'龙城秋日淡,古戍白烟横。万里无金革,胡儿贺太平。'其淡古无痕迹,与崔诗同。彼崔诗感慨今昔,故情思多;此诗闲吟边塞,故风力壮。"①崔滋所说的"东都"就是现今韩国的庆州。崔滋记录的实际上是新罗的口头诗学年代里的著名文化人物。按照《大东韵府群玉》卷五的说法,四仙是"新罗时曰南郎、述郎、永郎、安详也。游赏寒松、镜浦、丛石、越松等地,皆有旧迹。"他们是新罗口传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者,也是带有传奇性质的文化人物。玉府仙人是新罗玉宝高与其弟子们的统称。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十二"乐志"里记载说:"玉宝高入地理山云上院,学琴五十年。自制新调三十曲。"

与崔致远齐名的新罗文人还有薛聪。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列传》六记载说:

薛聪,字聪智,祖谈捺奈麻,父元晓,初为桑门,掩(淹)该佛书,既而返本,自号"小性居士"。聪性明锐,生知道待(道术),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后生,至今学者宗之。又能属文,而世无传者。但今南地,或有聪所制碑铭,文字(缺)落不可读,竟不知其何如也。

……

世传日本国真人《赠新罗使薛判官诗序》云:"尝览元晓居士所著《金刚三昧论》,深恨不见其人。闻新罗国使薛,即是居士之抱孙,虽不见其祖,而喜遇其孙,乃作诗赠之。"其诗至今存焉,但不知其子孙名字耳。至我显宗在位十三岁,天禧(乾兴)五(元)年辛酉(壬戌),追赠为弘儒侯。或云,薛聪尝入唐学,未知然不。

金富轼的记载里,完整的保存了新罗文人薛聪所著寓言《花王戒》。强首也是和崔致远其名的著名新罗文人。金富轼《三国史记》中也有

① ［韩］崔滋《补闲集》,第106页,圆光大学校出版局,1995年第三版。

传记：

强首，中原京沙梁人也。……及壮，自知读书，通晓义理。父欲观其志，问曰："尔学佛乎？学儒乎？"对曰："愚闻之，佛世外教也。愚人间人，安用学佛为？愿学儒者之道。"父曰："从尔所好。"遂就师读《孝经》《曲礼》《尔雅》《文选》。所间（闻）虽浅近，而所得愈高远，魁然为一时之杰。遂入仕历官，为时闻人。

强首常（尝）与釜谷冶家之女野合，情好颇笃。及年二十岁，父母媒邑中之女有容行者，将妻之，强首辞不可以再娶。父怒曰："尔有时名，国人无不知，而以微者为偶，不亦可耻乎？"强首再拜曰："贫且贱非所羞也，学道而不行之，诚所羞也。尝闻古人之言曰：'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忘。'则贱妾所不忍弃者也。"

及太宗大王即位，唐使者至，传诏书。其中有难读处，王召问之。在王前一见，说释无疑滞。王惊喜，恨相见之晚，问其姓名。对曰："臣本任那加良人，名字头（牛头）。"王曰："见卿头骨，可称强首先生。"使制回谢唐皇帝诏书表。文工而意尽，王益奇之，不称名，言任生而已。

强首未尝谋生，家贫怡如也。王命有司，岁赐新城租一百石。文武王曰："强首文章自任，能以书翰致意于中国及丽、济二邦，故能结好成功。我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则强首之功，岂可忽也？"①

强首的文章可以和军功相提并论，这在新罗和百济的史册中屡见不鲜。而强首所说"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忘"之古语，显然是来自中国。而在唐朝生活了二十二年的金仁问，则不仅仅是一位文人，还是著名的将军：

金仁问，字仁寿，太宗大王第二子也。幼而就学，多读儒家之书，兼涉庄、老、浮屠之说。又善隶书射御乡乐，行艺纯熟，识量宏弘，时人推许。永徽二年，仁问年二十三岁，受主命，入大唐宿卫，高宗谓涉海来朝，忠诚可尚，特授左领军卫将军。……仁问七入大唐，在朝宿卫，计月日凡二十二

① ［韩］金富轼《三国史记》四十六卷，《列传》六"强首"。

年。时亦有良图海,六入唐,死千(于)西京,失其行事始末。①

相比之下,新罗文人巨仁的经历就颇有些神秘色彩了:

王命拘巨仁京狱,将刑之。巨仁愤怨,书于狱壁曰:"于公恸哭三年旱,邹衍含悲五月霜。今我幽愁还似古,皇天无语但苍苍。"其夕,忽云雾震雷雨雹,王惧,出巨仁放归。②

从诗句里的典故可以看出,巨仁把自己比作了中国人邹衍,他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而金富轼所记述的这个故事,堪比"六月飞雪"。

① [韩]金富轼《三国史记》四十四卷,《列传》四"金仁问"。
② [韩]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十一"真圣王二年"。

第二编

高丽王朝的汉学

太祖王建所建立的高丽王朝自公元918年一直延续到1392年，共历474年。高丽王朝各君主在位时间如下表：

太祖 918—943
惠宗 943—945
定宗 945—949
光宗 949—975
景宗 975—981
成宗 981—997
穆宗 997—1009
显宗 1009—1031
德宗 1031—1034
靖宗 1034—1046
文宗 1046—1082
顺宗 1082—1083
宣宗 1083—1094
献宗 1095
肃宗 1095—1105
睿宗 1105—1122
仁宗 1122—1146
神宗 1146—1170
熙宗 1170—1197
毅宗 1197—1204
明宗 1204—1211
康宗 1211—1213
高宗 1213—1259
元宗 1260—1274
忠烈王 1274—1308
忠宣王 1308—1313
忠肃王 1313—1339
忠惠王 1339—1344
忠穆王 1344—1348
忠定王 1348—1351
恭愍王 1351—1374
辛禑 1374—1388
辛昌 1389
恭让王 1389—1392

当太祖王建成为朝鲜半岛统治者的时候，中国正是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公元918年是我国的后梁贞明四年。960年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宋朝。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与宋朝同时在我国存在的，还有辽、西夏、金等政权。元朝自1260年建立，到1368年元亡时，高丽王朝还没有灭亡。在这

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高丽王朝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往。

高丽王朝是在新罗的基础上兼并了朝鲜半岛其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早在兼并其他政权的时期,新罗就有了很高的汉学水准,已如上述。在征服与兼并的过程中,新罗搜罗了大批的半岛文化人才。这些人都是新建立的高丽王朝急需的文化尖兵。其文化建设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开创性地建立了国家直接管辖的学校。从现有记载看,在高丽王朝建立之前,朝鲜半岛各个政权的历代国王也都重视文化与教育,重视奖励学问。但是朝鲜半岛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校,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在高丽王朝之前并不完备。公元935年,太祖王建开始在高丽王朝内大力兴设学校。990年在西京(今平壤市)设立书院;992年设国子监,并选拔优秀生徒,送他们到中国留学。其次,是"私学"开始出现。穆宗时,被称为"海东孔子"的崔冲第一个在朝鲜半岛创立私学。随后,又有不少学者效法。朝鲜半岛的私学教育从此进入了发轫与发展期。后来在半岛大量出现的"书院",就是其传统的延续与继承。汉文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普及。第三,高丽王朝大力提倡书写文化,在文臣中行"月课法",命京中和地方文臣每月上诗三篇,赋一篇。用宫廷的指挥棒来调动人们对于汉字书写的兴趣。

高丽王朝的汉学研究,是在汉学普及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普及汉学的第一步,就是普及汉字。必须注意的是,该普及的时间是很长的,而绝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太祖王建开始,高丽王朝把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了汉文字书写为中心的构建上,该浩大的工程耗费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说到高丽王朝的丰功伟业,古代朝鲜的文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文字的书写,其次才是官僚体制的建设,再其次才是有形的文化财产的遗存。到了公元11世纪,王朝的文化价值取向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首先是诗人大量出现。而这里所说的诗人,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汉诗诗人。此时,在半岛出现了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金黄元、高兆基、郑袭明、郭輿等一大批有才华的诗人。高丽诗人们以清新的风格、浓厚的抒情色彩,开一代风气。尽管这些诗人还不足与后来的李仁老等诗人的创作成就相比,但是他们是半岛新的作家群体。半岛上汉字书写开始进入了黄金时代。与新罗和百济有数的几位汉诗诗人相比,他们的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个已经成熟了的可以自由书写的汉字文化中的代表,而不仅仅是他们自身。到了12世纪初,金富轼完成了他的《三国史记》的编纂。《三国史记》追述新罗从公元前57年到公元935年共992年、高句丽从公元前37年到公元668

年共705年、百济从公元前18年到公元660年共678年争雄朝鲜半岛的历史。13世纪，一然的私家史书《三国遗事》问世。这两部巨著里的人物传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显示了高丽王朝散文的巨大成就。到了这时候，半岛文学的主流是汉文诗歌而不再是口头诗学范围内的传说与演唱。书写文化在半岛已经扎根。高丽时代在半岛流行的汉语口语教材《老乞大》中有这样的课文：

你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的好？

我汉儿人上学文书，因此上些小汉儿言语省的。

你谁跟底学文书来？

我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来。

你学甚么文书来？

读《论语》《孟子》、小学。

你每日做甚么工(功)课？

每日清早晨起来，到学里。师傅上受了文书，放学，到家里吃饭罢，却到学里写仿书，写仿书罢对句，对句吟诗，吟诗罢师傅前讲书。

高丽时代的汉字教育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第一章 高丽时代的汉文学

高丽王朝建立以后所采取的文化政策，是以汉字书写为中心的。朝鲜半岛的国语文学，在这个时代其实是受排挤与压制的。目前在学术界还有一种看法，以为朝鲜的国语文学的繁荣，也是开始于这个时期。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觉，是这些学者认为，高丽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不仅把原有的新罗乡歌记录下来，还创作出了高丽歌谣、景几何体和时调等多种样式的国语诗歌。要知道，高丽歌谣之所以会长期流传民间，被称为“俗谣”和“长歌”，其实是掌握了文化话语权利的贵族士大夫们排挤的结果。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在书写的汉字文化在朝鲜半岛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这些敢于大胆地表现爱情、抒发情感等作品，其实正是那时候在朝鲜半岛文学的主体。它们原本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化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景几何体”就明白了。这类诗歌因段末附有朝鲜语气词“景几何如”而得名。又由于第一篇作品题名《翰林别曲》，所以又被称为“翰林别曲体”。它最早创作于13世纪，内容充满了高丽贵族的生活情趣。其文字是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乡札”和汉文的混用。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翰林别曲》是高丽贵族对于自己民族原有诗歌的仿作，是对于原来处于文化中心地位的口头诗学文化的怀念与追忆。新罗乡歌也好，高丽歌谣也罢，原本就是朝鲜半岛诗歌的主要组成部分，原本就处于半岛文化的中心地位。即使是在新罗时代，有了崔致远这样伟大的诗人，半岛的文学依然还是它们的天下。随着汉字的普及与日益深入人心，它们由原来的中心地位被排挤到了边缘。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高丽歌谣，其实只是原有作品的冰山之一角，远不是高丽歌谣的全貌。至于那些上承乡歌、下启时调和歌辞，在朝鲜的国语诗歌发展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的《翰林别曲》类作品，是高丽贵族士大夫们在试图突破外来汉字的束缚，回归本

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可贵的尝试。我们可以看到,就汉字书写的诗歌以外的情况来看,高丽歌谣与后来产生的"时调"①的音乐性都比"翰林别曲"体要明晰。而"翰林别曲"体在音乐性方面远不如二者。但是它也有自己的长处,这就是它的书写方面的特性。或者,也可以换句话说,"翰林别曲"体是类似于"汉诗"一样的作品,它更接近案头之作,而不太适宜于歌唱。

在高丽王朝,由于政府的提倡与鼓励,汉文的书写成了时尚。高丽太祖王建于公元935年兴设学校,975年,正式开科举取士,990年在西京(今平壤)设修书院,992年设立国子监,并选拔优秀生徒到中国留学;又命京中和地方文臣每月进诗三篇、赋一篇。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高丽王朝书写文化的发展。高丽穆宗时,崔冲创立了高丽第一所私学,私学随后在半岛兴盛起来。汉文书写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普及。士大夫们以书写为文化权利的表现和行使手段,并且让书写出来的一切符号都趋近于艺术。

到了高丽晚期,这些书写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并且在文化人那里得到了普及。相传无名氏所作《翰林别曲》里就排列了"(颜)真卿书、飞白书、行书、草书、篆籀书、蝌蚪书、虞世南书"和"羊须笔、鼠须笔"等。《翰林别曲》是用于演唱的,这说明当时不仅是文化人知道这些书写,高丽文人书写的情况连一般的老百姓都知道大概了。尽管他们可能不会书写汉字。

书写的成就是巨大的。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金黄元、高兆基、郑袭明、郭舆等诗人纷纷闪亮登上了书写文化的舞台,李仁老、林椿、李奎报、崔瀣、郑枢、李崇仁、元天锡等文人更是将周初以来的中国书写文化精神在高丽王朝尽情地加以发扬光大。12世纪初,金富轼著有《三国史记》,13世纪一然的《三国遗事》问世。两部巨著都是纯汉字的书写,充分展示了高丽文人在书写方面的成就。整个高丽王朝,文学的主流是汉文诗歌,书写文化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在中国的居住时间甚至超过了二十六年。高丽王朝书写文化的建立,为王朝与中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贸易往来提供了最为方便的通道。在没有海运的时代里,高丽君臣可以迅速从中国获得各种信息,与东北亚各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书写文化也由此而成了后来的朝鲜王朝的主流文化传统。书写的荣耀乃是高丽文人的美学追求。至于对于"稗说"与国语语音的整理工作,则是在朝

① 高丽末期出现的文学体裁,是只有三行的短诗。

鲜王朝世宗大王以后才开始的。

汉字书写在半岛一旦出现就经久不衰，在高丽朝风行一世。不管是忠于君主还是试图推翻君主的文人与武人们，在采用汉字书写方面的态度是空前的一致的。如此大规模的由口头诗学到书写的几乎是完全的转型，是中国与朝鲜半岛文人们经过了漫长的相互交流之后才完成的。就高丽时代的汉学家们而言，他们首先需要的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而如此的意识形态转变的核心，就是高丽文人们开始在心目中把“文”看成是极其重要的观念。就如同在我国的情况一样，“文”不仅是文字，不仅是书写，而且是一种理念，是文化的代表和象征。正如朝鲜文人徐居正（1420—1488）在《东文选序》中所论述的：“乾坤肇判，文乃生焉。日月星辰森列乎上而为天之文，山岳海渎流峙乎下而为地之文。圣人画卦造书，人文渐宣。”在徐居正的论述里，“天文”“地文”和“人文”对举，与我国南北朝时刘勰《文心雕龙》的提法颇有相近之处。时至今日，高丽文人的诗文集尚可知的包括崔冲（984—1101）《崔忠宪公遗稿》；义天（1055—1101）《大觉国师文集》；金富轼（1075—1151）《三国史记》《银台文集》；朴寅亮（？—1096）《殊异记》（片段）；李仁老（1152—1220）《银台集》《双明斋集》《破闲集》等作品，但只有《破闲集》还在完整的流传；李奎报（1168—1241）《东国李相国集》；崔滋（1188—1260）《补闲集》；一然（1206—1289）《三国遗事》。该书与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号称朝鲜半岛汉文史籍的“双璧”；李承休（1224—1300）《动安居士集》；安轴（1243—1306）《谨斋集》；陈澕（1200 文科及第）《梅湖遗稿》；李齐贤（1287—1367）《益斋集》《益斋乱藁》；林椿（？）《西河集》；崔瀣（1287—1340）《拙藁千百》；李穀（1298—1351）《稼亭集》；郑道传（1392？—1398）《三峰集》；李穡（1328—1396）《牧隐集》。

高丽文人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金黄元、高兆基、郑袭明、郭輿、李仁老、林椿、李奎报、崔瀣、郑枢、李崇仁、元天锡几乎都有自己流传至今的著名诗句。

高丽初期文人朴寅亮的汉字书写作品受到过宋朝文人的激赏。

朴寅亮（？—1096），高丽初期文人。朝鲜文人郑麟趾《高丽史·列传》卷九十五载：“朴寅亮，字代天，竹州人，或云平州人。文宗朝登第。多所扬历。辽尝欲过鸭绿江为界，设船桥，越东岸置保州城。显宗以来屡请，罢不听。二十九年遣使请之，寅亮修陈情表曰：‘普天之下既莫非王土，王

臣尺地之余，何必曰我疆我理？'……辽主览之，寝其事。累迁右副承宣，转礼部侍郎。三十四年与户部尚书柳洪奉使如宋，至浙江遇风，几履舟。及至宋，计所贡方物，失亡殆半。帝王勿问。王乃释洪等。有金觐者亦在，是行，宋人见寅亮及觐所著尺牍、表状、题咏，称叹不置，至刊二人诗文，号《小华集》。历翰林学士、承旨、同知中枢院事，肃宗元年以右仆射、知政事卒，谥文烈。寅亮文词雅丽，南北朝告奏、表状皆出其手，尝撰《古今录》十卷藏秘府。"朴寅亮的诗歌居然被中国人刊刻发行，可见其受人喜欢的程度。

《东文选》卷十二的朴寅亮《使宋过泗州龟山寺》写到：

巉岩怪石叠成山，上有莲坊水四环。
塔影倒江翻浪底，声声摇月落云间。
门前客棹洪涛疾，竹下僧碁白日闲。
一奉皇华堪惜别，更留诗句约重攀。

这里的"碁"即"棋"字。该诗显然是朴寅亮特意为下棋的中国僧人写下的。

朴寅亮的《伍子胥庙》写道：

挂眼东门恨未消，碧江千古起波涛。
今人不识前贤志，但问潮头几尺高。①

伍子胥临死时要求把自己的头挂在楚国都城的东门处，他要亲眼看着秦国的兵马进入楚国。朴寅亮对此十分感慨，认为时下大家把伍子胥都给忘了，仅仅关心"潮头"等杂事。

《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在高丽出将入相，其汉诗文得到了出使高丽的宋朝文人徐兢的高度评价。

金富轼（1075—1151），高丽时代史学家、文学家。字立之，号雷川。生于开京（今开城）。金富轼自幼渴慕汉学，其汉学功底深厚，其名字中"轼"字是因钦慕苏轼而取。其弟金富辙之名则仿照苏辙。金富轼于肃宗朝文

① ［韩］《东文选》卷十九。

科及第，历任宝文阁待制、翰林学士、门下侍中、平章事等职。1135年任元帅，率官兵平定西京（今平壤）叛乱。1145年，金富轼参阅朝鲜古代文献和中国《隋书》《通典》《册府元龟》等古籍，吸收民间传说，编纂成纪传体的史籍《三国史记》。该书在朝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朝文人徐兢在出使高丽时结识了金富轼，在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对金富轼作了介绍。金富轼曾经两次出使中国。1151年，76岁的金富轼去世，谥号"文烈"，被封为乐浪侯。其著作传世者除了《三国史记》外，还有《银台文集》。金富轼还曾与朴升中、郑克永等编写过《睿宗实录》《仁宗实录》。朝鲜文人郑麟趾《高丽史·列传》九十八卷记载说："（金富轼）貌硕体面黑、目露，以文章名世。宋使路允迪来，富轼为馆伴。其介徐兢，见富轼善属文、通古今，乐其为人，著《高丽图经》，载富轼世家。又图形以归，奏于帝。乃诏司局镂板，以广其传，由是名闻天下。后奉使如宋，所至待以礼。"

金富轼的诗歌也很有名。他的《甘露寺次惠袁（远）蕴》写道：

俗客不到处，登临意思清。
山形秋更好，江色夜犹明。
白鸟高飞尽，孤帆独去轻。
自惭蜗角上，半世觅功名。①

韩国的甘露寺在今京畿道开城府的五凤峰下。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记载，"高丽盛时，昌华李公子渊奉使中国，游观润州甘露寺，心甚乐焉。既返，求其形势相似者，六涉寒署，乃得此地，乐而营造，因冒其名，以建道场。"其后的许多文人墨客都喜欢到这里来抒发情怀。金富轼的"白鸟高飞尽，孤帆独去轻"一联尤其出众。

金富轼的《重（熏）修院杂咏》吟唱道：

院静僧闲夜向分，残灯孤枕卧幽轩。
自嗟情习何时尽，梦把花枝对酒樽。②

① ［韩］金甲起译注《三韩诗龟鉴》，第47－48页，梨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② ［韩］金甲起译注《三韩诗龟鉴》，第214－215页，梨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这里的“夜向分”就是“向夜分”，也就是已经到了夜半时分。“梦花故事”来自后汉马融。马融好学，一天他梦见自己来到了一个开满了鲜花的树林。马融在梦里采花不已，如醉如痴。醒后文才大增，天下文词无所不知，时人称为“绣囊”。金富轼对中国文化，确是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白头勤苦未捐书”就是他的生活的真实写照。

金富轼出自新罗“金”姓，其最著名的著作还是他主持编写的半岛第一部官方纪传体正史《三国史记》。全书共五十卷，完全用汉字书写，近年有韩国中央大学李康来教授的校对本问世。《三国史记》主要记述新罗的历史，其次是高句丽、百济的历史。半岛的“三国”统一于公元7世纪的新罗。“统一新罗”之后才是王氏高丽。

与金富轼的经历不同，高丽文人李齐贤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所交往者绝大多数都是元朝的一流文人。

李齐贤是高丽王朝晚期诗人，也是在中国生活时间最长的朝鲜半岛文人之一。他在中国游历近三十年。李齐贤(1288—1367)，字仲思，号益斋、栎翁。初名之公。生于开京①。其父即为著名文人。李齐贤自1304年始历任延庆宫录事、司宪纠正、典校寺丞、三司判官、西海道按廉使等职。1315年作为高丽忠宣王的侍从到元大都，与中国文人姚燧、阎复、赵孟頫、元明善等人交往。他在中国游历了川、陕、青、苏、浙等地，因为高丽国王被流放到吐蕃，他也到那里去探望。除了写作大量的文章以外，李齐贤还创作了许多汉文诗词，朝鲜文人郑麟趾主编《高丽史》多有引用。李齐贤的诗歌作品，题材十分广泛。许多高丽文人都始终以读书万卷、行路万里为其一生的不懈追求。但是像李齐贤这样既可以用诗歌表现对祖国的怀念和对元朝压迫高丽的不满，又可以真切地描绘中国名胜古迹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如《蜀道》《望华山赋水调歌头》《焦山》《多景楼雪后》等。

李齐贤1341年回国，官至右政丞。李齐贤曾用汉文翻译高丽歌谣；所著《栎翁稗说》是朝鲜稗说文学最早的作品之一。他又曾将中国元朝学者赵孟頫的书法传入朝鲜。清朝学者伍崇耀1862年在广东辑印《奥雅堂丛书》时，将他的全集《益斋集》编为第23集刊行。郑麟趾等撰写的《高丽史·列传》卷一百一十记载说：“(李齐贤)撰国史于其第，史官及三馆皆会

① “开京”即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城市。

焉。王尝命齐贤议定昭穆之次，语在《礼志》。王又以修筑京城访大臣耆老。齐贤上言曰：'三代而上不可知，三代而下立都而无城郭，未之闻也。我太祖东征西讨，削平僭乱统三为一，之后七年而薨。用疮痍之民，起土木之役所不忍也。故不城松京，非不为也，势不可也。其后因循至于显王之初，契丹蹂躏京邑，烧毁宫室，显王苍黄南狩。当时若有城郭之固，契丹未必蹂躏烧毁若此，其甚且易也。显王二十年，始命李可道筑开京城郭。后金山王子引兵而来，西海道、忠清道、沙平津北无处不至，不得入京都。余古車罗大屯兵黄桥，又不能入京都，以有城郭也。城郭之当修，无智愚皆知之矣。若修之则农时不可夺，糗粮之资、板筑之材，不可不备。起役之后，大众一聚，宫城及城门必令守备可也。既定此议，虽有阴阳忌讳，确然不改然后可就也。'红巾之乱，王南幸，齐贤谒于尚州，尝挥涕叹曰：'今日播迁，何异玄宗禄山之乱？'及贼退，又与洪彦博言曰：'古人称，壮哉山河，此魏国之宝也！初若设险守隘，制胜可必，恨不早图也。贼若野战，则我军必败，但因雨雪乘贼不虞故胜之。此赖宗社山河之佑也。'十六年卒，年八十一。谥'文忠'"。

与李齐贤不同，高丽文人李仁老与其同道仰慕中国竹林七贤，并以半岛"七贤"自居。

朝鲜文人郑麟趾《高丽史·列传十五》卷一百零二记载说："时李仁老、吴世才、林椿、赵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等自以为一时豪俊，结为友，称七贤。每饮酒赋诗旁若无人"。按照《高丽史》的传记，李仁老（1152—1220），字眉初，初名得玉，号双明斋。其曾祖曾任高丽平章事。李仁老自幼聪悟，能属文，善草隶。逢郑仲夫武人之乱，乃祝发以避，归隐十年。乱定归俗。明宗十年，擢魁科，补桂阳管记，迁直史馆。出入史翰凡十有四年。曾出使中国。李仁老与当世名儒吴世才、林椿、赵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结为忘年友，以诗酒相娱，世比之"江左七贤"。神宗朝累迁礼部员外郎，高丽高宗初，拜秘书监右谏议大夫。以诗名于时，但李仁老性偏急，当世不为大用。卒年六十九。所著有《银台集》二十卷，后集四卷，《双明斋集》三卷，《破闲集》三卷。

现李仁老作品存世者只有《破闲集》和收在《东文选》里的一部分诗文。

李仁老《和归去来辞》被收入徐居正等编辑《东文选》第一卷卷首。该文写到："归去来兮！陶潜昔归吾亦归。得隍鹿而何喜，失塞马而奚悲？蛾

赴烛而不悟，驹过隙而莫追。才握手而相誓，未转头而皆非。摘残菊以为餐，缉破荷以为衣。既得反于何有，谁复动于玄微？”我国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曾描述说：“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可以说，高丽文人李仁老已经深得阴柔之美的内中三昧。他为读者提供的，是一种优美的意境，一种无我之境。

收录在《东文选》卷四的李仁老《右山水友赵亦乐》写道：

我饮止数杯，君饮须一石。
及当醉陶陶，至乐相与敌。
两脸若春融，千愁尽冰释。
何须校少多？且得适其适。

李仁老的《破闲集》三卷是高丽第一部诗话作品，也是朝鲜半岛最早的诗话。其后的《补闲集》《小华诗评》等诗话作品，都以《破闲集》为宗。

在高丽文人里，“老于诗境界，谋却酒生涯”的李奎报也在汉学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李奎报（1168—1241），高丽时代的著名文人，初名“仁氏”，字春卿，自号（诗、琴、酒）三酷好先生、白云居士。京畿道骊州人。其父李允绥官至户部郎中。1190年登同进士第。此后长期任地方官，崔忠献父子执政后大受器重，历任正言、右司谏知制诰、户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政堂文学等，是朝廷重臣。谥号“文顺”。郑麟趾等撰《高丽史》卷一百零二，为李奎报辟有列传。著有《东国李相国集》《白云小说》。其本集有五十卷。

李奎报的诗歌在韩国诗坛上也很有分量。据李睟光《芝峰类说》的记载，“五言排律始见于初唐。而杜子美为一百韵。至高丽李相国奎报为三百韵。”①李奎报最著名的长诗是《东明王篇》和《三百零二韵诗》。前者取材于神话，写高句丽始祖朱蒙开国故事。《三百零二韵诗》就是《芝峰类说》所说的“三百韵”的排律。该诗赞颂自己国家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纯朴的民俗和秀丽的景色。

李奎报十分熟悉中国文学，特别推崇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和苏

① ［韩］李睟光著南晓星译《芝峰类说（上）》，第619页，乙酉文化社1994年版。

轼等人。他的《犬滩》云：

清晓发龙浦，黄昏泊犬滩。
黠云欺落日，狼石捍狂澜。
水国秋先冷，船亭夜更寒。
江山真胜画，莫作画图看。①

诗中的“黠云欺落日，狼石捍狂澜”是十分生动的拟物写法。

李奎报精通中国的经史百家与佛老之书。他青年时代就与“海左七贤”诸位诗人交游，经常参与诗会活动，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在武人跋扈、朝廷上日日争权夺利的情况下，身居高位的李奎报也难免出现归隐之思。其《新赁草屋韵四首：草堂端居和子美（一）》就写到：

杜门无客到，煮茗与僧期。
荷耒且学圃，归田当有时。
贫甘老去早，闲厌日斜迟。
渐欲成衰病，疏懒不啻兹。②

李奎报因为新租赁到了草屋，想起了杜甫的草堂。因此而写下了五首诗歌。这里是其中的一首。诗中的“啻兹”是不仅仅如此的意思。末联的意思是，我不仅仅是疏懒，而且还逐渐出现了衰老的病症。

其《新赁草屋韵四首：草堂端居和子美（四）》写道：

心已如焦谷，人谁射毒沙。
老于诗境界，谋却酒生涯。
默笑观时变，闲吟感物华。
在家堪作佛，灵运已忘家。③

① ［韩］金甲起译注《三韩诗龟鉴》，第147－148页，梨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② ［韩］金甲起译注《三韩诗龟鉴》，第151－152页，梨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③ ［韩］金甲起译注《三韩诗龟鉴》，第155－156页，梨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李晬光的《芝峰类说》评价李奎报的诗作属于“雄赡”。从上述的诗歌里，我们也可以比较切近地了解李奎报的“雄赡”。诗中的“焦谷”、“毒沙”都是来自佛经。“灵运”是指谢灵运。“老于诗境界，谋却酒生涯”与“默笑观时变，闲吟感物华”皆是可以称为“雄赡”的佳句。

李奎报的《北山杂题》表现的是作者超然物外的达观态度。其第四首吟道：

山人不浪出，古径苍苔没。
应恐红尘人，欺我绿萝月。

高丽文人崔滋《补闲集·中》对《北山杂题》评价极高，认为其酷似李白作品，“文顺公《北山杂题》云，‘山人不浪出，古径苍苔没。应恐红尘人，欺我绿萝月。’此诗置于李白集中，未知孰是……”

崔瀣与韩国历史上最早的汉诗选集《三韩诗龟鉴》，标志着高丽的汉文学进入了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新的发展阶段。

《三韩诗龟鉴》是高丽时代的崔瀣批点、赵云仡精选的。崔瀣生活于高丽的忠烈王朝，字猊山，号拙翁。他生于1287年，1340年去世。赵云仡生活于高丽的恭愍王朝(1332—1404)。该诗集选录了新罗、高丽的诗人共64家的247首汉诗。该书的初版刊本已经不传，目前可以见到的是朝鲜宣祖二十一年版本。该年即公元1566年，该书按照当时习惯是用中国的纪年来标明出版年代。书的末尾刊印的是“嘉靖丙寅冬顺天府重刊”。关于《三韩诗龟鉴》，历来的文献里有不同的说法。金宗直《青丘风雅·序》认为，“近世金快轩、崔猊山、赵石涧三老，各有选集。石涧以快轩杂猊山之编，最为得体。然而合乎己之权度者，然后收之，故多遗焉。此三老之选，皆忠烈以前之作，厥后诸作无有继而搜辑者。宗直辄不自揆，欲业粹为一编，以便览阅久矣。”[①]这里的“快轩”是指金台铉。按照金宗直的说法，《三韩诗龟鉴》是赵石涧把崔瀣和金台铉的书混合在一起而成的。徐居正《东文选·序》中则说：“皇明混一，光岳气全。我国家列圣相承，涵养百年。人物之生于其间，磅礴精粹。作为文章，动荡发越，亦无让于古。是则我东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并

① ［韩］金甲起译注《三韩诗龟鉴》，“解题”，梨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行于天地间，胡可泯焉，而无传也哉？奈何金台铉作《文选》，失之疏略；崔瀣著《东人文》散逸尚多。其不为文献之一大概也哉？”①按照徐居正的说法，崔瀣还是《东人文》的编辑者。韩国著名的文艺理论著作《乐学轨范》的作者成俔则认为：“《东人文》几十卷，侍中崔滋所撰；《三韩龟鉴》一帙，猊山崔瀣所撰；《东国文选》几十卷，侍中金台铉所撰。”《三韩诗龟鉴》还有日本版，是日本的元禄十一年（1698年）秋季改刻的。

看来，在韩国古代的文人心目中，崔瀣是一位比较重要的文选家。他曾经说道：“间有求见东人文字者。余直以未成书对，退且耻焉。于是，始有撰类书之志。东归十年，未尝忘也。今则搜出家藏文集其所无者，遍从人借，裒会探掇，校厥异同。起于新罗崔孤云以至忠烈王时。凡名家者，得诗若干首，题曰‘五七’；得文若干首，题曰‘千首’；骈俪之文若干首，题曰‘四六’。总而题其目曰《东人之文》。于戏！是编本自得之兵尘煨烬之末，蠹简抄录之余。未敢自谓集成之书。然欲观东方作文体制，不可舍此而他求也。”②

在高丽群星闪耀的文人中，李穀与李穑父子都是元朝的科举及第者。他们在中国学习，也在中国做官，与元朝文人的交流十分深入。

李穀（1298—1351），高丽末期文人，初名芸白，字中父，号稼亭。李穀与李穑父子都是高丽著名诗人。李穀于1320年中举子科，官至政堂文学，封韩山君。1333年又在中国元朝制科及第，并在元朝任翰林国史院检阅。李穀多次往来于中国和高丽之间，在中国的留居时间也很长。有《稼亭集》20卷传世。宋朝文人陈旅《送李中父使征东行省序》曰：“高丽在我朝，如古封建国得自官人。其秀民皆用所设科仕于其国。皇庆间，诏大比天下士，自是始有试礼闱者，然多缀末第。或授东省宰属，或官所近州郡。既归，即为其国显官，鲜更西度鸭绿水者。夫自封建既废，天下仕者无不登名王朝，其势然也。今高丽得自官人。而其秀民往往已用所设科仕其国矣，顾复不远数千里，来试京师者，盖以得于其国者，不若得诸朝廷者之为荣。故虽得末第？官，亦甚荣于其国。况擢高科官华近，为天下之所共荣者乎。元统元年，天子亲策进士，旅叨掌试卷帘内。高丽李穀所对策大为读卷官所赏，乃超寘乙科。宰相遂奏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亦荣矣哉。明年，上大

① ［韩］金甲起译注《三韩诗龟鉴》，“解题”，梨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② ［韩］金甲起译注《三韩诗龟鉴》，“解题”，梨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兴学校。中父得捧制书东还，且将以其得于朝廷者悦乎亲，以及其乡党也。余壮其行告之曰：子归见邦人诸友，宜言上文明，立贤无方。未尝鄙夷远人。如曾请丹妍不产于中国，而中国实用之。士患不适于用，不患中国之不已用也。不然，兴学校之诏，何以远颁于兹土哉。《易》之'渐'曰，'鸿渐于逵，其羽可用为仪，吉。'吾将见扬翘于东方者，与中父翩翩而来仪乎？元统二年四月十八日。国子助教莆田陈旅序。"

李穀之东还，有一批元朝文人为其写诗送行。其中东平岳至写道：

李君捧制驰驯归，海门六月云霏霏。
扬鞭举鞚四千里，东过鸭绿生光辉。
去年射策金门里，文章惊起中朝士。
绯衣象笏锡恩光，执笔翰林修国史。
君如海鹘腾羽翰，奋然一举凌云端。
勿讶边州有奇士，古来君子出三韩。

史官王士点的送行诗云：

朝暾明祖幄，芳饯赋长吟。
骑置虹旌下，人传凤诏临。
香名留雁塔，绣服过鸡林。
声教东渐海，年登九牧金。

襄阴王沂吟诵道：

元统千年运，三韩万古风。
江流明绿鸭，袍色赐猩红。
负弩乡人出，乘轺驿路通。
新诗书侧理，为我寄飞鸿。

大名潘迪是元朝著名的考古学者，他考证石鼓最力。他也有送别诗：

披尽丛沙见紫金，钜篇曾动主司钦。

东方宠耀山川丽，西掖恩沾雨露深。
辇底皇华辞凤阙，日边丹诏下鸡林。
还家细向乡人说，亘古文明莫盛今。

以诗句送李穀回高丽的中国文人还有程益、揭傒斯以及元朝翰林修撰宋褧。

从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出，李穀的汉文化修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李穡（1328—1396），高丽末著名文人，李穀之子。字颖叔，号牧隐。李穡生于高丽忠肃王十五年，死于朝鲜太祖五年。他的一家都与中国文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父亲李穀曾出任元朝的中瑞司典薄。李穡十三岁中成均试，随父到中国作为生员留学。1353 年为征东省乡试第一名。后以书状官身份再度来中国，参加廷试得第二甲第二名。任元朝翰林文学承仕郎、翰林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等职。回国后，官至成均馆大司成、政堂文学。李穡《牧隐集》55 卷初版于 1404 年，由其子整理并付梓。后辈孙更完善之。现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本共 24 册，1626 年全罗南道顺天府刊印本。

朝鲜文人郑麟趾《高丽史·列传》卷一百一十五载："辛禑三年，加推忠保节同德赞化功臣号，禑以穡为师傅。穡追父谷志，成大藏经。……帝遣张溥、周倬等来，溥等至境，问穡安否。禑以穡称为判三司事，出迎诰命。十一年上书乞退，禑不听，寻检校门下侍中。十二年知贡举以旧例。享禑于花园，禑以师傅敬重之，亲执手引入，欲对榻坐。穡固辞。禑亲牵内厩马赐之，命作诗。穡书云：'圣主开兴运，愚臣荷異恩。科场命分桂，卑食特罗尊。当面山光滴，临身日色温。经筵逞小技，茂渥似乾坤。'是试，穡严立禁防，举子年未满二十，不许赴试。判门下府事曹敏修子赴试不中，同知贡举廉兴邦欲取之，力请于穡。穡不听。"

朝鲜文人河仑《有明朝鲜国特进辅国崇禄大夫韩山伯牧隐先生李文靖公墓铭并序》一文，已收入《东文选》卷一百二十九。文中说："中朝进士以理学唱鸣东方，位至王国上相者，韩山牧隐先生李文靖公而已"。

李穡的《天宝歌：过蓟门有感而作》是七言古诗，已收录于朝鲜文人徐居正等编辑的《东文选》卷八：

天宝盛时何昌丰，天宝乱时何朦胧！
沉香亭中春色浓，渔阳鼙鼓声咚咚。

马嵬山下飞尘红，天子剑佩鸣琤琤。
三风十愆在省躬，宴安鸩毒须慎终。
明皇一念常笃恭，此胡安敢行狂凶？
乃知人事飞天穷。不见吴王宫西施半酣歌吹濛，
越兵自渡江无风。

高丽文人还为后代保留了许多中国文献。郑麟趾《高丽史》卷四十四《世家》四十四"恭愍王"记载说：

（姜）仁裕等于洪武五年①十二月初七日，因本国差委，在浙江省地面，蒙中书省差礼部主事王本道到来太仓，传奉圣旨："教恁众官人并亲随、伴当都来朝廷面听宣谕！"初八日，太仓卫应付快船二只，差镇抚周成礼送。二十日早朝，奉天门下面听宣谕。

随后就是高丽文人记载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大段口谕：

我前者，恁②众官人每③去太仓时，教开春礼部官去抬茶饭缘故，老院使并两个内侍我见不来。想这船风浪里，打将那里④去了。随后才方到来有姓孙的内侍⑤，废了。说，病死了，自吊死了。说的差呵。我问的明白了也。恁那国王，着带刀的人每窗下门外看守，行里步里关防的紧呵。那火者说道："我是本国的人，怎的这般关防？"我说呵，姓朴的宰相不容说，打了一顿，更与了毒药药死。门里不敢将出，后墙上拖出去了。特的把帽子高挂在树上，尸首吊在树下。故意怕毒药显出，等的口内生蛆，才方交百姓

① 明朝洪武五年壬子是高丽恭愍王二十一年，即公元1372年。[韩]郑麟趾《高丽史》卷八十七《表》卷二记载："五月，大明安置汉主陈友谅子理、夏主明玉贞子升于我"。

② 恁，你。早期白话里多见。

③ 每，们。

④ 那里，哪里。

⑤ 1372年春夏之交，朱元璋派延达麻失里及孙内侍送陈理和夏升到高丽。延达麻失里及孙内侍到开城以后，莫名死去。同年腊月，高丽使臣来南京，朱元璋大发雷霆。郑麟趾《高丽史》卷四十三《世家》"恭愍王二十一年"："癸亥，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达麻失里及孙内侍来锡王彩段纱罗四十八匹。王出迎于迎宾馆。"

来报。又驾船的军人每根的[1],也交多人关防。

说与恁那国王,一年三四起家差人来进贡许多钱粮。我可无些少好勾当。因此上,着老院使和两个内侍与将些少纱罗缎匹答礼,准当走一遭来。你可废那一个小火者[2],便有甚么光彩?休道是一个,便是十个也不打紧。这个火者不是那里与将来的,又不是躲避差发来的,是元朝那里我寻将来的。休远虑,休远虑的深了。我如今把恁放在船上,不教下岸来,恁心里如何?

恁每是打差使人,不干恁每事。说与恁那国王:既然疑惑我呵,修理城郭,囤粮,准备弓箭、炮石、军马,便敢相敌。你这般使人来打细[3],济甚事?!我听的,你那里放著一个破破陋陋城子[4]。你且海东囤粮,多劳民力,不见民有益。倭人常川侵你,你便准备三五百船只,交军人捉拿,那的便是好勾当。我这里比你那里隔海,有倭人来,我差人也捉拿他里[5]!为拿不的呵?将明州卫戴指挥、太仓卫徐指挥两个根的杀了,又差于指挥去根赶捉拿。将倭人年少的刺了口,更阄了他也,海上也干静了也。

去年正朝使臣姓韩的四个月到来。你为甚么迟来?风汛不好,不曾来的。我的指挥问他:"不会说汉儿言语?把这高丽人每绑了手脚,撇在水里!"恁那宰相忙唾了两三唾:"休!""休!"可怎知道汉儿言语来?都是小见识!因此上,旱路里来了,他可要海路里回去。我不曾着去正意,看我那山东一带船只、军马动静。今年正朝使臣四个月前到来。不知怎的,的是正意来打细。前者,一只船七日到来,我这龙江[6],件件事都如此。姓李的火者,并达达[7]、回回诸色人,都来推做买卖打细。李火者来了两三番也,见达达,说达达话;见一般火者,说高丽话;见汉儿,说汉儿话。这般打细呵,怎中我如今强如恁来打细[8]!我这里两三处折了四五万军马,我这里是创立的天下。省台官都阙少。恁那里与将廉干识字人二三百名来!说与恁国王,我委付他省台六部、各卫里做官人,不强如恁使人来做买卖打

---

① 根的,跟着的。

② 火者,太监。

③ 打细,打探。

④ 高丽王朝都于松京,即今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城市。

⑤ 里,哩。口语。

⑥ 明初设立"龙江关",在今南京下关区。朝鲜文人郑梦周出使中国南京,写有《龙江关》一诗。

⑦ 达达,鞑靼。

⑧ 这句话的意思是:怎奈何我如今强大,随便你们怎样探听。

细。我交①三年一遭来进贡②。说来，恁国王不志诚。忒疑惑，忒疑惑的多，交他③休疑虑。因此上，恁每如今连三年依旧累来④。之后，可三年一遭来进贡。这二三百人⑤，送盘缠，来往取信，不强如恁来打细、使小见识？

有一小节事，姓周的⑥女孩儿从元朝寻将他来。问呵，他说姓朱。俺容不得他，问他父呵，却说姓周。我如今留了他也。想恁来，十三岁的小孩儿会吃你恁？可早送与了人，有失子母之情；他父一去之后，并无信息，有失父子之情。你又把他爷来远流去了。恁每做的事，忒小见识。远虑，远虑的深了。当年，恁那国王呈将文书来，不见了他的侄女儿，我便使使臣到处里寻将来，与将去了。姓金的火者回来，话说的不明白，今番杀了他也。休小见识，志诚者。恁这一姓王子，数百年休教失了便好。

我难道征不征⑦。有我的两个小厮利害，恁似这般不志诚，小计量。他后来要征恁。去呵，我便是失信一般。我如今征不征？不敢说，不得不如此。恁来呵，也由恁；不来呵，也罢。我若征恁去呵，明州造海船五百只，温州五百只，泉州、太仓、广东、四川三个月内修造七八千只船，明白征去也者。我不似恁波皮⑧王，交火者龙福铺马上搏出来，那的呵。是他的驸马，为这般上头绑出他来了。我可不那般的，休疑惑我。我从二十四岁上，红军内住子⑨三年。自家砌⑩了些个军马，修了一座城子。海内打造了一万船只，后来各处城郭都收拾了。又大元也赶的迤北去了。我如今胡人也不曾远去，我那里雇的恁那⑪。明日、后日把达达每拿的拿了，赶的赶了，天下宁静之后，桑麻满园，四方富贵。那其间论外国之罪也者。中国之乱，诸侯之福也。

---

① 交，叫，教。

② 按照礼制，外藩是三年一贡。

③ 交他，叫他，教他。

④ 连三年依旧累来，连续三年年年进贡。

⑤ 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出使中国的使节团规模是200－300人。

⑥ ［韩］郑麟趾《高丽史》卷四十《世家》“恭愍王二十二年”：“秋七月甲辰，遣判缮工寺事周英赞如京师贺千秋节，并献济州牧胡肖忽秃不花所献马十九匹、驴二匹，英赞女曾入元，为大明兵所掳，选为宫人，有宠于帝。”朱元璋申斥高丽使臣后，周英赞于次年以密直副使到南京，贺正并进《陈情谢恩表》，为老院使被杀等事做辩解。

⑦ 这句话的意思是：是否出兵征服高丽，我现在还不好明说。

⑧ 波皮，泼皮、无赖。

⑨ “子”当为“了”字。

⑩ “砌”同“起”。

⑪ 那，哪。

我是一个农家，与我中原作主。恁是箕子之国，新罗、乐浪郡相敌，掳了平百姓，如今恁便都做了恁的奴婢。在先，唐太宗征恁不得，他每不会征。后高宗都灭了恁国，来在后关。先生那波①男女不理法度，只要贪淫。以此上他也坏了，因那上头恁提防的是也。我可不那般的明白征恁去，洪师范②是恁那里惹大③一介官人，又是王的亲，水里淹死了，皆是一人所作。昨是留下这些个人，若不留下呵，则道是我这里把截军官每，见他许多财物，废了他姓命。

恁国王想也者：恁每使人辽东等处，与吴王④相抬茶饭，并布一百匹。茶饭吃了，布子不曾收回，与将去了。算起来每匹布该米三石，通计三百石，兀的也是钱粮。那里是把茶饭正意打细。恁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又夹带著纳哈出⑤的伴当，来看我军营里事，恁透与他消息，抢了我牛家庄马头⑥十万粮，更折了三千军马。恁那里进来的表⑦上说道"俺每子子孙孙世世称臣"来，临了做这般勾当，小见识！又与徐总兵抬茶饭，不是真意，故意打听北平府军官事迹。你那般小见识，怎生使的！以小事大，古之礼也，为甚是不志诚。济州马匹"今日将来""明日将来"闹了一年，则将的四个马来了，不知恁的。的事做买卖来的人每，将不答紧⑧布席来，却不将一个马来贩卖阿。的都是恁的小计量。比人身上有一个小疮，不看去呵，到大难医治。有恁到太仓，三月内风汛好呵，回去，对恁国王根前说者，更休听小人言语。姓朴的宰相，姓周的女孩儿父亲、亲眷，与将来者⑨；国王根前行的火者四五个，与将来者。

恁这几个官人每姓甚？去年姓洪的海面上坏了船只。见海上难过，有

① 波，拨、批。

② 洪师范是高丽文人，1372年出使中国，到达南京。回国途中海上遇风暴溺死。[韩]郑梦周《圃隐集》"年谱考异""(洪武)五年壬子"条记载说："三月，以书状官，从知密直事洪师范赴京贺平蜀，兼请子弟入学。还至海中许山遭飓风，师范溺死。先生万死乃生。"([韩]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5卷，第606页，1990年版)

③ 惹大，偌大，那么大。

④ [韩]郑麟趾《高丽史》卷四十《世家》"恭愍王"："丁亥。吴王张士诚遣周仲瞻来献玉缨、玉顶子、彩缎四十匹。"

⑤ 纳哈出是与大明对抗的北元辽阳行省丞相。

⑥ 马头，码头。

⑦ "表"是汉文的一种文体。高丽使团要在北京(南京)向皇帝呈"表"。

⑧ 不答紧，不打紧，不重要。

⑨ 与将来者，给我带过来。

许多艰难。与恁船只脚力，教恁官人每往登州过海，三个日头过的。今后，不要海里来，我如今静海。有如海里来呵，我不答应。恁如海里来的廉干、好秀才，吏员著小船上送将来，我便答应. 不要贪的来。今后其余的海里不要通连，说与恁国王。恁那头里的意思，好生志诚来。志诚的过了，反疑的多了。你这般疑虑计较，到①不好了。我从前差去的人已解的我意。我差人呵，不肯差汉儿人，都是你那里本国人。恁每问我这里事体动静，他不敢不说与恁。我恰三五年的国土，则是一二年的火者，这火者与我十二三年也，恁可废了他。达麻失里院使②，他是元朝的火者，我头里来不要他，教他旧城里闲住来。听他精细呵，我教他内里来住了。差恁那里去来，那里肯不说我这里动静备细。我中国使臣、使将去了，打死了，我再不使将人去！恁有心来呵，来；无心来呵，休来。我前者使将一只船去呵，许多军马接待。那里③有那般体礼？休道一只船，十只船去呵，怕甚么？我听的倭贼二三百里田地入侵，不理论，放着破破的城子，不修理城池。疑惑我则么？我征恁呵，明白征恁。胡人赶的远去了呵，五年征不得呵，十年征恁。有心来呵，来；无心来呵，休来。说与恁国王者。

这里的文字虽然来自朝鲜文人郑麟趾所著《高丽史》，实际上是高丽文人尤其是高丽使臣的记载。高丽文人记载了一段明朝与高丽关系十分敏感时期的历史。朱元璋对高丽恭愍王的不满，在文字中被十分生动的记录下来了，它们是不可多得的史传文学作品。但这些文字最大的价值还是真实地记录了洪武皇帝的口语。这些资料在我国、在世界上都是十分罕见的。朱元璋是皇帝，高丽使臣有义务要把不肯发布文字旨意的帝王的话语记录下来。朱元璋还是明朝的太祖，高丽的未来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对于高丽使臣来说，朱元璋的任何一个发音都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情报。把握好这些情报，对于高丽王朝来说可以说是命运所系。朝鲜太祖李成桂适时把握了这些文字，因而准确地把握了朝鲜半岛的未来。

---

① 到，倒，反倒。

② ［韩］郑麟趾《高丽史》卷四十三《世家》“恭愍王二十一年”：“癸亥，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达麻失里及孙内侍来锡王彩缎纱罗四十八匹，王出迎于迎宾馆”。

③ 那里，哪里。

第二章
高丽的宗教与汉学

从公元918到公元1392年，高丽王朝统一并治理着朝鲜半岛。至此，半岛的宗教经历了原始巫教的更生、儒佛道三教的传入等阶段。佛教是高丽王朝最主要的宗教。中国进入元朝以后，高丽国王娶公主为妻，成了元朝皇帝的女婿。此时的半岛佛教主要受元朝宗教理念的支配，佛教徒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并与朝鲜半岛以往的儒家传统形成了激烈的文化冲突。高丽末期，笃信儒家的文人排佛、斥佛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这些事件层出不穷，并最终导致了高丽王朝的灭亡。朝鲜王朝代替高丽王朝，在文化上的最明显标志就是佛家被儒家所代替。

在高丽王朝宗教发展史中，统治者利用各种宗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甚至可以说，高丽王朝也是在宗教的帮助下建立并发展壮大的。但到了后期，当佛教从文化的中心地带被排斥到边缘，成为信奉者以女子为主的宗教的时候，高丽王朝就走到了尽头。

高丽太祖王建生于唐乾符四年（公元877年）正月，成长于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家庭。有关他的诞生，就有佛教因缘的传说。传说桐里山祖师道诜遇到王建的父亲时："（云）明年必生圣子，宜名王建。因作实封，题其外云：谨奉书百拜献书于未来统合三韩之主大原君子足下。"尽管这只是传说，但高丽王朝也积极地维护这种宗教权威，尽量让其王权有一个神权的外衣。王建生活的年代时值新罗王朝走向衰败，群雄并起。甄萱据南州称后百济，弓裔据高勾丽之地。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二十岁的王建投奔弓裔，被封为金城太守。由于王建屡建战功，职位逐步提升，但是弓裔的残暴也时常让王建望而生畏。在一批不堪其苦的大臣的策划下，贞明四年（公元918年）六月，王建率众发动政变，推翻弓裔政权，建立高丽王朝。

王建在发动政变时，就充分利用了谶纬迷信的作用。据金富轼《三国

史记》记载，贞明四年，来自唐朝的商人王昌瑾从一位“状貌魁伟，鬓发尽白、着古衣冠”的人那里以米换得一枚古镜，后发现镜上有字，曰：“上帝降子于辰马，先操鸡后搏鸭，于巳年中二龙见，一则藏身青木中，一则显形黑金东。”于是，这位商人将古镜献给弓裔。文人宋含弘等认为：“上帝降子于辰马者，谓辰韩马韩也；二龙见，藏身青木，一显形黑金者，青木松也，松岳郡人以龙为名者之孙，今波珍粲，侍中之谓欤？黑尽铁也，今所都铁圆之谓也。今主上初兴与此，终灭于此之验也；先操鸡后搏鸭者，波珍粲侍中先行鸡林，后收鸭绿之意也。”趁此机会，宋含弘等拥戴王建，推翻了泰封政权。据说弓裔从王昌瑾得到古镜时，曾让有司寻找镜主的下落，未果，“唯东州勃飒寺炽盛光如来相前有镇星古相如其状，左右亦持椀镜”。这样看来，古镜上的文字就更不同寻常，真正预示着改朝换代的“天机”了。

高丽时代，由于太祖王建对佛教实行的“教政”方针，佛教作为护国宗教受到朝廷的庇护，有了更大发展。在高丽统一前后，太祖建了很多佛寺和堂塔，并命令全国州县建筑裨补寺塔3,500个。他在晚年让第五王子出家。这样，教学各宗派由新罗末期的衰退逐渐有所转机，禅宗也有了朝气。

高丽还多次向中国求取大藏经。高丽关于《大藏经》的最早记述是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世家·太祖》：“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航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王亲迎之，置于帝释院”。这一年是高丽太祖天授十一年（后唐天成三年戊子，公元928年）。郑麟趾《高丽史》卷九十三《列传》六“韩彦恭”记载说：“彦恭奏请《大藏经》帝赐藏经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又赐御制秘藏诠逍遥莲花心轮。还，王授御史礼官侍郎判礼宾省事。”按照《高丽史》的记载，此事是在高丽成宗四年即宋雍熙二年乙酉，公元985年。

高丽还分别从我国的宋朝、辽朝和契丹得到过《大藏经》。宋朝《开宝藏》完成后，不断雕印译经。所译佛经和本朝僧俗的佛学著述，并归入《藏经》。宋神宗时，福州东禅寺僧人雕印《大藏经》（史称《东禅寺版》），以收录宋初以来所撰的佛籍。此后不久，高丽使臣就三次向宋廷购求《藏经》。《高丽史》卷八《世家·文宗》记载：“三月丙午，契丹送《大藏经》，王备法驾迎于西郊”。此事发生于高丽文宗十七年，即宋嘉祐八年癸卯，1063年。《高丽史》卷十二《世家·睿宗》“庚寅，辽遣高存寿来贺生辰，仍赐大藏经”。这一年是高丽睿宗二年，即宋大观元年丁亥，1107年；《高丽史》卷九《世家·文宗》：“己丑命太子迎宋朝《大藏经》置于开国寺，仍设道场。”这

一年是宋元丰六年癸亥，即高丽文宗三十七年(1083年)。

太祖王建大兴佛教，同时他也向天神、五岳名山、天川祭祀，还恢复了新罗时代的遗法“八关会”。高丽定宗将谷物7万石下赐大寺刹，以培养学僧。光宗时期，按照儒家科举法，设立僧科考试，把法阶分为7级，选第5级三重大师以上的高僧担当国王的老师，作为王师或国师。由于佛教受到国家的保护，僧侣得到国家的优厚待遇。王子等贵族子弟也纷纷出家。

随着佛教发展，也出现了很多弊端。城乡僧侣逐渐学会俗风。他们不求精进，不守佛戒，而贪图僧位和财利，有的甚至过着出入酒色之家的不检点生活。同时，教宗和禅宗互相诽谤，称对方为异端。这样，佛教一方面堕落，另一方面内部冲突极大，逐渐处境艰难。但随着高丽文宗之子义天的出现，佛教界有一次出现了朝气。义天入宋求法，巡礼名刹并修行，向名僧学习五宗法要，专攻华严宗和天台宗佛法奥义。回国后，他主张终止禅教两宗的法争，给两宗的融合以很大帮助。他又开创了半岛天台宗，并大力扩大其势力，给佛教界注入了很大活力。

与义天所弘扬的天台宗教义对峙的，有主张禅宗的圆应国师学一，之后的坦然、之印、德素等名僧也大力宣传禅宗。他们的出现曾扬起玄风，但禅宗势力还是无法中止其衰微。直到神宗、熙宗当政，半岛上出现了著名佛学家知讷。知讷力挽狂澜，挽回了半岛禅宗的颓势，为日后创立两宗合流的朝鲜唯一佛教宗派曹溪宗打好了基础。

义天和知讷的出现，使高丽佛教进入了辉煌时期，大藏经的雕刻，更为朝鲜半岛文化史和宗教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高丽大藏经》是在接受中国大藏经的基础上雕刻出来的，有初雕和再雕两种。初雕始于高丽显宗时期，直到文宗时，经过60年才完成雕刻，共计雕刻佛经一千一百零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不幸的是，这些藏在符仁寺的用以镇护国家的大藏经板，于高宗十九年(1232年)被入侵的蒙古兵连同黄龙寺的九层塔统统烧掉。面对国难，高宗为得到佛陀的庇护，在偏安于江华岛的同时，又花了16年的时间，再次完成了八万大藏经的雕刻。

尽管高丽王朝极力推崇佛教，儒学依然是其国学主科。就民众信仰而言，道教以及五行风水之说在民间也有很多的信众。

高丽时代虽然佛教大为兴盛，但谶纬风水说、阴阳五行说也甚为流行。谶纬风水与阴阳五行等迷信杂说，从新罗统一时代开始即流行于民间，到了高丽王朝，这些迷信杂说更加盛行，其影响直到宫廷。高丽历代国王和

贵族阶级与佛教徒一起惑信阴阳说、谶纬说、风水说等。平民在日常生活中也讲究日期、方位、方向的凶吉。高丽国民深深陷于佛教与杂祀信仰的泥坑,无法自拔。

在高丽时代,中国的道家思想对半岛也有不少的影响。肃宗七年,曾在禁中为玉皇大帝打醮。睿宗时期,高丽人李仲若赴宋学道,后回国。深信道教的宋徽宗向高丽派遣了两名道士,在开京修建了道观福源观。道教在半岛逐渐发展起来。到高丽末,开京①设有道教观祠5所,地方有太乙殿4所。但这些都直属于王室,是宫廷的祈福消灾观祠,民间并没有广泛地设立道观。

高丽王朝建立以后,儒家一直受佛教势力的打压。即使如此,儒学仍是官定的国学主科。公元958年,高丽光宗采纳后周文人双冀的建议,摹仿唐朝建立科举制度,把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成宗年间,建国子监,经营学舍书斋,内建文庙享祀孔子。然而直到此时,儒家仍处于不振状态。至文宗时期,侍中崔冲设九斋,教授儒学。儒学逐步兴起,但并未彻底摆脱佛家文化的强力打压。高丽后期的睿宗虽沉迷于佛教和道教信仰,对儒家也有所扶持。他亲自到文庙行酌献之礼,在国学设七斋,为培养儒生设置养贤库,使儒学有了一时生气。但这些仍没有改变半岛儒学萎靡不振的状态。

高丽末年,法门紊乱,僧侣堕落。新一代的儒学家在安裕引进程朱理学后有极大发展,并掀起了斥佛与排佛运动。儒家和佛教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到恭愍王时,妖僧辛旽失势,给以太学为中心的儒生排佛提供了把柄。之后,儒生出身的李穑、郑梦周、郑道传等竭力主张排佛。直到1393年,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佛儒两教的斗争,才以儒家的胜利,佛教被赶出朝廷而结束。

第一节　高丽佛教与汉学

高丽太祖王建在建国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佛教的力量,这一方面是出于个人信仰,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其参谋崔凝劝他修文德远

① 开京即现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城市。

佛屠阴阳，王建则认为乱世之人，祸福难定，要有佛陀保佑才行。待定乱居安，才可以移风俗，美教化。王建对佛教的态度决定了他对佛教的基本政策，这就是既扶持又限制，最终目的乃为其政治统治服务。这一点，在高丽取得半岛的完全统一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高丽前期佛教的发展

高丽的佛教直接继承的是新罗的佛家遗产。早在新罗时代，半岛就有元晓大师、义湘大师和道义大师等佛学大德。元晓大师（617—686年）俗姓薛，幼名誓幢，新罗湘州人。曾与义湘大师一起前往唐朝求法，返新罗后，注释《华严经》，写下《大乘起信论疏》，《金刚三昧经论》，是半岛净土宗的先驱。高丽时代追封元晓大师为“和静国师”；义湘大师（625—702年），半岛华严宗始祖。曾前往中国求法，在智俨大师的门下学习，回国后创建了华严寺、海印寺、梵鱼寺等“华严十刹”，一生致力于弘扬华严宗佛法。有《华严一胜法界图》，《十门看法观》等著作；道义国师乃新罗禅宗的代表人物，“九山禅门”之“迦智山”开山祖师。公元784年前往唐朝，821年回国，对时人重经教颇失望，到雪岳山修行40年，向弟子廉居传授禅学。高丽早期的佛教就是在继承上述佛家代表人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讲求经典的华严宗等宗派与讲求开悟的禅宗之间的争斗在新罗时代就开始了，在高丽王朝建立初期也没有停止。

在高丽佛教发展史上，道诜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佛学思想奠定了高丽王朝近五百年佛教发展的基本特色。自他以后，佛教更多地发挥着镇护国家、祈福禳灾的功能。道诜对后世影响最大且又让世人争议最多的是他成功地运用阴阳五行说和谶语为高丽王朝服务。可见，道诜规定了半岛佛家的基本特色：第一，出家而不忘国。半岛佛教往往要干涉国家层面的俗务。至今在韩国有很多党员的“护国党”就是可以参加总统大选的。第二，佛家教义要杂谶纬与阴阳五行之说，以争取更多的信众。

道诜的文化方略是成功的。企图依靠佛力使高丽万年平安的太祖王建在全国的修寺塔达三千五百个。据传说，它们是依据道诜的献策营建的。[①] 据说修建这些寺塔的理论依据是：半岛山水过分背逆，因而国内经常不得安宁，民心常乱。如果在全国3,500个要地建佛寺或佛塔，奉安神

① ［韩］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世家·太祖》。

像，便能使山川脉通气顺，高丽国泰民安。王建听信了此说，命令诸州建设伽蓝、厚待佛僧、举行盛大法会。

崇信佛教成为高丽王朝推行了五百年的文化大计，还因为王建去世前，作为遗教提出十条训要。训要说：

其一曰：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其二曰：诸寺院，皆道诜推占山水顺逆而开创，道诜云吾所占定外，妄加创造则损薄地德，祚业不永。……新罗之末，竞造佛屠，衰损地德，以底于亡，可不戒哉！……其六曰：朕所至愿在于燃灯、八关。燃灯所以事佛，八关所以事天、灵及五岳名山大川龙神也。后世奸臣，建白加减者，切宜禁目。①

在太祖王建的十条遗训中，"其一""其二""其六"三条都关乎佛教信仰。王建作为一代英主，看到了新罗时期半岛佛教带来的负面作用，所以他借道诜的威望来说服后世子孙们不要滥建佛寺，这种用心是良苦的。太祖王建在高丽王朝建立过程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道诜本人在高丽佛教中的地位，高丽佛教镇护国家的祈禳性和阴阳风水的迷信性对于大众的吸引力，这三方面共同推动了半岛佛教的迅速发展。

继太祖王建的历代国王均采取了护佛政策，教禅两宗均得以复兴。教宗的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密宗、法性宗等也挽回了新罗末年世道混乱时所面临的衰退局面。禅宗由于高丽初期英僧辈出也有了活力。光宗时期，制定了封高僧为王师、国师的法阶制度。因此，佛教迎来了比三国统一时期更加优越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国家实行僧科制度，即由国家选拔僧侣的考试制度。它是国家对僧侣队伍实施有效管理的措施之一，也是国家扶持佛教的具体体现。关于僧科制度的确立时间，金廷彦所撰《伽耶山普愿寺法印国师碑》记载说：

龙德元年，置海会，选缁徒之制。

因此我们得知，在正式的僧科制度实施之前，高丽曾经实行过"海会"

① ［韩］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世家·太祖》。

这种早期僧选制度的尝试。“龙德元年”为公元921年，此时太祖王建即位刚刚四年，离最后统一半岛还有十四年的时间。严格意义上的僧科制度，一般认为是光宗时代建立的。高丽文人崔冲所撰《圆空国师碑》记载说：

显德初，光宗大王立黄极崇法门，征雪岭之禅，俾伸角妙，选丹霞之佛，明示悬科。师雄入议国，首（阐）理窟，炫叠双之绝艺，彰累百之高名。

“显德”为中国后周世宗的年号，也是高丽光宗继位五年至十年。光宗是高丽时期的惑佛国王。他为先考追福和国家繁荣，修建许多愿堂，大办佛事，并为振兴佛教向宋派留学僧36名，并按照儒家的科举制度，在佛教中设立僧科制度，制定佛僧阶位制度。光宗光德九年（中国后周显德九年，公元958年），依据来自后周的文人双冀的建议，将录用官吏的科举制度用于僧侣的选拔。僧科考试给僧侣制定阶位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僧侣们的社会地位。

僧科有预考和正式考试之分。预考是在各山门或宗派内部进行的，合格者才能参加国家进行的正式大选。另外，僧科又分禅宗和教宗两个系统。禅宗的阶位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等。教宗的阶位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等，禅宗的“大禅师”和教宗的“僧统”，是佛门的最高荣誉职位。光宗光德九年，设立“王师”“国师”二师制度，具有三重大师以上僧阶的僧侣，有资格当选为王师或国师。王师是国王的老师，国师是德识高尚的国家表率，其地位高于王师。僧侣成为王师或国师时，国王也行师生之礼。二师制度实行后，第一个成为国师的是惠居，第一个成为王师的是坦文。僧侣在宫廷受到如此尊敬，致使社会上一时崇佛成风，富贵世家子弟争先恐后削发为僧，佛门人才大量集结。光宗后期，佛教界名僧大德辈出。

高丽时代的僧科制度大约一直延续到朝鲜时代中期，只是法阶名称上稍有区别。

佛教越发展，佛事也就越多，王家每逢喜庆、丧事，必设盛大斋会，经常举办般若经、仁王经、金刚经、华严经等讲会和诵经道场等。这些佛事活动从其特性和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祈福、禳灾、镇兵、治病、讲经、忏悔、受戒、饭僧、荐度、施食、祈雨、祈晴等十多类。

定宗曾于继位的第一年（946年）“备仪仗奉佛舍利步至十里所开国寺

安之,以谷七万石纳大寺院,各置佛名经宝及广学宝以勤学法者”。之后的光宗在位时间比较长,达二十六年。光宗在继位的第二年创立奉恩寺,又创佛日寺,并分别以这两座寺院作为太祖和先妣刘氏的愿堂。光宗在位期间,僧人谛观曾于960年持《天台教论疏》入宋,为中国天台宗的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光宗兴佛的原因,史料说他“中岁以后”“信谗多杀,内自怀疑,欲消罪恶,广设斋会”。景宗和成宗时,溺佛的弊病稍稍得到纠正。成宗锐意改革,“赡学以养士,覆试以求贤”,一时儒家的仁孝思想十分盛行。但之后的穆宗也广建庙宇。

宫廷佛事从显宗时期开始更加繁多。显宗即位当年就恢复了从太祖时开始到成宗时废除了的“燃灯会”和“八关会”,并不断地创建寺塔,经常举行各种讲经和佛会。显宗九年(宋天禧二年戊午,1018年),重修开国寺塔,奉安佛舍利时,饭僧达10万。

继显宗后的德宗喜佛事不亚于其先王。他即位前就曾“幸毬庭,饭僧三万”。即位的第一年便至外帝释院、王轮寺、奉恩寺、玄化寺等佛教寺院达十次,又于膺乾殿受菩萨戒,以僧法镜为国师。他之后的靖宗在即位二年于毬庭饭僧一万,并下令全国,“凡有四子者,许一子出家,于灵通、嵩法、普愿、桐华等寺戒坛试所业经律”;靖宗七年(宋庆历元年辛巳,1041年)设藏经道场,九年(宋庆历三年癸未,1043年)在会庆殿设百座道场,并饭僧各一万。靖宗诞辰,须在外帝释院设祈福道场7天,朝廷百官在兴国寺设祈福道场。此后的文宗在位时间很长,达三十七年,而高丽佛教的各种佛事活动至此也进入高潮时期。尽管文宗本人对当时佛教界的堕落现象也十分不满,但他所兴办的佛事,却是其先王所望尘莫及的。即位前,他就不断地到普济寺饭僧,幸法王寺设八关会等等。即位后每年都举行饭僧、设道场等相关佛事。文宗十九年(宋治平二年乙巳,1065年)让王子煦祝发为僧。二十四年(宋熙宁三年庚戌,1070年)让王子窥于玄化寺剃发为僧。之后每年多次去寺院举办法会。

高丽文宗之后又经历顺宗、宣宗、献宗、肃宗、睿宗、仁宗等君王,在高丽时代前半期的历史中,这些国王在兴办佛事方面大事铺张,比之前代君王皆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佛事耗费了国家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地方官府以办佛事为借口,向百姓实行苛敛诛求。文宗虽曾下令防止外吏以佛事为借口作弊和醉饱歌舞。但是,文宗本身佛事繁多,不亚于先王。仁宗根据妖僧妙清的建议

设无能胜等道场，高丽仁宗十二年，以妙清为“三重大统”。翌年（宋绍兴五年，1135年）妙清、赵匡等据西京（今平壤）造反，虽为金富轼所平息，但高丽王朝也为长期以来的溺佛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高丽君臣之所以兴佛、崇佛乃至溺佛，是因为人们把佛教作为现世利益的祈求方式。不论王室、贵族、将军，还是平民百姓，都卷入了繁杂的佛事。而经常办佛事和向佛求福本身，则使国民养成了只依靠佛祖过日子的习惯。宫廷面对四邻强国，时常感到即将面临灭顶之灾。危机感很自然地驱使他们寻求宗教上的庇护和慰藉。

二、高丽王朝佛教的黄金时代

在高丽王朝的500年统治中，从第十一代文宗开始，文宗、宣宗、肃宗三代约50—60年间，是佛教的黄金时代。这时的高丽处在鼎盛时期，佛教乘国运兴隆亦达到了顶点。

文宗虔诚地崇敬佛僧在前代国王中是没有的。他把从显宗时期开始延续60年的高丽大藏经的刻造予以完成，这是他的伟大业绩之一。他认为，僧职是卫护国祚的圣职，是不次于公卿大夫的职业，他分别将第四子王煦（义天）、第六子王窥、第十子王璟送进佛门。作为尊敬僧侣的榜样，他即位五年就曾亲自招待全国80岁以上高龄的僧人。

继承文宗的顺宗一即位，就在会庆殿设道场三天。之后宣宗即位，宣宗在位的十一年间里，供佛、崇佛和祈福除灾法会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他不仅喜欢斋会，而且王室的仪式也改为佛教式的仪式。他巡幸时有手捧仁王经的法僧在驾前开道，因为仁王经是解除七种灾难，使国家太平的护国经。王弟义天从宋朝带释典和经书一千卷回国时，他将其任命为兴王寺主持，并在兴王寺设教藏督监，从宋、辽、日购进佛书，刊行藏经共1,010部，4,700卷。

继承宣宗的献宗在位六个月就去世了，在他之后肃宗即位。肃宗也是不亚于文宗、宣宗的奉佛王。他在位10年间，办佛事用去的时间和耗费的精力，比办政事还多。他不仅设法会，而且在位期间来往于有名寺刹不计其数。他花了不少精力修建寺塔，造佛像、佛具，并让幼子澄俨入佛门。

高丽佛教大体上不过是继承新罗佛教而已。但是，第十一代国王文宗之子、大觉国师义天的出现，使高丽佛教颇具生气。他开创的天台宗主张教观兼修，因此教禅两宗长达3个世纪的相互拆台和争吵有了缓和。义天

以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渊博的佛学修养，自觉地担负起对高丽前期佛教进行认真总结的历史重任——他也是汉传佛教受容过程的终结和民族化宗教产生之前的承上启下的人物。

1. 大觉国师的生平

义天(1009—1101年)，俗名王煦，是高丽国王文宗的第四子，13岁时就受封为“佑世僧统”，是当时高丽国的一代名僧。宋元丰八年(1085年)，即高丽宣宗二年，义天来华求法，于同年五月在密州登陆，从天竺寺慈辩习天台教义，后游天台佛陇，礼智者大师塔。义天在中国求法的这段时间里，在杭州惠因寺净源法师门下学华严教理就有一年之余，因此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元祐元年(1086年)，义天携教典经书3,000余卷回高丽，并于高丽肃宗二年(1096年)创立高丽天台宗。编写、著作有《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圆宗文类》以及《释苑词林》等，依《总录》刊行教藏章疏4,740卷，后人称之为《义天续藏经》。后人编其遗文为《大觉国师文集》。金富轼所撰碑文载：

上(指文宗)一日谓诸子曰：孰能为僧，作福田利益乎？师起曰：臣有出世志，惟上所使。上曰：善。

这说明义天的出家一是出于自觉自愿，二是得到了王族的支持。在义天出生后的第五年(1059年)，文宗曾下令全国，一家有三子者许一子出家，因而义天的出家可以说是王室所作的楷范。宋治平二年(1065年)，义天在灵通寺景德王师烂圆处削发，习华严教观。《仙凤寺碑》称“受贤首教观”，《灵通寺碑》也说：

尝梦人传澄观法师书。自是，慧解日进。……自贤首教观，及顿渐大小乘经律论章疏，无不探索。又余力外学，见闻渊博，自仲尼老聃之书、子史集录、百家之说，亦尝玩其菁华，而寻其根柢。

照这些记载，义天的学问极渊博，其中受澄观的影响尤为显著。澄观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以华严学附会禅学和天台教旨，这对义天日后思想的形成以及沟通华严、天台两家学说的尝试无疑开启了先河。义天探讨所有大、小乘佛典，并对儒学进行了精深的研究。

宋治平四年(1067年)七月,文宗下教谕,称义天为"光智开宗弘真佑世僧统"。义天看到当时"所传诸家教乘,或有绝本不行者,或有愚鲁混淆者,或有缺于钞解者,兼以自五代至今日,向二百年,诸师著述未见流通,所以发愤忘遐",为更深入地研究佛法,向父王文宗上书,请求到大宋求法,并为此例举圆光、义湘等大德入唐求法的事例,但遭到了文宗拒绝。之后,宣宗虽然在义天"忘躯慕道"精神的感染下"意许之",无奈群臣仍以为不可,于是义天只得于宣宗三年四月留书于国王及太后,"潜与弟子二人随宋高林宁船而去。"宣宗派人追之不及,便遣礼宾省官员数人渡海随同义天入宋。义天七月到宋都汴京,受到宋帝哲宗的厚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历访宋都名刹和高僧,严修佛法。

实际上,义天在入华前即对中国佛教的现状了解甚详,如《灵通寺碑》所记:"师尝有志如宋问道,闻晋水净源法师,在慧行为学者师。托舶贾,致书以修礼。源公知师非常人,即复书相招。由是,欲往滋甚。"可见,入宋前他已同净源有书信来往。义天到杭州见到之前与他有书信来往的华严宗净源法师,两人一见如故。义天向他请教了诸法中存疑的问题。净源(1011—1088年),俗姓杨,字伯长,号潜叟,宋朝高僧。他自幼习儒,秉性聪慧。初随五台山承迁学《华严经》,继而从明覃学李通玄所著《华严论》。时长水子睿弘《首楞严》,促希、缙云演《圆觉》与《起信》,净源"遍参兼听","本末全尽",被"四方宿学推为义龙"。净源的思想受长水子睿弘的影响很大,即主张宗密一系沟通《圆觉》与《起信》的理论。他推崇《起信》,以为从杜顺以来即或明或暗地引据《起信》而立观门,于是他在华严宗的传承系统上推定马鸣为初祖,接下来有龙树、帝心(杜顺)、云华(智俨)、贤首法藏、清凉澄观、圭峰宗密,由此构成"华严宗七祖"之说。

净源在中国华严宗中的突出地位,一方面取决于他对华严思想的探微发隐,显彰祖说;另一方面则是他对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灭佛以来散失已久的华严章疏的搜集和整理。对于后者,此次出国来宋朝的义天恰恰出力甚多。他送回的《华严经》章疏,如智俨所撰的《搜玄记》《孔目章》《无性摄论疏》《起信论义记》、法藏所撰的《探玄记》《起信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疏》《三宝诸章门》以及澄观所撰的《贞元新译华严论疏》和宗密所撰的《华严纶贯》等佚而复传,对中国华严经的补足起了极大的作用。后来义天回国,又将《金书华严》的三个译本共一百八十卷寄赠净源所住的慧因教院,协助净源成为华严宗的"中兴之主"。杭州慧因寺也因

此有“高丽寺”之称。

义天在杭州期间主要随净源受学。《仙凤寺碑》载:“余杭山水,甲于天下,诸宗之老,遗世宴坐……见师割爱忘势,万里求法,则虽积道德,胶其口而不传者,犹且倒廪倾囷,罗列而进。故诸宗法义,多得于此。”这表明义天除华严外,还接受了其他各家的思想,特别是天竺寺慈辩从谏法师的天台教观。据载,义天“在本国,耸闻慈辩高谊之日久矣。既至杭,特请慈辩讲天台一宗经论,每与主客及诸弟子听受”。拜别慈辩时,辩以手炉、如意等物相赠。此外,义天还参访了灵芝寺的元照律师,讨论了净土教学和律学。他在宋期“历问六宗中铮铮者,则净源、怀琏、芳其、慧琳、从谏等五十余人”,足见其交游之广。

来中国一年后,高丽宣宗以国母思念为由,上表宋廷,请遣义天归国。哲宗应允高丽之请,诏义天抵京。数日后,义天下杭州,在慧因院听了净源的华严大义讲论。临别前,义天至天台山谒智者大师浮图,并亲作发愿文于塔前,誓传天台教观于海东。后从天台山到明州,从广利寺大觉禅师怀琏问了禅的奥义。

宋元祐元年(高丽宣宗三年,1086 年),义天返回海东,受到高丽君臣的隆重欢迎。此次义天入宋,共十四个月,行程万里。时间虽短但成绩显著。其一,他为中国华严宗的振兴带来了必要的历史文献。我国唐朝以前的佛经,因受唐末、五代兵灾洗劫,至宋初已佚亡甚多,但在高丽却依然保存着不少隋唐时期传入的佛籍。义天入宋后,不少佚经又得以重返中土。其二,他将中国华严宗的最新思想带往海东,这些思想是义天发展半岛华严宗的主要理论依据;其三,使天台宗在海东重新兴盛起来。义天的身份以及他的宋朝交流,使得半岛僧俗不仅对华严宗更加崇敬,也知道了天台宗的奥义;其四,为佛教各宗的整合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义天就扮演了中国与高丽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

义天还国后,“发愤亡遐”,致力于弘扬佛法,“始创天台宗,置于国清寺”,并整理雕印佛经及诸宗章疏,为华严宗大刹兴王寺的主持。义天还国时,带回了大量宋朝的佛籍,“献释典及经书一千卷”,其后,“又于兴王寺置教藏督监,购书于辽、宋,多至四千卷。”他孜孜不舍 20 年,终于仿照唐朝智升《开元释教录》的体例,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 卷,其中收书1,010 部,4,700 余卷,还收录了新旧诸宗章疏。教藏总录收录元晓、义湘、憬兴等 20 名本国僧人撰述 142 部 402 卷。义天晚年,以其所搜集的辽、宋佛典

为基础，汇编古今诸宗章疏和五代以来中国与高丽高僧、法师的著述写成《高丽续藏》。

义天在华严宗传承系统的确立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他的努力，洪圆寺修建了九祖堂，以马鸣、龙树、天亲、佛陀、光统、帝心、云华、贤首、清凉为九祖。义天的九祖说同净源的七祖说虽有不同，但仍坚持马鸣为初祖。从其时代需要出发，义天的思想带有明显的圆融色彩。比如谈及性、相两宗的关系时，他坚持认为，“清凉有言，性之与相，若天之日月，易之乾坤”。义天的这席话是有针对性的。在贤首的五教中，唯识瑜伽被判为大乘始教，即非究竟玄妙之说，由此而引起了后世的纷争。至于大小乘之间、权实之间的争论，义天也本着圆融的精神试图予以统一。他在《与内侍文冠书》中说：

予固不敏，而知学之难，所以顷岁，重道轻生，问津中国者，志在于何？在乎效圣人之用心也。圣人用心，则广大悉备，有人乘焉，有天乘焉，有声闻乘焉，有缘觉乘焉，有菩萨乘焉。此之五乘，是学佛者之所宜尽心之大概也。十善五戒，人乘也；四禅八定，天乘也；四圣谛法，声闻乘也；十二因缘，缘觉乘也；六度万行，菩萨乘也。以言乎人乘，与周孔之道同归；以言乎天乘，共老庄之学一致。先民所谓修儒道之教，可以不失人天之报，古今显达，皆以为知言也。

可见义天的志向不仅是要统一五乘，甚至连世间盛行的儒家和道家学说也被拉进他的体系中来。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始，便力求同儒、道相融合，三国时期就把“尽孝”加进佛教的戒律，又将“慰孝悌，养孤独”当作纲领之一确定下来，这便是一种积极尝试。

由于义天所处地位的特殊性，义天对政治的影响也非同寻常。《灵通寺碑》说他“既为一国尊亲，有大政事，必款密谘决。故所与上论列国家事甚多，而有阴德于人民亦厚，世莫得而尽知。”在义天的建议下，高丽重新使用银瓶钱和“海东通宝”。由于高丽和朝鲜王朝大多数时间都使用中国的货币，它们是半岛通行的货币之一，是几种极其珍贵的半岛专用的金属货币。

自回国至去世的十六年时间里，义天除主持兴王寺外，还先后历住浮石寺、洪圆寺、天寿寺等地。宣宗薨后，他一度退居海印寺，“浩然有终焉之

志”。肃宗时，义天“复居兴王寺，教学如初”。之后又“主持国清寺，初讲天台教义”。高丽肃宗六年（1101 年）冬，义天去世，寿四十七岁，谥“大觉国师”。

2. 义天与天台宗

公元 6 世纪后半叶，中国由长时间的分裂走向统一。已经传播了约五百年之久的中国佛教也在酝酿着统一。由此形成的隋唐诸宗派虽然在表面上看来呈现出宗派林立的状况，但各宗派内部无不是想以自己的理论统一庞杂的各种学说。谋求融合统一是隋唐佛教各宗派的主观愿望。这种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当时流行的大乘经典《法华经》和据此成立的天台宗教学上。《法华经》不仅在理论上以“会三归一”思想为依据，证明三乘同属一佛乘，而且在实践上通过给三乘人一并授记以示其所言不虚。这些做法无非是想调和佛教内部各派之间的对立，天台法华所具有的这种融合精神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而且还被日本、朝鲜佛教所继承和发扬。

中国天台宗尊北齐的慧文禅师为初祖。他代表的是注重实践的北方学风，以躬行禅观为主，后因读龙树的《中观》和《大智度论》而悟出“一心三观”的禅法。之后的慧思坚持定慧双开，在一心三观的心要上悟出法华三昧。

中国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觊（538—598 年）年十八出家，登大贤山持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在有所体悟后便至大苏山投慧思门下研修法华三昧。南朝陈末他完成一部重要的著作《法华文句》。隋代陈后，他回到故乡荆州创建玉泉寺，在此讲授《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玄义》《止观》《文句》被合称为“天台三大部”，代表了智觊学术思想的最高成就。

天台宗成立伊始，就有不少海东僧人来中国学习传承这一宗派的教旨，新罗高僧玄光法师来慧思处，研修法华三昧，成为慧思二十八高足之一。玄光学得天台奥义回国，在雄州翁山寺院传法华。此后，经憬兴、太贤、元晓、顺憬、义寂、遁伦之手著述疏记，法华奥义有了说明。玄光传到半岛的法华宗堪比中国天台宗，但未形成独立的一派。后新罗统一三国之后，圣德王时期，法融、理应、纯英三法师入唐，师承天台宗嫡派荆溪大师。归国后传播天台宗义。

到了中国宋朝，高丽僧人谛观在海东天台宗传播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谛观入宋的原委，《吴越王传》中记载说：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初天台教卷，经五代之乱，残毁不全。吴越王俶，遣使至日本、高丽以求之。至是，高丽遣沙门谛观，持论疏诸文，至螺溪谒寂法师，一宗教文复还国中。

宋太祖建隆元年是公元960年（高丽光宗光德九年）。谛观来华，使天台宗“一宗教文复还国中”，对于中国天台宗文献的补足做出了贡献。其所著《天台四教仪》对天台宗的判教立义和南北古师的异议作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和剖析，因而被视为高丽天台宗的“关钥”和“初学发蒙之著”。就其在中国的作为来看，谛观在高丽时业已是一位造诣高深、颇有地位的天台宗僧人了。

与谛观同时代的另一位闻名中国的高丽僧人叫义通。义通到中国后，在天台云居德韶国师门下学习，在去世的前二十年一直在中国传教。作为高丽僧人，谛观和义通两人一个为中国天台宗典籍的失而复得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一个为宋代天台宗的振兴培养了一大批不可多得的人才。按照天台宗谱，义通被尊为第十七代祖。

以上是义天入宋前中国天台宗的大致情况。

当年，义天入宋，除了学习华严教旨外，又从慈辩法师学习天台教观，并在智者塔前发誓将该宗传往海东。而在这之前，天台宗在朝鲜半岛宗教中还未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宗派，所谓“五教九山”中还没有天台宗的一席之地，这说明天台宗在高丽佛教界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到了义天时代情况就有所不同，这也与他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首先，他的入宋求法并不是盲目地到中国学习佛教，他是在感悟到“天台三观，最上真乘，此土宗门未立，甚可惜也”之后才“浩然决乘桴之计”。其次，他的传教活动自始至终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由于出身地位的特殊，王室对义天的礼遇是史无前例的。朝廷为他耗费巨资修建国清寺作为传播天台宗的根本道场。再者，长期以来，禅宗和其他宗派之间的矛盾重重，相互攻击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教宗一方诋毁禅宗是旁门左道，而禅宗指责对方不懂佛法的真谛。义天弘扬天台宗的教学，正是要借助会三归一的精神结束这种宗派纷争的局面。这也说明不仅佛教内部有要求统一的必要，国家、民族也把统一的希望寄托给天台法华教旨。这一点，高丽人闵渍曾说过：

闻大唐国有会三归一《妙法莲花经》，及天台智者一心三观禅法，与圣君合三韩成一国风土结合。若求是法流行，则后嗣龙孙，寿命延长，王业不绝，常为一家矣。

把《法华经》的“会三归一”和天台宗的“一心三观”附会于“合三韩成一国”是高丽人利用佛教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绝妙范例。

高丽肃宗二年（宋绍圣四年丁丑，1097年）国清寺落成，义天在此任第一任主持并开始讲授天台教观。经过义天的努力，已传播七百余载的半岛的佛教由原来“五教九山”正式转变成“五教两宗”。新的五教指华严（圆融）宗、慈因（法相）宗、中道（法性）宗、始兴宗、南山（戒律）宗；两宗则指曹溪宗（禅宗）、天台宗。

义天的佛教思想里最突出之处是沟通了华严与天台两家的学说。如果说义天前期是在融会各宗的基础上刻意弄清“贤首、天台”的“判教异同，及两宗幽妙之义”，那么，由宋归国之后则把重点放在统一天台与禅宗，尤其是“援禅入台”的实践上。

义天的佛学思想里原本某些地方就与禅学的宗旨相通。但是，义天也对当时禅宗的现状似有不满。义天并没有完全否定禅宗，但却指出了禅宗的局限性。在义天时代，华严宗的力量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势力强大的当为禅宗，所以天台宗的成立与发展，其竞争对手首先是禅宗。义天不仅在思想上给当时的禅宗以深刻的批判，同时在实际行动中也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使禅宗逐渐向天台宗转变。

禅门九山中，有才华的僧侣竞相学习天台宗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在天台宗的建设过程中，义天十分注重该宗有关典籍的收集。在所编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中，有关天台宗的章疏，仅《法华经》方面的就有六十种之多。另外《金光明经》方面的有二十五种，《观无量寿经》方面的有十五种。把对立、相互排挤的佛教不同门派统一起来，是义天的最大贡献之一。

义天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继承人。他门下弟子数逾千人，对宗派建设起过很大作用的有德麟、翼宗、景兰、教雄等。其中以教雄最为出色。在宋大观三年己丑（公元1109年），由义天主盟的高丽王朝第一次天台宗大选中，教雄应试并取得“上上品”资格。

三、知讷与曹溪宗

新罗僧人信行传入北禅、道义传入南禅，新罗和高丽时代的朝鲜半岛都有禅宗。义天从宋回国在兴王寺开天台宗，有些禅宗高僧被吸引到了天台宗，禅宗有所受挫。但是在民间，禅宗依然流行。不少高僧也孜孜不倦地宣扬禅宗。圆应国师学一通晓禅旨和大般若。据说，他得到三昧之力，因而善于治病。他慨叹禅宗未能在半岛大振，因而一生为弘扬禅宗而努力。义天在弘圆寺设圆觉会，特招请他，固辞不就，只埋头于禅宗。高丽睿宗九年（宋政和四年甲午，1114 年），他成为大禅师，仁宗元年（宋宣和五年癸卯，1125 年）成为王师。

高丽神宗时期普照国师知讷出现，开创了半岛独立的禅宗。义天作为官僧，受到君、后的宠爱，尽情发挥自身的才智，在教宗掀起一大旋风。知讷作为民僧，完全以个人的才学和德行扬名，给禅宗带来一大革新。

知讷大师（1158—1210），高丽中期名僧，半岛禅宗中兴祖师。知讷俗姓郑，号牧牛子。八岁投曹溪云孙宗晖禅师出家，其早年“学无常师，唯道是从”。1182 年考上僧科，在清凉寺、普门寺等地顿悟“禅教不二”的道理。1190 年，他宣布《劝修定慧结社文》，主张定慧双修，后于松广寺展开 120 天的法席，在那里开示法义。53 岁时于法床示现入寂。其著作还有《华严论节要》等。知讷将半岛原有的九山禅门归到曹溪宗下，使之与义天大师的天台宗一起形成了高丽佛教的两大中心支柱。

关于知讷阅读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而有悟的情况。金君绥所撰《佛日普照国师碑铭》中记述说：

> 偶一日，于学寮开《六祖坛经》，至曰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见闻觉知，不染万象，而真性常自在，乃惊喜，得未曾有。起绕佛殿，颂而思之，意自得也。

这是知讷求道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也是他日后创立的教团归宗曹溪的原因所在。我们知道，《六祖坛经》的中心思想，用它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用”。这里的“无念”，《大乘起信论》等将之作为心本体和修道最高境界的同义语。六祖慧能就是以其“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子广为人知的。《六祖坛经》道：“无者，无何事？念

者,念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又说:"无念者,于念而不念","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己念上离境,不于法上生念"。知讷觉悟到的,正是这种作为"见闻觉知"之主体的"真如本体",它是不被万缘、万境所染而常自在的本质。此后,知讷越发厌名利,对于半岛佛教界的冲突尤其厌恶,每欲栖遁林壑。

宋淳熙十二年乙巳(高丽明宗十五年,1185年),知讷游下柯山,寓于普门寺。因读大藏,得李长者《华严论》,重发信心,前解转明。李长者《新华严经论》和《大慧语录》的观点被其大量采用。

这是其求道和思想上的第二个飞跃,即在理论上更加倾向华严学。这里的李长者即唐代华严学者李通玄。他学无常师,精通儒释二典。李氏参究新译《华严经》,著有《新华严经论》四十卷、《华严经会释论》十四卷等著作。知讷在李通玄的话语中,发现了"根本不动智"与"圆顿信解"之原则。

高丽明宗二十年(宋绍熙元年庚戌,1190年),知讷移居居祖寺。在这里,知讷和其他禅侣们一起结社行道,共同创立了在高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定慧社"。宋庆元三年丁巳(1197年),知讷又与禅侣们一起入智异山,隐居于上无住庵。屏黜外缘,专精内观。

这是第三次飞跃。在此,知讷体会到空寂灵知的本体同一切境界和作用不即不离、活泼自在的大解脱境地。他要求达到"不分内外,亦不辨东西南北,将四方八西,只作一个大解脱门,圆陀陀地,体用不分,无分毫渗漏"至高圆融的精神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其妄自灭,真心即现",就可获得超越生死烦恼之永久解脱。

宋庆元六年庚申(1200年),知讷率徒移居松广山吉祥寺。在此期间,他们或谈道,或修禅,王公士庶,投名入社,亦数百人。诵持的《金刚经》以及《六祖坛经》《华严经》《大慧语录》也是知讷本人禅学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其所立三种修行法门更显示出他的禅学体系的实践性。

高丽熙宗即位(1205年)后,赐名松广山为曹溪山,吉祥寺为修禅社。下赐满绣袈裟。熙宗六年,知讷在吉祥寺坐化,国王赐谥号"佛日普照国师"。知讷著有《法语》《看话诀疑论》《圆顿成佛论》《真心直说》《修心诀》《劝修定慧结社文》等。知讷去世后,他的法脉由真觉、清真、真明、晦堂、慈清、慈圆、慧觉、净慧、弘真、高峰等人传承到16世纪。我国当代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中国佛教史》"知讷和曹溪宗—朝鲜民族化佛教宗派"对知

讷试图消除半岛佛教界的宗派纷争给与了高度评介。

从历史地位和作用来看，知讷和义天同为高丽时期最著名、最典型的两位高僧。义天以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和渊博的佛学修养，自觉地担负起对高丽前期佛教进行认真总结的历史重任。知讷则领导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佛教运动。使得半岛佛教从追逐名利、热衷于门派纷争逐渐还原为“平民佛教”、“修道佛教”、“山林佛教”。知讷以后，教禅两宗之间的隔阂渐渐消失，尖锐的法争因而结束。

四、高丽后期的佛教与佛教的堕落

知讷去世后，高丽王朝又经历了康宗、高宗、元宗、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忠穆王、恭愍王等在位时间长短不等的十二位国王，历时181年。这段时间，高丽王朝进一步走向衰落，而佛教也日益现出颓败的势头，由国家支持的各种佛事的频繁程度和奢靡程度较之以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高宗（1214—1259年）长达46年的统治期间，高丽正处在内忧外患中。高宗三年，契丹兵入香山，烧普贤寺。四年春，僧徒谋诛崔忠献不克，忠献遂大杀僧徒。崔氏在政治斗争中利用禅宗，但其子孙辈常常利用僧人的身份为非作歹。

忠烈王时期，僧人们食肉、饮酒、近女色。忠烈王七年巡幸庆州，了解僧侣情况，结果发现有一半僧侣与妻同居，过世俗的家庭生活。他们为晋升高位法阶，以佩物、绫罗等物品行贿和受贿，所以，世人把行贿所得的法阶，讥笑为绫首座、罗禅师。可见，高丽末期半岛佛教已经糜烂不堪，而僧侣的恶行却得到了高丽宫廷的庇护。郑麟趾《高丽史》卷三十八《世家·恭愍王》载：“六月乙丑，召台官谕曰：‘僧禅近所犯不须穷治。’禅近，内愿堂僧也。素有宠于王，至是通士人妻，为宪府所鞫。故王命释之。时僧徒恣淫。慈恩宗僧英旭，通宦官金不花妻，台官钩致欲罪之，旭曰：‘若欲罪我，须罢宗门，今宗门僧谁，非我乎？’”

佛教的堕落不止于僧徒的戒行。佛教作为现实利益的祈祷宗教发展，但许多佛僧忘记佛教自体的本质，接受了异端邪说即阴阳五行说和地理风水说，陷于旁门左道。

高丽太祖按照道诜的推占，在全国各地修建寺塔。太祖之后的高丽王室和贵族惑信佛僧所说的阴阳地理说，王室的出京、巡驻、祈祝、相地、造宫

等，都为佛僧的占卜所左右。

高丽中叶，阴阳风水说在佛僧中更加流行，出现了《道诜记》《道诜踏山歌》《三角山明堂记》《九变图局》等谶纬风水书和神志秘词等秘记。毅宗相信内侍荣仪有关国家大业要昌盛、国王要长寿就要祈祷的上奏，要中央和地方寺院大办祝圣法会。而法会时间过长，使京外府库枯竭，引起人民的怨恨。元宗对臣下佛教信徒有关在江华三朗城建假阙，设五星道场，蒙古就会来降的说法信以为真，便设大佛顶五星道场120天。

这样，佛僧背弃佛教本来的信仰，把世事与阴阳谶纬说和异端杂说相结合，使佛教丧失了纯洁性。佛僧逐渐参与政治，这也成为高丽亡国的开端。

高丽光宗时期开始实行王师、国师二师制度以来，僧侣公然参与政治。王师、国师负责用法力维护国祚，他们的地位高于公卿大夫，能向国王就任何事务进言。仁宗时期出现的名叫妙清的妖僧，就受到王室和权臣的信赖。他主张西京（今平壤）迁都论，使仁宗在西京建大花宫。此外，妙清鼓吹征伐金国论，称帝建元论等，引起儒臣的反对。妙清发动叛乱。

僧徒参政在恭愍王时期以辛旽的参政达到顶点。他也是最后一个参政的僧侣。辛旽，僧名遍照，原为灵山县玉川寺寺奴。他的容貌与国王梦见救他的人长相一样，这成为因缘，使他经常被密召入宫，为国王所宠信。遍照不学无术，道德败坏，但他的长相和阴阳术数，受到国王的宠爱，改名为“旽”，时人称其为“神僧”。辛旽一方面阿谀奉承国王，另一方面又喜欢淫乐和贿赂，谗害忠良，最终引起以儒臣为中心的上层的不满，发起弹劾他的运动。郑麟趾《高丽史》卷四十二《世家·恭愍王》记载说：“秋七月癸巳，全罗道体覆使崔龙苏还京，先见辛旽，后谒王。命有司杖之。”恭愍王二十年，作恶多端的辛旽被处以极刑。

佛僧的参政，也使寺院聚集了大量的财产。寺院不满足于朝廷所授的赐田和信徒为供佛所交纳的钱财。他们以设佛事为借口，公然勒索财物。有的僧人参与经商，占有大量庄田。不仅如此，他们还与富豪争夺奴婢，从而拥有无数奴婢。这样就出现了两大弊端：首先是寺院土地遍布，而绝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土地；其次，寺院垄断了高丽巨大的人力市场。国家无法适时地调用这些男女劳动力。

各宗派之间为掌握巨大财产往往发生寺刹争夺战。财产多的寺院不知不觉就被势力强大的宗派夺走。结果，财源丰富的宗派僧侣的道德愈加

堕落。

因为寺院财源广进，僧侣受国家特优待遇，可以免除劳役，许多追求安逸和温饱的人聚集寺院。既有王子贵族、出身微贱但怀着继承佛陀意愿而进佛门的，也有怀有不同目的的人争相入寺。寺刹不再是人们进行纯净修道戒行的场所，而变成在佛陀大树荫底下谋取自己利益的杂群的隐身地。

高丽末年，儒学力量再次彰显，教宗的萧条无法掩饰。在同佛教对立的儒学者中，虽有李齐贤等许多人参禅，但大多数人都开始摈弃教宗。由儒生掀起的排佛暗流在高丽末期逐渐掀起。

五、高丽末年的排佛运动

高丽末期，社会上逐渐掀起一阵阵排佛的风波。这既有佛教本身走向衰落、糜烂的内在因素，同时也是因为儒学势力的抬头所致。高丽初期，儒学思想同佛教和仙教（包括中国传来的道教）混杂在一起。一般来说，佛教虽然在新罗和高丽两朝精神世界里享有独尊的优势，但就现实政治方面来看，儒学仍起着主导作用。

高丽自光宗时期模仿唐制，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在民间渐渐出现儒生。成宗时期，录用崔承老等儒生为宰相，建国子监，广泛经营学舍和肃斋，因而掀起儒风。到文宗时期，以“海东孔子”著称的崔冲立志学儒，并立私学教育后进儒生。睿宗时期，增建国子监，设养贤库，培养儒生，选有名儒生录用为学官。仁宗时期，令学者讲论经义，国王亲临国学听讲。但是在他之后，从毅宗开始的100年间，武人当权，高宗时期的儒家势力因而无影无踪。武臣政治结束后，国内外军事冲突不断，高丽未能把力量放在儒学上。

后来，忠烈王有某种振兴儒家的意愿，任命崔雍等人为经史教授，让太子到国学听讲儒学，重修大成典，国王亲临大成典行拜礼，于是儒家又有所抬头。安裕从中国引进了朱熹理学，这就成为高丽斥佛的第一步。

安裕门下有白颐正，他到元并将程朱学传入高丽。李齐贤师事于白熙正，李穑师事于李齐贤，权近师事于李穑。恭愍王十六年，当时巨儒李穑成为成均馆大司成，其下有金容九、郑梦周、朴宜中、李崇仁等出类拔萃的教官。他们开讲宋学，儒学兴起，儒生活动活跃，佛教成为站在反对立场的儒学者的众矢之的。

高丽末叶儒学盛行。佛教在理念上本来就处于受儒生反对的地位，加上僧风颓废到极点，滥设佛事浪费国帑，寺刹成为罪犯和游食之辈的寄食

处，佛教弊端日益显著。高丽末叶出现斥佛论的原因，首先是与佛教思想背道而驰的儒家的勃兴；其次是佛教自身的堕落腐败；第三是儒生400年间政治上屈服于佛教的宿怨，导致对高丽末期僧职垄断政事的报复。

高丽末叶斥佛论兴起，或在太学讲斥佛，或向国王上书佛弊，故从恭愍王时期开始，斥佛论思潮无法阻挡。据《东国通鉴》载，辛昌王时期，典法判书赵仁沃向国王上疏说："佛氏之教以清净寡欲、离世绝俗为宗，固非所以治理天下国家之道也。近世以来，诸寺僧不顾其师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傭，以供佛僧，而以富其身。出入寡妇人家，污染风俗，贿赂权势之门，希求巨利，其于清净绝俗之教何愿。自今选有道行、无利欲者住诸寺院。其土田之租，奴婢之傭，令所官收之，载诸公案，计僧徒之数而给之，禁主持窃用。凡留宿人家之僧，以犯奸论。贵贱妇女，随父母丧亡，毋得诣寺，违者以失节论，其为尼者，以失行论，敢祝妇人发者，加以重罪。乡吏、驿吏及公私奴婢勿许为僧尼僧徒。恒留宿人家者俾充军籍，其主家亦论罪。"由此可以充分了解当时的佛弊和儒生的感情。

恭让王即位，王权更加虚弱。他坐虚位而惑信荒谬的佛僧的话，开工修建演福寺，并要认命僧粲英为王师。对此，站在斥佛论前列的成均馆大司成郑梦周，在对国王的讲筵上痛斥佛教是灭绝人伦的魔教。成均馆学官郑道传也上书佛说荒唐，劝禁办佛事，节约经费。恭让王时期，斥佛论达到高潮。恭让王三年，国王下令，禁止妇女来往寺院。成均馆学生趁此机会相继上书斥佛。其中，成均馆博士金子粹的上疏更为激进。他要求下令，对为了成为僧尼而削发者处以极刑。成均馆生员朴础上疏，说佛教主张邪说，上欺君，下愚民。儒国王兴儒将成为天下万世的君子，如国王兴佛必成为天下万世的小人。他们两人的上书使国王大怒，差点被处以死刑。

到高丽末叶，斥佛论得势，甚至视僧尼如禽兽。儒臣不可遏止地废除佛式丧葬祭礼，采用朱子家礼的儒家仪式，建家庙的人增多。以成均馆为中心掀起的斥佛论，人们议论纷纷，上疏不断。但是，分析儒生的主张，斥佛论有两种。其一认为：佛教本身是无上圣道。只讲寺院的弊害和佛僧的堕落，要求改正佛弊，使之回到佛教本然的状态。另一种论点认为：佛弊产生于佛教的本质，因为佛教本身是灭人伦、害国家的宗教，应禁止信仰。主张前者的有：以高丽硕学牧隐李穑为首的权近、李齐贤、崔莹、李穀等。主张后者的有，被奉为"东方理学之祖"的郑梦周为首的郑道传和以成均馆为中心的青年儒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扑灭论取得胜利。到李朝时

期，终于实行了变僧尼为贱民，废毁寺院的宗教政策。

高丽末主张斥佛论的儒生很多，但在理论和激烈程度上都不及郑道传。郑道传作为丽末鲜初的儒臣，帮助李成桂推翻高丽王室，在朝鲜初期制订施政原则——《经国元典》和确立教政方针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郑道传，号三峰。自幼聪明好学，在李穑门下学习。他不仅在儒学和文学方面有名，而且精通乐理、医术和兵法，得到恭愍王欣赏，成为太学博士。但由于与郑梦周、李崇仁等主张亲明论，被流放。他在流放时期召集邑民子弟，讲儒书，教育后进；另一方面埋头于反佛教宣传，著有《佛氏乞食篇》等数篇长文。后帮助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

郑道传与李齐贤、李穑、李穀温和的斥佛论不同，他要求彻底抹杀佛教，以儒家统一文教。他斥佛的理论性文章《佛氏杂辨》和《心气理篇》无人能超越。《心气理篇》载于他的著作《三峰集》。此文共三章。第一章“心难气”，阐述释氏修心之意和老氏之非。第二章“气难心”，阐明老氏养气法和释氏之非。第三章“理谕心气”，论述儒家义理和老释两氏之非。文章最后是“心问天答”。这里载有就世间人心常有颠倒善恶吉凶现象对天发问和天所作的回答。在这四章中“理谕心气”是最主要的。

《心气理篇》是斥佛概论，而《佛氏杂辨》则是从朱子学的立场来加以论述。此文前后有十九篇。在《佛氏杂辨》中，他对佛教教理全面地进行了尖锐的攻击。他从朱子学的立场批驳了佛教的轮回说、因果说、心性说、唯识说、慈悲说、地域说等。他痛斥佛教灭绝世间伦理，破坏社会组织；佛徒脱离人世，不思劳动，寄生他人；佛教不分正邪，只要皈依即能免灾得福，是荒谬之说；而禅宗尤其胡言乱语，是迷惑人心的魔宗。

郑道传的斥佛论最有分量，但他的理论依据基本上还是宋学和阴阳五行说。在儒生阵阵讨佛声中，最终迷于佛事的恭让王终于不得不禅位于李成桂。高丽王朝自始至终伴随着浓厚的佛教信仰，真可谓成也佛教，败也佛教。

在高丽王朝，佛教其实是很发达的一种汉文化。半岛所兴是汉传佛教，而无南传和藏传佛教，就是明证。决定历史发展的在人而不在宗教，高丽王朝的统治者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在元朝即将灭亡的时候看到主流文化的走向，是他们最终走出半岛历史大舞台的根本原因。佛教与儒家的主流文化地位之争，伴随着半岛王朝的更迭。艰深的佛学与玄奥的性理学之间的对决，从半岛汉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是汉学不同门派之争。说到底，佛学是汉学，性理学也是汉学。

第二节 高丽神教与中国道教的融合

中国道教作为一个完整的宗教传入朝鲜半岛，始于7世纪前半期。643年，掌握大权的渊盖苏文向国王上奏说："三教譬如鼎足，厥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要求推行儒佛道"三教并兴"的政策①。他认为道教传播的不够，应极力提倡，并一次为抵制儒佛既成势力的手段。进入高丽时代，中国道教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高丽王建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也深信神教，频繁地祭祀天神、五岳、大川，历代国王（除成宗、穆宗外）都沿用旧制，每年举行"八关会"。睿宗破例在王府北侧政和门前建福源观，供奉三清神像，设道士，兴斋醮，念"醮礼青词"。高丽道观，除此以外还有神格殿、太清观、太一殿、净事色等多处。

朝鲜半岛的著名古籍，如《高丽图经》（1123年）、《三国史记》（1145年）、《三国遗事》（1280年）、《高丽史》（1451年）、《玉枢经》（1570年）、《东医宝监》（1613年）、《海东传道录》（1632年）、《周易参同契注解》（1639年）、《揆园史话》（1675年）、《新注道德经》（1681年）、《南华经注解删补》（1682年）、《庄子辩解》（1716年）、《文献备考》（1770年）、《林园十六志》（1845年）等，或多或少都记载有道教的内容，这些用汉文写成的著作也为后人研究朝鲜半岛的道教传播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其中《高丽图经》是出使半岛的中国使节徐兢所作，早就被看做是高丽时代的名作，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和一然的《三国遗事》都是半岛的史书，内中对于朝鲜半岛道教演变的介绍很有价值。朝鲜王朝的著名文人李景圭（1788—?）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一书共60卷，内有《道教仙书道经弁证说》《东国道教本末弁证说》《返还弁政记》《元晓义湘弁证说》《三韩始末弁证说》《白头山弁证说》《二斗下降弁证说》《宫室制度弁证说》《灵宝真灵位业图弁证说》篇，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朝鲜王朝末期的著名文人李能和（1867—1945）的汉文手写本《朝鲜道教史》是半岛第一部道教流传史书，颇受学者青睐。

① ［韩］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一、高丽时期的神教和道教

高丽太祖王建在信奉佛教的同时也信奉神教。太祖元年十二月，当时新罗景明王在位，后百济势力也很强大。王建为祈祷完成统一大业，大办“八关会”。八关会本系高句丽的神教法俗，经惠亮法师传入新罗。惠亮劝新罗举行八关会，是檀君仙人以来传承的，即孟冬时在球场垒台，群臣和百姓聚在一起祭祀天神、五岳、名山、龙神，分享酒和茶果；一起欣赏音乐歌舞。太祖王建开办的八关会与新罗八关会一样，在球庭醮祭土俗神天神、五岳、大川等以后，大家品尝国王宴请的酒和饼果，以音乐、歌舞、百戏进行欢乐，使诸神高兴，祈祷国家和王室安泰。

太祖王建在他末年给后嗣亲授的训要十条中说：“朕所至愿在于燃灯、八关。燃灯所以事佛，八关所以事天、灵及五岳名山大川龙神也。后世奸臣，建白加减者，切宜禁目。”深信神教的太祖从即位起，就把八关会作为高丽整个时代的国家祭典之一。

高丽在复兴的“八关会”仪式中多少增加了佛教的色彩。到第六代成宗时，君臣崇信儒家和佛教，疏远仙教，于是以八关会仪式和杂技繁杂为理由停止举办，从此约有30年没有举行八关醮祭。到第八代显宗时，依崔沆的奏请，八关会复活，并成为整个高丽时代的国家重要定例行事。八关会按照常例于仲冬举行，斋会前日叫小会日，斋会日叫大会日。这两天灯火辉煌，地方长官上书国王，祝贺八关会。八关会也成为各国商人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

高丽时，佛教极度兴盛，伽蓝堂塔占了几乎全部灵场、名山胜地，各种神教祭祀被佛教抹杀。但据《高丽图经》记载，高丽人喜欢供奉鬼神，神教信仰在民间与佛教一起也很兴盛。另一方面，王室受宋朝流行的道教信仰的影响，从文宗时期起依中国道教的祭祀，开始祭祀老人星、本命星、昊天五方帝、北斗星、太一火星、金星、元始天尊、三界神等。从肃宗时期开始，仿效宋朝宫中举行的行事，将玉皇大帝奉安禁中，与太祖王建的神主一起供奉。睿宗二年，把道教最高神元始天尊像奉安于玉烛亭，每月祭祀。

高丽中叶仁宗时期，依经臣郑知常奏请，在宫中建立画有八仙的八圣堂。据说，在松岳郡住过八仙，于是就在松岳山建立八仙堂，奉安八仙。据郑知常的《八圣文撰》记载，八仙为：第一是护国白头岳太白仙人、第二是龙围岳六通尊者、第三是月城天仙、第四是驹丽平壤仙人、第五是驹丽木觅

仙人、第六是松岳震主居士、第七是甑城岳仙人、第八是头岳天女。人们无法知道八仙的来历，但从八仙大体上均取灵山峻峰的名字来看，他们是住在各个灵山的仙人。而且，八仙与八关是有关系的。仁宗九年，依妙清奏请，在平壤筑西京林原宫城，宫城内建有与松岳一样的八圣堂，在其中奉安八仙，举行赞扬八仙的祭祀。

到高丽中期，仙教和佛教混融，出现了佛、仙合作的香徒团体。平壤八仙被附会成半仙半佛：

护国白头岳太白仙人——实德文殊师利菩萨

龙围岳六通尊者——实德释迦佛

月城天仙——实德大辨天神

驹丽平壤仙人——实德燃灯佛

驹丽木觅仙人——实德毗婆尸佛

松岳震主居士——实德金刚索菩萨

甑城岳神人——实德勒叉天王

头岳天女——实德不动优婆夷

这样，人们把国内主山灵峰的神仙均拟定为佛或菩萨。到毅宗时，不仅宫室崇尚仙教，而且国王到西京向国民下教书说：第一，要尊重佛事；第二，要归敬沙门；第三，要保护三宝；第四，要尊尚仙风。这样，在民间也要同鼓励信佛一起奖励仙教的信仰。

可见佛教与道教在半岛的流传，是相互渗透，互相影响的。郑麟趾《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二《列传·方技》载：

新罗末，有僧道诜入唐，学一行地理之法而还。作秘记以传。……道诜记云："高丽之地有三京，松岳为中京，木觅壤为南京，平壤为西京。十一十二正二月住中京，三四五六月住南京，七八九十月住西京，则三十六国朝天。"又云："开国后百六十余年都木觅壤。"臣谓今时正是巡驻新京之期。臣又窃观道诜踏山歌曰："松城落后向何处？三冬日出有平壤！后代贤士开大井，汉江鱼龙四海通。"

受宋朝影响，肃宗时在禁中奉安玉皇大帝，祭天象和三界百神等，但没有设立道院。在他之后的睿宗笃信道教，睿宗六年（1110）建立起半岛史上第一个道观——福源观，这是根据李仲若的建议设立的。李仲若曾赴宋

朝学习道教，师从法师黄大忠和周与龄，他回国后上疏睿宗设立玄观，作为举行斋醮的福地。《中京志》（卷三）记载：它位于王府北边太和门内，殿内有三清像，睿宗、毅宗曾在此亲自主持醮祭。福源观建立后，前来听道的人门庭若市，极大地传播了道教。当时宋徽宗根据高丽方面的请求，派来两名道士在高丽举行培训，在培训者中选择优秀者作道士。公元1370年，明太祖曾派朝天宫道士徐师昊赴高丽举行山川祭祀，竖立石碑。郑麟趾《高丽史》卷四十二《世家·恭愍王》记载：

庚辰，帝遣道士徐师昊来祭山川祝文曰："皇帝遣朝天宫道士徐师昊致祭于高丽首山及诸山之神、首水及诸水之神。高丽为国，奠于海东山势磅薄，水德汪洋，实皆灵气所钟，故能使境土安宁，国君世享富贵，尊慕中国，以保生民。神功为大。朕起自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统。比者，高丽奉表称臣，朕喜其诚，已封王爵。考之古典，天子于山川之祀，无所不通。是用遣使，敬将牲币，修其祀事，以饷神灵，惟神鉴之。"

二、具有民族特色的高丽道教

中国道教传入朝鲜后，与朝鲜固有的神仙信仰一拍即合，故而没有遭遇什么抵制与摩擦，并在国家的尊崇下得以广泛传播，势力显赫。但是中国道教并不是原封不动地被朝鲜吸收，而是与朝鲜固有的神仙思想、天神信仰以及儒佛二教相调和、相融合，发展到高丽时期，已经形成具有朝鲜特色的道教。朝鲜道教与中国道教相比，内容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从而不知不觉地成为朝鲜文化的一部分。

高丽神教从高丽初就开始沿袭上古朝鲜的神教习俗，保持祭祀天地山川等土俗神的信仰形态。睿宗时，道教从宋朝传入，高丽王朝建观祠，任命道士，将道教作为宫廷宗教，加以保护。宋朝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十八"道教"云："唐祚之兴，尊事混元始祖，故武德间，高丽遣使丐请道士至彼，讲五千文，开释玄微。高祖神尧奇之，悉从其请。"中国道教与民俗神教结合，深深地浸透到宫廷和民间。高丽道教与佛教一起受到朝廷保护，并作为祈福消灾宗教加以弘传。道教和佛教各自立教，又很好协调，后来在仪式、信仰形态方面更进一步混融。

"八关会"是从半岛三国时代传下来的神教祭祀仪式，是祭祀天灵、五

岳、名山、大川的。人们燃起灯，让诸宗僧侣参加，就变成道佛混合的杂仪。仁宗八年在平壤建立八圣堂，受当时流行的本地垂迹说影响，硬将八圣仙教神仙，附会为天竺的实体佛或菩萨。高丽中期以后，将道教祭神奉安于佛堂的情况多了起来。佛教界把原来供奉为天界帝王的帝释天和玉皇大帝并列供奉；寺院建七星阁，向北斗七星祈祷赐福息灾。在寺刹建七星阁的起因是密教的《妙见菩萨神咒经》《妙见菩萨罗尼经》《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等经典里是崇拜七星的。

在中国道士的服装是黄色、紫色或青蓝色，而高丽道士的服装则是白色（白衣）和黑色（皂衣）。白色是由天神信仰发展来的，因为天神是光明的，是“白“的，所以白色成为其象征色，也成为民族的象征色。宋朝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十八“道士”云：“道士之服，不以羽衣，以白布为裘，皂巾四带。”在高丽时代，曾把仙郎称作“皂衣仙人”，大概由于仙郎的服装是黑色的。高丽道士服装颜色的变化也反映了其固有的民族信仰与道教融合的情况。

中国道教神仙众多，很多在中国流行的民间信仰和风俗习惯也传到高丽，逐渐演变为高丽的民间信仰和风俗习惯。有的与高丽原有的信仰习惯相调和而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八仙内容的改变；有的则原封不动地为高丽所接受，如贴门神像的习俗、守庚申的习俗、星辰信仰、关帝信仰等。

贴门神像习俗是从高丽睿宗时建造福源观后设置门神像开始的，是从中国传来的。门神像有神荼、郁垒、尉迟恭、秦叔宝、寿星仙女、钟馗、值日神将、鬼头、葛和周两将军等；在元旦、立春、端午那天帖子扇上的书画也与门神有关。

守庚申的习俗很早就传入朝鲜。据《高丽史》卷二十六记载，高丽元宗六年时，守庚申活动在高丽已经成为国家的习俗，在庚申那天，人人通宵欢饮，彻夜不眠。宫廷如此，民间亦然。

高丽佛教、道教虽都源于中国，但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高丽国王的信奉与尊崇，发展成规模巨大、人数众多、影响深远的国家宗教，并与朝鲜历史上固有的信仰与传统相结合，而成为独具特色的朝鲜宗教。高丽统治者利用宗教建国、巩固自己的统治，希望在佛教或道教中寻找国泰民安，然而却被一步步拖入拜神的泥潭无法自拔，最终导致高丽王朝的覆灭。

第三编

朝鲜王朝的汉学

太祖李成桂创立的朝鲜王朝自公元1392年开始，直至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共历时518年。朝鲜各君主在位时间分别为：

太祖	1392—1397	光海君	1608—1623
定宗	1398—1401	仁祖	1623—1649
太宗	1401—1418	孝宗	1649—1659
世宗	1418—1450	显宗	1659—1674
文宗	1450—1452	肃宗	1674—1720
端宗	1452—1455	景宗	1720—1724
世祖	1455—1468	英宗	1724—1776
睿宗	1468—1469	正宗	1776—1800
成宗	1469—1494	纯祖	1800—1834
燕山君	1494—1506	宪宗	1834—1849
中宗	1506—1544	哲宗	1849—1863
仁宗	1544—1545	高宗	1863—1907
明宗	1545—1567	纯宗	1907—1910
宣祖	1567—1608		

朝鲜王朝与我国的明清两朝时间大致相同。在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半岛文人创造了辉煌的汉文化。朝鲜文人不仅写出了大量的汉文学作品，而且在性理学研究方面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朝鲜文庙从享者除了与我国一致的四贤、十哲外，还有半岛文人（西庑）崔致远、郑梦周、郑汝昌、李彦迪、金麟厚、成浑、宋时烈、朴世采以及（东庑）薛聪、安裕、金宏弼、赵光祖、李滉、李珥、金长生、宋浚吉。这些被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嘉许的文化英雄，除了崔致远、薛聪外，均是朝鲜文人。

第一章
朝鲜王朝的汉文学

朝鲜王朝的汉文学，一如高丽的汉文学一样，一直是半岛汉学的主体。文人们用诗文来进入统治者上层，又用这些汉字来治理国家和地区。他们同样还用这些汉字来构建自己的诗学意识形态。

由高丽入朝鲜的著名文人郑梦周（1337—1392）是出色的汉文学家。郑梦周，字达可，号圃隐。高丽恭愍王九年庚子（1360年）应举，连魁三场，遂擢第一。多次出使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明洪武五年（1372年）以书状官的身份从洪师范出使中国京师，祝贺平蜀。郑梦周在高丽王朝时与朝鲜太祖李成桂同殿为臣，手握重权。后被李成桂之子杀死。有《圃隐集》传世。

《圃隐集》卷之一所收郑梦周诗作《三月十九日，过海宿登州公馆。郭通事、金押马船阻风未至，因留待》是他在出使中国路途中的作品。郑梦周写道：

登州望辽野，邈矣天一涯。溟渤限其间，地分夷与华。
我来因舟楫，利涉还可夸。昨日海北雪，今朝海南花。
夫何气候异，可验道路赊。客怀易凄楚，世事喜蹉跎。
偕行二三子，相失迷风波。终夜苦忆念，耿耿闻鼓挝。
晨登蓬莱阁，浪涌山嵯峨。归来就孤馆，欹枕空吟哦。

其《蓬莱驿示韩书状（名尚质）》吟唱到：

昨日张帆涉海波，故园回首已天涯。
地经辽霤军容壮，路入登莱景物多。

客子未归逢燕子，杏花才落又桃花。
同来幸有韩生在，每作新诗和我歌。

朝鲜文人沈光世《海东乐府》记载说："丽末文忠公郑梦周，以真儒王佐才，出而为用，最被圣祖所知，屡辟幕下。回军之后，同升为相。文忠与金震阳诸公，忘身循国，欲扶社稷。时圣祖功业日盛，群下归心，势难终于北面。文忠协谋倾之。太宗尝告太祖曰：'郑梦周岂负我家？'太祖曰：'我遭横谗，梦周以死明我。若系于国家，有不可知。'及文忠公心迹倡著，太祖设宴请之，作歌侑酒曰：'此亦何如，彼亦何如？城隍堂后垣颓落，亦何如？我辈若此为不死，亦何如？'文忠遂作歌送酒曰：'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白骨为尘土，魂魄有也无。向主一片丹心，宁有改理也欤?!'太宗知其不变，遂议除之。文忠一日问病于太祖邸，因察气色归。过故酒徒家，主人出外，阶花盛开。遂经入呼酒舞于花间曰：'今日风色甚恶，甚恶！'连嚼数大碗而出。其家人怪之，俄闻郑侍中遇害矣。文忠之自太祖邸归也，有橐鞑武夫，冲其前导而过。文忠顾谓随行录事曰：'汝可落后。'答曰：'小的从大相，何可他往乎？'再三呵止，亦不从。文忠之遇害，抱持同死。当时仓卒，无人记其姓名。遂不传于后世。"①

假如说郑梦周是从高丽王朝过渡到朝鲜王朝的文人的一个代表，朝鲜文人金宗直就成了朝鲜王朝文化方面的一个代笔人。他参与了许多文化方面的事业。最重要的是他恪守古代半岛文人的传统，不肯与统治者中的文化败类同流合污。在金宗直看来，"学以致用"的传统才是汉学的精粹。

金宗直（1431—1492），字季昷，号占毕斋。善山人。中明景泰癸酉（1453年）科进士，天顺己卯（1459年）文科及第。天顺五年辛巳（1461年），拜承文博士。历任吏曹参判、湖南观察使。成化十九年癸卯（1483年）以后历任承政院同副承旨、吏曹参判、刑曹判书、知中枢府事，其国君称赞其"端慤无伪，学问渊源"，谥"文简"。金宗直在国内游历期间，写有许多纪行诗，参与编修五十卷的《东国舆地胜览》，编辑《青丘风雅》《东文粹》等，有《占毕斋集》传世。他的纪行诗《八月十日潺水驿》吟唱道：

潺水津头潺水驿，皇华一夜倚匡床。

① ［韩］《大东野乘·海东乐府》。

半庭微月无人影，闲听风滩抑更扬。[1]

这里的“匡床”就是睡觉的床。

金宗直的诗句音乐感很强，颇能上口。如下一组收录于其《占毕斋集》卷二十一的诗歌即是这类作品：

《顺天府》

看尽山茶与石榴，村村门巷可淹留。

玉川依旧横如线，不见当时燕子楼。

《望头流》

循山一路自云峰，试险初来兴正穷。

偶见头流西北角，排风喜气欲腾空。

《长水水分亭》

云烟万壑水分亭，最是湖南僻远程。

一片彩旗盘鸟道，马头南北听泠泠。

金宗直的诗歌里有多种注解，留下了当年朝鲜王朝的生活景象。其《法圣浦西峰杂咏》写道：

西北鳌波侵日车，云帆直欲簸青徐。

春花如锦须重到，要见蒙山石首鱼。

该诗注云：“土人云，每三四月诸道商船俱集于此，捕石首鱼曝干。自峰底至顶无着足处。”[2]

金宗直恪守朝鲜文人一直学习汉诗“诗史”写作的传统，其对官吏的不满在诗句里表现颇多。《历尽山郡，九月初二日自高山入全州》写道：

---

① [韩]金宗直《占毕斋集》卷二十一。

② [韩]金宗直《占毕斋集》卷二十一。

始出山来慰不聊，甄都今日马声骄。
俗顽定费三千牍，路远重经五百条。
渐觉凄风侵病骨，空惭拙政负清朝。
闾阎却怪皇华吏，只问州箴与俚谣。①

"清朝"在这里是指政治清明的王朝。"五百条"是地名，在今天的全州北面。"州箴"的说法来自西汉扬雄。

《八良岘》一诗直斥官员：

西溪流水和佩鸣，方丈苍云拥马行。
旧官无德自可愧，境上百物还多情。②

《镇安望马耳山》一诗则表现了金宗直的审美理想：

天外落奇峰，双尖如马耳。不知几千仞，亭亭烟雾里。
偶蒙重瞳顾，佳名传万祺。涌出与父母，前称真鄙俚。
中原亦有之，名实当相拟。真宰巧莫穷，永怀鸿蒙始。
我来秋雨余，青红错如绮。濯濯春笋姿，相偎不相倚。
遥瞻首不掉，门户终夜闷。愧无济胜具，咫尺难历视。
安得绿玉杖，高步脱泥滓。信宿碎石庵，上挹峰顶水。
青童共商略，一服方寸匕。③

诗句里的"重瞳"来自舜的传说。据说舜是重瞳。"济胜具"典出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泥滓"句出杜甫。杜甫诗中有"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金宗直《金堤郡因雨更留一日次壁上韵》写道：

千旌扬复止，聊与幕宾谈。听雨朝连暮，看山北误南。

① ［韩］金宗直《占毕斋集》卷二十一。
② ［韩］金宗直《占毕斋集》卷二十一。
③ ［韩］金宗直《占毕斋集》卷二十一。

低眉遵画一，守口用绒三。着处惟尸素，淹留面发惭。①

这里的“画一”是指在一张白纸上写写画画。“尸素”即“尸位素餐”。“听雨朝连暮，看山北误南”一联尤其精妙。

金宗直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其弟子和再传弟子都严格恪守金宗直的汉学传统。朝鲜文人南孝温《师友名行录》记录说：“金宏弼字大猷，受业于占毕斋。庚子年生员，与余同庚，而日月后于余。居玄风，独行无比。平居必冠带。室家之外，未尝近邑。手不释小学，人定然后就寝，鸡鸣则起。人问国家事，必曰：‘小学童子，何知大义？’尝作诗曰：‘业文犹未识天机，小学书中悟昨非。’占毕斋先生批云：‘此乃作圣之根基，鲁斋后岂无人？’其推重如此。年三十后，始读他书。训后进不倦，如贤孙李长吉，李绩、崔忠成、朴汉恭、尹信皆出门下。”可见，“直言”和“谦逊”是金宗直恪守的汉学道统，而恰恰是这样的道统惹恼了统治者，其身后甚至出现了因“私藏”金宗直著作而被杀死的文人。

在朝鲜文人的心目中，书写不仅仅是书写自身，而是一种诗学意识形态的建构。与高丽王朝不同，朝鲜文人开始大量书写“说话”和“逸史”。这些文字介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其中不乏历史真实，但也有大量的传奇成分。但它们是朝鲜文人心目中的真实，其假想性恰恰就是文人们的生活理想的表现。在这类作品中，文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朝鲜与中国将军如何抗击日本侵略者，以及朝鲜军人如何在帮助大明朝抗击后金中树立功勋。

朝鲜文人的汉文书写中，《大东野乘》是叙述性作品。其中无名氏《逸史记闻》记录明朝军队与后金军队的决战时说：“奴贼乃建州卫也，戊午春，贼势炽张，兵马亦精，指中原谓‘南朝’。语甚不逊，多有陆梁之渐。天子震怒，以杨镐为辽东都御史，李如松为总兵。特遣都督刘綎，发兵十万，又敕我国挟攻建州，共期剿灭。光海以姜弘立为都元帅，金景瑞为副元帅，率兵二万。行到牛毛岭寨，刘綎十万大败于贼，刘綎自焚死，乔游击自缢死，军兵自相蹂躏，僵尸百余里。姜弘立、金景瑞亲领将卒，解甲降虏。宣川郡守金应河，以左营将见大将之降，不胜其愤。到深河，依柳树下抽矢射贼，连杀八九。矢尽之后，挥刃斩贼，至于剑折乃止，仍死其下。故奴贼名其树曰‘将军柳’。”文中的“光海”即光海君，他派遣姜弘立来帮助明军，但

① ［韩］金宗直《占毕斋集》卷二十一。

是姜弘立带来的朝鲜军很快就投降了满族军队。

无名氏《逸史记闻》所记载“壬辰倭乱”也很精彩，文中说：“日本贼首平秀吉，弑君篡立，遂有入犯天朝之计。遣玄苏等致书我国，声言假道，辞极悖慢。我国举以大义，斥绝其使。壬辰四月，秀吉遣其将平秀家等，督精兵二十万，以平行长、平义智、平调信等为先锋，残我八路，夷我五庙，陷我三京（汉城开城平壤是也），烧我二陵（宣靖陵也）。幸赖圣天子特遣都督李如松，统率南北官兵四万余兵，来救我国，遂致平壤之捷。丁酉之乱，又遣杨经理、麻都督，以致稷山之捷。戊戌，军门邢玠、经理万世德，分遣西路诸将。都督麻贵，由东路镇蔚山；都督董一元，由中路镇泗川。都督刘綎，由西路镇顺川。都督陈璘由水路遇贼于露梁，鏖战大捷。会秀吉去日本死，诸贼皆卷兵而去。先是，对马岛民，船运物货，贸贩米布于我国，以资其生。一自兵祸之后，岛民饥馑难于资活。岛主平义智，连遣橘智正刷还被虏男女，来要和好，乞通开市。大概源家康为关白，自言壬辰丁酉之变在关东，不曾干预兵事。朝鲜与我实无仇怨，请与通和之。故遣僧人松云（俞惟正也）于日本侦探贼情，刷还被掳男女一千三百余名。具由咨报于辽东抚镇各衙门。丙午冬，日本国王源家康，修书通好，缚送犯陵贼二名。其一名，年二十余，壬辰年未五岁也。领议政柳永庆设三省于司仆寺，鞫问而施刑，自以为雪国耻。人皆笑其谬妄。遣吕佑吉、庆暹、丁好宽为回答使如日本。参判尹安性作诗送之曰：‘使名回答去何之，此日和亲意未知。试向汉江江上望，二陵松柏不生枝。’此作传诵于洛下，而为识者所叹赏。”文中的“平秀吉”即日本著名军阀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执政后，派日本军队入侵朝鲜，很快攻占了半岛的很多地方。朝鲜王朝宫廷北移，向明朝请求援助。李如松带领明军入朝参战，经过近八年的抗击，打败了日本侵略军。无名氏的《逸史记闻》，显然是要继承汉学里的修史传统。这些文字不是用来做游戏的，而是沉甸甸的记述。

同样收录于《大东野乘》里的朝鲜文人金时让《紫海笔谈》，干脆用一个故事来说明书写不仅仅是书写自身，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它要说明，书写是沉甸甸的。《紫海笔谈》云：“高丽遁村李集，仕恭愍朝，忤贼旽，窃负其父而逃。投于永川同年崔元道家。旽诛，始还仕为判典校事。未几，退居骊州，卒。《（东国）舆地胜览》误载于本朝之下曰‘仕本朝’云云。而注诗林者，亦踵其谬。宣庙朝，经筵官洪廸请改之。命待印出之日。今三年，改刊《舆地志》。公八代孙李汉阴德馨，时为领相。上书乞遵遗教厘

正，上从之。命儒臣改撰。付录于其名下曰‘辨误：而集以恭让丁卯岁卒，郑梦周、李崇仁等俱作诗哭之。’丁卯岁乃辛禑十三年也，越二年己巳，恭让始立。改撰之抵牾不合，无异于前。所谓儒臣，不过当时玉堂之臣。闻浅见陋，无怪乎有此误。而汉阴以词林领袖，为祖先雪诬，固当详慎，亦有此失，信乎撰述难也。”金时让所写故事直指首相李德馨。朝鲜文人李德馨（1561—1613），字明甫，号汉阴、双松、抱雍散人等。祖籍广州。1508年文科别试及第，为玉堂参下官。1591年升大提学、礼曹参判。日本军队入侵朝鲜，以“请援使”入明都北京请求中国发兵援助。回国后为汉城府判尹，并充当明将军李如松接伴官。1594年出任吏曹判书，并任京畿、平安、黄海等四道体察府使。1597年，“丁酉再乱”，明将杨镐带兵入朝支援。李德馨任右议政、行判中枢府事。升领议政。1608年，以陈奏使再次入明都北京。谥“文翼”。有《汉阴先生文稿》传世。按照金时让的说法，李德馨时任首相，居然连自己的八代祖的事迹修改都没有搞好，“信乎撰述难也”。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则李德馨在八代之后，还要为自己的祖先李集的事迹负责，汉字的书写也在朝鲜王朝也确实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做做的事情。

为了深刻研究汉学，朝鲜王朝的读书人往往要下很苦的功夫。朝鲜文人南孝温《师友名行录》记录说：“郑汝昌字自勖，入知异山三年不出。明五经，穷极其蕴，知体用之源同分殊，知善恶之性同气异，知儒释之道同迹差。性理之学醒狂敬之。庚子年，上下教成均馆，求经明行修儒生，馆中举自勖为第一。知馆事徐居正将进伯勖而讲经，自勖退。癸卯年进士，其父六乙，施爱之乱死国。是时自勖年少，居丧无阙。居母丧，典礼之数，饘粥之食，一依《家礼》。庚戌年，参议尹兢荐其孝与学，士林无比。特召为昭格署参奉。自勖上书请免，上下教褒之，名益重。”

朝鲜文人中也涌现了许多才子，他们的汉字书写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金时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金时习（1435—1493），字悦卿，号清寒子、梅月堂，江陵人。生于朝鲜世宗十七年。五岁能为诗，时称“神童”。二十岁时佯狂而出，削发为僧。居无定所，名号累变。曾还俗娶妻，妻死后再次出家。成宗二十四年逝世。后被尊为“生六臣”之一。1583年，朝鲜宣祖命刊印《梅月堂集》。《梅月堂集》有诗集十五卷、文集八卷。朝鲜文人南孝温《师友名行录》记录说：“金时习，江陵人，新罗之裔，先余二十岁。字悦卿，号东峰，又号碧山清隐，

又号清寒子。世宗乙卯年生，五岁能属文。世宗命招承政院赋诗，大异之。召其父教之曰：'善养此儿，予将大用。'乙亥年，光庙摄政。入沙门，名曰雪岑。入居水落山精舍，修道炼形。见儒生则言必称孔孟，绝口不道佛法。人有问修炼事，亦不肯说。或有言金乖崖守温坐化之事。答曰：'坐化于礼不贵，吾但知曾子之易簀，子路之结缨以死之为贵也，不知其它。'辛丑年间，食肉长发，为文以祭祖父曰：'伏以帝敷五教，有亲居先；罪列三千，不孝为大。凡居覆载之内，孰负养育之恩。故恶兽莫过虎狼，而微忠无逾豺獭。能全爱亲之性，又谨报本之诚，皆天理之固然，而物欲之难蔽者也。伏念愚騃小子，嗣续本支。少沉滞于异端，嗟迷懵而未讲。将修道可以荐拔，悟谎说莫如轮回。壮岁因循，末路方悔。乃考礼典，搜圣经，考定追远之弘仪，参酌清贫之活计。务简而洁，在腆以诚。汉武帝七十年，始悟田丞相之说。元德公一百岁，乃化许鲁斋之风。感霜露之沾濡，忧岁月之逾迈。惊惶无已，叹讶良多。如赎旧愆，倘纳堪舆之两际。庶将面目，得拜祖宗于九原。'自壬寅以后，睹世将衰，不为人间事，为弃人于闾阎间，日与人争讼于掌隶院。一日，饮酒过市，见领议政郑昌孙曰：'汝奴宜休！'郑若不闻，人以此危之。其尝与交游者，皆绝不往来。独与市僮狂易者遨游，醉倒于道侧，恒愚恒笑。后或入雪岳，或居春川山，出入无常。人莫知其涯涘也。其所喜者，正中、子容、子挺及余。所著诗文数万余篇，播迁之际散亡殆尽。朝臣儒士，或窃取之以为己作。"

金时习少年时在大司成金泮门下学习《孟子》《诗经》《书经》《春秋》，又在著名文人尹祥门下学习《易经》《礼记》。早期尊奉儒家的仁爱、忠义、礼信、性理伦理道德，成年后又尊奉佛家理论。金时习18岁时在曹溪寺学习佛理。明天顺初年"癸酉士祸"发生，他削发为僧，以译经为业，并著有《十玄谈要解序》《大华严法界图序》等书。他以佛家出世思想作为与现实抗争的武器和逃避现实的手段。闻世祖篡权、端宗逊位改元，乃佯狂披发而逃。金时习是时代造就的文人，也是朝鲜王朝不可多得的臣子。他身处于儒家与佛家之间，徘徊于癫狂与清醒之际。虽然可以说佛论法，但他比谁都更像儒生；虽然看起来是个癫狂的样子，但是他比谁都更清醒。金时习可以用毛笔任意挥洒，也可以用双脚走出文化味道来。他的逃遁，他的言行，他的居住等等，在当时就已经成了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在数不清的诗文作品之外，金时习还写有小说《金鳌新话》，包括《万福寺樗蒲记》《李生窥墙传》《醉游浮碧亭记》《南炎浮州志》《龙宫赴宴录》五篇，用小说的

形式来宣传他的儒家正统思想，以及佛教的宿命、无常和生死轮回等观念。

金时习生活在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里。15世纪后半叶的成宗开始，朝鲜王朝“两班”的文武官僚阶层人数日益增多。混乱的党争与宫廷内的争权夺利叠加在一起，社会上无日不在争斗。先是以协助世祖篡位的武将、勋贵为主的“勋旧派”，同与儒生和士大夫为主的“士林派”首先发生党争。随着燕山君被废后，“士林派”得势。但“士林派”随后又发生内讧并分裂为不同派别，包括明宗时期的“大尹派”和“小尹派”，以及宣祖时的“东人党”（岭南学派）和“西人党”（畿湖学派）。东人党在政治斗争中得势后又分裂为以李滉（李退溪）为首领的“南人派”和曹植为首领的“北人派”。北人派由于拥立光海君即位而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得势。朝廷中的北人党又分裂为以李尔瞻为首、主张拥立光海君的大北派，和柳永庆为首、主张拥立嫡子的小北派。小北派在光海君即位后受到打击，柳永庆被赐死，小北派分裂成清小北和浊小北，而大北派则又分裂成骨北、肉北和中北三派。南人则分裂为清南和浊南。西人派在仁祖反正、废黜光海君的政变中得势，又在显宗时期分裂为老论派（元老派）和少论派（少壮派）。南人派在肃宗时因依附张禧嫔而得势。总之，朝鲜王朝的中期和后期，是在混乱而无休止的党争中度过的。

汉诗文的写作，对于许多命运多舛的朝鲜文人来说，还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郑希良以及其他具有类似生活经历的文人们，在冰天雪地里吟唱，在饥寒交迫中书写。他们人穷而文富，命贱而诗贵。

郑希良（1469—1502），字淳夫，号虚庵，著名朝鲜文人，有《虚庵遗集》传世。郑希良生于朝鲜睿宗一年，燕山君八年自沉而亡。他一生困顿，曾经被三次流放，曾经被放逐到中国与朝鲜交界的龙湾。在燕山君的暴政下，他最终选择了自沉。而其诗文的可贵之处，大约也就来源于他困顿与艰难的生活。正如其遗集之序里所说“古人之穷则诗工。政谓此也。君凡三黜于外，穷可知也。”也正是郑希良的这种困顿，才促成了他特殊的诗歌风格。特定的观察视角与多数人想不到的诗兴才会滚滚而来。其《有感》写道：

父母生我苦，毫发皆所赐。惜哉不肖身，具体宁非美。
提携烦背膝，庶几完骨髓。胡为浪触祸，腰脚遭鞭箠。
寸躯自难保，何敢答亲志。远谪天一涯，故国隔万里。

定省已久阙，念之良可耻。弟妹各飘零，一夕魂九徙。

登高独长望，落日悲风起。①

郑希良把自己的身体看得比自己所坚信的礼仪、道德要轻很多。他的读书与做学问道路，是与其颠沛流离与动遭刑罚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郑希良对中国文化十分向往。在《送尹尚中（卓然）赴京二首》（癸酉年作）里，有“中原足文献，取征良在兹”之句。他的诗里充满了对于能到中国去的同事的羡慕。他写道：

客路经辽野，偏令志士悲。闾山贺氏墓，孤竹伯夷祠。

霁月无边照，清风无限吹。晚生空好古，千里有余思。②

这里的“闾山贺氏墓”是指明朝文人的墓地。贺钦（1437—1510），明朝著名文人。字克恭、尧天，号医闾。本贯浙江，出生于辽东广宁。成化二年丙戌（1466年）进士，授为户科给事中，后被派为陕西参议，因母病辞。在大山中闭门读书写作。有其子贺士咨编《医闾集》九卷传世。明人李辅等编纂《全辽志》卷下“贤行”中有传。可参见明人贺士咨编《医闾集》卷一、卷二、卷三“言行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郑希良的诗歌，也很有禅意。其《题金刚寺》写道：

寺古何年作，问僧僧不知。青山澹欲夕，白雨急催诗。

偶宿高人境，兼念静者机。吾今如梦里，还怪我为谁。③

到了朝鲜王朝的后期，丁若镛和他的《与犹堂全书》成了汉文书写里最出色的作品。同时，也标志着用汉字承载的“朝鲜实学”的出现。朝鲜实学是性理学的对立面，文人们对于空谈性理感到厌倦，他们要用汉字来探索经济、地理、历史和军事等方面。他们要走出“理窟”，回到现实。尽管朝鲜实学与中国朴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丁若镛等人的探求作品，又

① ［韩］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18卷，第13页，1988年版。

② ［韩］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18卷，第19页，1988年版。

③ ［韩］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18卷，第22页，1988年版。

确实是可圈可点的。

丁若镛(1762—1836)是朝鲜王朝最著名的文人之一。他的《与犹堂全书》被称作个人书写最多的汉字作品。其《铜雀渡时屈监试,领内赴和顺,九月也。汝三同行》写道:①

铜雀秋风起,乌城忆杳然。官斋箐竹里,书室菊花前。
远逐随阳雁,徐回泛壑船。旅游非不乐,行迈念亲年。

诗歌中的"铜雀渡"在今韩国首尔市内,是汉江的一个著名渡口。那里有著名的汉江大桥。

收录于《与犹堂全书》第一集诗文集第二卷《诗集》的一首诗,题目很长。题目自身就交代了很多事情。大致是"十一月一日,于西岩凤谷寺温阳地陪木斋李先生校星翁遗书":

郁郁星湖子,诚明着炳文。弥漫愁旷际,芒忽见纤分。
眇末吾生晚,微茫大道闻。幸能沾膏泽,惜未睹星云。
宝藏饶遗馥,仁恩实救焚。典刑余一老,齿德迥千群。
道丧穷年叹,朋来暮境欣。校书酬耿结,负笈喜辛勤。
犹有安冥摘,徒然到白纷。勖哉良友辈,于此送朝曛。

从这里可以看出,丁若镛等朝鲜文人在校对和出版汉字作品时是多么的认真,又是多么的兴高采烈。一个被社会看重的人,其作品必然十分被人们重视。丁若镛等人校勘星湖先生的作品,其实就是一场文化盛宴。聚集在那里的人们,都有一种由衷的自豪感。而星湖先生的作品,恰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鲜诗文,而是朝鲜实学的代表作。丁若镛等人在这场文化盛宴上,要探求的恰是准科学的学问,而不是性理学。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四集乐集第三卷《乐书孤存》三《查十二律以制器法上天造化之理》写道:

① [韩]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诗文集第一卷《诗集》。

天之造物，皆有比例。禽兽大者，其周身诸骨，皆节长而围大。其小者周身诸骨，皆节短而围小。然其诸骨之比例，于其本身之内，各有大小之差。脊骨尾骨及肩臂臑髀膊胳之等，无一同者。然其大兽小兽，差降之级，各有比例。假如牛脊，视羊脊三倍，则其肩臂臑髀膊胳之差，亦用三倍之律以为比例。假如羊（牛）脊三分损一，以为豕脊，则其肩臂臑髀膊胳之差，亦用三分损一之律以为比例。如是，然后其鸣吠行走，诸骨之运动，皆调畅无碍。岂惟禽兽然矣？人身诸骨大小之比例，亦皆如是。故侨如，横至九亩；僬侥，短止三尺。而肩臂髀胫大小之差，仍有比例，各适其体。故医家每用本人中指横纹，以为一寸，以定其人针灸诸穴。取膏肓者，曲膝齐胸；取四花者，垂臂鸠尾。大人小人，其法皆同。明诸骨大小之差，不违比例也。

丁若镛作为朝鲜王朝著名的实学家，在这里虽然探索的是传统汉学中的“乐学”，字句里已经出现了“我注六经”的味道。其《与犹堂全书》第六集地理集第一卷《疆域考·朝鲜考》是一篇大量引用古代文献的实学名文。该文云：

朝鲜之名，起于平壤，本箕子之所都也。《史记·宋世家》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伏生《书大传》云：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见《洪范疏》。《汉书·地理志》云：箕子去之朝鲜。节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是以其民终不相盗。节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镛案：今人多疑箕子朝鲜，或在辽东。然《苏秦传》《货殖传》朝鲜、辽东真番之等，皆别言之，不可混也。知朝鲜之名，必起于平壤者。《地理志》乐浪郡属县二十五，朝鲜居首。当时卫满之都，实在平壤。其后乐浪之治，亦在平壤。而其首县为朝鲜。则朝鲜者，平壤之旧名也。《易》曰：箕子之明夷。谓箕子为君。而外夷文明也。若但辽东而止。岂遽夷哉。

明《一统志》云：平壤城在鸭绿江东，一名王险城，箕子之故国。城外有箕子墓。汉为乐浪郡治。见“辽东都司古迹”条。《舆地胜览》：箕子墓在平壤府北兔山。镛案：《史记·索隐》杜预云：梁国蒙县，有箕子冢。然箕子志决罔仆，道在明夷。无缘反葬于中国。今考《一统志》，“蒙县”无此文。

到了朝鲜王朝末期，典型的文人还是汉文书写者，其中引领王朝到近代朝鲜的文人数不胜数。成崎运、崔锡敏、高永喜、韩昌洙、金丙翊、金春熙、金鹤元、金嘉镇、金声根、金思浚、金思辙、金永哲、金允植、金泽荣、金宗汉、李秉武、李凤仪、李干夏、李根澔、李根命、李根湘、李根泽、李海昌、李海升、李琦镕、李容乐、李容泰、李容稙、李完镕、李完用、李胃荣、李夏荣、李允用、李载觉、李载克、李载昆、李载完、李正鲁、李址镕、李钟健、闵丙奭、闵炯植、闵商镐、闵泳徽、闵泳奎、闵泳璘、闵泳绮、闵泳韶、闵种默、南廷哲、朴箕阳、朴齐斌、朴齐纯、朴容大、朴泳孝、权重显、任善准、宋秉畯、尹德荣、尹雄烈、尹泽荣、张锡周、赵东润、赵民熙、赵同熙、赵羲渊、赵重应、郑汉朝、郑络镕等都是。其中有些人晚节不保，但他们汉字书写者的身份是无可怀疑的。名单中的金允植曾在我国天津留居一年以上，他带来了人数众多的留学生队伍，并与李鸿章等多次对谈。①

① 参见拙著《王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导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二章 朝鲜王朝的性理学

高丽末期的文人们从中国引入了“性理学”（Neo - Confucianism），随后，性理学成了朝鲜王朝汉学中独特的学问，也成了朝鲜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朝鲜性理学发展史上发生过诸多论辩，其中最为著名的“无极太极论辩”、“四端七情论辩”以及“人性同异论辩”最终使朝鲜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论”探讨为中心的哲学轨道。如果我们从汉学的角度来看，则性理学本属儒学，儒学本属汉学，汉学－儒学－性理学这样的发展轨迹是半岛的特色。难怪现今韩国的学者要把性理学翻译为“新孔学”（Neo - Confucianism）了。

提到半岛的性理学，就不能不提安裕。高丽末，文人安裕随忠烈王到燕京，携《朱子全书》回国。他是将朱学系统传入高丽的第一位学者。他担心儒学荒废，便设国学，致力于儒士的培养，还派人入元朝购入经书、史书、祭器、乐器等，以奖励儒家，因而学习儒家的人达数千人。安裕作为朱子学的先驱性人物，在大力倡导朱子学的同时，还注意选拔性理学人才。高丽末期的李穑也是早期引进、消化和发展半岛性理学的重要思想家。

1765 年来北京的朝鲜文人洪大容，对中国朋友介绍半岛情况时说：

箕子之衰，典章散亡，俗尚刚厉，武力虽竞，文教扫地。逮于丽末，有郑圃隐梦周，始倡理学。其入本国以来，文学渐兴。有金寒暄宏弼，郑一蠹汝昌。皆表章程朱之学。有赵静庵光祖，天资极高。年三十掌风宪数年，国中化之。男女异路，庶民丧葬皆遵家礼。不幸早死，未究其学。有李晦斋彦迪，始著书阐明义理。有李退溪滉实履笃实，倡道益盛。有李栗谷珥禀质清通，见解超迈。其论性理诸说，高明的确，洞见大原。如“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不能无所发”数句，语其要旨也。亦

不幸四十九而卒。有成牛溪浑,与栗谷并时齐名。其后有金沙溪长生,益阐礼学,毫分缕析,条理粲然。其后有宋尤庵时烈、宋同春浚吉,同时倡道。尤庵享年最久,尊尚《春秋》。圃隐以下诸贤,皆从祀本国圣庙。①

洪氏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中国清乾隆三十年。他所介绍的朝鲜王朝的大学者,皆为半岛最著名的性理学家。

李穡(1328—1396),号牧隐,由高丽入朝鲜的著名儒学家。他曾在我国元朝翰林院为官,将程朱理学引入半岛,奠定了朝鲜王朝性理学思想基础。郑麟趾《高丽史》卷一百一十五《列传》二十八"李穡"云:"十六年重营成均馆,以穡判开城府事兼成均大司成,增置生员,择经术之士。金九容、郑梦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教官先。先是,馆生不过数十,穡更定学式,每日坐明伦堂,分经授业。讲毕,相与论难忘倦。于是学者咸集,相与观感,程朱性理之学始兴"。2005 年 11 月 19 日,在北京召开"中韩牧隐李穡学术思想研讨会"会议,北京大学陈来教授从"天则理"说、浩然之气说、明德明命说、性情功夫论、理寓于象说等方面分析了李穡的理学思想。胡军教授、张敏教授以及韩国成均馆大学李基东教授、崇实大学教授郭信焕等共同讨论了牧隐性理学等思想。

高丽晚期的著名文人郑梦周也是朝鲜半岛性理学的重量级人物。其后有著名的性理学人徐敬德。在朝鲜被称为"东方大贤"的栗谷李珥(1536—1583)与另一位大儒退溪李滉(1501—1570),同被誉为朝鲜性理学的双璧,其后还有金长生与宋时烈师徒。他们都为朝鲜半岛的性理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郑梦周(1337—1392)字达可,号圃隐。其曾祖、祖父都是高丽名臣。其父郑云瓘,判书兵曹事,封日城府院君。高丽恭愍王九年庚子(1360 年)应举连魁三场,遂擢第一。十一年选补艺文检阅。十六年以礼曹正郎兼成均博士。十七年转成均司艺,二十年改太常少卿俄迁成均司成,二十一年壬子(明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以书状官从洪师范出使中国京师,祝贺平蜀。辛禑元年拜右司议大夫,移成均大司成。四年拜右散骑常侍,历典工禮仪、典法版图判书,六年从朝鲜太祖李成桂击倭,还拜密直提学。七年签书司事,十年拜政堂文学。同年,因与明朝关系紧张,高丽文臣不敢进南京

① [韩]洪大容《湛轩书·外集·杭传尺牍》卷二。

朝拜。郑梦周独自请行，大得赞赏。十一年同知贡举，十二年再赴京师，请冠服又请免岁贡。十四年拜三司左使，辛昌元年改为艺文馆大提学。从朝鲜太祖李成桂定策，立恭让。拜门下赞成事、同判都评议使司事、户曹尚瑞司事、进贤馆大提学、知经筵春秋馆事兼成均大司成、领书云观事，封"益阳郡忠义君"，赐"纯忠论道佐命功臣"号。

郑麟趾《高丽史·列传》卷一百一十七记载说："梦周天分至高，豪迈绝伦，有忠孝大节。少好学不倦，研穷性理，深有所得。太祖素器重，每分阃，必引与之偕。屡加荐擢，同升为相。时国家多故，机务浩繁，梦周处大事、决大疑，不动声色，左酬右答，咸适其宜。时俗丧祭，专尚桑门法，梦周始令士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所著诗文豪放峻洁，有《圃隐集》行于世。本朝赠大匡辅国崇禄大夫、领议政府事、修文殿大提学兼艺文春秋馆事、益阳府院君，谥文忠。"《圃隐集》所收咸傅霖所撰《行状》记载说："国家自辛丑被兵以来，学校荒废。至是，恭愍王锐意复兴，新创成均馆以学官小。选硕儒若永嘉金九容、潘阳朴尚衷、密阳朴宜中、京山李崇仁及公兼学官，以牧隐李文靖公兼大司成。时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而公讲说发越，超出人意，闻者颇疑。及得云峰胡氏《四书通》①，与公所论，靡不脗合，诸儒尤加叹服。牧隐亟称之曰：达可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

郑道传（1342—1398）是朝鲜"性理学"的大师。收于《三峰集》第九卷里的关于佛家的论述以及第十卷里的《心气理篇》《心难气》《心问》等，都是性理学方面的重要论述。

河仑（1347—1416）《浩亭集》的第二卷收录的是他的"疏"、"札"、"启"、"说"、"序"和"记"。其"说"有《心说》《性说》《名子说》《议政府相规说》和《循资格说》。虽然都是短文，论说却很有深度。其中的《心说》《性说》已经是朝鲜性理学的重要文献。

申叔舟（1417—1475）《保闲斋集》卷十三里的"家训"是他对于家人的叮嘱。包括"操心第一"、"谨身第二"、"勤学第三"、"居家第四"、"居官第五"和"教女第六"。从题目来看，它几乎是《颜氏家训》的缩微版本。而其内容，则是朝鲜的性理学所一贯倡导的知行不二。

---

① "云峰胡氏"即元朝文人胡炳文。胡炳文（1250—1333），字仲虎，号云峰，婺源人。其《四书通》在朝鲜半岛有很高的知名度。该书已收入《四库全书》。

徐敬德(1489—1546),字可久,号复齐,唐城人。他生于成宗二十年,卒于明宗元年。一生致力于格物之学与性理学,司马试外不参加科举,以读书为业。晚年隐居松京(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城市)郊外花潭,时人称其为"花潭先生"。有《花潭集》四卷传世。朝鲜王朝的"花谷书院"即为纪念徐敬德而建。《花潭集》卷三所收朝鲜文人朴民献《神道碑铭》对于徐敬德的性理学思想有较早的总结。

徐敬德晚年写有《原理气》《理气说》《太虚说》《鬼神死生论》等四篇性理学文章。他的《复其见天地之心说》《温泉辨》《声音解》《皇极经世数解》《六十四卦方圆之图解》及《卦变解》等著作也凸显了他的性理学思想。徐敬德的性理学思想还在他的文学作品里有清楚的表达。他的《谢金相国惠扇二首》前有与慕庵金安国的对话:"问:扇挥则风声,风从何出?若道出于扇,扇里何尝有风在?若道不出于扇,毕竟风从何出?"①在对话里,徐敬德继承和发展了朝鲜儒学里的主流思想,试图用性理学来解释风与扇子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其中的对话与诗句颇有佛教禅宗里的辩难味道,但是徐敬德的儒学追求还是很明晰的。他要直接继承郑梦周等人的思想,把儒学建设成朝鲜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徐敬德的辩论,不会在"风动"还是"旗动"的问题上纠缠。徐敬德似乎要在自然科学还没有解释这样的问题之前,把空气的流动和扇子的挥动联系起来。徐敬德回答说:"愚以为不消如此说。扇所以能鼓风,而非扇能生风也"。徐敬德的回答,把慕庵金安国的挑战性提问归为一个"伪问题"。因为在大自然里,"风者气也",就如同尘埃、野马一样。其思想受邵雍象数学的影响很大。他在诗句里写道:

一尺清飙寄草堂,据梧挥处味偏长。②

徐敬德从天地万物实存的本体意义上来批判佛教,他主要针对佛教内禅宗的思想而展开阐释。他说:"禅家云,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有日真空顽空者,非知天大无外,非知虚即气者也。空生真顽之云,非知理气之所以为理气者也。安得谓之知性,又安得谓之知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此尽之矣。吾亦曰,死生人鬼,只是气之聚散而已。有聚散而无有,

① [韩]徐敬德《花潭集》卷一。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十四卷,1988年版。

② [韩]徐敬德《花潭集》卷一。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十四卷,1988年版。

无气之本体然矣。”徐敬德对佛教的批判比之其前辈要深刻，因为他是从世界观高度来批判佛教的；徐敬德对于性理学的建设也比其前辈有力，因为他一生都在研究《易经》和格物。其象数的排列也就是当时半岛思想家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

《花潭集》卷一所收诗歌里多有哲理。如《天机》《观〈易〉吟》等。徐敬德《观〈易〉吟》写道：

坎离藏用有形先，到得流行道始传。
羲画略摹真底象，周经且说影中天。①

徐敬德生在张载四百年之后，对于邵雍十分仰慕。他《观〈易〉偶得首尾吟，以示学〈易〉辈诸贤》之《又一绝》写道：

观物工夫到十分，日星高揭霁披氛。
自从浩气胸中养，天放林泉解外纷。②

李滉（1501—1570）《退溪全书》是朝鲜时代的巨著。在深入研究中国理学的基础上，退溪提出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的理论被称为是“理气二元论的理论。”他认为，人有恻隐之心，这就是“仁”之端；人有辞让之心，这就是“礼”之端；人有羞恶之心，这就是“义”之端；人有是非之心，这就是“智”之端。“仁”“礼”“义”“智”四端就是从“理”而衍生出来的。所谓“气”，也就是“性”。它可以发展为“七情”。它们是“喜”、“怒”、“哀”、“惧”、“爱”、“恶”、“欲”。因此，他要求多研究性理和《易》。

李珥（1536—1584），字叔献，号栗谷、石潭、愚斋，本贯德水。朝鲜大儒，著名性理学家。现今5000元韩币上为栗谷李珥画像。朝鲜成均馆内大成殿的东庑配享。有《栗谷全集》传世。李珥最大的贡献是驳斥了李滉的“理气二元论”，从而把半岛性理学的理论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

① ［韩］徐敬德《花潭集》卷一。收入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十四卷，1988年版。

② ［韩］徐敬德《花潭集》卷一。收入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十四卷，1988年版。

由其门人金长生撰写的《崇政大夫议政府右赞成兼弘文馆大提学、艺文馆大提学、知经筵春秋馆成均馆事栗谷李先生家状》记载说：

其为学也，以收心养性为本，而一于主静。遂暂染禅学，一朝释然开悟。去邪归正，醇如也。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道，无不皓穷玩索，洞见大原。体之于身心而推之于事为。纷华之中，自持愈严。屋漏之隐，谨独无愧。见识精诣，践履笃至。而每以为未足，勇往直前，唯恐不及。虽于世味，一切淡泊，而至应物处事，则条理详密，不遗锱铢。每日晨起，整齐衣冠，诣祠堂，焚香拜谒，退坐书室，涉览经传。尤喜《朱子大全》。尝患胃疾，故读书不喜出声。而若遇理会自得处，辄欣然朗读而止。自晨至夕，必有所事。或读书思索，或朋友讲论，或应接事物。非有疾病，未尝偃卧枕席。讲说道理，精微透彻，多阐先儒所未发者。

李珥对于性理学的兴趣，其实是高丽王朝就已经出现了的半岛文人兴趣的一种延续。郑麟趾《高丽史》里对此多有记载。高丽佞臣往往“不喜性理”，而忠臣重臣则往往相反。在金长生“试撮其大者而言之”的上述《家状》里，李珥的性理学思想被加以简明的概括：

云峰胡氏①以为性发为情，其初无有不善；心发为意，便有善不善。退溪先生以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胡氏以情意为二歧；退溪以理气为互发。而先生辨之曰：心之体是性，心之用是情。性之外更无他心。故朱子曰，心之动为情。情是感物所发底，意是缘情计较底。非情则意无所缘。故朱子又曰：意缘有情而后用。心之寂然不动者，谓之性；心之感而遂通者，谓之情；心之所感而演绎思量者，谓之意。然则心性果有二用，而情意果有二歧乎？五性之外无他性，七情之外无他情。孟子于七情中，别出其善情，目为四端。非七情之外别有四端也。情之善恶，夫孰非发于性乎？其恶者本非恶，只是掩于形气。有过不及而为恶。故程子曰：善恶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四端七情，果为二情。而理气果可互发乎？夫以心性为二用、四端七情为二情者，皆于理气有所未透故也。

① “云峰胡氏”，元朝文人胡炳文。胡炳文（1250—1333），字仲虎，号云峰，婺源人。其《四书通》在朝鲜半岛有很高的知名度。该书已收入《四库全书》。

凡情之发也,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理气混融,元不相离。若有离合则动静有端,阴阳有始矣。理者,太极也。气者,阴阳也。今曰"太极与阴阳互动",则不成说话。太极阴阳,不能互动。则谓理气互发者,岂不谬哉?

在这里,李滉的思想受到了李珥的批判。"理气二元论"在李珥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批判使用的是归谬法。李珥重申,理气混溶,不可分离。他引用朱熹的话,强调人欲因天理而发。如今李滉等人一定要把它们拆开,就变成了"太极与阴阳互动",成了谬论。在《家状》里,金长生继续归纳乃师李珥的性理学思想:

牛溪①以为朱子论人心道心,有"或生""或原"之语,似与退溪之意合。四七之与人心道心,虽其立言意味差有不同,皆其说性情之用耳。理气互发之说,非天下之定理,则朱子何以有"或生""或原"之说耶?先生曰:感动者固是形气,而其发也,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其源虽本乎天性,其发也,由乎耳目四肢之私。故主乎气,而目之以人心。人心、道心,只是一心,而随其发而异其名耳。若曰"理气互发",则是"理""气"二物,各为根柢于方寸之中。未发之时,已有人心、道心之苗脉。理发则为道心,气发则为人心矣。然则吾心有二本矣,岂不大错乎?退溪以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以此为先入之见,而以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主张而伸长之。夫心,必有感而动,而所感皆外物也。天下安有无感而由中自发之情乎?所感有正、有邪;其动有过、有不及,斯有善恶之分耳?今以恻隐言之。见孺子入井,然后此心乃发。所感者孺子也。孺子,非外物乎。安有不见孺子之入而自发恻隐者乎?就令有之,不过为心病耳,非人之情也。朱子之说,意必有在,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非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且言七情则四端在其中,非若人心、道心之相对立名也。曰道心,则非人心;曰人心,则非道心。故可作两边说,下矣。若所谓四端者,则只是七情中直出者也,何可谓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而分两边说乎?

---

① "牛溪"即朝鲜文人成浑。成浑(1535—1598),字浩原,号牛溪、默庵,本贯昌宁。著名性理学家,朝鲜文庙配享。有《牛溪集》传世。

在李珥看来,“人心、道心,只是一心”,人不能同时有两个心。一个人见到小孩子掉到井里了,他的恻隐之心生发出来,这个人乃是感外物而发恻隐之心。如果不感外物,他自己时时处处有恻隐之心,则心理上可能有问题了。但“恻隐”作为“道”则是长存的。不管这个人感不感外物。

李珥的得意弟子是金长生。金长生(1548—1631),字希元,号沙溪,本贯光山。金长生《沙溪遗稿》卷九是性理学作品,卷十是门生宋时烈整理的金长生“语录”。

收录于《沙溪先生遗稿卷三》的《答崔汝允命龙》是金长生与朝鲜文人崔命龙探讨“理”“气”之间关系的几封信。

崔命龙在信中首先提问:“《大学》首一节《明德》注下小注,北溪陈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气。理与气合,所以虚灵。栗谷先生驳之曰:理气元不相离,非有合也。理气虽不相离,决非一物。谓之合者,未见其有病。而栗谷之说如此,伏乞详辨下示。”崔命龙对于北溪陈氏“理与气合,所以虚灵”和栗谷先生李珥“理气元不相离,非有合也”这样针锋相对的观点表示疑惑,请求金长生给予解答。

金长生回答说:“理气元不相离,本混融而无间。若如陈氏之说,则人物未生时,理气相离。至其生育人物时,始与之相合,如阴阳男女之为,其可乎?朱子解太极图说‘妙合而凝’曰:本混融而无间。栗谷先生极赞美之。愚少时,误看太极图。以为始生时,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始合而凝。及闻先生之言,乃觉其误。陈氏之误,无亦如此耶?陈氏且以为,人得理气而虚灵,然则物独不得理气而蔽塞乎?夫人物通塞之分,只在于得气之正通偏塞之异而已,不在于合理气与否耳。陈说多有病处。栗谷之攻破似是矣。”显然,金长生是在捍卫栗谷李珥“理气元不相离”这样一个观点。

崔命龙在回信中,对于金长生的解释并不太满意。他说:“伏承下谕,直截明白。所当听顺勿违,而胸中之惑,终未能释然。张子之言,合字在上;陈氏之说,合字在下。在上者,人合之也;在下者,自相合也。两合字果不同。而既得气,则理便在其中。而自相合者,似两物异处而自彼来合者也。栗谷之驳之固宜。然理气虽混融无间,而理在气中,实不相杂则谓之合,亦无妨矣。而先生终始斥之,窃恐先生以老先生之言为主,而不更察陈氏之意也。”

对此,金长生比较满意。金长生认为崔命龙实际上是把栗谷李珥“理气元不相离”的观点做了细致的阐释。金长生认为,崔命龙看到了“理气

元不相离”背后的实质，即“理气虽混融无间，而实不相杂”。金长生进一步解释说：“所论陈氏之说，再三往复，尚未归一。陈说非徒理与气合者有病。人得理气合，所以虚灵云者，尤有病。夫物之蔽塞者，亦得理气而生。何独人得理气之故而虚灵乎？理与气合之说，虽非谓两物自彼而来合，然其下字则分明有病矣。前书吾贤引朱夫子之说曰，必得是理，然后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为魂魄五脏百体之身。朱子此说，盖欲明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得之于理。魂魄五脏百体之身，得之于气。是从人物已生之后，而指其性与身之所由来，故其立言如是。与陈氏之说，大不同也。《近思录》叶氏注曰：合理与气而成气质。栗谷先生亦尝非之矣。来书所谓理气虽混融无间，而实不相杂，则甚善。”

在《答李克钦德胤》中，朝鲜文人李德胤首先对“无极而太极”提问，然后他说：“太极者，理也。无终始，无死生。通物我，兼大小，则理无可尽之时。《中庸·不诚无物章》注曰：所得之理既尽，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然则理有间断之时耶？‘理’之一字，人皆曰‘予知’。如我管窥，反复思之，犹未洒然。伏愿高明详释字义，剖破大头脑处，以开困蒙之吝。如何？”

对此，金长生指出：“中庸注所谓所得之理既尽云者，是说各具之太极也。盖理挂搭于气而成此物，则亦有始终聚散之道。故其在此物者，必有时而散以终矣。盖是理非悬空独立之物，则须如此也。然若论其统体之太极，则岂有终始死生物我小大之理乎？”①

金长生《答或人问目》②是以书信形式展开的性理学问答。问：“缘情为意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惧等四者，及修身章之亲爱贱恶等五者，皆心之用也。而意之所发千百种，而《大学·诚意》章，只以好恶二者之意为言者。是何也？”

金长生答复说：“朱子曰，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如爱那物是情，所以去爱那物是意。又曰，情是动处，意则有主向。如好恶是情。好好色，恶恶臭便是意。总而论之，人之当喜而喜，当怒而怒，当哀而哀，当惧而惧，当爱而爱，当恶而恶，当欲而欲，是皆情之善者。于是乎以为善，而较计商量而行之者，是意也；不当喜而喜，不当怒而怒，不当哀而哀，不当惧而惧，不当爱而爱，不当恶而恶，不当欲而欲，是皆情之恶者。于是乎以为恶，

① ［韩］金长生《沙溪先生遗稿》卷三。

② ［韩］金长生《沙溪先生遗稿》卷三。

而较计商量而不行之者，是意也。大抵事虽万端，而不过善恶两者；意虽千变，而不出好恶二者而已。《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盖意缘情者也。情既如此，故意亦如此矣。孟子亦于《夜气》章，只以好恶二字揔括人心而言之。《礼运》《大学》及《孟子》之说，其可谓一以贯之矣。"

有后学问："诚意、正心，何别？"金长生答复说："诚意，真为善而实去恶之谓也。到正心地位，虽无善恶之可言，或不能无偏系留滞浮念之病。故必须敬而直之，使之常存。此正心诚意之别也。然正心最难，如温公可谓用力于诚意，而犹为念虑所搅扰，是心不得其正也。虽然，真诚意则去正心不远。而欲到真诚意地位，则必须格物致知，以尽心体之明。而后可到也。以此言之，温公致知不精，其所谓诚意者有所未尽，故其念虑搅扰，至于终夜不眠也。尝记花潭门人问曰：先生地位何如？花潭曰：到得诚意。未知花潭真到诚意地位耶？其自言曰，知到十分尽处。此则虽颜子有不敢言者。必其知有不尽，故不能自知其未到十分尽处，知既未尽则何以到真诚意地位也。"

宋时烈（1607—1689），字英甫，号右庵，本贯恩津。出生于朝鲜宣祖时期，1625年（朝鲜仁祖三年）开始，在金长生门下学习性理学。金长生死后，在其子金集门下完成学业。1633年，中生员试，任敬陵参奉。1634年他27岁时参加文科科举，为状元。1635年被任命为凤林大君之师。1636年，仁祖被清太宗围困于南汉山城，宋时烈正随侍于左右。"丙子胡乱"后金军俘虏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为人质，宋时烈坚决反清，辞官为学。孝宗即位后，被起用，随后被人密告而辞官。1658年为吏曹判书，旋辞。1678年被流配到德源、巨济等地，1680年放回。三年后与弟子不合引发分裂。1689年因反对淑仪张氏所生王子被封为元子被流至济州。同年6月，在押送回汉城的路上，被宫廷赐死。1694年恢复名誉，谥号"文正"。朝鲜英祖时，其学问得到宫廷的再次认可与褒奖。宋时烈得以与崔致远等从享成均馆文庙。《宋子大全Ⅰ－Ⅸ》包括目录二卷、原集二百一十五卷、附录十九卷，共一百零二册。

收录于《宋子大全卷五》的《己丑封事（八月）》是宋时烈的一篇长文："前司宪府掌令臣宋时烈，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百拜，上言于主上殿下：伏以臣闻，圣王之世，贤能在职，各效其忠智谋猷者，所以济治于上也。愚下

退野，谨守其礼义廉耻者，所以象治于下也。此其贤愚之途虽殊，而其为兴化之资则一也。故朱子曰：士大夫之辞受出处，岂独其身之事而已，乃关风俗之盛衰。”

在《己丑封事（八月）》一文里，宋时烈滔滔不绝，展开其性理学的精彩议论：

司马光为相，每询士大夫私计足否曰：若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轻去就耶？臣于此数语，早自服膺。每蒙恩眷，辄思退缩，以为讳愚而不讳僭，畏法而不畏义，是乃无耻之大者。身既无耻，何以事君？此志介石，终始不渝。故臣顷者退归之日，圣上之眷，极其隆重。英僚之挽，亦甚恳至，有为殊恩感泣，亦有以慢上訾责者。臣诚惶惑，不知攸措，而终窃以为强颜冒进，不足以报效万一，则只有以退为义，而窃自附于朱子所谓“关风俗”，司马所谓“为朝廷”者，庶几少寓愿忠之诚，故终于退而不敢留也。然而下来之日，眷顾天阁，不忍无言。敢留一疏，略伸微忱。蒙批旨，恳恻丁宁，有若父子间相语者然。因又闻殿下更遣礼官，以谕书及臣未归而勉留云。臣非鹿豕，何以为心，感悚兢惕，置身无地。

在宋时烈看来，“身既无耻，何以事君”。大臣必须要有羞耻之心，然后才能有为国家办事情的能力。如果仅仅考察能力而不管大臣的心性，那么就很危险。宋时烈强调，心性之事，关乎风俗。如果一个国家每个人都讲求的是利益，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高手，大家都朝自己怀里划拉，则大臣不成大臣，将军不成将军。当外敌入侵的时候，谁肯向前？大敌当前，举枪投降是最简单的事情。不要说是强敌，就是土匪来了，大家都默不作声，或者纷纷逃跑，郡县也就难以安宁了。要是一个国家充满了只顾自己的“聪明人”和“明白人”，这样，就会把朝前冲锋的军人看成是傻子。宋时烈最担心的，就是朝鲜会出现这样的风俗。

宋时烈特别关注君主对于臣子的眷顾之心。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为朝廷”君主必须适当的给臣下考虑到生活问题，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不管是臣子还是君主，其所作所为在宋时烈《己丑封事（八月）》一文看来，不外乎“正心诚意”四字：

昔，朱子将赴行宫，有要于路者，以为正心诚意之说，上所厌闻，戒以勿

言。朱子曰:吾平生所学,只此四字,岂敢回互而欺吾君乎?今臣不敢迁就他说,以负高明纯粹之圣学,故敢掇先儒之绪余,推衍为说如左。然正心诚意之说,本出先圣之训,平正精粹,初无新奇可喜之意。故汉唐之间,常屈于功利之谈。至宋之孝宗,则其初固尝喜闻矣。及朱子因其说而剖析于几微,指陈其得失之迹,而以为此非所以为正心之实云。故遂恶其韬瑕毕见,隐泐难掩。而其初之未尝不喜者,终至于未尝不厌也。故朱子于癸未奏事之后,与人书曰:初读第一奏,论致知格物之道,天颜温粹,酬酢如响。次读第二奏论复仇雪耻,第三奏论佞幸鸱张,言路壅塞,则不复闻圣语矣。然则孝宗之所尝喜之者,果欲验之身心之内,而施诸政事之实乎?徒以其出于古训而不得不喜也。其后戊申,朱子复以封事,更进其说。上已就寝,亟起疾读。盖是时,上既厌勤,欲以此为诒燕之谟。故其好之笃也如是矣。

在宋时烈看来,朱熹"正心诚意"之说,才是高明纯粹之理论。其他人的说法,皆不足取。在《己丑封事(八月)》里,他说:

故臣每以为,宋之不竞,由于其始之厌闻;而其不亡者,由于其终之好之也。后之俗学,乃以诚正之妙,推以置之于冥漠不可测知之域。而其所以施之政事文为者,则与此不相入,而别为一事。故从古帝王心法之要,终作笆篱边无用之物。悠悠千载,良可于悒。故臣常谓俗学之见,反不如恣人之智也。夫恣人之欲乱人国家者,必先坏人主之心术,然后行其巧乱之谋,无不如志。故仇士良教其徒,以为天子常宜娱以奢靡,勿使之读书亲近儒士,心知忧惧也。彼乃深知天下之事,不问善恶,无不本于人主之一心。而彼俗学者,乃不知以正心诚意为本,徒骋乎事为之末流,不亦舛乎?!故臣之所进,皆主乎殿下之一心。诚能持养于燕闲蠖濩之中,而省察于用人处事之间,则知天下虽广,兆民虽众,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而真得尧、舜、周、孔相传之要法矣。伏愿殿下深留睿意毋忽,则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在这里,宋时烈把国家的治乱归结为君主之一念,君主的心性是决定国家治乱、百姓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宋时烈的理论武器是朱熹"诚正"之说。问题就在于,宋时烈当时考虑的是君主与人民利益是完全一体化的利益,而君主则不一定做如是考虑。

宋时烈毕竟是读书人,他还要在自己的性理学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在

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者，主敬之事也；辨人欲而克之者，讲学之要也；明天理而复之者，主敬之功也。然则欲正其心者，舍是事何以哉？然帝王居常处邃密之中，接下喜渊默之体，其所以正心与不能之实，若不可得而窥者。而其符验之着于外者，则终有所不得而掩。不翅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可不惧哉?!

宋时烈和赵光祖等许多朝鲜文人一样，都是在死后才被尊崇为文化英雄的。他们的性理学理论，在其生前并不一定被当权者所接受。

丁若镛(1762—1836)是朝鲜王朝后期著名的文人，也是一位性理学家。他的《原教》从教育的角度论述了性理的本质：

爱养父母谓之孝，友于兄弟谓之弟，教育其子谓之慈，此之谓"五教"也。资于事父以尊尊，而君道立焉，资于事父以贤贤，而师道立焉，兹所谓生三而事一也。资于事兄以长长，资于养子以使众。夫妇者，所与共修此德，而治其内者也；朋友者，所与共讲此道，而助其外者也。然唯慈者，不勉而能之。故圣人之立教也，唯孝弟(悌)是训。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不去是也。由是言之，《大学》之"明明德"，明此二者也。《中庸》之"自诚明"，诚此二者也。"忠"之为言，尽此二者而实于己也；"恕"之为言，推此二者而及于物也。"格物致知"，格此二者而知所以先后也；"穷理尽性"，穷此二者而尽吾之性分也。二者诚乎心，谓之正心；二者诚乎身，谓之修身。昭明二者，以顺性命，谓之事天。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教也者，五教也。①

在丁若镛看来，教育说到底是出于人的"慈"。每个父母都天然的具有教育子女的本能，这样的"慈"是"不勉而能之"的。把这些不用训练就可以具有的本能开发出来，就是教育。而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接受父母的这些"慈"就是"孝"，接受兄长的教诲就是"悌"。圣人之立教，只要抓住了孝、悌这个总纲，就可以水到渠成了。丁若镛进一步发挥说，讲究孝、悌就是正心，"二者诚乎心，谓之正心"，心术不正，哪里还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①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诗文集第十卷《文集》。

讲究孝、悌就是修养，“二者诚乎身，谓之修身”。没有修养的人怎么能够算是受教育的人呢？讲究孝、悌就是对于上天怀有崇敬与畏惧之心，“昭明二者，以顺性命，谓之事天。”在丁若镛看来，所谓性理之“性”，也是性命之“性”。讲究孝、悌也就是在讲究性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理就是人的天性的张扬，就是作为父母、兄弟姐妹的自然人的本性的发挥。

朝鲜王朝的性理学抓住了朱熹的理论主张，把它们和半岛的实际结合起来，其理论探讨的成就在当时的东北亚是很突出的。朝鲜半岛的性理学本来是要和高丽末期的佛学相抗衡，并为朝鲜王朝的统治奠定理论基础的。就汉学的意义而言，郑梦周、李珥、金长生、宋时烈等文人要拨乱反正，把汉学从谈佛参禅的斜路上拉回到箕子所开创的正途上来。但到了朝鲜王朝的末期，这种理论也逐步丧失了其战斗性和生命力，成了落后于朝鲜实学的纸上谈兵。正如韩国电影《义士安重根》[1]主人公的台词所说：“空谈性理，有什么用！”

① 安重根刺杀朝鲜总督伊藤博文，被朝韩人民视为民族英雄。

第三章 “燕行录”的汉学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古代出使中国的高丽、朝鲜使节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文字。这些书统称“燕行录”。“燕行录”的写作前后相继达700年之久。它们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外国文人记录中国的超大型文库。“燕行录”是用汉字记录下来的朝鲜使节团中文人的日记，内中有散文也有诗歌。其原文多散见于高丽和朝鲜文人们的诗文集内。韩国林基中教授编选的《“燕行录”全集》有100卷之巨。

高丽与朝鲜文人的“燕行录”，不仅是值得解剖的“书写中心主义”范本，还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中国人文地理记录。可惜这些文字有相当部分是未经排印的手稿，还有一大部分是古籍的影印。

“燕行录”所涉及陆路沿途站点本身，就值得深入研究。这里，我们仅以朝鲜王朝“燕行录”陆路主要路线为线索，介绍一下它们所涉及我国辽宁、河北、天津、北京的具体地名。该路线线索主要载于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和朝鲜文人柳寅睦(1839—1900)《北行歌·路程记》(燕行时间1866年)。韩国林基中教授《“燕行录”研究》里有墨书原作的影印，比较清楚。[①] 朝鲜文人李海应(1775—1825)《薊山纪程》(燕行时间1803—1804年)附录《道里》为我们的考察底本。《薊山纪程》是作者用毛笔书写的书稿，并未付印。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的《“燕行录”选集》和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的《“燕行录”全集》皆为影印版。故下文注释里称其为“原稿”。该书稿载，

① [韩]林基中《”燕行录”研究》，第68-81页，一志社，2002年初版，2006年增补版。

鸭绿江是中国与朝鲜的界河。

朝鲜

自京[1]历高阳、坡州、长湍、松都、金川、平山、葱秀、瑞兴、剑水、凤山、黄州、中和、平壤、顺安、肃川、安州、嘉山、定州、郭山、宣川、铁山之车辇、龙川之良策、义州之所串，至湾府[2]。凡二十四店，共一千五十里。[3]

中国辽宁省

鸭绿江五里，小西江一里，中江四里，方陂[4]浦五里，九连城四里（古镇江府。原稿注）。共二十四里。

恒头河子二里，九连城站四里，望隅八里，者音卜四里（一名虾蟆塘[5]。原稿注），碑石隅二里（有没字碑。原稿注），松隅三里，马转板一里（一名沙窝子。原稿注），石隅五里，金石山[6]七里，中衙门三里（一名质光岘。原稿注），汤他子[7]五里，干浦三里，细浦七里，柳田二里，汤站九里（一名汤山城[8]。原稿注），葱秀站三里。共六十八里。

鱼龙堆一里（一名知他尔。原稿注），车逾獐项二里（一名沙平。原稿注），王八石[9]十里，上龙山三里，栅门十里。共二十八里。

自义州至栅门。共一百二十里[10]。

---

① 京，王京。即汉城（今韩国首尔市）。

② 湾府，朝鲜义州府。

③ 此次朝鲜使节团在其国内的运动路线，基本是现今贯通南北朝鲜（大韩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京义铁路”沿线。

④ “陂”同“坡”。

⑤ 虾蟆塘，即今丹东市蛤蟆塘镇。在201国道沿线。

⑥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说，“金石山”一名“顶石山”。

⑦ 原稿“他”当为“池”字。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说，“汤池子”即“温井坪”。

⑧ 汤山城，现今的汤山城镇。离沈丹高速公路不远。

⑨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王八石”一名“孔丛”。但朝鲜文人柳寅睦（1839—1900）《北行歌·路程记》（燕行时间1866年）记载说“王八石”一名“孔岩”。

⑩ 这一段路线基本与现今的铁路线一致。李海应等从九连城经过五龙背、汤山城到达边门。

安市城[1]五里，榛坪二里，凤池四里，旧栅门三里，凤凰山十二里，凤凰城[2]四里。共三十里。

三叉河六里，二台子四里，干子浦十里（一名余温子介。原稿注），四台子一里，伯颜洞九里（元伯颜驻军处。原稿注），麻姑岭十里，松站十里（古镇东堡。一名薛站[3]，又雪里站[4]。原稿注）。共五十里。

小长岭五里（一名阯子岭[5]。原稿注），瓮北河五里（一名三家河。原稿注），大长岭五里（一名长岭子。原稿注），刘家河[6]八里，黄家庄二里。共二十五里。

八渡河五里（一名金家河。原稿注），獐项一里，林家台[7]九里（一名金鸡河。原稿注），范家台五里，二道方身五里，通远堡[8]十里（古镇夷堡。原稿注）。共三十五里。

石隅五里，和尚庄八里，草河口桥[9]十里，畓[10]洞二里。共二十五里。

分水岭十五里，高家岭六里，俞家岭四里，连山关[11]五里（原稿注：古鸦鹘[12]关）。共三十里[13]。

---

① 安市城在今辽宁海城市。海城的英城子山城才是安市城旧址。朝鲜使节团见到的是今“高句丽山城（乌骨城）”。参见魏存成《高句丽遗迹》，第78、109－110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凤凰城，今凤城市区。

③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松站”一名“薛刘站”。

④ 该地今名“薛礼站”。在304国道附近。

⑤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把该地记为“少长岭”，并称其一名“阯岭子”。朝鲜文人柳寅睦（1839—1900）《北行歌·路程记》（燕行时间1866年）记录说“小长岭”一名“阯岭子”。“阯”同“陡”。

⑥ 现今“刘家河”是304国道沿线的大站。

⑦ “林家台”地名至今未变，在304国道附近。

⑧ “通远堡”当是今“老通远堡”。在304国道附近至今还有“通远堡”。

⑨ 今304国道沿线有“草河口”。属本溪市。

⑩ “畓”是朝鲜汉字，“水田”的意思。但从原稿作者李海应的记载看，此字在清朝中国即有。

⑪ 此次朝鲜使节团从蛤蟆塘至连山关，走的是今304国道沿线。

⑫ “鹘”读“湖 hú”。

⑬ 朝鲜使节团多沿着现今304国道（沈丹高速公路）沿线行进。

会宁岭[1]二十里，甜水河十七里，甜水站[2]三里。四十里。

青石岭十里，小石岭五里，狼子山十五里。共三十里。

摩天岭八里（西有唐太宗时驻跸[3]山、马蹄山。原稿注），头关站[4]八里，三流河四里，王祥岭十里，石门岭[5]四里，王宝台[6]六里（有冷井。原稿注）。四十里。

高丽丛十里，阿弥庄五里，木厂[7]五里，太子河九里（燕丹走死处。原稿注），迎水寺[8]一里。自栅至此东八站[9]。共三十里。

接官厅[10]十二里，防虚所六里，三道把五里，烂泥涂[11]五里。共二十八里。

万宝桥六里，烟台河堡[12]四里，山腰[13]铺五里，五里台[14]五里，十里河堡[15]七里。共二十七里。

板桥堡[16]五里，长盛站五里，古家子五里，沙河堡[17]六里，暴交哇六里，毡匠铺四里，火烧桥二里，白塔堡[18]八里。共四十里。

---

①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说，“会宁岭”一名“大古岭”。

② 从连山关开始，朝鲜使节团走向现今自本溪市到辽阳市的省道。“甜水”之名，至今尚存。

③ “驻跸”，君主、后妃出外于途中暂停小住。“跸”读“毕 bì”。

④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说，“头关站”一名“通家庄”。

⑤ 今望宝寨附近有上门岭。

⑥ “王宝台”即今辽阳市的“望宝台”。在汤河风景区附近。

⑦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此地为“木厂铺”。

⑧ 迎水寺在今辽阳市的东京陵附近。

⑨ 朝鲜燕行人员经常说到“东八站”，但原稿作者李海应的交代不甚清楚。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说，“自栅至此称东站”。

⑩ 接官厅在今灯塔市。其附近是张台子。

⑪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此地为“烂泥堡”。此地今名“乱泥铺”。

⑫ “烟台河堡”今名“大路烟台”。

⑬ 该地今名“山岳堡”。“山腰”也许即“山药”。我国许多小地名都是最早的居民取的。他们没有什么文化，所取名往往不太文雅。但这些名字十分贴切，也很生动。经官府整理以后，比较雅致，却往往不符合原来的地理和人文特征。

⑭ 该地今名仍是“五里台”。

⑮ 该地今仍名“十里河”。

⑯ “板桥堡”今名“板桥”。

⑰ 该地今名仍然是“沙河堡”。

⑱ “白塔堡”今名“白塔”。

一所台五里，浑河堡[1]五里，浑河一里（一名耶里江。原稿注），沈阳九里（奉天府、盛京。原稿注）。共二十里。

自栅门至沈阳。共四百四十五里[2]。

愿堂[3]寺五里，塔桥[4]七里，方士村五里，壮元桥七里，永安桥八里（筑路推此[5]。原稿注），共三十里。

双家子七里，大方身十里，磨刀桥五里，白边站[6]十里。共三十里。

神农站十二里，孤家子[7]十三里。共二十五里。

周流河十里（一名巨流河。原稿注），巨流河堡五里。共十五里。

西店子二里，五道河三里，四方台七里，郭家屯四里，新民屯[8]四里，小黄旗堡四里，大黄旗堡八里。共三十二里。

柳河沟[9]八里，石狮子[10]十五里，营房十里（一名古城子。原稿注），白旗堡五里。共三十八里。

小白旗堡十二里，新方五里，一板门十三里（一名半拉里[11]。原稿注）。共三十里。

---

①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说，“浑河堡”一名“红花铺”。

② 从连山关到沈阳，朝鲜使节团的行走路线基本是今本溪到辽阳再到沈阳的省道。

③ 愿堂，有权势或金钱的人为许愿而捐助的佛寺或佛寺中的某一殿堂。原稿作者李海应本书中所说，多属御愿堂、朝廷愿堂。这些地方不仅没有任何徭役和赋税，而且还得到朝廷的资助，通常有宫廷赐予的土地。

④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说，“塔桥”一名“塔院”。

⑤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载为“筑路始此”。即从此始有筑路。

⑥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说，“白边站”一名“老边站”。此地即今之“老边城”。

⑦ “孤家子”今名“胡家”。

⑧ 从沈阳过今“永安石桥”，李海应一行出沈阳西北，过大房身（大方士）、老边，渡过辽河，往现今的辽宁省新民市走去。这一段路程，他们基本与现今的304国道并行。在新民，朝鲜使节团一行上的是现今102国道。该路线一直通往北京的通州。

⑨ 该地现今有“柳河大桥”。在102国道上。

⑩ 现今102国道沿线有“大石狮子”。

⑪ 原稿“半拉里”有误。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说，“一板门”一名“半拉门”。现今102国道沿线有“半拉门镇”。

靠山屯八里(一名王家庄,又有王八盖字①。原稿注),二道井子十二里。共二十里。

神隐寺八里,新店二十二里(一名胡家窝棚②。原稿注)。至此,筑路止。共三十里。

土子井二里,十里扛子③八里,烟台④五里,小黑山五里。共二十里。

羊肠河十二里,中安堡⑤十八里。共三十里。

于家垡⑥五里,朝阳铺⑦三里,八望台三里,旧店里三里,二台子六里,古家子⑧三里,大古家子五里,焦家店五里,广宁站五里。共三十八里。

兴隆店五里,双河堡五里,北镇堡⑨五里,常兴店五里,三台子二里,二台子六里,阁阳驿⑩十二里(无梁屋始此。原稿注)。共四十里。

二台子⑪十里,三台子⑫五里,四台子五里,五台子⑬五里,望山堡⑭五里,石山站⑮十里(一名十三山。原稿注)。共四十里。

三台子四里,秃老婆店八里(一名二台子。原稿注),大凌河⑯十三里,大凌河堡⑰五里。共三十里。

---

① 原稿"又有"当为"又名";"字"当为"子"。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说,"靠山屯"又名"王家庄、王八盖子"。

② "胡家窝棚"当为今天的"胡家镇"。在102国道沿线。

③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也把此地记载为"十里扛子"。

④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说,"烟台始此"。

⑤ 中安堡今为"中安镇"。在102国道沿线。

⑥ "垡",地名用字。《元史·河渠志·浑河》有"落垡村"。韩国首尔大学冠岳校区附近有"落星垡"。

⑦ "朝阳铺"今名"朝阳堡",在102国道沿线。

⑧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说,"古家子"一名"鞑子店"。

⑨ 北镇堡即今北镇市。

⑩ 原稿"阁阳驿"有误。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为"间阳驿"。此地即今102国道沿线的间阳镇。

⑪ 现今102国道沿线有"小二台子"。

⑫ 该地现名"三台子镇"。在102国道沿线。

⑬ 该地今名仍为"五台子"。

⑭ "望山堡"今名"望山铺",在102国道沿线。

⑮ 该地现名"石山镇"。

⑯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大凌河"作"大陵河"。

⑰ 大凌河堡即今凌海市。该市内有大凌河街。

四同碑[1]十二里，双阳店[2]八里。共二十里。

小凌河堡五里，小凌河桥[3]三里，西店子一里（一名水手营。原稿注），松山堡[4]十四里，官马山十三里（有官马冢。原稿注），杏山堡[5]五里，十里河八里，高桥堡[6]十里。共五十九里。

朱家堡[7]二里，红旗营[8]五里，塔山所[9]五里（天晴时，望鸣呼岛。原稿注），朱沙河五里，罩罹店[10]二里，罩罹山[11]一里，二台子四里，连山驿[12]六里。共三十里。

烟台河五里（一名五里河。原稿注），长春河五里，双树堡[13]一里，双石岭一里，干柴岭一里，东八里堡[14]八里（望鸡鸣山，山有呕血台。原稿注），东头台二里，永宁寺一里，宁远卫[15]五里。共三十里。

青墩台六里（观日出。原稿注），曹庄驿[16]六里，七里陂[17]六里，五里桥

---

① “四同碑”今名“四桶碑”。附近有“四桶村”。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说“四同碑”乃“明将王平父子敕文之碑”。

② “双阳店”今名“双羊镇”。在102国道沿线。

③ 现今102国道上有“小凌河大桥”。在锦州市百股车站附近。1875年，日本人曾根俊虎在此地过河并画了图。并注明“人户十四五，叫小绫河村”。参见［日］曾根俊虎《北中国纪行 清国漫游志》中译本第58－59页，范建明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张明杰主编《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④ “松山堡”现为“松山镇”。在102国道附近。

⑤ “杏山堡”即今“杏山”。在102国道附近。朝鲜文人金诚一（1538—1593）《鹤峰集》续集卷一燕行长诗《朝天纪行》有“驰车杏山虎穴近，沿路一带成长坑”诗句，说明女真人已经在这里扎下了营寨。

⑥ “高桥堡”今名“高桥镇”。在102国道沿线。

⑦ “朱家堡”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为“朱家店”。现今此地有“朱家洼”。

⑧ “红旗营”即现今“大红旗营”。在102国道沿线。

⑨ 今102国道附近有“塔山”。

⑩ “罩罹”即“笊篱”，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载说，“罩罹店”有三义庙。

⑪ 今102国道沿线有“笊篱山”。

⑫ 连山驿在今葫芦岛市区。

⑬ “双树堡”今名“双树铺”，在今葫芦岛市区。

⑭ “东八里堡”当即今“东八里村”。

⑮ 宁远卫即今辽宁省兴城市。

⑯ “曹庄驿”今名“曹庄”。在102国道沿线。曹庄驿站是明清两朝来北京的朝鲜使节团必经之地。

⑰ 原稿有误。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此地为“七里坡”。“陂”读“坡 pō”。该地现仍名“七里坡”。

七里，中右所五里（一名沙河所[1]。原稿注）。共三十里。

干沟台三里，烟台河[2]五里，半拉店五里，望海店[3]二里，曲尺河[4]五里，三里桥七里，东关驿三里。共三十里。

二台子[5]五里，三台子五里，六渡河桥[6]五里，中后所三里，一台子五里，二台子四里（有废烟台，观日出。原稿注[7]），三台子[8]三里，沙河站[9]六里，双墩台四里，板桥四里，叶家坟[10]四里，口鱼河屯二里，口鱼河桥[11]三里，亮水河[12]七里。共六十里。

满井铺四里，前屯卫[13]四里，王家台五里，望江台三里，王济沟四里，头封河五里，高岭驿[14]五里，小松岭沟三里，大松岭沟[15]五里，中前所[16]七里。共四十五里。

大石桥七里，两水湖[17]三里，老军屯[18]五里，王家庄二里，八里堡[19]十里（有姜女庙。原稿注），四方城子五里（有将台。原稿注），二里店一里，山

---

① “沙河所”今名“沙后所”，在102国道沿线。

② 现今102国道上有“烟台河桥”。

③ 该地102国道附近有“望海满族乡”。

④ “曲尺河”今名“曲河桥”，在102国道沿线。其附近的地名为“曲河”。

⑤ 现今102国道沿线仍有地名“二台子”。

⑥ “六渡河桥”当即现今102国道上的“六股河大桥”

⑦ 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里，“有废烟台，观日出”七个字注在前“二台子”下。看来是原稿作者李海应把姜柏年的文字抄错位置了。

⑧ 现今过绥中县县城以后的102国道沿线仍有地名“三台子”。

⑨ 现今102国道上有“沙河站桥”。

⑩ “叶家坟”今名“叶家”，在102国道附近。

⑪ 现今102国道上有“狗河大桥”。狗河是主要流经辽宁省绥中县的一条河流，也是我国唯一以“狗”命名的河流，对于研究十二生肖有重要意义。

⑫ 今102国道附近有“凉水村”。

⑬ “前屯卫”今名“前卫镇”。在102国道沿线。朝鲜文人尹根寿（1537—1616）《月汀集·月汀朝天录》之《吊杨忠壮公庙》载：“杨照庙在前屯卫”。明朝嘉靖年间广宁总兵杨照（？—1563）是在与后金军作战时阵亡的。朝鲜文人赵宪（1544—1592）《重峰集》卷十《朝天日记》“七月十七日”有详细记载。

⑭ “高岭驿”今名“高岭镇”，在102国道沿线。

⑮ 原稿作者李海应把“小松岭沟”“大松岭沟”的前后位置搞反了。大松岭沟在102国道沿线。

⑯ “中前所”今名“前所镇”，在102国道沿线。

⑰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把此地记录为“雨水湖”，看来原稿作者李海应的“两水湖”更贴切些。该地现有“凉水河子”，在102国道沿线。

⑱ “老军屯”地名至今未改，在秦皇岛市102国道沿线。

⑲ “八里堡”地名至今未改，在102国道沿线。

海关二里。共三十五里。

自沈阳至山海[1],七百八十七里。

河北省

深河一里,五里台[2]四里,红花店[3]三里(墩台始此。原稿注)。共八里。

栾家岭二里,吴家茔[4]四里,二十里堡洼六里,范家庄十里,汤河堰三里,大理营[5]七里(一名浪河。原稿注),王家岭[6]二里,凤凰店[7]三里。共三十七里。

望海店[8]十里,深河驿[9]五里,高台岭堡八里,纲子店[10]二里(一名王家店。原稿注),马棚山六里,石子河一里,榆关[11]三里。共三十五里。

宋家庄三里,上白石堡三里,下白石堡[12]三里,吴家岭四里,抚宁县[13]八里(文笔峰在西南。原稿注),羊河[14]一里,五里堡四里,卢家店二里,十里台堡三里,芦峰口[15]五里,茶棚庵[16]六里,饮马河三里,背阴堡[17]三里。共四十七里。

---

① 山海,指山海关。

② 秦皇岛市高建庄乡有五里台,在102国道沿线。

③ "红花店"今名"红瓦店",在102国道沿线附近。

④ "吴家茔"当即今秦皇岛市富家营。该地在港城大街东头。

⑤ "大理营"今名"大里营村",位于秦皇岛市海阳镇西,在102国道沿线。

⑥ "王家岭"今名"西王岭",在102国道沿线。

⑦ 该地至今仍名"凤凰店"。在102国道沿线。

⑧ "望海店"至今仍未改,在102国道沿线。

⑨ "深河驿"今名"深河乡",在102国道沿线。

⑩ "纲子店"今名"往子店",在102国道沿线。

⑪ "榆关"今名"榆关镇",在102国道与京沈高速公路之间。

⑫ "下白石堡"今名"下白石铺",在102国道与京沈高速公路之间。

⑬ 抚宁县县城在今抚宁镇,在102国道沿线。

⑭ "羊河"今名"洋河",在抚宁县城西。

⑮ 该地至今还叫"芦峰口",在102国道沿线。

⑯ "茶棚庵"今名"茶棚镇",在102国道沿线。

⑰ "背阴堡"今名"背阴铺",在102国道沿线。

双望堡[1]八里，吴鞑子店三里，腰站[2]三里，部落岭[3]五里，二十堡[4]二里，十八里堡[5]三里，白沙河七里，驴子槽[6]八里，漏泽园三里，永平府[7]二里（古右北平。原稿注）。共四十四里。

青龙河[8]一里，南坵[9]店四里，滦河一里，鸭子河四里，范家店六里，望夫台[10]四里，安河店[11]八里，赤红堡[12]六里，野鸡坨[13]六里。共四十里。

沙河屯[14]八里，张家庄八里，沙河驿[15]四里。共二十里。

红庙[16]五里（一名三官庙。原稿注），马铺营[17]五里，七家岭五里，新店子五里，干河草[18]五里，王家店[19]五里，新平店四里，张家店二里，扛牛桥四里，莲花池一里，青龙桥九里，榛子店[20]一里。共五十里。

烟墩台十里，白草洼七里，铁城坎三里，牛栏山五里，小铃河四里，板桥[21]一里，银城堡[22]五里，五里台十里，丰润县[23]五里。共五十里。

---

① “双望堡”今名“双望镇”，在102国道沿线。

② 该地至今仍名“腰站”，在102国道沿线。

③ 该地至今仍名“部落岭”，在102国道沿线。

④ 原稿“二十堡”有误。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此地为“二十里堡”。

⑤ “十八里堡”今名“十八里铺”，在102国道沿线。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注“十八里堡”说“古卢龙塞”。

⑥ 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驴子槽”下注“发驴槽”。

⑦ 永平府治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县城。

⑧ 青龙河在卢龙县西，102国道上有大桥。

⑨ “坵”同“丘 qiū”。

⑩ “望夫台”今名“望府台”，在102国道沿线。其南面是油榨镇。

⑪ “安河店”今名“西安河”，在102国道沿线。

⑫ “赤红堡”今名“赤峰铺”，在102国道沿线。

⑬ “野鸡坨”今名“野鸡坨镇”，在120国道沿线。

⑭ “沙河屯”当即今“沙窝铺”，在102国道沿线。

⑮ “沙河驿”今名“沙河驿镇”，在102国道沿线。

⑯ “红庙”今名“红庙子”，在102国道沿线。

⑰ 该地至今仍名“马铺营”，在102国道沿线。

⑱ 该地至今仍名“干河草”，在102国道沿线。

⑲ “王家店”今名“王店子镇”，在102国道北面。

⑳ “榛子店”今名“榛子镇”，在102国道沿线。

㉑ “板桥”之名至今未改，在102国道沿线。

㉒ “银城堡”今名“银城铺”，在102国道沿线。

㉓ “丰润县”即今唐山市丰润区，在102国道沿线。

赵家店五里，张家店一里，还乡河二里，鲁家店二里，高丽堡[1]五里（有水田。原稿注），沙子河五里，软鸡堡五里，新坊[2]三里，李家店五里，沙流河[3]七里。共四十里。

两水桥十里，两家店[4]五里，二十里堡[5]五里，十五里屯[6]五里，东八里堡[7]七里，龙池庵三里，玉田县[8]五里。共四十里。

西八里堡八里，黄家店七里，彩亭桥[9]五里，大树枯店[10]一里，蜂山店四里，螺山店[11]三里（一名宋家庄。原稿注），梯子山七里，鳖山[12]五里。共五十里。

天津（段家岭至燕郊今属河北省）

二里店[13]二里，现渠八里，三家庄三里，云田寺[14]四里，翠屏山[15]三里，八里堡[16]二里，渔阳桥三里（一名东五里桥。原稿注），贯日庄二里，蓟州[17]三里（古渔阳，北有盘山。原稿注）。共三十里。

五里桥[18]五里，徐家店十里，邦均店[19]十五里。共三十里。

---

① "高丽堡"今名"高丽铺"，在102国道沿线。

② 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载，"新坊"一名"茶棚庵"。

③ "沙流河"今名"沙流河镇"，在102国道沿线。

④ "两家店"今名"亮甲店镇"，在102国道沿线。

⑤ "二十里堡"今名"二十里铺"，在102国道沿线。

⑥ "十五里屯"今名"十五里铺"，在102国道沿线。

⑦ "东八里堡"今名"东八里铺"，在102国道沿线。现今在玉田县城东面。

⑧ 该地即今河北省玉田县县城玉田镇。

⑨ 该地至今仍名"彩亭桥"。在102国道沿线。

⑩ 原稿"大树枯店"当为"大枯树店"，即今102国道沿线的孤树镇。而且，其后有缺失文字。朝鲜文人姜柏年（1603—1681）《燕行路程记》（燕行时间1660年）记录为"大枯树店十里，小枯树店一里"。

⑪ "螺山店"今名"后螺山"，在102国道沿线。

⑫ "鳖山"今名"别山镇"，在102国道沿线。属天津市蓟县。

⑬ 该地现今仍名"二里店"，在102国道北面。

⑭ "云田寺"今名"大云泉寺"与"小云泉寺"，在102国道北面。离天津市蓟县县城很近。

⑮ "翠屏山"地名至今未改，在今天津市蓟县县城中昌北路的东面。

⑯ "八里堡"今名"八里铺"，在今天津市蓟县县城中昌北路的东面。

⑰ 蓟州，今天津市蓟县县城。其鼓楼一带是古代朝鲜使节团经常流连的地方。

⑱ 该地至今仍名"五里桥"，在天津市蓟县县城西面。其附近是"建材大世界"。

⑲ "邦均店"今名"邦均镇"，在102国道沿线。属天津市蓟县管辖。

白涧站[1]十二里(有尼姑庵。原稿注),公乐店五里,段家岭[2]三里,石碑铺十里,滹沱河[3]五里(一名错河桥[4]。原稿注),三河县[5]五里(古临驹县。原稿注)。共四十里。

枣林庄六里,白浮图[6]六里,新店六里,皇亲庄六里,夏店[7]六里,柳河屯[8]六里,马起乏[9]六里(一名马起铺。原稿注),燕郊堡[10]八里。共五十里。

北京

方家庄三里(一名师古庄。原稿注),滕家庄五里,胡家店五里,习家庄二里,白河二里,通州[11]一里。石路始此。共十七里。

八里桥八里(一名永通桥。原稿注),管家庄二里,杨家闸二里,三间房三里,定府庄三里,大王庄二里。共二十里。

太平店二里,十里堡三里,八里堡二里,红门三里,弥勒院三里,东岳庙五里,朝阳门二里(一名齐华门[12]。原稿注)。共二十里。

自山海关至皇城六百六十七里。通计为三千六百九里。

以上就是现存"燕行录"作者经过次数最多的燕行路线。"燕行录"的作者们几乎经过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有记录。即使是一个很小的村子。而在这些记载中,往往会出现中国史家忽略不计的内容。就以上述燕行路线的书写者、朝鲜文人李海应的《蓟山纪程》来说,该书的记载多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如李海应在沈阳所记录与程伟元的会见,在北京求见纪晓岚与在

---

① "白涧站"今名"白涧镇",在102国道沿线。属天津市蓟县管辖。

② "段家岭"今名"段家岭镇",在102国道沿线。属河北省廊坊市下属的三河市管辖。

③ 滹沱河,河北省西部的河流。"滹"读"呼 hū"。

④ 参见[清]和珅 等《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七"错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三河县"今名"三河市",在102国道沿线。属河北省廊坊市管辖。

⑥ 该地至今仍名"白浮图",在102国道沿线。

⑦ "夏店"今名"夏垫镇",在102国道沿线。

⑧ 该地至今仍名"柳河屯",在102国道沿线。

⑨ 该地至今仍名"马起乏",在102国道沿线。

⑩ 燕郊堡即今河北省三河市的燕郊镇。

⑪ 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

⑫ 原稿"齐华门"当为"齐化门",

圆明园内的生活记录等。在“程伟元书斋”一节里，他写道：号小[1]能诗文字画，家在城内西胡同。因沉[2]教习仕临[3]，往见之。程出，肃延座。题一绝曰：

国语难传色见春[4]，雅材宏度尽精神。
贱生何幸逢青顾，片刻言情尽有真。

程本系河南籍，伊川先生[5]三十一世孙，见[6]授沈阳学掌院。

郢下[7]歌成白雪春，主人情致憺[8]怡神。
逢迎诗席匆匆话，莫辨浮生梦与真。

其中“郢下”之句是李海应的和诗。李海应记载的时间是“初六日，晴。永安桥三十里午餐。白边站三十里宿。”。而按其原稿的书写体例，当为“初六日丁卯”。这一天是1804年1月18日。林骅先生2007年4月10日在天津《今晚报》上介绍我整理《蓟山纪程》书稿时，专门论及的就是这一段文字。但林骅先生把李海应与程伟元会见时间说成是1803年，有误。

由于高丽和朝鲜文人尊崇箕子，他们在经过河北省卢龙县的时候都特别在意。那里是古孤竹国，是伯夷、叔齐和箕子的故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朝鲜文人们反复记录卢龙的箕子庙和太公庙，时代的变迁也在这些“燕行录”的文字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崇祯丙子六月”出发来中国的潜谷金堉曾任领议政（首相），其1636年出使中国之”燕行录”，即《潜谷遗稿》

---

① “号”当为“字”，“小”后当缺一“泉”字。但也许是原稿作者李海应在整理日记时搞不清楚程伟元的情况了，因此含糊写成了“号小能诗文字画，家在城内西胡同”。

② “因沉”是醉心于（某项事业）的意思。

③ “仕临”，即将做官（的学业准备）。这句话的意思是，程伟元很投入地在这里为那些即将做官的人讲学。

④ 这句的意思是，尽管不能用口语对话，但彼此的表情还是很愉快的。国语，指汉语（与朝鲜语）口语。

⑤ “伊川先生”即北宋著名学者程颐。程颐（1033—1107），河南洛阳人。北宋理学家，程颢之弟。有《程颐文集》等著作传世。

⑥ “见”通“现”。

⑦ “郢”读“颖 yǐng”，地名。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江陵附近。

⑧ “憺”读“但 dàn”，安然，平和。

卷十四之《朝京日录》。这一年，后金军队逼近昌平和武清，大明朝岌岌可危。金堉记载说：

山海关以西所经州县，贼兵皆不入。只见村落野店，或有焚掠处，而亦不多也。居民旋皆收葺，宛然如旧。永平府以东至北京，只是一野。村阎连络，烟火相接，山无寸木。而原野则树木蓊郁成林，皆是杨柳、白杨、枣栗之类。而枣栗则列植田中，成行绳直，无尺寸荒地，而全无水田。只高丽村前，有似水田者一处。路上商旅络绎不绝，十数为群，所骑所驮，非驴则骡。大车则驾十余，或五六头；小车则或牛或驴二三头；挽辂则独轮而一人推之，所载则一马之驮也。载重则前有一人挽之，加重则驾以驴骡。前挽者执鞭以驱。室屋则皆以土厚覆上，又平坦而雨下不漏云。贼虽焚烧，火不易爇，且无连烧之患矣。贼兵得于内地者甚多，故急于归冗，不顾诸城而去。然去通州只三四里，去皇城只七八里而不入，亦危甚矣哉。中朝最尚异教淫祀，每村必有一寺，或有三四者。谓之“庙堂”。每朔望焚香礼拜。城中亦有庙堂数处。宁远则所谓天平寺者，乃祖总兵之愿堂也，最大而丽。军门、太监以下皆往烧香礼拜。所过路旁、城堡、村庄，皆有庙堂。僧徒、道士与村人相半而行。关王庙谓之“敕封三界伏魔大帝庙”，无处不有。又有玉皇庙、玄帝庙、碧霞君庙、天妃圣母庙、西王母庙、火神庙、马神庙、马明王庙、泰山行宫三官庙等，名号不可胜记，皆以金字扁额。过者入则必拜，无贵贱皆然。登科显职之人，必建牌楼于大道中。古以木为之，近来则以石为之。中立正门，左右有夹。上有三层楼，题其名姓，填以泥金，五采丹青。石上亦施彩色，画以异兽奇花。乡宦之家，则各书职名扁额门首。若尚书、太史、天官、青锁、祭酒、铜章之类，不可胜计，皆以金碧填之。各驿各堡，皆有城。大村庄则亦有城。至于太监农庄亦筑方城者，有之。皆以甓筑之，以甓为虹门矣。人死则不葬于山，葬于野田中，或路旁平地。坟形锐甚，如艾炷。年年取土一锸，加于其上，谓之“加土”。以此益高益锐。不用莎覆。士大夫则四面筑墙，前开一门。此所谓“神道墓门”也。墙内坟如立葱，多者数十，少者六七。树以白杨老柯。门额题曰“某官、某人之先茔”。自通州至北京，夹路左右，皆墓门也。与村阎相杂。不在路旁者，又何可胜计哉。祭则必烧纸钱，坟面多被爇。且以红纸为小旗，插于坟顶。纸钱者，或以金、或以银，涂在纸上，造如杯盂状，塞其上面而空其中。我国所谓“金钱纸”“银钱纸”者，即此也。

第四编

当代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

韩国学者在大韩民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学方面的研究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各大学中文系和相应研究所（院）里的研究人员，在推动半岛汉学在新时代的发展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与其前辈不同的是，如今的汉字书写在半岛的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都不是很流行。能够流利书写汉字并用汉语写文章的人，即使在专业研究者那里也很难寻找。汉诗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耄耋老人。然而，科学研究是在半岛汉学中出现的新气象。如今的研究者中虽然也有许世旭教授那样精通中文写作的诗人，多数研究者都是论文和论著的写作者。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汉语世界里的文献，是半岛先哲们无法想象的。由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主编的大部头《中韩辞典》的编写，也是半岛先哲们无法做到的。本编主要从中国散文和小说这两个方面做大致的梳理。

第一章
韩国学者的中国散文研究

韩国学者的中国散文的研究是从韩国建国以后就已经开始了的。在大韩民国建立之初的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后来的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停滞。由于中韩两国的历史悠久的文化联系，韩国和日本一样属于汉字文化圈，中国的散文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韩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和韩国的国文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许多资深中国语言文学研究专家例如张基槿、车柱环、金学主、许世旭等，都曾经或者现在还在研究中国散文。这恐怕和韩国自古以来的汉学研究以诗文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有关。就大致情况来看，可以把对于汉魏六朝以前散文与其后散文的研究分为两大方面。虽然，在这历史的分期之外，还有许多综合的研究和译介。在60年代和70年代，就有《汉文新讲》①《汉文通论》②《汉文通释》③等书出版。张基槿、车柱环、金学主、许世旭是韩国学术界中最早进行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汉学修养是对朝鲜王朝旧时代文人传统的传承。张基槿先生除了可以用毛笔书写外，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反映比较快。车柱环先生现仍然是首尔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化老资格专家。金学主也是首尔大学的教授，他曾经在台湾大学学习，对陶渊明有精到的研究。许世旭教授是高丽大学教授，用中文出版多部文学作品。

一、对汉魏六朝以前散文的研究

对于古文和今文的研究文章，有李相玉《古文今文之浅见》④，金都练

① ［韩］李家源著，新丘文化社，1964年版。
② ［韩］许世旭著，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1971年版。
③ ［韩］赵钟业著，荧雪出版社，1975年版。
④ 《渊坡车相辕博士颂寿论文集》，1971年。

《古文源流考》[1]和《古文文体研究》[2],以及《古文的几个概念》[3]、李台薰《群经今古文略述》[4]、尹浩镇《古文范畴试论》[5]等。

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有车柱环翻译的《东洋的智慧》[6]《论语》[7]等大量的译介。光是《论语》,在韩国就有近20多种译本。《孟子》也有十几种译介本。《老子》和《庄子》的译介版本也较多。这些书籍不仅是翻译和介绍,有的也有精深的研究。如李民树《论语解说》[8],金学主《孔子的生平与思想》[9]。著名美学家白淇洙在1981年和1988年分别用韩语和英语发表了关于孔子艺术和美学思想的论文。韩武熙于1985年发表了《庄子散文研究》[10]。权锡焕和沈揆昊分别在1986年和1988年以庄子散文为题完成了成均馆大学和韩国外大的硕士论文。其他诸子的译介版本不如孔孟和老庄多,研究文章也较少。

对于辞赋,从20世纪60年代就有安振高、徐首生和李庆善的论文发表。[11] 到了80年代,对于辞赋的研究文章更多了些。白承锡发表了《汉赋探源》[12],《洞箫赋研究》[13],《贾谊赋研究》[14]等论文,集中探讨汉赋。范善均在1980年和1983年分别研究了"辞赋之名"与"屈赋之风格"问题[15]。1988年,范善均以《屈赋研究》为题,完成了延世大学的博士论文。

总体而言,韩国的散文研究最有成果的还是对于汉魏六朝以后的散文研究。就以学位论文来说,汉魏六朝以前的散文研究选题较少。以笔者的

---

① 国民大学《韩国学论丛》第2辑,1979年。

② 国民大学《韩国学论丛》第6辑,1983年。

③ 国民大学《中国学论丛》第5辑,1988年。

④ 檀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5辑,1982年。

⑤ 《中国语文学》第16辑,1989年。

⑥ 乙酉文化社,1964年版。

⑦ "乙酉文库",1969年。

⑧ 一潮阁,1985年版。

⑨ 太阳文化社,1978年版。

⑩ 檀国大学《东洋学》第15辑。

⑪ 《文理大学报》第20辑,1965年;庆北大《论文集》第11辑,1967年;《中国学报》第6辑,1967年。

⑫ 东国大学庆州分校《论文集》第4辑,1985年。

⑬ 《中国语文学》第12辑,1986年。

⑭ 《中国语文学》第15辑,1988年。

⑮ 《闲堂车柱环博士颂寿论文集》《中国人文科学》第2辑。

不完全统计，有沈揆昊《庄子散文的形像化研究》[①]、赵载泓《墨子散文的思想性和文学性研究》[②]、李在夏《曹操诗文研究》[③]等几篇。大多数的散文研究都是以唐以后的作家作品为对象。这样的选题倾向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当代的韩国汉学研究试图在选题与科研方向上找出可以超越前人的突破点。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韩战"即我国所说"抗美援朝"结束，韩国的当代汉学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维持阶段。战火纷飞，饥寒交迫，学者们很难在半岛上放下一张书桌。当战争结束以后，以首尔大学中文系为代表的韩国中国文学研究者们还要面对传统文士的强大压力。那些参加过朝鲜科举的老人们有许多还在世。他们对自己家族的孩子们的汉学水平不满意。高丽大学许世旭教授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流动的故乡》里，就描绘了许氏家族里一位这样的长者。这些老人不仅汉学水平很高，而且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韩国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在选题上尽量时间上靠后，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二、汉魏六朝以后的散文研究概观

汉魏六朝的中国散文研究在韩国也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展开的。由于在韩国通常是一位学者的硕士或博士论文就决定了他以后的论文选题，对于学位论文目录的搜集通常就可以帮助我们把握韩国学者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

其中，综合性研究的论文不多，姜炅范《唐代山水游记研究》[④]算是较有特色的一篇。

研究刘禹锡的可以说是1篇半，因为有1篇是诗文并论的，这就是朴仁成《刘禹锡诗文研究》[⑤]和李商千《刘禹锡散文研究》[⑥]。

而研究韩柳欧苏王曾"八大家"的论文中，韩柳的论文又占了一半以上。其中，李章佑《韩退之散文研究》[⑦]可以说是此类论文中最早的一篇。

---

① 韩国外大硕士论文，1988年。
② 韩国外大硕士论文，1992年。
③ 成均馆大学硕士论文，1995年。
④ 成均馆大学硕士论文，1992年。
⑤ 高丽大学博士论文，1995年。
⑥ （大邱）启明大学硕士论文，1996年。
⑦ 首尔大学硕士论文，1965年。

而且该文至今仍然是研究唐宋散文的必读篇目。关于李章佑教授的散文研究,下文有专门评介。对于韩愈的散文研究,按照发表年代,有如下几篇学术论文:

张哲镐《韩愈文学思想研究》,成均馆大学硕士论文,1984 年

南宫远《韩愈研究:以其文学性为主》,江原大学硕士论文,1985 年

金钟美《韩愈古文理论研究》,首尔大学硕士论文,1990 年

南宗镇《韩愈的墓志铭类文章研究》,成均馆大学硕士论文,1991 年

李钟汉《韩愈散文的分析研究》,首尔大学博士论文,1992 年

朴璟实《韩愈散文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1995 年

李济元《韩愈的古文论研究》,忠南大学硕士论文,1997 年

对柳宗元散文的研究,主要论文有:

洪寅杓《柳宗元研究》,首尔大学硕士论文,1968 年

柳银姬《柳宗元的传与山水记考察》,延世大学硕士论文,1985 年

洪承直《柳宗元寓言文的讽刺研究》,高丽大学硕士论文,1986 年

朴景兰《柳河东"著述之文"的思想研究》,汉阳大学硕士论文,1991 年

吴洙亨《柳宗元散文研究》,首尔大学博士论文,1992 年

洪承直《柳宗元散文的文体研究》,高丽大学博士论文,1992 年

林春英《柳宗元传记寓言散文研究》,韩国外大硕士论文,1993 年

林玄镐《柳宗元永州八记研究》,庆熙大学硕士论文,1994 年

金俊亨《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研究》,明知大学硕士论文,1996 年

李贤《柳宗元永州八记考察》,庆星大学硕士论文,1997 年

在上述文章中,除了李章佑、洪寅杓已是老一辈学人外,几篇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都是现在在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科研和教学中坚。其中,吴洙亨博士毕业后在首尔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

研究宋代散文的有学位论文中,对曾巩、欧阳修的研究论文并不多,大致有:

郭鲁凤《欧文的修辞研究》,韩国外大硕士论文,1983 年

金兰英《欧阳修记文研究》,岭南大学硕士论文,1989 年

金钟燮《曾巩散文研究》,首尔大学硕士论文,1990 年

郭鲁凤《欧阳修散文研究》,韩国外大博士论文,1991 年

朴京淑《欧阳修古文研究》,国民大学硕士论文,1994 年

鲁长时《欧阳修散文的分析研究》,岭南大学博士论文,1995 年

黄一权《欧阳修抒情散文的研究》,启明大学硕士论文,1992 年

柳在润《欧文辞赋研究》,全南大学博士论文,1996 年

以"三苏"散文为研究对象的,则有:

禹竣浩《苏东坡散文研究》,韩国外大硕士论文,1980 年

禹竣浩《苏东坡辞赋研究》,韩国外大博士论文,1990 年

李镇汉《苏轼散文的创作论及风格研究》,汉阳大学硕士论文,1993 年

林俊相《苏轼记体散文研究》,成均馆大学硕士论文,1993 年

崔在赫《苏洵散文研究》,汉阳大学硕士论文,1994 年

金钟燮《苏辙散文研究》,首尔大学博士论文,1995 年

朴鲁胎《苏轼散文研究》,诚信女大博士论文,1996 年

其中郭鲁凤、金钟燮的博士论文比较引人注目。除此之外,唐润熙于 1977 年向首尔大学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古文家的记文研究》则可以算作是综合性研究》论文了。

关于明清散文,韩国学者看重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站得住的流派与作家作品。综合性学位论文包括裴永信《明代游记体例与表现特色考》①、李康来《桐城派方苞的古文理论研究》②、崔泳准《姚鼐散文研究》③、尹银淑《曾国藩的古文论》④。而在其中,现任教于崇实大学的李济雨教授对于晚明小品的研究较为深入。李济雨的博士论文是由台湾师大王熙元教授指导的,题为《晚明小品之文艺理论及其艺术表现》,1992 年通过答辩。李济雨从读硕士的时候起,就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中国晚明小品。除了公安三袁、竟陵钟谭外,他对于山阴张岱的散文尤其情有独钟。接连发表了多篇关于张岱的研究论文。其实,在韩国学者对于晚明小品的研究者中,现任教于釜山东义大学的高八美教授的成果出现较早。早在 1978 年,高八美就在台湾辅仁大学以《袁中郎及小品文研究》为题,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1981 年,又发表了《袁中郎的文学观》⑤。李准根也是在台湾辅仁大学以晚明小品研究为题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时间是 1982 年。1984 年,

① 韩国外大硕士论文,1985 年。

② 首尔大学硕士论文,1992 年。

③ 全南大学博士论文,1996 年。

④ 淑明女大硕士论文,1984 年。

⑤ 釜山大学《人文论丛》第 20 辑。

李准根在韩国外大的《中国学研究》创刊号上，又发表了《晚明小品文考察》一文。申美子也在1983年发表了《张岱散文的特色》一文[①]，次年又发表了《明代小品文兴盛的时代背景》[②]。另外，赵佶长也在1982年就发表了《袁宏道散文考》[③]。赵令扬在1985年也发表了《归有光和袁宏道：明代古文运动力的反响》[④]。辛玉教在1990年以《归有光散文研究》为题，完成了韩国外大的硕士论文。在其博士论文中，李济雨用了很多的篇幅讨论了"晚明小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问题。他认为，可以用"短而隽异"四个字来概括晚明小品的基本特征。它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探索性文体。正如作者所说"晚明小品的存在绝不是为达到既定效用的一种文学体裁，而是在阐释、实践当时新兴文学的本质和特征的过程中产生，而尚未演变成完整体式的一群探索性文学创作"[⑤]。李济雨认为清四库馆臣所称"小品"，是与正统"文章""史论"相对而言，有贬义。而现代文学中所称之"小品文"，则是受西方散文观念影响下出现的散文文体。

中国现代作家的散文作品在韩国的普及程度远远不及古文那么高。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了一批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主要包括白元淡《鲁迅杂感文研究》[⑥]、刘世钟《鲁迅野草象征体系研究》[⑦]、李今仙《鲁迅前期杂文主题意识与特性研究》[⑧]、韩秉坤《鲁迅杂文研究》[⑨]、张惠琼《鲁迅杂文艺术性研究》[⑩]、朱寅善《朱自清散文的特性研究》[⑪]、朴宣姬《朱自清散文小品文研究》[⑫]、崔正穆（拟音）《徐志摩散文研究》[⑬]。

至于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韩国，和欧美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将它们作为政治气候的传递品而不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

① 汉阳大学《比较文化研究》第2卷1号。
② 汉阳大学《人文论丛》第7辑，1984年。
③ 《外国文化研究》1982年第5辑。
④ 《中国学报》第25辑。
⑤ 引自答辩提要。
⑥ 延世大学硕士论文，1983年。
⑦ 韩国外大博士论文，1993年。
⑧ 韩国外大硕士论文，1993年。
⑨ 全南大学博士论文，1995年。
⑩ 檀国大学硕士论文，1989年。
⑪ 国民大学硕士论文，1987年。
⑫ （大邱）启明大学硕士论文，1993年。
⑬ 釜山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

的。所以，出现的第一篇论文是刘宾雁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苏秉锡的《刘宾雁文学作品研究》①。另外，车镇宪也撰有《秦牧散文创作论》②。但是和古代散文研究比较起来，论文的数目还是太少了。

可以看出，在韩国学者心目中，只有那些散文大家才是研究的对象。只有那些在文学史上享有很高声誉的文学流派才值得研究。这正是韩国汉学研究传统在新时代的发扬。

三、散点透视：韩国中文专家的散文研究

在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中，截止1990年发表论文20篇以上的有16位③。而其中发表论文在50篇以上专家包括车柱环（75篇）、张基槿（66篇）、金学主（65篇）、许世旭（116篇）和柳晟俊（74篇）。

这些中文专家虽然各有专攻，但对于中国散文也都有著述。例如车柱环和张基槿两位先生对于中国先秦的散文译介开始很早。金学主教授对于先秦诸子的翻译和介绍，也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其译介所及，老庄孔孟之外，墨子、孙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列子等无不囊括。进入80年代，金学主又在"朝鲜时代所印《文选》本"和"朝鲜时代刊行中国文学关系书研究"两大方面发表了系列文章，刊载于台湾《韩国学报》1985年第5辑和《东亚文化》第26、27辑。后者涉及《五臣注文选》《古文真宝》《文章正宗》等。这些研究成果还参加了1988年安东大学组织的国际学术大会的交流。另外，韩武熙教授在撰写关于中国散文研究文章之外，还编辑出版了多种中国散文的文集。

在韩国的中国语文学专家中，许世旭和李章佑两位教授的中国散文研究格外引人注目。

1　许世旭的中国散文研究

许世旭教授的中国文学研究文章和著作很多。徐敬浩编《国内中国语文学研究论著目录》中，许世旭的论著目录占了7页。其中涉及中国文学

① 高丽大学硕士论文，1989年。

② 高丽大学硕士论文，1990年。

③ 参见徐敬浩《国内中国语文学研究论著目录》，正一出版社，1991年。以及吴淳邦《韩国中国语文学界之学术活动简介》，载中国《学人》第2辑。

与文化研究的许多方面。早在上世纪70年代,许世旭就已经编辑出版了《汉文通论》①,翻译了《庄子》②、《朱自清:现实与艺术的世界》③等。许世旭还在上世纪70年代就致力于中国散文史的整理、译介和研究。他在《中国散文史》④和《中国随笔的传统》⑤、《中国随笔的传统(中国散文学史)》⑥、《民国以来的随笔》⑦等文章中,系统而又概括地介绍和评价了中国散文,并大致勾勒出了其历史发展线索。这在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是有开拓意义的。进入80年代,许世旭教授的中国散文研究论著有:《中国小品文的特性》⑧、《小品的现代化——民国》⑨。《中国随笔小史》于1981年由乙酉文化社出版,这是许世旭教授多年来在中国散文史的研究中的一大总结性成果。

2 李章佑的中国散文研究

李章佑1965年于首尔大学提交了硕士学位论文《韩退之散文研究》后,就在中国散文研究的领域深入思考。他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撰写的论文还包括《汉文比较考》⑩、《韩愈文章小考》⑪、《欧阳修〈进修唐书表〉论》⑫、《史记伍子胥列传的构成》⑬、《汉书司马迁传考释》⑭、《文章流别论考释》⑮、《韩愈文研究绪说》⑯、《韩昌黎序类文研究》⑰。在这期间,李章佑还于1968年以《韩昌黎文体研究》为题,向台湾大学提交了硕士论文。

① 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1971年。
② 徽文出版社,1973年。
③ 《随笔文学》,1973年11辑。
④ 《随笔文学》1976年第83辑。
⑤ 《随笔文学》1979年第78辑。
⑥ 《随笔文学》1979年第82辑。
⑦ 《随笔文学》1979年6月号。
⑧ 韩国外大《论文集》第13辑,1980年。
⑨ 收入《中国随笔小史》,见下文。
⑩ 首尔大学《文理大学学报》20,1965年。
⑪ 《中国学报》第3辑,1965年。
⑫ 《渊坡车相辕博士颂寿纪念论文集》,1971年。
⑬ 檀国大学《东洋学》第2辑,1972年。
⑭ 檀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辑,1974年。
⑮ 檀国大学《论文集》第8辑,1974年。
⑯ 檀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3辑,1976年。
⑰ 《渊民李家源博士六秩颂寿纪念论丛》,1977年。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除了编写和撰写其他的中文研究书籍文章外，李章佑还发表了《朝鲜朝刊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①]、《韩愈的古文理论》[②]、《韩愈与古文运动》[③]。并于1982年获得了首尔大学的中国文学博士学位。早在1975年，李章佑就出版了《中国历代散文选》，该书于1991年由新雅社再版，影响较大。除此之外，李章佑教授还数次发表过介绍和评论韩国的韩愈研究的文章。

李章佑教授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韩愈散文研究，就已经在使用文体研究方法，对韩退之诸文做分类考查了，这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是很难做到的。进入80年代，李章佑对于韩愈散文所做的已经不仅仅是文体学研究了。上引1984年他在檀国大学《东洋学》第14辑所发表的论文，从古文运动的产生背景入手，来阐发韩愈的文学主张。这样的研究已经显示出了在韩国尤其难能可贵的宏观研究倾向。

余论：中青年学者与中国散文研究

像韩国中国文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一样，中国散文的研究领域现在也涌现出了一批新秀。他们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在韩国本土或者是在台湾取得博士学位的。1995年以后取得博士学位的暂且不论，在此之前取得学位的学者中，禹竣浩除了发表《苏东坡辞赋研究》[④]之外，还发表了《赤壁赋考》[⑤]、《后赤壁赋考》[⑥]、《东坡赋考》[⑦]、《东坡赋考Ⅱ》[⑧]、《苏东坡文赋的特征》[⑨]、《前后赤壁赋的绘画性》[⑩]、《辞赋的定义与范畴》[⑪]等论文。郭鲁凤

---

① 首尔大学《中国文学》第7辑，1980年。
② 檀国大学《东洋学》第14辑，1984年。
③ 《中国学报》第25辑，1986年。
④ 韩国外大博士论文，1990年。
⑤ 忠南大学《论文集》第9辑，1982年。
⑥ 忠南大学《论文集》第10辑，1983年。
⑦ 《中国语文学》第6辑，1983年。
⑧ 韩国外大《中国学研究》创刊号，1984年。
⑨ 《中国语文学》第10辑，1985年。
⑩ 《湖西文学》第14辑，1988年。
⑪ 忠南大学《龙吟》第3辑，1990年。

除了发表《欧阳修散文研究》[1]之外，还有《醉翁亭记考》[2]、《欧阳修散文研究》[3]、《欧阳修经学研究》[4]、《欧阳修"文穷后工"研究》[5]等。吴洙亨除了发表《柳宗元散文研究》[6]以外，还有《杜牧诗文简论》[7]、《韩愈柳宗元二人论古书文章初探》[8]、《柳宗元"传状"类散文研究》[9]、《柳宗元的寓言文研究》[10]等论文。李钟汉和洪承直也有多篇关于中国散文的研究论文问世。金钟声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通过的论文题目是《战国策文学面之研究》，撰于1993年。最近几年，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也辛勤劳作，不断有新文章问世。他的有关"战国策研究"的论文大部分是主题研究。

总之，韩国学者的中国散文研究是在老一代学人的鼓励和带动之下，沿着韩国传统的汉学研究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韩国的中国散文研究出现了可喜的新气象。虽然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还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相信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一定会有所匡正，更上一层楼。

本章撰写时参考使用了韩国中央图书馆、国会图书馆编目资料光盘1997年版和中央图书馆学术网路资料，以及徐敬浩教授所编韩国学者中国语文研究著作目录。蔚山大学朴璟实教授提供了她发表于台湾《中国唐代学会会刊》1996年第7辑上的《韩国地区唐代散文研究概况(1964—1995)》一文，谨此一并致谢。

① 韩国外大博士论文，1991年。
② 韩国外大《里门论丛》第3辑，1983年。
③ 韩国外大《中国学研究》第3辑，1986年。
④ 韩国外大《中国学研究》第5辑，1990年。
⑤ 韩国外大中国问题研究所《中国研究》第12辑，1990年。
⑥ 首尔大学博士论文，1992年。
⑦ 汉阳大学《人文论丛》第8辑，1984年。
⑧ 汉阳大学《人文论丛》第10辑，1985年。
⑨ 《人文论丛》第19辑，1990年。
⑩ 《中国语文学》第21辑，1993年。

第二章
韩国学者的中国小说研究

韩国学者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几乎是从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了的。大韩民国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建立，而最早的关于中国小说以及其他的中国文学的研究，是丁来东等的一批评介文章，和尹永春《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①]等著作。对于中国小说的介绍和翻译则开始于1946年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史》[②]，金光洲等共同翻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选集》[③]。随后，朴泰远的《中国小说集》于1948年出版（正音社）。但是随后的战争和经济困难，使得这种研究成为文化人的奢望。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才又陆陆续续的开展起来。总起来说，韩国学者的中国小说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发轫期；第二个阶段是60年代、70年代的发展期；第三个阶段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繁荣期。由于与中国在文化传统上的接近，现代的韩国中国小说研究其实是“日据时代”（日本占领期间）汉文学研究的继续和发展。但由于此方面研究是在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发轫和发展期十分漫长。其间又加上朴正熙总统明令禁用汉字达十年之久，处于CJK文字圈的韩国失去了汉字优势。这些都给韩国的中国小说研究带来了困难。20世纪80年代前末苏联的崩溃和解体，为韩国学者的中国小说研究带来了一线生机。特别是90年代中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在韩国出现了“汉语热”。韩国的中国小说研究也走向了繁荣。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研究，在韩国学术界出现了丁来东、张基槿、丁范镇、全寅初、崔溶澈、吴淳邦、

① 1949年版，鸡林社。
② 李明善译，首尔。
③ 首尔出版社，1946年版。

徐敬浩、卢惠淑等著名学者，以及一大批优秀科研成果。

一、中国小说研究的发轫

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中国小说的研究还没有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分离出来。开一代风气的韩国先生们，在最初所能做的，也多是评论、译介和概论性的工作。丁来东的评介性论文在当时很有影响。1933年10月26日、27日，1934年6月30日到7月4日，1935年5月1日的《东亚日报》上，分别发表了丁来东就中国文坛、中国文人所写的文章。另外，他还在《朝鲜日报》1931年11月8日至12月1日上发表了这一类文章。1932年的7月号的《四海公论》上，丁来东发表了《中国两大文学团体概观》，1934年9月号的《新家庭》上，丁来东又发表了《中国的女性作家》。其他的文章还包括，1936年5月号《四海公论》上的《最近中国的新文学展望》，1938年8月1日至8月11日在《朝鲜日报》上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坛概观》等。这些文章对于大韩民国建立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起到了启蒙者的作用。

1945年《艺术周报》第1、2期丁来东所发表的《中国文学中的鲁迅与巴金》一文，就和林炳夏的《回忆革命作家鲁迅》①、金光洲的《鲁迅及其作品》②、赵超构《中国解放地区的文学运动》③等形成了韩国建国以后的最早一批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尹永春也于1948年5月号的《白民》上发表了《郭沫若论》。朴鲁胎的《鲁迅论》④和《唐代小说研究》⑤，李相玉《中国哲学与文学的相关性》⑥，张基槿《传奇小说的发展》⑦，也是在当时极为难得的一些学术论文。此时出现的著作还有金东成翻译的《金瓶梅》⑧等。

除了丁来东的介绍性评介外，尹永春在中国小说研究的发轫阶段也是比较活跃的一位学人。除了上述的文字外，尹永春还发表了《林语堂文学

① 《新人文学》1947年10月号。
② 《自民》，1948年1月号。
③ 《文学》8，1948年7月号。
④ 《知性》3，1958年。
⑤ 成均馆大学《论文集》第3辑，1958年。
⑥ 《自由文学》1959年7月号。
⑦ 《首尔大学论文集》第7集，1959年。
⑧ 乙酉文化社，1956年版。

的世界性》[1]、《自由中国的文学》[2]等文。

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也出现了王平《大陆作家的受难相》[3]等文章。

总之，中国小说在韩国的研究，是起于丁来东的介绍性评介，继之以尹永春的广泛研究，而由张基槿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的。

二、中国小说研究的发展阶段

中国小说的研究在韩国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稳步发展的阶段。

本阶段中，张基槿等先生仍然活跃在学术界。张基槿在1961年翻译了胡云翼的《中国文学史》[4]，在1964年的第3卷和次年的第4卷、1966年的第5卷《亚细亚女性研究》中，他发表了《唐传奇中出现的女性Ⅰ、Ⅱ》《唐传奇与中国传统女性观比较》3篇论文，对于唐传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69年，他又在中国语文学会刊上发表了《唐代传奇小说研究》。同年，张基槿还以《传奇小说研究》为题的长篇论著作为他在首尔大学的博士论文。可以说，唐传奇是张基槿先生在60年代的研究重点。他还在1966年翻译了《官场现形记》[5]，在20世纪70年代翻译过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文璇奎发表了《中国文学发达史》[6]，编写了《中国文学史》[7]。

在中国小说研究的发展阶段的20年时间里，先后出现了“唐传奇”“京本、话本”“三国、水浒”这样3个热点。

首先是“唐传奇”。张基槿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唐传奇的学术热情，带动了丁范镇、全寅初、李东乡、卢惠淑等后学。在本阶段的唐传奇研究中，丁范镇的成果最引人注目。他在1961年于台湾师大提交了《唐代传奇及其影响》的硕士论文，又在1978年以《唐代传奇研究》为题完成了成均馆大学的博士论文。他有关唐传奇的论文还有《虬髯客传考》[8]，《枕

---

① 《新日》54，1956年4月号。
② 《黎明》2－2，1958年3月号。
③ 《自由文学》3，自由文学社，1958年3月。
④ 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
⑤ 《世代》4卷10号。
⑥ 《教坛》57，1971年9月。
⑦ 景仁出版社，1972年版。
⑧ 《韩国文化研究院论丛》3卷1号，1963年。

中记研究》[1],《李公佐研究》[2],《白行简其人及其小说》[3],《补江总白猿传研究》[4],《唐代古文运动与传奇的内在关系》[5],《东城父老传的历史背景》[6],《枕中记主人公间关系研究》[7],《唐传奇内外虚实论》[8],《唐传奇范畴的分类问题》[9]等。1975 年,他翻译出版了沈既济等撰的《唐代传奇小说选》。丁范镇不仅对于唐传奇做汉文学研究,而且还以韩国的史料来作参照系,这些开拓性的成果使得曾任成均馆大学校长的丁范镇不愧为唐传奇专家。

除了丁范镇之外,在本阶段以唐传奇研究取得学位的还有金揆镇(1963 年,首尔大学硕士)、全寅初(1969 年,延世大学硕士)、李东乡(1970 年,台湾大学硕士)、卢惠淑(1979 年,淑明女子大学硕士)。崔奉源和洪淳孝也在本时期内发表了自己的唐传奇研究论文。

本时期的第 2 个研究热点是京本通俗小说和话本小说。李汉祚、金一根、车柱环等都发表了研究成果。李永求还以《京本通俗小说研究》为题,完成了首尔大学的硕士论文。但是,总体而言,京本通俗小说和话本小说的研究在本阶段,不如唐传奇研究那么声势浩大,也没有特别突出的研究成果。但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大气候中,能有如此的研究阵容,在当时也就是热点了。京本通俗小说和话本小说的研究,要到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才真正繁荣起来。

本时期的第 3 个热点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研究和介绍。《三国演义》的本阶段译本,有 1961 年正音社的《完译三国志》,1962 年该社又出版了崔映海的《完译三国志(上中下)》。同年,平凡社、学友社也分别出版了徐仁居、方基焕翻译的《三国志》。后来的译本还有金恩烨《单卷完译三国志》[10]、金光洲《三国志

① 《大东文化研究》第 2 辑,1966 年。
② 《大东文化研究》第 5 辑,1968 年。
③ 成均馆大学 人文社会《论文集》第 13 辑,1968 年。
④ 《中国学报》第 8 辑,1968 年。
⑤ 成均馆大学 人文社会《论文集》第 15 辑,1970 年。
⑥ 《大东文化研究》第 11 辑,1976 年。
⑦ 《渊民李家源博士六秩颂寿纪念论丛》,1977 年。
⑧ 成均馆大学《人文科学》第 7 辑,1978 年。
⑨ 《大东文化研究》第 12 辑,1978 年。
⑩ 文连堂,1964 年版。

(上中下)》(三中堂 1965 年)等十几种。在翻译和介绍的基础上,对于《三国演义》的文学研究也开始了。本时期研究论文发表最多的是李庆善。他在《三国志演义考》[①]、《三国演义中的英雄群像》[②]、《三国演义人物考》[③]、《三国演义的比较文学研究》[④]以及《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⑤]等文章中,就《三国演义》的诸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这无论如何是开创性的。李庆善还在 1971 年专门撰文论述了韩国的文学作品从《三国演义》中接受的影响以及《九云梦》《玉楼梦》与《三国演义》的直接比较[⑥]。李庆善的《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和《三国演义的比较文学研究》也作为专著分别于 1976 年和 1978 年在志一社出版。

对于《水浒传》的介绍和研究,也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就展开了的。译本和译介本包括崔映海的《完译水浒传(上下)》、朴荣浚的《水浒传》和金八峰的《八峰水浒志》[⑦]、千世旭的《水浒志》[⑧]、金东里的《水浒志》[⑨]和金光州的《新译水浒传》[⑩]。上述的译本和译介本有的是不完全译本。但是,大致来说,在 60 和 70 年代的韩国学术界,已经把《水浒传》的原文基本上介绍给了国民。

在翻译和介绍的同时,就在进行着学术研究。其中,李慧淳的研究文章最有份量。在其于 1972 年完成的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水浒传研究》和其后的《水浒传版本考》等文章中,都显示出一种开拓精神。其他人的论文还包括李凤鳞的《水浒传中的中国思想》[⑪],成宜济的《水浒传批判考》[⑫]。对于我国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宋在禄等也有评介。

对于《西游记》和《红楼梦》这两部长篇小说,韩国研究人员在本时期

---

① 首尔大学人文社会《论文集》,1969 年 4 月。
② 汉阳大学《论文集》第 2 辑,1969 年。
③ 汉阳大学《论文集》第 6 辑,1971 或 1972 年。
④ 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 年。
⑤ 《中国文学》第 1 辑,1973 年。
⑥ 分别收入《汉阳大学论文集》第 5 辑和《渊坡车相辕博士颂寿纪念论文集》。
⑦ 译本,语文阁,1966 年版。
⑧ 译本,仁文社,1968 年版。
⑨ 译本,三省出版社,1971 年版。
⑩ 瑞文堂,1975 年版。
⑪ 《大邱大学论文集》,1960 年。
⑫ 檀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 3 号,1976 年。

尚无多大兴趣。《西游记》倒是有几种译本：韩民教的《单卷完译孙悟空》[1]，郑麟永的《西游记》[2]，金光洲的《西游记》上、中、下[3]和金东成的《西游记》[4]。研究论文在本时期只是见到了丁奎福的《西游记与韩国古小说》[5]。至于《红楼梦》，不管是译本还是研究论著，本时期皆付阙如。倒是《金瓶梅》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了几个译本：金东成的《金瓶梅》[6]，赵轼的《金瓶梅》[7]，金龙济的《金瓶梅》上、下[8]，赵诚出的《金瓶梅》[9]。

除了上述的介绍和研究以外，在本阶段还有张基槿先生的对于《官场现形记》的译介[10]，池荣在翻译的《浮生六记》[11]。

韩国学者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和古代小说的研究一样，也是分为了译介和研究两个方面。关于译介，专门的书籍和文章不多。因为和古代文学不同的是，现代的中国文学的创作是和理论与批评、和文艺思潮联系在一起的。金时俊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2]就算是比较早的译介了。对于中国现代的小说家的译介和研究，也远远不及对于古代小说家那么热情。具体作家的评介，也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起步的。其中只有鲁迅是个例外。

张基槿先生在1974年5月出版了《鲁迅和他的小说》[13]。随后，从1975年到1978年，许世旭[14]、河元庆[15]、河正玉[16]、李家源[17]分别出版了对于鲁迅《阿Q正传》的译介书籍。其中，许世旭和李家源的著作中，还包含了

① 翰林社，1962年版。
② 民音社，1966年版。
③ 乙酉文化社，1976年版。
④ 乙酉文化社，1976年版。
⑤ 《亚细亚研究》第14卷，1970年。
⑥ 乙酉文化社，1956年，1977年版。
⑦ 大韩出版社，1962年版。
⑧ 正音社，1964年版。
⑨ 三省出版社，1971年版。
⑩ 《世代》第10号，1966年。
⑪ 乙酉文化社，1969年版。
⑫ 新雅社，1975年版。
⑬ 大洋书籍。
⑭ 泛友社，1978年版；三省出版社，1978年版。
⑮ 译本，语文阁，1966年版。
⑯ 新雅社，1976年版。
⑰ 东西文化社，1978年版。

《狂人日记》等其他鲁迅的作品。车柱环的《民族,反抗,绝望——鲁迅与其境遇》[1]应当算作是鲁迅研究的较早一篇文章。1970年,李玲子以《鲁迅小说研究:其作品中的民众形象》完成了其首尔大学的硕士论文。除了河正玉、韩武熙、金相一、尹芳烈和许世旭分别撰写了对于鲁迅文学及其思想的综合研究论文之外,在本时期,还有金永哲的《阿Q正传小考》[2],李汉祚的《〈药〉中的对话》[3],全寅初的《阿Q正传研学》[4]。全寅初的论文是当时以及现在的韩国鲁迅小说研究之佼佼者。本时期的另一项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是丁范镇翻译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5]。该书是丁范镇在小说研究的译介方面的力作。

总之,韩国的中国小说研究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还只是处于缓慢的发展之中。究其原因除了上文已经论及的政治和时代的原因外,还有学术界自身的原因,那就是在韩国很讲究经典、学院派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很多的学者尤其是前辈学者是看不起小说之类的研究的。在日本人占领韩国以及之前,都是如此。很多人把小说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读物,而不屑于研究它们。因而,即是有研究成果也很难被肯定。就是在韩国建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研究汉文学也还是以研究诗歌和诗学为主。真正的多元化学术研究的开始,还是要等到80年代和90年代的到来。

但是,毕竟在本阶段已经有了这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小说,而且有了这些研究成果。人们在肯定上述研究不可避免的会有时代的局限的同时,也对他们筚路褴褛的开创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

三、中国小说研究的黄金时代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韩国的中国小说研究发展最为辉煌的阶段。之所以说是最为辉煌,是因为在本阶段出现了三种新气象:首先是研究队伍的壮大。中国小说的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难登大雅之堂,到上世纪60和70年代开始从容地步入学术的殿堂,到本阶段研究者形成壮观的阵容,不能不说辉煌。其次是研究范围的扩大。几乎中国小

① 《文学春秋》第2卷,1965年。
② 首尔大学《文理大学报》第18辑,1972年。
③ 《中国学报》第16辑,1975年。
④ 分别载于延世大学《人文科学》第36、38辑,1976年和1978年。
⑤ 学研社,1978年版。

说研究的方方面面在本阶段的韩国学术界都有研究。不仅中国的古代小说,就是现代乃至当代和"后"新时期的小说,也有人在研究。例如田彩延在1991年就以《王蒙小说研究》为题,完成了忠南大学的硕士论文。后来还有金炯俊对于《活动变人形》的细致研究①。最后,是在本时期之内,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学者,出现了一些在世界汉文学领域也可以占一席之地的优秀研究成果。

现代和当代部分中国小说研究在本时期也一批研究成果,其中的鲁迅研究论著尤其多。可参见朴宰雨《国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绍介文献目录》②,高丽大学毕业的金河林博士的《鲁迅研究在韩国》③、《鲁迅研究在南朝鲜》④。但显然80年代和90年代的"黄金时期"应当是以古代小说研究为主的。

就古代中国小说来看,本时期的韩国学者大致是沿着时代顺序就某一领域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的,并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热点。

在汉魏六朝直到唐传奇和宋话本小说的研究领域,本时期丁范镇先生继续他的此项专攻,除了发表论文外,《唐代小说研究》于1982年出版。徐敬浩、卢惠淑等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唐传奇的研究文章。全寅初则把精力放在了六朝志怪等方面。另外,金政六于1987年以《三言小说研究》为题,完成了成均馆大学的博士论文。李腾渊在话本小说的研究中论文较多。他1985年在台湾完成话本小说的硕士论文,1986、1987、1988分别发表了关于话本小说的研究论文。1989年,他以《晚明代小说理论研究》为题,完成了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博士论文。

洪淳孝与郑东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在此阶段颇为引人注目。从1980年到1983年,洪淳孝分别发表了《三国志平话的构造与文体》⑤、《三国演义的社会意识与历史意识》⑥、《三国演义的题材及其表现技巧》⑦。同年,洪淳孝完成了其在台湾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三国演义研究》。郑东国也

① 《中国文学》第23辑,1995年。

② 《中国现代文学》第1号,1987年。

③ 檀国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刊号,1986年。

④ 《鲁迅研究年刊》中国和平出版社,1990年。

⑤ 忠南大学《论文集》第7卷2号,1980年。

⑥ 忠南大学《论文集》第9卷2号,1982年。

⑦ 忠南大学《论文集》第10卷2号,1983年。

发表了《三国演义中的重要人物考查》[①]和《三国演义中的重要地名考查》[②]。郑东国还在《三国演义传入韩国与韩国人喜好之研究》[③]、《三国演义对韩国文学之影响》[④]两篇文章中,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切入来考查《三国演义》。

李慧淳于1985年出版了《水浒传研究》的专著。

除了上述的一般介绍之外,下面单独为几个方面的研究做些评介。

〔1〕全寅初:中国小说的综合研究

全寅初教授是一位中国小说综合研究者。从1980年开始,全寅初发表和出版的著作、论文包括:

《中国小说观念的演变考释》,《延世论丛》第19辑,1982年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爱情故事》,延世大学出版社,1983年

《先秦小说试探》,延世大学《人文科学》第50辑,1983年

《秦汉间的神仙思想与中国小说的形成》,《东方学志》第40辑,1983年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延世大学出版社,1985年

《神仙传研究》,《延世论丛》第21辑,1985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延世大学出版社,1985年

《中国近代小说史》(阿英著)译本,正音社,1987年

《阿Q正传的再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第1辑,1987年

《中国古代小说史》,新雅社,1992年

全寅初的研究视角相对的说比较开阔。对于中国小说总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因而给人以高屋建瓴的感觉。早在1977年关于六朝小说的形成的文章中,全寅初就认为,六朝小说的成因,应当说是佛教、道教的影响与方术、阴阳五行思想的综合作用。最近十几年的研究成果,更是显现出其总揽全局的综合研究特点。

〔2〕崔溶澈:《红楼梦》版本研究

本阶段的韩国中国小说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红楼梦》研

---

① 《中国语文学》第6辑,1983年。

② 大邱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第2辑,1983年。

③ 大邱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第1辑,1982年。

④ 台湾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80年。

究的兴起。

《红楼梦》的译本本时期有金龙济和金长焕的两种、正音社编辑部出面推出的一种等。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高旼喜还在1990年以《红楼梦的现实批判意识研究》为题,完成了高丽大学的博士论文。其中崔溶澈的《红楼梦》版本研究,由于是立足于韩国的文本考查,所以一开始就十分引人注目。在完成了台湾大学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文学背景研究》(1983年)以后,崔溶澈的《红楼梦》研究就逐步转到了考据学方面。先后发表了《曹雪芹家世考》①、《曹雪芹生平考》②、《红楼梦脂砚斋评语研究》③、《红楼梦脂评的艺术分析研究》④等论文。从1986年开始,崔溶澈的《红楼梦》研究主要是版本的考据研究。先后发表的论文包括:

《红楼梦初期版本的研究》,汉阳大学《人文论丛》第11辑,1986年

《红楼梦后期版本的研究》,汉阳大学《人文论丛》第13辑,1987年

《红楼梦现代版本的研究》,汉阳大学《人文论丛》第15辑,1988年

《乐善斋本完译红楼梦初探》,《中国语文论丛》第1辑,1988年

《书评:乐善斋本完译红楼梦影印本》,《中国语文学》第15辑,1988年

《关于红楼梦现代译本的考察》,《中国语文论丛》第2辑,1989年

《韩国乐善斋本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学刊》第43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也就是在1990年,崔溶澈以《清代红学研究》为题,向台湾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

1993年江原大学出版了《中国小说绘模本》,是据日据时代《支那历史绘模本》改编。主要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插图韩国古代画家的模刻。崔溶澈还在该书中发表了《韩国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文。

〔3〕吴淳邦:晚清讽刺小说研究

吴淳邦教授属于在韩国的小说研究中独树一帜者。他把研究对象选定为晚清讽刺小说研究。在韩国,研究晚清讽刺小说的人很少。具良根在

---

① 高丽大学中国研究会《中国论丛》创刊号,1984年。

② 汉阳大学《人文论丛》第10辑,1985年。

③ 汉阳大学《人文论丛》第17辑,1989年。

④ 汉阳大学《人文论丛》第19辑,1990年。

1987年以《清末谴责小说的外面背景研究》为题，完成了韩国外大的博士论文。这应当算是晚清小说研究的开端。1983年完成了台湾辅仁大学的硕士论文《晚清讽刺小说的人物研究》后，吴淳邦就在讽刺小说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论文有《晚清四大小说的对比技巧》①、《试论中国讽刺小说的界说》②、《晚清四大小说的讽刺对象》③、《中国讽刺小说的讽刺技巧特点》④等。1989年，他以《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为题，完成了台湾大学的博士论文。1995年，该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中国大陆学界的广泛注意。最近几年，他又翻译出版了《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还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晚清讽刺小说的讽刺艺术》一书。并曾出任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会长。

〔4〕从"韩国中语中文学会"到"中国小说研究会"

韩国现有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的学术研究团体超过20个，而且还在增多。1998年成立了"中国语文论译学会"。其中"韩国中国学会"是建国后第一批留学中国（1949－1992年间只是留学台湾）的学者组织的，影响很大。有学会刊物《中国学报》。"韩国中语中文学会"是第一个纯粹的全国性中文研究学会，学会刊物是《中语中文学》。还有纯粹研究中国小说的学术团体就是"中国小说研究会"，学会刊物是《中国小说研究会报》。在学术研究的组织方面，"中国小说研究会"以战略眼光组织学术活动，在中国小说的研究方面既是战略的策划者，也是战术的执行者。最近二十年来，为推动全国的中国小说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另外，首尔大学中文系有"韩国中国语文学会"，作为中国小说研究专家，徐敬浩1994年出任该会会长之职。该会核心刊物《中国文学》，1973年创刊。90年代以来，首尔大学积极开展中国小说的研究。自1993年至1997年，在首尔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博士生中，就有如下这些人是专攻中国小说的：

魏幸复《孽海花研究》，1993年2月

金垠希《192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研究》，1993年2月

---

① 台湾《中外文学》15:4，1984年。

② 台湾《古典文学》第7辑，1985年。

③ 台湾政治大学《汉学论文集》第3辑，1985年，1988年收入台湾联经出版社的《晚清小说研究》。

④ 台湾《中外文学》19:10，1987年，同年收入《第5回国际比较文学论文集》。

裴炳均《聊斋志异研究》,1993 年 8 月

金元东《古典白话短篇小说研究》,1993 年 8 月

金映植《宋元话本小说的形成研究》,1994 年

李镇国《三国演义毛评的叙述论研究》,1994 年

金宜镇《老舍小说研究》,1996 年

金震坤《宋元平话研究》,1996 年

另外,"高丽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会"(成均馆大学)以及韩国外大、朝鲜大学等都有自己的学会和研究刊物。这些学会是挂靠在某一名校,而以全国或整个地区(如首尔)的学人为团结对象的。不仅学会工作在不断展开,而且也在越来越走向世界,与时代要求相适应。

从"韩国中国语文学会"的《中国文学》上发表的论文来看,20 世纪最后几年也出现了新的改革。本来,韩国的汉学研究沿用了古代学人重资料、考据的路子,但现代学术研究资料社会共享的特性,要求学人必须适应。徐敬浩会长自己最先系统地收集了韩国国内发表和出版的有关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研究成果的专著,在这一点上是开风气之先的。借助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在考据、资料的基础上出新,《中国文学》在这一方面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第 25 期(1996 年)上发表的洪尚勋的长篇论文,就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志怪传奇中的世界观问题。文章极见古典的扎实功底,又有深入的理论分析。

韩国崇实大学吴淳邦教授在《中国小说研究在韩国》一文里,开列了韩国出版的《中国小说论丛》部分目录:

中国小说论丛 第 3 辑 目次 1994. 10.

1. 试论中国小说的观念上之定位——以发生论为主　郑在书(梨花女大)

2. 从认识论的基础来看小说的现实性问题　赵宽熙(祥明大学)

3. 清代小说理论中的"本质论"研究　李腾渊(全南大学)

4.《史记》传的体裁考察　权锡焕(祥明大学)

5. 汪藻的《世说新录人名谱》探析　金长焕(江原大学)

6. 唐代的入仕观在小说中的表现　俞炳甲(清州大学)

7. "发迹变泰"话本的"公案性"新探　张映(成均馆大学)

8. 明末三位作家的同一题材形象化样相——陆人龙为主　权宁爱（淑明女大）

9. 借用中的独创，幻想中的讽刺——《西游补》的小说世界　吴淳邦（崇实大学）

10. 明清人情小说的勃兴和《红楼梦》的出现　高旼喜（翰林大学）

11.《红楼梦》脂批中“情不情”的意义考察　崔炳圭（韩国外大）

12. 王希廉《红楼梦》评点中的小说观　韩惠京（天主教大学）

13.《续红楼梦》的内容和其乐善斋本的翻译样相　崔溶澈（高丽大学）

14. 中国古典小说的国内流入时期与其过程及版本研究　闵宽东（庆熙大学）

15. 朝鲜时代中国小说戏曲词典学　朴在渊（鲜文大学）

中国小说论丛 第4辑 目次 1995. 3.

1. 叙事文学初期形态之神话——古代史诗为主　金善子（延世大学）

2. 盗跖寓言故事的叙事方式受容样相　权锡焕（祥明大学）

3. 中国叙事诗的初期形态　田宝玉（延世大学）

4. 志怪的文学性格考察——有关小说的起源问题　宾美贞（首尔大学）

5. 中国叙事文学论研究的基本课题试探　李腾渊（全南大学）

6. 中国小说史的叙述体系和类型的分类　崔溶澈（高丽大学）

7. 中国小说的起源和概念定义试论　赵宽熙（祥明大学）

8.《山海经》中的动物形象考　张美卿（成均馆大学）

9.《列仙传》研究　金长焕（江原大学）

10. 唐传奇小说论　卢惠淑（淑明女大）

11. 唐传奇的偶然性研究　金洛哲（成均馆大学）

12. 敦煌本《韩朋赋》的谈论构造　全弘哲（韩国外大）

13. 敦煌话本小说的成立问题考察　朴完镐（全南大学）

14. 唐传奇和敦煌讲唱文学对明代拟话本的影响考　金敏镐（高丽大学）

15.《醉翁谈录》“小说”说话的“小说”理论考　张映（成均馆大学）

16. 话本小说的因果应报观检讨　咸恩仙（淑明女大）

17. 三言的开放性——以对禁欲的磨炼为主题的作品为主　闵惠兰(全南大学)

18.《剪灯馀话》和乐善斋本《聘聘传》研究　朴在渊(鲜文大学)

19.《三国演义》的国内流入和其版本研究　闵宽东(庆熙大学)

20.《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和《青天白日》比较研究　李文赫(世明大学)

21. 韩译演义小说与韩国家门型古小说之间的连关性研究　宋真韩(全南大学)

22.《金瓶梅》性欲描写的意义分析　金兑坤(朝鲜大学)

23. 从王希廉评点看《红楼梦》的结构(1)　韩惠京(天主教大学)

24.《镜花缘》研究(1)——研究现况和分类问题检讨　郑荣豪(全南大学)

25.《醒世因缘传》的版本　郑在亮(成均馆大学)

26.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的理想世界　吴淳邦(崇实大学)

27. 李伯元小说的俗语考察　金锡起(成均馆大学)

28. 梁启超以小说寻路——"公"意识和小说力量批判　李琮敏(大田产业大学)

29. 古典的现代继承:鲁迅的《故事新编》考察　申振浩(鲜文大学)

30.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研究　金良守(成均馆大学)

中国小说论丛 第5辑 目次 1996. 3.

1. 韩国历代《红楼梦》翻译的再检讨　崔溶澈(高丽大学)

2. 言语翻译与文化翻译　郑晋培(延世大学)

3. 中国文学中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赵宽熙(祥明大学)

4.《太平广记》谚解本的谚解样相研究　尹河炳(全南大学)

5.《世说新语》佚文研究　金长焕(江原大学)

6. 唐传奇与神话构造的对比分析　金洛哲(成均馆大学)

7. 话本小说的因果应报观检讨(2)　咸恩仙(淑明女大)

8. 乐善斋本《后水浒传》研究　朴在渊(鲜文大学)

9. 侠义的概念和《儿女英雄传》的特点　金明信(高丽大学)

10.《活地狱》的结构和司法制度之紊乱　金锡起(成均馆大学)

11.《激流三部曲》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金仁哲(圆光大学)

12. 茅盾的《子夜》小考　朴宰范(岭南大学)

中国小说论丛 第6辑 目次 1997. 3.

1. 二百余年来《儒林外史》研究之回顾　陈美林(南京师大)

2.《老残游记》——刘鹗救国安天下方略的艺术化　刘瑜(山东社科院)

3. 对鲁迅中国小说史学的批判检讨　赵宽熙(祥明大学)

4. 神仙·道教传统中"龙"的意义　张贞海(韩信大学)

5. 乐善斋本《大明英烈传》研究　朴在渊(鲜文大学)

6. 中国古典小说的国内受容方法研究　闵宽东(庆熙大学)

7.《新罗殊异传》研究的基本脉络与观点　李剑国(南开大学)崔桓(岭南大学)

8. 敦煌讲唱写本果然是说唱艺人的底本吗?　金敏镐(高丽大学)

9.《金瓶梅》人物描写技法研究　金兑坤(朝鲜大学)

10.《聊斋志异》的家庭伦理　金惠经(大田产业大学)

11. 从王、张、姚三家评点看《红楼梦》的寓意体系　韩惠京(天主教大学)

12.《镜花缘》的构造和叙述特征　郑荣豪(西南大学)

13. 从小说形式看近代人的自我现象　文丁珍(高丽大学)

14. 西欧文化对中国小说的近代化所产生的影响关系探究　吴淳邦(崇实大学)

中国小说论丛 第7辑 目次 1998. 3.

1. 文言小说的理论研究与基础研究　李剑国(南开大学)

2. 李文烈《为了皇帝》之传统小说论探析　郑在书(梨花女大)

3. 中国小说研究在韩国(1945—1997)　赵宽熙(祥明大学)

4. 从古代中国的目录书目看小说概念的起源和变化　安正熏(首尔大学)

5.《太平广记》狐类故事小考　尹河炳(全南大学)

6. 关于15世纪历学书《训世评话》　朴在渊(鲜文大学)

7.《欢喜冤家》小考　金敏镐(高丽大学)

8. 从李伯元小说看晚清社会的奇现状　金锡起(成均馆大学)

9. 巴金与韩国战争　金仁哲(圆光大学)

10. 沈从文《边城》的原型模式和表现技巧　朴宰范(高丽大学)

中国小说论丛 第8辑 目次 1998. 8.

1. 历史与现实之救援　成谨济(延世大学)

2. 有关中国小说史的几种断想　李昭弦(首尔大学)

3. 从叙事观点看中国小说的演变　赵宽熙(祥明大学)

4. 司马迁的叙事论　洪尚勋(首尔大学)

5. 明清小说批评理论研究　许庚寅(檀国大学)

6. 志怪：小说和文化之间　郑在书(梨花女大)

7. 魏晋南北朝志怪的叙事模式变化研析　安正熏(首尔大学)

8. 八仙传说的由来与传播　金道荣(高丽大学)

9.《水浒传》的国内受容研究　闵宽东(庆熙大学)

10.《红楼梦》所见的中国岁时风俗　尚基淑(韩西大学)

11. 狭邪小说《花月痕》的再评价　金洛哲(成均馆大学)

12. 巴金的家小考　朴宰范(高丽大学)

中国小说论丛 第9辑 目次 1999. 2.

1.《海国妙喻》的成因及其问世的意义与影响　鲍延毅 鲍欣(山东枣庄师专)

2. 中国民间古典文学的记录传统与表演传统　金震坤(大田产业大学)

3. 中国小说的韩国说话化样相和意义　孙志凤(鲜文大学)

4. 从史实和虚构的角度阅读《燕丹子》　申秉澈(高丽大学)

5.《玄怪录》所表现的神仙观考察　宋伦美(成均馆大学)

6.《白蛇传》弹词小考　郑大雄(建阳大学)

7. 试论李渔的话本小说　闵惠卿(高丽大学)

8. 李渔戏曲的通俗性研究　朴泓俊(天安大学)

9.《红楼梦》与《镜花缘》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郑荣豪(西南大学)

10. 清代侠义爱情小说的人物形象研究　金明信(高丽大学)

11. 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所见的贫困形象研究　千贤耕(成均馆大学)

中国小说论丛 第10辑 目次 1999. 8.

1. 武侠小说渊源辨析　马美信(复旦大学)

2. 反讽与小说　赵宽熙(祥明大学)

3. 刘知几的叙事论——《史通》的周围　洪尚勋(首尔大学)

4. 中国古典小说所表现的死亡世界　闵宽东(庆熙大学)

5. 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女性形象(1)　金震坤(大田产业大学)

6. 朝鲜时代中国评点本小说的传播和影响　谭帆(华东师大)郑沃根(东义大学)

7. 唐代传奇神怪类情节模式　全星迳(国民大学)

8. 佛教系变文的系统和表演样相　金镇荣(忠南大学)

9. 目连说话的"地狱救母"渊源　张椿锡(全南大学)

10.《镜花缘》的样式和主题　洪周延(首尔大学)

11. 老舍的《骆驼祥子》研究　朴宰范(高丽大学)

就韩国学者的中国小说研究而言,第一个阶段是评介,第二个阶段是发展,第三个阶段是繁荣。学者们以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这三部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如本文介绍的张基槿先生、丁范镇先生等这样的大家还少些。在韩国的中国文学界,车柱环、金学主、许世旭等著名学者几乎都未涉及专门研究中国小说的领域。韩国的中国小说研究还大有可为。

第五编

韩国现存汉文作品

韩国现存汉文作品，可以分为佛经类、日志及史书类、诗文类三大类。佛经类主要是现存《高丽大藏经》以及经板“八万大藏经”；日志及史书类现存《承政院日记》《日省录》和《朝鲜王朝实录》《司马榜目》和郑麟趾《高丽史》、金富轼《三国史记》、一然《三国遗事》；诗文集主要是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辑出版的《韩国文集丛刊》，该丛刊已出版至350辑。此外，诗文集还应该包括古代编辑的《东文选》《大东野乘》和现在编辑的“燕行录”（主要研究基地为韩国东国大学和成均馆大学）。其中，笔者在韩国光盘版出版之初就已购得的有《朝鲜王朝实录》《司马榜目》和郑麟趾《高丽史》，金富轼《三国史记》、一然《三国遗事》购得的是印刷本。

韩国现存汉籍最集中的地方是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

一、佛经类

《高丽大藏经》。《高丽大藏经》是朝鲜半岛版本最古老的佛经。中国第一部汉文大藏经是由宋太祖发愿雕造、至太宗时完成的官版大藏经。因始雕于开宝年间，故称《开宝藏》，是我国最早雕刻印刷的佛典总集，其成书不论是在佛教史还是印刷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可惜《开宝藏》在元代已散佚，国内今存两种宋本残卷。《开宝藏》传入了高丽、日本等国，也成为了海内外大藏经的祖本，其影响极为深远。《开宝藏》成书后，高丽向宋廷求得，以此为蓝本开始雕刻大藏经，此即《高丽大藏经》初雕本。约公元1089年，高丽王朝增补续刻了《高丽大藏经》续雕本。1232年，蒙古军队入侵高丽，所有经板均毁于战火。1236年至1251年，《高丽大藏经》再雕本完成。现今仅存的再雕本被视为现存汉文大藏经中最为古老的版本。不仅如此，这些《高丽大藏经》的木刻雕版至今犹存，共八万多块，现藏于韩国海印寺内。它们于1995年被列为“世遗”。

二、日志及史书类

《承政院日记》。承政院是朝鲜定宗设立的机构，类似现今的秘书处。现存《承政院日记》包括自1623年（朝鲜仁祖元年）3月到1894年（朝鲜高宗三十一年）6月历时272年的国政记录。承政院此后改称承宣院、宫内部、秘书监、奎章阁，但其记录直到1910年为止，现存共3,243册。《承政院日记》是朝鲜王朝最庞大的汉字记录，1999年4月9日，《承政院日记》被指定为韩国第303号国宝，2001年9月被列为"世遗"。《承政院日记》是历代朝鲜文人的历史书写，只有一套原稿，无印刷本。故其字体并不一致。并且书写者以及当值者的姓名都一一记录下来。韩国有关机构已经将其逐页拍照为数字化图片。《承政院日记》是对朝鲜王朝国政的广泛实录，包括启禀、传旨、请牌、请推、呈辞、上疏、宣谕、传教等内容。记录方式逐日记载。《承政院日记》始于朝鲜王朝开国初期，前期《日记》因日军进攻的"壬辰倭乱"等战火被烧毁。《承政院日记》是研究韩国国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韩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军事、历书、天文、书法等方面必不可少的资料。就朝鲜汉学的角度而言，《承政院日记》的汉字书写是从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结束的大规模日记，它们是半岛最系统的用汉字记录的历史资料之一，也是300年间韩国文学变化发展的系统记录。

《朝鲜王朝实录》。它是自朝鲜王朝太祖至哲宗的25代君主共475年（1392至1863）按日记录的编年史，共1,893册，是最古老且庞大的汉字书写史书。《朝鲜王朝实录》所记录史实涵盖朝鲜王朝政治、外交、军事、制度、法律、经济、产业、交通、通讯、社会、风俗、美术、工艺、宗教等各个方面。由于奉中国为宗，其中有大量的中国史实，可以看做是中国史书的补充。《朝鲜王朝实录》由朝廷的春秋馆史官负责书写和编辑。春秋馆史官的设置，按照朝鲜文人的说法，是中国上古史官文化的遗存。春秋馆史官具有超越王权的独立地位，实录在新王即位后开设实录厅并安排史官编撰，其文稿国王也不能随意阅读，以确保实录的真实性和可信性。[①]《朝鲜王朝实录》由春秋馆史官编成后，就印刷刊行，分送到在朝鲜各要地设置的史库保存。在"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中，部分实录曾被火烧毁，但随后重新

① 参见拙著《半岛唐风：朝韩作家与中国文化》第130页"太祖大王欲见实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出刊或进行补修。至20世纪初,在鼎足山、太白山、赤裳山、五台山等4处史库,各留传1套实录。其中鼎足山本1,181册、太白山本848册、五台山本27册、其他散本21册,共2,077册。各种版本有重复。它们被定为韩国第151号国宝,1997年10月被列入"世遗"。

《日省录》。据韩国首尔大学崔承熙教授介绍,《日省录》起于朝鲜英宗三十六年(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年),止于纯宗四年(清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连续记录共151年,232册。但有缺漏。《日省录》采用日记形式用汉字对王朝国政进行实录,其内容包括启禀、传旨、请牌、请推、呈辞、上疏、宣谕、传教等。《日省录》是研究韩国国史的重要资料,同时《日省录》还有大量的朝鲜王朝与中国交流与交往的实际记录。尤其是朝鲜王朝使节团进贡中国的贡道以及贡道沿途中国风土人情的记录,对于中国与韩国都有巨大的文献价值。

《司马榜目》。朝鲜王朝的科举考试主要分司马试和文科考试,类似我国的乡试和会试。《司马榜目》记录了朝鲜王朝500多年的考试结果,高中者的父母姓名,出生地点,所中科目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三、诗文集

以下为笔者再整理的韩国现存诗文集目录,按时间顺序排列。之所以说是"再整理",是因为包括目录在内的韩国汉籍整理工作乃该国学者们几十年来从未间断的浩大工程。笔者按自己翻阅及理解情况加了注解,资料基本来自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原文刊印以及韩文索引、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韩文索引、韩国古今编译院的韩文翻译,特此致谢。

新罗文人作品:

崔致远(857—?)《桂苑笔耕集》。崔致远,字孤云,新罗王京(今庆州)沙梁部人。12岁到中国学习,五年后宾贡科及第。曾任唐朝的宣州溧水县尉。后为淮南节度使高骈掌书记。

崔致远于884年以唐使身份归国。新罗宪康王封他为侍读学士、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终因对现实不满,率家隐居伽耶山。崔致远被朝鲜历代公认为半岛汉文文学奠基人。《唐书·艺文志》列传中有介绍,《全唐诗》收有他的作品。罗隐等人还与他有过诗歌唱答。高丽文人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十六有传。朝鲜成均馆内大成殿的东西配位从享者加该国文人(西庑)崔致远、郑梦周、郑汝昌、李彦迪、金麟厚、成浑、宋时烈、朴世采以及(东庑)薛聪、安裕、金宏弼、赵光祖、李滉、李珥、金长生、宋浚吉。这些文人即"文庙配享"者。崔致远是西庑第一。

崔致远(857—?)《孤云集》。崔致远,字孤云,新罗王京(今庆州)沙梁部人。

高丽文人作品:

林椿(?)《西河集》。林椿是高丽仁宗朝人,字耆之,号西河,"海左七贤"之一。

李奎报(1168—1241)《东国李相国集》。李奎报,初名仁氏,字春卿,号(诗、琴、酒)三酷好先生、白云居士,本贯骊州。"全集"为四十一卷,"后集"十二卷,共有五十三卷,加"年谱"共十四册。

李奎报(1168—1241)《东国李相国集Ⅱ》。李奎报,初名仁氏,字春卿,号(诗、琴、酒)三酷好先生、白云居士,本贯骊州。

陈澕(?)《梅湖遗稿》。陈澕生活于高丽明宗到高宗年间。据黄景源《梅湖集序》(作于公元1783年,即朝鲜正宗七年,清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介绍,梅湖先生是洪州人,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进士。随后为翰林。并作为书状官出使我国金朝。回国后升任知制诰、右司谏并知公州事。卒于任上。

白贲华(1180—1224)《南阳诗集》。白贲华,字无咎,号南阳、参禅居士,本贯蓝浦。《南阳诗集》是其子白希谂于公元1249年搜集整理后出版的。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2卷所收录的本子是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藏本,乃是日本占领朝鲜时期的海印寺重印本。该本缺页很多,且全书字迹模糊,几不可读。其后有李奎报撰写的《京山府副使尚书礼部员外郎白公墓志》。

金坵(1211—1278)《止浦集》。金坵,字次山,号止浦,本贯扶宁。

李承休(1224—1300)《动安居士集》。李承休,号动安居士。于元至元十年癸酉(1273年)作为书状官出使元朝大都(今北京)。其"燕行录"名《宾王录》,收入《动安居士行录》卷四。

洪侃(1304—?)《洪崖遗稿》。洪侃,字平甫、云夫,号洪崖,本贯丰山。

安轴(1282—1348)《谨斋集》。安轴,字当之,号谨斋,本贯顺兴。

李齐贤(1287—1367)《益斋乱稿》。李齐贤,初名之公,字仲思,号益斋、栎翁,本贯庆州。新罗王后裔,1302年十五岁登第。1315年作为高丽忠宣王王璋的侍从到元大都(今北京),与中国元朝学者姚燧、阎复、赵孟頫、元明善、张养浩等人交往,游历了许多地方。1341年回国,官至佥议政丞,封鸡林府院君。其在华时间近三十年。

崔瀣(1287—1340)《拙稿千百》。崔瀣,字彦明、寿翁,号拙翁、猊山农隐,本贯庆州。

闵思平(1295—1359)《及庵诗集》。闵思平,字坦夫,号及庵,本贯骊兴。

李穀(1298—1351)《稼亭集》。李穀,初名芸白,字中父,号稼亭,本贯韩州。李穀乃李穡之父。1302年中举子科,1333年在中国元朝登制科及第,曾任元朝翰林国史院检阅。多次往返于两国之间,官至政堂文学,封韩山君。后在中国病逝。《稼亭集》二十卷。

郑誧(1309—1345)《雪谷集》。郑誧,字仲孚,号雪谷。受高丽国王派遣出使中国,病逝于大都(今北京)。

李达衷(1309—1385)《霁亭集》。李达衷,字仲权,号霁亭,本贯庆州。

白文宝(1303—1374)《淡庵逸集》。白文宝,字和父,号淡庵、动斋,本贯稷山。

李集(1327—1387)《遁村杂咏》。李集,字浩然,号墨岩斋、遁村,本贯广州。

田禄生(1318—1375)《野隐逸稿》。田禄生,字孟耕,号野隐,本贯潭阳。

李穡(1328—1396)《牧隐稿》。李穡,字颖叔,号牧隐,本贯韩州。稼亭李穀之子。从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到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李穡在中国作为国子监生员留学3年。1353年征东省乡试第一名。后以书状官身份参加燕行,再度赴中国。在大都(今北京)参加殿试,擢第二甲第二名。任中国元朝政府应奉翰林文字承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等职。回国后,官至成均馆大司成、政堂文学、门下侍中,封韩山君。《牧隐稿》共五十五卷,其中诗稿三十五卷,文稿二十卷。

李穡(1328—1396)《牧隐稿Ⅱ》。李穡,字颖叔,号牧隐,本贯韩州。

李穡(1328—1396)《牧隐稿Ⅲ》。李穡,字颖叔,号牧隐,本贯韩州。

郑枢(1333—1382)《圆斋稿》。郑枢,字公权,号圆斋、无形子,本贯

清州。

朴翊(1332—1398)《松隐集》。朴翊,字太始,号松隐,本贯密阳。

韩修(1333—1384)《柳巷诗集》。韩修,字孟云,号柳巷,本贯临津。

郑道传(1342—1398)《三峰集》。郑道传,字宗之,号三峰,本贯奉化。以推戴拥立朝鲜太祖即位,被封为开国功臣、辅国崇禄大夫、奉化伯。郑道传少年从牧隐李穡学习,1384 年(明洪武十七年甲子)农历七月,以书状官随圣节使正使郑梦周一起到中国南京,受明太祖朱元璋的欢迎与赏识;1390 年(明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六月,郑道传以圣节使正使再次出使中国;1392 年冬,以门下侍郎、赞成事的身份出使中国,到南京。《三峰集》的第一、第二卷是诗词与赋,第三卷与第四卷是文。第五到第六卷是经济文鉴,第七到第八卷是经国典。第九卷是"佛氏杂辨"。第十卷是理学。(九卷里佛论、十卷《心气理篇》《心难气》《心问》等,是性理学作品。)第十一、第十二卷是经济文鉴别集。第十三卷是(兵书)阵法。第十四卷是附录。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三峰集》乃 1791 年版本,共十四卷,七册。

郑梦周(1337—1392)《圃隐集》。郑梦周,字达可,号圃隐。本贯庆州迎日。全集三卷,加"附录",共四册。卷首有"遗像"。郑梦周于 1372 年、1384、1386 三次出使中国。朝鲜文庙配享。

金九容(1338—1384)《惕若斋学吟集》。金九容,字敬之,号惕若斋,本贯安东。1372 年(明洪武五年壬子)随洪师范、郑梦周出使中国,到达南京。1384 年,再次出使中国,明太祖朱元璋愤高丽国王与北元来往,将其流放大理卫。同年 7 月,金九容行至泸州附近的永宁县江门站病逝。金九容一路流放,一路书写,其燕行诗歌记录了 600 多年前从北京到四川的许多珍贵生活画面。参见拙著《半岛唐风:朝韩作家与中国文化》,第 258 - 270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成石璘(1338—1423)《独谷集》。成石璘,字自修,号独谷。本贯昌宁。

元天锡(1330—?)《耘谷行录》。元天锡,字子正,号耘谷,本贯原州。共五卷,三册。

卓光茂(1330—1410)《景濂亭集》。卓光茂,字谦夫,号景濂亭、拙隐,本贯光州。

李存吾(1341—1371)《石滩集》。李存吾,字顺卿,号石滩,本贯庆州。

李詹(1345—1405)《双梅堂箧藏集》。李詹,字小叔,号双梅堂,本贯

洪州。

赵浚(1346—1405)《松堂集》。赵浚,字明仲,号吁斋、松堂,本贯平壤。

河仑(1347—1416)《浩亭集》。河仑,字大临,号浩亭。本贯晋州。四次出使中国,主编朝鲜《太祖实录》。

李崇仁(1347—1392)《陶隐集》。李崇仁,字子安,号陶隐,本贯星州。1386年,以贺正使来我国南京。1388年,李穑出使我国,李崇仁为副使,李成桂之子李芳远为书状官。李芳远即后来的朝鲜太宗。

南在(1351—1419)《龟亭遗稿》。南在,字敬之,本贯宜宁。南在于1393年以"奏闻使"出使中国。次年再次出使中国,为陈奏副使。

权近(1352—1409)《阳村集》。权近,初名权晋,字可远、思叔,号阳村,本贯安东。高丽恭让王二年己巳(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六月,权近奉命出使中国,九月返回。1391年农历正月,奉命到中国南京为高丽王朝谢恩。朝鲜王朝建立,权近被封为资宪大夫、检校艺文春秋大学士兼成均大司成。1396年随使臣到中国南京,因文才出众大受朱元璋赏识,命留文渊阁,游观三日,赐宴招待。皇帝出题命其做诗二十四首,并赐之御制诗三首。《阳村集》共四十卷十册。其中第一卷至第十卷是诗歌,第十一卷至第十四卷是"记",第十五卷至第二十卷是"序",第二十一卷至第四十卷是其他类文章。

李行(1352—1432)《骑牛集》。李行,字周道,号骑牛子、白岩居士、一可道人,本贯骊兴。李行文科及第后,在高丽末期历任翰林院修撰、大司成等。高丽恭让王二年,判书吏曹。朝鲜王朝建立,李行骑牛入山,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故事,不肯受朝鲜太祖之召。后太宗以旧谊相征,终不肯出山。

吉再(1353—1419)《冶隐集》。吉再,字再父,号冶隐,本贯海平。高丽朝官至从事郎、门下注书。太祖李成桂建立朝鲜,隐居故乡,屡招不出。《冶隐集》卷首有吉再画像。

郑总(1358—1397)《复斋集》。郑总,字曼硕,号复斋,本贯清州。

李种学(1361—1392)《麟斋遗稿》。李种学,字仲文,号麟斋,本贯韩山。

李稷(1362—1431)《亨斋诗集》。李稷,字虞庭,号亨斋,本贯星州。

李原(1368—1429)《容轩集》。李原,字次山,号容轩,本贯固城。

卞季良(1369—1430)《春亭集》。卞季良,字巨卿,号春亭,本贯密阳。

尹祥(1373—1455)《别洞集》。尹祥,字实夫,号别洞,本贯醴泉。

朴兴生(1374—1446)《菊堂遗稿》。朴兴生,字敬夫,号菊堂、菊隐、春谷,本贯密阳。

申概(1374—1446)《寅斋集》。申概,字子格,号寅斋、养拙堂,本贯平山。

河演(1376—1453)《敬斋集》。河演,字渊亮,号敬斋,本贯晋州。

朴宜中(1337—1403)《贞斋逸稿》。朴宜中,字子虚,号贞斋,本贯密阳。

朝鲜文人作品:

河纬地(1412—1456)《丹溪遗稿》。河纬地,字天章、仲章,世称"丹溪先生",本贯善山。世宗二十年戊午(1438年)文科状元,官至礼曹参判。朝鲜端宗十四岁即王位不久,其叔父首阳大君于1455年夺取了王权,是为朝鲜世祖。河纬地、朴彭年、成三问、李塏、柳诚源、俞应孚六臣不服,谋取上王(端宗)复位,于是被杀,后被朝鲜史书称为"死六臣","死六臣"是作为守卫礼法的英雄被尊崇的。至今韩国首尔市鹭梁津附近还有"死六臣公园"。

柳方善(1388—1443)《泰斋集》。柳方善,字子继,号泰斋,本贯瑞山。

丁克仁(1401—1481)《不忧轩集》。丁克仁,字可宅,号不忧轩、茶轩、茶角,本贯灵光。

南秀文(1408—1442)《敬斋遗稿》。南秀文,字景质、景素,号敬斋,本贯固城。

金守温(1409—1481)《拭疣集》。金守温,字文良,号乖崖、拭疣,本贯永同。

崔恒(1409—1474)《太虚亭集》。崔恒,字贞父,号太虚亭,本贯朔宁。

元昊(?)《观澜遗稿》。元昊,字子虚,号观澜、雾巷,本贯原州。

梁诚之(1415—1482)《讷斋集》。梁诚之,字纯夫,号讷斋、松坡,本贯南原。

李石亨(1415—1477)《樗轩集》。李石亨,字伯玉,号樗轩,本贯延安。

朴彭年(1417—1456)《朴先生遗稿》。朴彭年,字仁叟,本贯平阳。朝鲜王朝著名的"死六臣"之一。

申叔舟(1417—1475)《保闲斋集》。申叔舟,字泛翁,号保闲斋、希贤堂,本贯高灵。官至议政府领议政(首相),并曾领兵作战。出为将,入为相,极受重用。1443年以书状官出使日本,其文才大受日人赏识。1445年从使臣到辽东,请教因罪发配于此的明翰林学士黄瓒,往来辽东十三次,为《训民正音》成书立了大功。1452年随谢恩使赴中国。1454年春,以谢恩使再次出使中国。

成三问(1418—1456)《成谨甫集》。成三问,字谨甫,号梅竹轩,本贯昌宁。朝鲜王朝著名的"死六臣"之一。

徐居正(1420—1488)《四佳集》。徐居正,字刚中,号四佳亭,本贯达城。其外祖父是阳村权近。徐官至正宪大夫、议政府左赞成,封达城君。与卢思慎等受命编辑《东文选》,又编辑《东国通鉴》《历代年表》《东人诗文》《太平闲话滑稽传》等大型书籍。其中《东文选》是古代朝鲜流传很广的一部汉文书,全书一百三十卷,四十六册。《四佳集》现有诗集二十五卷、诗集补遗三卷、文集六卷、文集补遗二卷,共二十七册。

徐居正(1420—1488)《四佳集Ⅱ》。徐居正,字刚中,号四佳亭,本贯达城。

赵旅(1420—1489)《渔溪集》。赵旅,字主翁,号渔溪,本贯咸安。

李承召(1422—1484)《三滩集》。李承召,字胤保,号三滩,本贯阳城。1459年,朴元亨为奏闻使出使中国,荐李承召为副使。

姜希孟(1424—1483)《私淑斋集》。姜希孟,字景醇,号私淑斋,本贯晋州。

成侃(1427—1456)《真逸遗稿》。成侃,字和仲,号真逸,本贯昌宁。《真逸遗稿》有徐居正的序言。共四卷,一册。

金宗直(1431—1492)《占毕斋集》。金宗直,字季昷,号占毕斋,本贯善山。金宗直自幼喜欢汉文,日书写常常万言。官至汉城府尹、刑曹判书兼弘文馆提学、知中枢府事。参编《东国舆地胜览》(五十卷),编修《庆尚道地图志》《青邱风雅》。金宗直门人众多。《占毕斋集》包括诗集二十三卷、文集二卷、《彝尊录》二卷,与年谱、附录等合为九册。

洪裕孙(1452—1529)《筱丛遗稿》。洪裕孙,字庆余、子容,号筱丛、狂真子,本贯南阳。

崔淑精(1432—1480)《逍遥斋集》。崔淑精,字国华,号逍遥斋,本贯完山。1475年(朝鲜成宗六年,明成化十一年乙未),随谢恩使出使中国。

金时习(1435—1493)《梅月堂集》。金时习,字悦卿,号清寒子、梅月堂、雪岑、东峰、碧山清隐、赘世翁,本贯江陵。五岁能为汉诗,世宗大王大加赏叹,时称神童。逝世后被尊为"生六臣"之一。1583年宣祖大王命刊印《梅月堂集》。有诗集十五卷、文集八卷,九册。

李陆(1438—1498)《青坡集》。李陆,字放翁,号青坡居士,本贯固城。

洪贵达(1438—1504)《虚白亭集》。洪贵达,字兼善,号涵虚亭,生于朝鲜世宗二十年,燕山君十年被杀。

成俔(1439—1504)《虚白堂集》。成俔,字磬叔,号虚白堂,本贯昌宁。其《乐学轨范》是朝鲜王朝乐学的重要文献,被看做半岛的《乐记》。

杨熙止(杨稀枝)(1439—1504)《大峰集》。杨熙止,字可行,号大峰。本贯祥原。其祖先本中国关西文人杨震之。《大峰集》引人注目的诗篇是《拆号日,上命臣熙止即刻入侍。特拜检阅。赐改名曰"稀枝",改字曰"桢父"。御笔题诗首句,令诸宰臣进联以识喜。诚千古未有之异数也》。

孙肇瑞(?)《格斋集》。孙肇瑞,生卒年不详,字引甫,号格斋、勉斋,本贯安东。

俞好仁(1445—1494)《濡溪集》。俞好仁,字克己,号濡溪。本贯高灵。

金訢(1448—1492)《颜乐堂集》。金訢,字君节,号颜乐堂,本贯延安。

李宜茂(1449—1507)《莲轩杂稿》。李宜茂,字馨之,号莲轩,本贯德水。

蔡寿(1449—1515)《懒斋集》。蔡寿,字耆之,号懒斋,本贯仁川。

表沿沫(1449—1498)《蓝溪集》。表沿沫,字少游,号蓝溪、平石,本贯新昌。

郑汝昌(1450—1504)《一蠹集》。郑汝昌,字伯勖,号一蠹,本贯河东。朝鲜文庙配享。

南孝温(1454—1492)《秋江集》。南孝温,字伯恭,号秋江,本贯宜宁。南孝温是占毕斋金宗直门徒,与金时习、元昊、赵旅、成聃寿、李孟专等是著名的"生六臣"。朝鲜成宗三年(1472年),上书请求为端宗平反昭雪。又撰写《六臣传》为"死六臣"正名。

丁寿岗(1454—1527)《月轩集》。丁寿岗,字不崩,号月轩,本贯押海。

曹伟(1454—1503)《梅溪集》。曹伟,字大虚,号梅溪,本贯昌宁。曹伟是占毕斋金宗直妻弟。

崔溥(1454—1504)《锦南集》。崔溥,字渊渊,号锦南,本贯罗州。1482年(明成化十八年壬寅)科举及第,1487年去济州奔父丧乘船被飘至我国浙江台州。归国后受王命写出《飘海录》。1492年以书状官出使我国。"戊午史祸"中,当政的燕山君大肆杀害文人,以其藏《占毕斋集》流放端川。崔溥于端川神色自若,处之坦然。1504年(明弘治十七年甲子),燕山君命处决之,年五十。《锦南集》原集二卷、《飘海录》三卷,合五册。

李湜(1458—1488)《四雨亭集》。李湜,字浪翁,号四雨亭,本贯全州。

崔忠成(1458—1491)《山堂集》。崔忠成,字弼卿,号山堂,本贯全州。

李宗准(?—1499)《慵斋遗稿》。李宗准,字仲匀,号慵斋、慵轩、浮休子、尚友堂、太庭逸民、庄六居士,本贯庆州。

李黿(?—1504)《再思堂逸集》。李黿,字浪翁,号再思堂,本贯庆州。

郑光弼(1462—1538)《郑文翼公遗稿》。郑光弼,字士勋,号守夫,本贯东莱。

申用漑(1463—1519)《二乐亭集》。申用漑,字漑之,号二乐亭,申叔舟后人,本贯高灵。善草书、隶书及骑射。1504年以圣节使出使中国。《二乐亭集》奎章阁藏本共十五卷,三册。

姜浑(1464—1519)《木溪遗稿》。姜浑,字士浩,号木溪子、东皋,本贯晋州。《木溪遗稿》是作者后孙于1910年刊印的。共二卷,一册。

金驲孙(1464—1498)《濯缨集》。金驲孙,字季云,号濯缨,本贯金海。濯缨先生是占毕斋金宗直的门人。原集八卷、续集二卷,合四册,前有宋时烈序言。

权五福(1467—1498)《睡轩集》。权五福,字向之,号睡轩,本贯醴泉。

李贤辅(1467—1555)《聋岩集》。李贤辅,字棐仲,号聋岩,本贯永川。

李胄(1468—1504)《忘轩遗稿》。李胄,字胄之,号忘轩,本贯固城。因是占毕斋金宗直的门人,"戊午史祸"时被流放到珍岛,燕山君十年被杀。《忘轩遗稿》不分卷,一册。

李堣(1469—1517)《松斋集》。李堣,字明仲,号松斋,本贯真宝。

郑希良(1469—1502)《虚庵遗集》。郑希良,字淳夫,号虚庵、散隐,本贯海州。续集卷三有"戊午史祸"资料。

朴英(1471—1540)《松堂集》。朴英,字子实,号松堂(斋),本贯密阳。卷三为《道统录》。

李穆(1471—1498)《李评事集》。李穆,字仲雍,号寒斋,本贯全州。

金世弼(1473—1533)《十清轩集》。金世弼,字公硕,号十清轩、知非翁,本贯庆州。卷四有《已卯名贤录》。

李希辅(1473—1548)《安分堂诗集》。李希辅,字伯益,号安分堂,本贯平壤。

洪彦忠(1473—1508)《寓庵集》。洪彦忠,字直卿,号寓庵,本贯缶溪。洪彦忠乃洪贵达子。

金克成(1474—1540)《忧亭集》。金克成,字成之,号忧亭、青萝、萝轩,本贯光山。卷三面三十二至面四十为燕行诗,燕行时间1521年。《入帝都,宿同文馆》对玉河馆的位置有记述。其中对传说"天下第一关"书者萧显有记述,《萧给事中显失鹤》小注云:"家在山海关,以善书闻"。

朴祥(1474—1530)《讷斋集》。朴祥,字昌世,号讷斋,本贯忠州。

沈义(1475—?)《大观斋乱稿》。沈义,字义之,号大观斋、大观子,本贯丰山。

洪彦弼(1476—1549)《默斋集》。洪彦弼,字子美,号默斋,本贯南阳。

权橃(1478—1548)《冲斋集》。权橃,字仲虚,号冲斋、松亭,本贯安东。卷三、四、五、六为正德四年日记。卷七为嘉靖十八年己亥(朝鲜中宗三十四年,1539年)《朝天录》,此次出使中国,权橃为"奏请使"。

金安国(1478—1543)《慕斋集》。金安国,字国卿,号慕斋,本贯义城。

李荇(1478—1534)《容斋集》。李荇,字择之,号容斋、沧泽渔叟、青鹤道人,本贯德水。卷四为《朝天录》,燕行时间为1500年。

朴闾(1479—1504)《挹翠轩遗稿》。朴闾,字仲说,号挹翠轩,本贯高灵。朴闾乃高灵人,李荇同学、同乡,南衮好友,申用漑之婿。弘文馆修撰。因忤燕山君而下狱死。子朴寅亮。

李耔(1480—1533)《阴崖集》。李耔,字次野,号阴崖、梦翁、溪翁,本贯韩山。

梁彭孙(1480—1545)《学圃集》。梁彭孙,字大春,号学圃,本贯济州。卷九为《乙卯党锢名录》。

金安老(1481—1537)《希乐堂稿》。金安老,字颐叔,号希乐堂、退斋、愚叟,本贯延安。《希乐堂稿》卷一前部分为手写。

赵光祖(1482—1519)《静庵文集》。赵光祖,字孝直,号静庵,本贯汉阳。卷一附录"事实"里有韩国理学源流简介。朝鲜文庙配享。

李迨(1483—1536)《月渊集》。李迨,字仲豫,号月渊主人、琴书子,本

贯骊州。

申光汉(1484—1555)《企斋集》。申光汉,字汉之、时晦,号企斋、骆峰、石仙斋、青城洞主,本贯高灵,领议政(首相)申叔舟之孙。申叔舟善汉语口语,与中国文人倪谦友善,二人通信终生。《企斋集》卷十一、十二为《皇华集》,最后三卷是文集。别集卷七面五"吾东人,鲜有作词者。益斋后无复继者"。

金正国(1485—1541)《思斋集》。金正国,字国弼,号思斋、八余居士,本贯义城。卷四面四十有"己卯党籍"。

金净(1486—1521)《冲庵集》。金净,字符冲,号冲庵、孤峰,本贯庆州。卷五有"十一箴",是性理学作品。

苏世让(1486—1562)《阳谷集》。苏世让,字彦谦,号阳谷、退休堂、清心子、谦斋、竹西,本贯晋州。《阳谷集》卷三、卷四是燕行诗,燕行时间为1533年。卷八末尾有手书墨迹。其草书很有名。

韩忠(1486—1552)《松斋集》。韩忠,字恕卿,号松斋,本贯清州。

宋麟寿(1487—1547)《圭庵集》。宋麟寿,字眉叟,号圭庵,本贯恩津。

沈彦光(1487—1540)《渔村集》。沈彦光,字士炯,号渔村,本贯三陟。卷一附录《年谱》,后有墨迹。

金絿(1488—1534)《自庵集》。金絿,字大柔,号自庵、栗谷病叟,本贯光州。卷二为《别曲》,韩国古代歌曲。

徐敬德(1489—1546)《花潭集》。徐敬德,字可久,号复斋、花潭,本贯唐城。《花潭集》卷二多研究性理、易。

李彦迪(1491—1553)《晦斋集》。李彦迪,字复古,号晦斋、紫溪翁,本贯骊州。朝鲜文庙配享。

郑士龙(1491—1570)《湖阴杂稿》。郑士龙,字云卿,号湖阴,本贯东莱。《湖阴杂稿》卷二是《朝天录》,燕行时间为1534年;卷三《甲辰朝天录》是郑士龙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出使中国的"燕行录"。

奇遵(1492—1521)《德阳遗稿》。奇遵,字子敬,号服斋、德阳,本贯幸州。

赵晟(1492—1555)《养心堂集》。赵晟,字伯阳,号养心堂,本贯平壤。

闵齐仁(1493—1549)《立岩集》。闵齐仁,字希中,号立岩,本贯骊兴。

尚震(1493—1564)《泛虚亭集》。尚震,字起夫,号泛虚亭、松岘、向日堂,本贯木川。本集前有墨迹,卷五有歌章。

成守圳(1493—1564)《听松集》。成守圳,仲玉,号听松,本贯昌宁。

宋纯(1493—1583)《俯仰集》。宋纯,字守初、诚之,号企村、俯仰亭,本贯新平。卷二为燕行诗。续集卷一有"燕行录"一文。

金义贞(1495—1548)《潜庵逸稿》。金义贞,字公直,号潜庵、幽敬堂,本贯丰山。

周世鹏(1495—1554)《武陵杂稿》。周世鹏,字景游,号慎斋、南皋、武陵道人、巽翁,本贯尚州。《别集》卷一有《首阳山赋》,卷八有用韩语书写的《道东曲》九章。

李瀣(1496—1550)《温溪逸稿》。李瀣,字景明,号温溪,本贯真宝。

林忆龄(1496—1568)《石川诗集》。林忆龄,字大树,号石川、荷衣,本贯善山。

成运(1497—1579)《大谷集》。成运,字健叔,号大谷、虚父、三山病人,本贯昌宁。本集分上、中、下集和附录。

罗世缵(1498—1551)《松斋集》。罗世缵,字丕承,号松斋,本贯罗州。集中有作者墨迹、洪奭周序墨迹等。

罗湜(1498—1546)《长吟亭遗稿》。罗湜,字正源,号长吟亭,本贯安定。

赵昱(1498—1557)《龙门集》。赵昱,字景阳,号愚庵、葆真庵、龙门、洗心堂,本贯平壤。

李浚庆(1499—1572)《东皋遗稿》。李浚庆,字原吉,号南堂、红莲居士、养窝、东皋,本贯广州。集中有许穆"跋"墨迹。

李恒(1499—1576)《一斋集》。李恒,字恒之,号一斋,本贯星州。

林熏(1500—1584)《葛川集》。林熏,字仲成,号葛川、自怡堂、枯查翁,本贯恩津。

李滉(1501—1570)《退溪集(别集)》。李滉,字景浩,号退溪、退陶,本贯安东。李滉乃朝鲜大儒,朝鲜文庙配享者。今韩国首尔有退溪路,韩国货币1000元上印其画像。《退溪集(别集)》卷八有性理学作品。附录《考证》卷一"要存录"四十三板。《退溪集(别集)》存目录二卷,原集四十九卷,别集一卷,外集一卷,年谱四卷,共三十册。

曹植(1501—1572)《南溟集》。曹植,字楗仲,号南冥、山海、方丈老子、方丈山人,本贯昌宁。卷二有《杏坛记》。

崔演(1503—1549)《艮斋集》。崔演,字演之,号艮斋,本贯江陵。其

中卷三是燕行诗歌。卷五与卷六是嘉靖十八年(1539年)做从事官迎接明朝使节团的对诗。卷九、十为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以冬至使出使中国的诗歌作品集。

林亨秀(1504—1547)《锦湖遗稿》。林亨秀,字士遂,号锦湖,本贯平湖。附录有中国文人华察等的诗歌。

洪暹(1504—1585)《忍斋集》。洪暹,字退之,号忍斋、讷庵,本贯南阳。

宋麒寿(1506—1581)《秋坡集》。宋麒寿,字台叟,号秋坡居士、讷翁,本贯恩津。《年表》载,宋麒寿于嘉靖三十六年丁巳(1557年)以"圣节使"出使中国,因品行高洁,被誉为"冰玉宰相"。

严昕(1508—1553)《十省堂集》。严昕,字启昭,号十省堂,本贯宁越。本集为"浅草文库"手写本。但该手写本"附录"《严公碣文》和《志铭》皆以为,严昕生卒年当为1508—1543,与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卷三十二(1989年出版)的记载有异。《严公碣文》有"年三十六,病卒京师"句;《志铭》载严昕卒年为"癸卯"。

金麟厚(1510—1560)《河西全集》。金麟厚,字厚之,号河西、湛斋,本贯蔚山。从祀文庙。全集十二卷,附录四卷。卷第十二有"上梁文"。朝鲜文庙配享。

金澍(1512—1563)《寓庵集》。金澍,字应霖,号寓庵,本贯安东。全集七卷。前有李福源手书"序"。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年)以礼曹参判出使中国,卒于北京。皇帝命礼部治丧(见卷七之第四面)。

吴祥(1512—1573)《负喧堂遗稿》。吴祥,字祥之,号负喧堂,本贯海州。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年),以朝鲜仁宗大王即位之"告计使"出使大明;明隆庆六年壬申(1572年),因明朝穆宗皇帝升遐,以"降香使"赴北京。

李桢(1512—1571)《龟岩集》。李桢,字刚而,号龟岩,本贯泗川。有《别集》二卷。

丁熿(1512—1560)《游轩集》。丁熿,字季晦,号游轩,本贯昌原。集内有宋焕箕于"崇祯后三戊午"手书序,以及"崇祯八十八年乙未"后孙丁载兴手书跋。

朴枝华(1513—1592)《守庵遗稿》。朴枝华,字君实,号守庵,本贯旌善。内有手迹。

柳希春(1513—1577)《眉岩集》。柳希春,字仁仲,号眉岩、涟溪,本贯善山。全集二十一卷。卷一《府文庙新设郑文忠心公位板》。卷三《锦南先生事实记》《飘海录跋》对崔溥一生记录详细。卷四是性理学著作。卷五至卷十四为《日记》(1567—1576年)(其中卷九之面三十四于朝鲜君臣迎接"天使"过程记载详细)。

尹铉(1514—1578)《菊涧集》。尹铉,字子用,号菊涧,本贯坡平。《菊涧集》分上中下三卷。

李元禄(1514—1574)《朴谷集》。李元禄,字士兴,号朴谷。李元禄是高丽文人遁村李集的后人。

卢守慎(1515—1590)《稣斋集》。卢守慎,字寡悔,号稣斋、伊斋、十青亭、暗室,本贯光州。该集共十二卷。卷五第三十六面是其和明朝使节陈世能诗。卷七有《车赋》。《内集》是性理学作品。

郑惟吉(1515—1588)《林塘遗稿》。郑惟吉,字吉元,号林塘、尚德斋,本贯东莱。外孙金尚宪序。卷下有《傧接录》是陪同"韩正使"等中国使节团文人的诗歌作品。

洪仁佑(1515—1554)《耻斋遗稿》。洪仁佑,字应吉,号耻斋,本贯南阳。世传其先乃唐朝派遣入高句丽八学士之一。卷二是《日录钞》,自戊戌年(1538年)开始的日记。

宋寅(1517—1584)《颐庵遗稿》。宋寅,字明仲,号颐庵,本贯砺山。

沈守庆(1516—1599)《听天堂诗集》。沈守庆,字希安,号听天堂,本贯丰山。

朴承任(1517—1586)《啸皋集》。朴承任,字重甫,号铁津、啸皋、水西翁,本贯潘南。卷二有燕行诗。

杨士彦(1517—1584)《蓬莱诗集》。杨士彦,字应聘,号蓬莱、海客、完丘、沧海,本贯清州。

李之菡(1517—1587)《土亭遗稿》。李之菡,字馨伯、馨仲,号土亭、水山,本贯韩山。

林芸(1517—1572)《瞻慕堂集》。林芸,字彦成,号瞻慕堂、芦洞散人,本贯恩津。

许晔(1517—1580)《草堂集》。许晔,字太辉,号草堂。历任成均馆大司成、司谏院大司谏、弘文馆副提学等。长子、次子和三子以及三女许楚姬(1563—1589,字景樊,号兰雪轩)皆为著名文人。

黄俊良(1517—1563)《锦溪集》。黄俊良,字仲举,号锦溪,本贯平海。

卢禛(1518—1578)《玉溪集》。卢禛,字子膺,号玉溪、迂斋,本贯丰川。续集卷一"歌"中有部分韩文字母。

金贵荣(1519—1593)《东园集》。金贵荣,字显卿,号东园,本贯尚州。前有遗墨。

梁应鼎(1519—1581)《松川遗集》。梁应鼎,字公燮,号松川,本贯济州。卷一有1577年出使中国诗作。

康惟善(1520—1549)《舟川遗稿》。康惟善,字符叔,号明庵、舟川,本贯信川。

权擘(1520—1593)《习斋集》。权擘,字大手,号安排堂、习斋,本贯安东。

吴健(1521—1574)《德溪集》。吴健,字子强,号德溪,本贯咸阳。

姜翼(1523—1567)《介庵集》。姜翼,字仲辅,号介庵、松庵,本贯晋州。

徐起(1523—1591)《孤青遗稿》。徐起,字待可,号颐窝、龟堂、孤青、孤青樵,本贯利川。

朴淳(1523—1589)《思庵集》。朴淳,字和叔,号思庵、青霞子,本贯忠州。

赵穆(1524—1606)《月川集》。赵穆,字士敬,号月川、东皋,本贯横城。

金隆(1525—1594)《勿岩集》。金隆,字道盛,号勿岩,本贯咸昌。

具凤龄(1526—1586)《柏潭集》。具凤龄,字景瑞,号圭峰、柏潭,本贯绫城。

文益成(1526—1584)《玉洞集》。文益成,字叔栽,号玉洞,本贯南平。

朴光前(1526—1605)《竹川集》。朴光前,字显哉,号竹川,本贯珍原。

郑琢(1526—1605)《药圃集》。郑琢,字子精,号药圃、柏谷,本贯清州。

奇大升(1527—1572)《高峰集》。奇大升,字明彦,号高峰、存斋,本贯幸州。后有《论思录》日记。

郑介清(1529—1590)《愚得录》。郑介清,字义伯,号困斋,本贯固城。似乎全书皆为性理学作品。

具思孟(1531—1604)《八谷集》。具思孟,字景时,号八谷,本贯绫城。

最后《吊亡录》多“壬辰倭乱”人名。

金富伦(1531—1598)《雪月堂集》。金富伦,字惇叙,号雪月堂,本贯光山。

权好文(1532—1587)《松岩集》。权好文,字章仲,号松岩、青城山人,本贯安东。卷六是家礼,较简单。《松岩续集》卷七《松岩独乐》有韩国语字句。

金孝元(1532—1590)《省庵遗稿》。金孝元,字仁伯,号省庵,本贯善山。卷二有《头陀山日记》。

辛应时(1532—1585)《白麓遗稿》。辛应时,字君望,号白麓,本贯宁越。

黄廷彧(1532—1607)《芝川集》。黄廷彧,字景文,号芝川,本贯长水。

尹斗寿(1533—1601)《梧荫遗稿》。尹斗寿,字子仰,号梧阴,本贯海平。

高敬命(1533—1592)《霁峰集》。高敬命,字而顺,号霁峰、苔轩,本贯长兴。卷四有其于明万历九年辛巳(1581)出使中国诗作。

郑惟一(1533—1576)《文峰集》。郑惟一,字子中,号文峰,本贯东莱。

权文海(1534—1591)《草涧集》。权文海,字灏元,号草涧,本贯醴泉。卷四有杂记。后有遗墨。

宋翼弼(1534—1599)《龟峰集》。宋翼弼,字云长,号龟峰、玄绳,本贯砺山。卷五后为礼学作品。

成浑(1535—1598)《牛溪集》。成浑,字浩原,号牛溪、默庵,本贯昌宁。卷六有杂记,是日记。朝鲜文庙配享。

郑仁弘(1535—1623)《来庵集》。郑仁弘,字德远,号来庵,本贯瑞山。

李济臣(1536—1584)《清江集》。李济臣,字梦应,号清江,本贯全义。1569年以冬至使书状官出使中国。

李珥(1536—1584)《栗谷全集1》。李珥,字叔献,号栗谷、石潭、愚斋,本贯德水。朝鲜大儒,著名性理学家,朝鲜文庙配享。现今5000元韩币上为栗谷李珥画像。《栗谷全集1》共二十三卷。

李珥(1536—1584)《栗谷全集2》。卷二十八卷为《圣学辑要》,二十九至三十为《经筵辑要》明宗乙丑至辛未共七年的日记。卷三十一、三十二为《语录》,《拾遗》卷四有《贡路策》。

李海寿(1536—1599)《药圃遗稿》。李海寿,字大仲,号药圃、敬斋,本

贯全义。

郑澈(1536—1593)《松江集》。郑澈,字季涵,号松江,本贯延日。

洪圣民(1536—1594)《拙翁集》。洪圣民,字时可,号拙翁,本贯南阳。

金千镒(1537—1593)《健斋集》。金千镒,字士重,号健斋、克念堂,本贯彦阳,曾任水原府使。壬辰倭乱时举义兵至江华岛,城陷前杀敌。投水自尽。附录卷三《年谱》面十一有详细记载。

白光勋(1537—1582)《玉峰集》。白光勋,字彰卿,号玉峰,本贯海美。

尹根寿(1537—1616)《月汀集》。尹根寿,字子固,号月汀,本贯海平。有明朝钦差大臣熊化"序"。其中《月汀朝天录》是"燕行录",燕行时间为明万历十七年己丑,即1589年。

赵宗道(1537—1597)《大笑轩逸稿》。赵宗道,字伯由,号大笑轩,本贯咸安。

李山海(1539—1609)《鹅溪遗稿》。李山海,字汝受,号鹅溪、终南睡翁、竹皮翁、柿村居士,本贯韩山。其中《鹅溪年谱》载,李山海是明隆庆元年丁卯(1567年)出使朝鲜的明朝文人许国、魏时亮的"远接使"。

金诚一(1538—1593)《鹤峰集》。金诚一,字士纯,号鹤峰,本贯义城。卷六《朝鲜国沿革考异》是答复日本人的文字。续集卷一有燕行诗以及长诗《朝天纪行》,燕行时间为1577年。

郑昆寿(1538—1602)《柏谷集》。郑昆寿初名郑逵,字汝仁,号柏谷、庆阴、朝隐,本贯清州。卷二有《呈兵部尚书石星文》。卷三为《赴京日录》(1592年)。后者是著名的"燕行录"。

河沆(1538—1590)《觉斋集》。河沆,字灏源,号觉斋、来复斋,本贯晋州。

柳云龙(1539—1601)《谦庵集》。柳云龙,字应见,号谦庵,本贯丰山。

李诚中(1539—1593)《坡谷遗稿》。李诚中,字公著,号坡谷,本贯全州。

崔岦(1539—1612)《简易集》。崔岦,字立之,号东皋、简易堂,本贯通川。卷四、五多是与中国礼部来往公文、与援朝明将李如松等的文字往来。卷六、七为其1577、1581年、1594年燕行诗歌。

崔庆昌(1539—1583)《孤竹遗稿》。崔庆昌,字嘉运,号孤竹,本贯海州。其中有燕行诗,燕行时间为1576年。

金玏(1540—1616)《柏岩集》。金玏,字希玉,号柏岩,本贯礼安。

金宇颙(1540—1603)《东冈集》。金宇颙,字肃夫,号东冈、直峰布衣,本贯义城。

朴汝龙(1541—1611)《松厓集》。朴汝龙,字舜卿,号松崖,本贯沔川。

李德弘(1541—1596)《艮斋集》。李德弘,字宏仲,号艮斋,本贯永川。卷五、六为性理学作品。

李廷馣(1541—1600)《四留斋集》。李廷馣,字仲熏,号四留斋、退忧堂、月塘,本贯庆州。卷八为《行年日录》。卷十《倭变录》追述日本自新罗时期侵略朝鲜的历史。

洪可臣(1541—1615)《晚全集》。洪可臣,字兴道,号晚全堂、艮翁,本贯南阳。

安敏学(1542—1601)《枫崖集》。安敏学,字习之、而习,号枫崖、湖月堂,本贯广州。其中"杂著"是性理学著作。

柳成龙(1542—1607)《西厓集》。柳成龙,字而见,号西厓、云岩,本贯丰山。《西厓集》卷一《朝天录》为其"燕行录",燕行时间为1569年。

李瑀(1542—1609)《玉山诗稿》。李瑀,字季献,号玉山,本贯德水。

李纯仁(1533—1592)《孤潭逸稿》。李纯仁,字春乡、伯生,号孤潭,本贯全义。

郑逑(1543—1620)《寒冈集》。郑逑,字道可,号寒冈、泗阳病叟,本贯清州。卷六、七多礼学作品。

梁大朴(1544—1592)《青溪集》。梁大朴,字士真,号松岩、竹岩、青溪道人,本贯南原。

李鲁(1544—1598)《松岩集》。李鲁,字汝唯,号松岩、文殊山人,本贯固城。

赵宪(1544—1592)《重峰集》。赵宪,字汝式,号后栗、陶原、重峰,本贯白川。卷首有多图,记录礼仪与击退倭寇。卷四为《拟上十六条疏》。卷十、卷十一、卷十二《朝天日记》为"燕行录"。燕行时间为1574年。其中有"石油"一节。

刘希庆(1545—1636)《村隐集》。刘希庆,字应吉,号村隐,本贯江华。

李舜臣(1545—1598)《李忠武公全书》。李舜臣,字汝谐,本贯德水。万历四年丙子(1576年)武科及第。曾任全罗道左水军节度使。他是"壬辰倭乱"中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民族英雄。全书多国王教谕、图片及年表,对李舜臣改造之"龟船"图解尤其细致。

曹好益(1545—1609)《芝山集》。曹好益,字士友,号芝山,本贯昌宁。卷六是性理学作品。

郑士诚(1545—1607)《芝轩集》。郑士诚,字子明,号芝轩,本贯清州。卷三《壬辰日录》记录的是日本丰臣秀吉派兵侵朝后事情。

成汝信(1546—1632)《浮槎集》。成汝信,字公实,号浮槎,本贯昌宁。

朴而章(1547—1622)《龙潭集》。朴而章,字叔彬,号龙潭,本贯顺天。卷二为燕行诗(1591、1603年)。

李元翼(1547—1634)《梧里集》。李元翼,字公励,号梧里,本贯全州。卷二有"燕行录"(燕行时间为1591、1603年)。

金长生(1548—1631)《沙溪遗稿》。金长生,字希元,号沙溪,本贯光山,其子金集也是朝鲜著名文人。《沙溪遗稿》多性理学作品,卷十是门生宋时烈整理的金长生"语录"。朝鲜文庙配享。

沈喜寿(1548—1622)《一松集》。沈喜寿,字伯惧,号一松、水雷累人,本贯青松。其中有《皇华伺候录》。

许筬(1548—1612)《岳麓集》。许筬,字功彦,号岳麓、山前,本贯阳川。许晔(1517—1580)长子。

柳根(1549—1627)《西坰集》。柳根,字晦夫,号西坰、孤山,本贯晋州。卷四注中有"万历丙午(1606年)三月,敬次正使朱公之蕃"字样。该卷皆为柳根与朱之蕃等中国使节的唱和作品。

李廷馨(1549—1607)《知退堂集》。李廷馨,字德熏,号知退堂、东阁、西山老人,本贯庆州。

林悌(1549—1587)《林白湖集》。林悌,字子顺,号白湖、谦斋、枫江,本贯罗州。

宋象贤(1551—1592)《泉谷集》。宋象贤,字德求,号泉谷、寒泉,本贯砺山。

许篈(1551—1588)《荷谷集》。许篈,字美叔,号荷谷,本贯阳川。许晔次子。其《荷谷先生朝天记》燕行时间为1574年。

郭再佑(1552—1617)《忘忧集》。郭再佑,字季绥,号忘忧,本贯玄风。

闵仁伯(1552—1626)《苔泉集》。闵仁伯,字伯春,号苔泉,本贯骊兴。

吴亿龄(1552—1618)《晚翠集》。吴亿龄,字大年,号晚翠,本贯同福。

韩百谦(1552—1615)《久庵遗稿》。韩百谦,字鸣吉,号久庵,本贯清州。韩百谦曾具体测量平壤井田的面积与规格,并作《井田说》。

高尚颜(1553—1623)《泰村集》。高尚颜,字思勿,号泰村、南石,本贯开城。

李好闵(1553—1634)《五峰集》。李好闵,字孝彦,号五峰、南郭、睡窝,本贯延安。

张显光(1554—1637)《旅轩集》。张显光,字德晦,号旅轩,本贯仁同。

韩应寅(1554—1614)《百拙斋遗稿》。韩应寅,字春卿,号百拙斋、柳村,本贯清州。1576年进士小科及第,1584年任"宗系辨诬奏请使"书状官,出使中国。1591年,日本使节玄苏等给朝鲜王朝发出无礼书信,韩应寅作为"陈奏使"赴北京,并受明朝万历帝接见。归国路上,日军入侵朝鲜,"壬辰倭乱"爆发。在义州升为工曹判书,迎接李如松提督带领的明军入朝。后官至右议政。1613年因"癸丑狱事"受牵累,次年逝世。

李达(1539—1618)《荪谷诗集》。李达,字益之,号荪谷、西潭、东里,本贯新平。

河受一(1553—1612)《松亭集》。河受一,字太易,号松亭,本贯晋州。

赵靖(1555—1636)《黔涧集》。赵靖,字安中,号黔涧,本贯丰壤。

李廷立(1556—1595)《溪隐遗稿》。李廷立,字子政,号溪隐,本贯广州。

车天辂(1556—1615)《五山集》。车天辂,字复元,号五山、橘园,本贯延安。车天辂与明朝文人朱之蕃多有唱和。朱之蕃,字符介,号兰隅,南直上元(今南京)人。万历乙未(1595年)状元,官至吏部右侍郎。万历三十三年乙巳冬(1606年)出使朝鲜,在朝鲜有很高的知名度。

裴龙吉(1556—1609)《琴易堂集》。裴龙吉,字明瑞,号琴易堂,本贯兴海。

李恒福(1556—1618)《白沙集》。李恒福,字子常,号白沙、弼云、东冈,本贯庆州。高丽末期著名文人李齐贤之后。1580年谒圣文科及第,1583年国君赐暇读书,升正字。后任艺文馆奉教、吏曹佐郎。1589年后为应教、直提学、右承旨。1590年为户曹参议。1592年以后,分别任吏曹参判、刑曹判书、都总管。日军入侵朝鲜,明军入朝援助,为远接使。1595年为礼曹判书、弘文馆大提学、艺文馆大提学、知义禁府事、右参赞。1597年为兵曹判书、右议政,出使中国。回国后升为领议政。1604年被封为扈圣一等功臣。光海君执政后被罢官流放,后复职。有《白沙集》《北迁日录》等著作传世。

韩浚谦(1557—1627)《柳川遗稿》。韩浚谦,字益之,号柳川,本贯清州。

金涌(1557—1620)《云川集》。金涌,字道源,号云川,本贯义城。

徐渻(1558—1631)《药峰遗稿》。徐渻,字玄纪,号药峰,本贯达城。1803年来华的朝鲜文人李海应《蓟山纪程·仁贤书院》记载说:"院在外城之内,奉箕子影帧,眉目粹然,首着冔冠。冠制,如近日妇女常着墨帽子。徐药逢(峰)尝入燕,得《箕子陈〈洪范〉图》一本,遂匣藏于此"。《药峰遗稿》卷三《行状》与《神道碑铭》皆为金尚宪所作。

李厚庆(1558—1630)《畏斋集》。李厚庆,字汝懋,号畏斋,本贯星州。

柳梦寅(1559—1623)《於于集》。柳梦寅,字应文,号於于堂、艮斋、默好子,本贯兴阳。

成文浚(1559—1626)《沧浪集》。成文浚,字仲深,号沧浪,本贯昌宁。

吴允谦(1559—1636)《楸滩集》。吴允谦,字汝益,号楸滩、土塘,本贯海州。

李埈(1560—1635)《苍石集》。李埈,字叔平,号苍石、西溪,本贯兴阳。《苍石集》目录及原集十八卷,十册。

李埈(1560—1635)《苍石集Ⅱ》。李埈,字叔平,号苍石、西溪,本贯兴阳。

金尚容(1561—1637)《仙源遗稿》。金尚容,字景择,号仙源、枫溪,本贯安东。万历十八年(1590年)增广文科及第,历任吏曹佐郎、同副承旨等。1598年以"圣节使"出使中国。回国后为刑曹参议、兵曹参议,升为左承旨。后判汉城府,为礼曹判书。后金军队进攻朝鲜,仁祖大王躲避江都,金尚容留守汉城。后官至议政府右议政。崇祯十年丁丑(1637年),后金军队再次进攻朝鲜,金尚容带社主等先到江华。后金军队突至,金尚容点燃火药自焚。《仙源遗稿》内有《年谱》。

朴仁老(1561—1642)《芦溪集》。朴仁老,字德翁,号芦溪、无何翁,本贯密阳。

李德馨(1561—1613)《汉阴文稿》。李德馨,字明甫,号汉阴、双松、抱雍散人,本贯广州。1508年文科别试及第,1591年升大提学、礼曹参判。日军入侵朝鲜,以"请援使"入明都北京。回国后为汉城府判尹,并充当明将李如松的接伴官。1594年出任吏曹判书,并任京畿、平安、黄海等四道体察府使。1597年,"丁酉再乱"时,明将杨镐带兵入朝支持。李德馨任右

议政、行判中枢府事。升领议政。1608年,以“陈奏使”再次入北京。

黄慎(1560—1617)《秋浦集》。黄慎,字思叔,号秋浦,本贯昌原。1596年,黄慎作为“通信使”带领庞大的使节团出使日本。高丽王朝辛禑元年(1375年)即派出了首个通信使团到日本,朝鲜王朝也多次向日本派出过通信使节团。

李睟光(1563—1628)《芝峰集》。李睟光,字润卿,号芝峰,本贯全州,朝鲜太宗大王之子敬宁君的六代孙。他曾三次到北京,作为朝鲜王朝的特使觐见明朝皇帝。其《芝峰类说》于1614年脱稿,共三千四百三十五条,征引书目从六经开始到“本朝”共三百四十八家,涉及人物二千二百六十五人,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李春英(1563—1606)《体素集》。李春英,字实之,号体素,本贯全州。

郑晔(1563—1625)《守梦集》。郑晔,字时晦,号守梦、雪村,本贯草溪。

许楚姬(1563—1589)《兰雪轩诗集》。许楚姬,字景樊,号兰雪轩,本贯阳川。她是许晔(1517—1580)三女,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诗集前有明朝文人朱之蕃、梁有年书于朝鲜碧蹄馆的《序》。

全湜(1563—1642)《沙西集》。全湜,字净远,号沙西,本贯沃川。

崔晛(1563—1640)《讱斋集》。崔晛,字季升,号讱斋,本贯全州。

郑经世(1563—1633)《愚伏集》。郑经世,字景任,号河渠、乘成子、石濑道人、松麓、愚伏,本贯晋州。

许禧(1563—1640)《水色集》。许禧,字子贺,号水色、尚古斋,本贯阳川。

张兴孝(1564—1633)《敬堂集》。张兴孝,字行原,号敬堂,本贯安东。

李廷龟(1564—1635)《月沙集Ⅰ》。李廷龟,字圣征,号月沙、秋崖、习静、痴庵、保晚亭主人,本贯延安。《月沙集》原集六十三卷,附录五卷,合二十册。

李廷龟(1564—1635)《月沙集Ⅱ》。李廷龟,字圣征,号月沙、秋崖、习静、痴庵、保晚亭主人,本贯延安。

柳潚(1564—1636)《醉吃集》。柳潚,字渊叔,号醉吃,本贯兴阳(高兴)。

郑文孚(1565—1624)《农圃集》。郑文孚,字子虚,号农圃,本贯海州。

鲁认(1566—1622)《锦溪集》。鲁认,字公识,号锦溪、锦里,本贯咸平

(咸丰)。

申钦(1566—1628)《象村稿Ⅰ》。申钦,字敬叔,号敬堂、百拙、南皋、玄轩、象村居士、玄翁、放翁、旅庵,本贯平山。《象村稿》原集等六十卷,合二十册。

申钦(1566—1628)《象村稿Ⅱ》。申钦,字敬叔,号敬堂、百拙、南皋、玄轩、象村居士、玄翁、放翁、旅庵,本贯平山。

姜沆(1567—1618)《睡隐集》。姜沆,字太初,号睡隐,本贯晋州。

赵纬韩(1567—1649)《玄谷集》。赵纬韩,字持世,号素翁、玄谷,本贯汉阳。

李庆全(1567—1644)《石楼遗稿》。李庆全,字仲集,号石楼、瑞草,本贯韩山。

梁庆遇(1568—?)《霁湖集》。梁庆遇,字子渐,号霁湖、点易斋、蓼汀、泰岩,本贯南原。

卢景任(1569—1620)《敬庵集》。卢景任,字弘仲,号敬庵,本贯安康。

许筠(1569—1618)《惺所覆瓿稿》。许筠,字端甫,号蛟山、惺所,本贯阳川。

李时发(1569—1626)《碧梧遗稿》。李时发,字养久,号后颍渔隐、碧梧,本贯庆州。

权韡(1569—1612)《石洲集》。权韡,字汝章,号石洲,本贯安东。

郑蕴(1569—1641)《桐溪集》。郑蕴,字辉远,号桐溪、鼓鼓子,本贯草溪(八溪)。

沈悦(1569—1646)《南坡相国集》。沈悦,字学而,号南坡,本贯青松。

权得己(1570—1622)《晚悔集》。权得己,字重之,号晚悔、居元子,本贯安东。

李民宬(1570—1629)《敬亭集》。李民宬,字宽甫,号敬亭,本贯永川。

金尚宪(1570—1652)《清阴集》。金尚宪,字叔度,号清阴,本贯安东,金尚容之弟。金尚宪以判书身份参与抵御后金军队,兵败后国王下南汉山城,而金尚宪自缢未死。后随朝鲜世子被掠至沈阳,单独关押后被放还。官至左议政。朝鲜文人申钦《象村集》、朝鲜文人尹斗寿《梧荫遗稿》前有金尚宪手书序言。朝鲜文人郑惟吉(1515—1588)《林塘遗稿》有"外孙安东金尚宪"手书序。

李安讷(1571—1637)《东岳集》。李安讷,字子敏,号东岳、东谷、东

广，本贯德水。

金鎏(1571—1648)《北渚集》。金鎏，字冠玉，号北渚，本贯顺天。

李春元(1571—1634)《九畹集》。李春元，字立之、元吉，号九畹，本贯咸平。

赵缵韩(1572—1631)《玄洲集》。赵缵韩，字善述，号玄洲，本贯汉阳。

洪瑞凤(1572—1645)《鹤谷集》。洪瑞凤，字辉世，号鹤谷，本贯南阳。

金奉祖(1572—1630)《鹤湖集》。金奉祖，字孝伯，号鹤湖，本贯丰山。

朴知诚(1573—1635)《潜冶集》。朴知诚，字仁之，号潜冶，本贯咸阳。

安邦俊(1573—1654)《隐峰全书Ⅰ》。安邦俊，字士彦，号冰壶、牛山、隐峰，本贯竹山。《隐峰全书》原集三十八卷，附录二卷，合二十册。

安邦俊(1573—1654)《隐峰全书Ⅱ》。安邦俊，字士彦，号冰壶、牛山、隐峰，本贯竹山。

成汝学(1557—?)《鹤泉集》。成汝学，字学颜，号鹤泉、双泉，本贯昌宁。

李民窦(1573—1649)《紫岩集》。李民窦，字而壮，号紫岩，本贯永川。

洪命元(1573—1623)《海峰集》。洪命元，字乐夫，号海峰，本贯南阳。

金集(1574—1656)《慎独斋遗稿》。金集，字士刚，号慎独斋，本贯光山。金集乃朝鲜著名性理学家金长生之子。

睦大钦(1575—1638)《茶山集》。睦大钦，字汤卿，号茶山、竹坞，本贯泗川。

赵希逸(1575—1638)《竹阴集》。赵希逸，字怡叔，号竹阴，本贯林川。

郑忠信(1575—1636)《晚云集》。郑忠信，字可行，号晚云，本贯光州。

任叔英(1576—1623)《疏庵集》。任叔英，字茂叔，号疏庵、东海散人，本贯丰川。

申敏一(1576—1650)《化堂集》。申敏一，字功甫，号化堂，本贯平山。

高用厚(1577—1652)《晴沙集》。高用厚，字善行，号晴沙、瑞石，本贯长兴。

金玲(1577—1641)《溪岩集》。金玲，字子峻，号溪岩，本贯光山。

沈光世(1577—1624)《休翁集》。沈光世，字德显，号湖滨居士、休翁，本贯青松。

黄宗海(1579—1642)《朽浅集》。黄宗海，字大进，号朽浅，本贯怀德。

赵翼(1579—1655)《浦渚集》。赵翼，字飞卿，号浦渚、存斋，本贯丰

壤。《浦渚集》共三十五卷，十八册。

金堉(1580—1658)《潜谷遗稿》。金堉，字伯厚，号潜谷、晦静堂，本贯清风。金堉曾任领议政(首相)，其1636年出使中国之“燕行录”载《潜谷遗稿》卷十四《朝京日录》。金堉后代金允植于1881—1883年以“领选使”来中国天津。

姜硕期(1580—1643)《月塘集》。姜硕期，字复而，号月塘、三塘，本贯衿川。

郑弘溟(1582—1650)《畸庵集》。郑弘溟，字子容，号畸庵，本贯延日。

李敬舆(1585—1657)《白江集》。李敬舆，字直夫，号白江、凤岩，本贯全州。

李植(1584—1647)《泽堂集》。李植，字汝固，号泽风堂，本贯德水。

赵任道(1585—1664)《涧松集》。赵任道，字德勇，号涧松，本贯咸安。

崔鸣吉(1586—1647)《迟川集》。崔鸣吉，字子谦，号沧浪、迟川，本贯全州。

赵絅(1586—1669)《龙洲遗稿》。赵絅，字日章，号龙洲、柱峰、鬻翁，本贯汉阳。

吴竣(1587—1666)《竹南堂稿》。吴竣，字汝完，号竹南，本贯同福。

金应祖(1587—1667)《鹤沙集》。金应祖，字孝征，号鹤沙、哑轩，本贯丰山。

尹善道(1587—1671)《孤山遗稿》。尹善道，字约而，号孤山、海翁，本贯海南。

张维(1587—1638)《溪谷集》。张维，字持国，号溪谷、默所，本贯德水。《溪谷集》共三十六卷，十八册。

鲜于浹(1588—1653)《遁庵全书》。鲜于浹，字仲润，号遁庵，本贯太原。

申翊圣(1588—1644)《乐全堂集》。申翊圣，字君奭，号乐斋、乐全堂、东淮居士，本贯平山。

郑百昌(1588—1635)《玄谷集》。郑百昌，字德余，号玄谷、大滩子、天容，本贯晋州。

李敏求(1589—1670)《东州集》。李敏求，字子时，号东州、观海，本贯全州。

尹顺之(1591—1666)《滓溟斋诗集》。尹顺之，字乐天，号滓溟，本贯

海平。

吴翰(1592—1634)《天坡集》。吴翰,字肃羽,号天坡,本贯海州。《天坡集》第一、第二卷主要是燕行诗。

金世濂(1593—1646)《东溟集》。金世濂,字道濂、道源,号东溟,本贯善山。

李景奭(1595—1671)《白轩集Ⅰ》。李景奭,字尚辅,号白轩、双溪,本贯全州。李景奭是朝鲜王族,是德泉君后人。《白轩集》原集五十三卷,附录三卷,合十八册。

李景奭(1595—1671)《白轩集Ⅱ》。李景奭,字尚辅,号白轩、双溪,本贯全州。

河弘度(1593—1666)《谦斋集》。河弘度,字重远,号谦斋,本贯晋州。

李明汉(1595—1645)《白洲集》。李明汉,字天章,号白洲,本贯延安。

许穆(1595—1682)《记言Ⅰ》。许穆,字文父、和父,号眉叟、台岭老人,本贯阳川。原集六十七卷,别集二十六卷,合二十册。许穆是朝鲜王朝名臣,文人诗文集多有其手书序言。

许穆(1595—1682)《记言Ⅱ》。许穆,字文父、和父,号眉叟、台岭老人,本贯阳川。

申硕蕃(1595—1675)《百源集》。申硕蕃,字仲衍,号百源,本贯平山。

尹舜举(1596—1668)《童土集》。尹舜举,字鲁直,号童土,本贯坡平。

金庆余(1596—1653)《松崖集》。金庆余,字由善,号松崖,本贯庆州。

金烋(1597—1638)《敬窝集》。金烋,字子美、谦可,号敬窝,本贯义城。

郑斗卿(1597—1673)《东溟集》。郑斗卿,字君平,号东溟,本贯温阳。

李尚质(1597—1635)《家州集》。李尚质,字子文,号家州,本贯全州。

河溍(1597—1658)《台溪集》。河溍,字晋伯,号台溪,本贯晋州。

李昭汉(1598—1645)《玄洲集》。李昭汉,字道章,号玄洲,本贯延安。

蔡裕后(1599—1660)《湖洲集》。蔡裕后,字伯昌,号湖洲,本贯平康。

郑瀁(1600—1668)《抱翁集》。郑瀁,字晏叔,号孚翼子、抱翁,本贯迎日。

尹元举(1601—1672)《龙西集》。尹元举,字伯奋,号龙西,本贯坡平。

金弘郁(1602—1654)《鹤洲全集》。金弘郁,字文叔,号鹤洲,本贯庆州。

郑太和(1602—1673)《阳坡遗稿》。郑太和,字囿春,号阳坡,本贯东莱。

姜柏年(1603—1681)《雪峰遗稿》。姜柏年,字叔久,号闲溪、听月轩、雪峰,本贯晋州。

黄㡳(1604—1656)《漫浪集》。黄㡳,字子由,号漫浪,本贯昌原。前四卷中多杂燕行诗歌。

金得臣(1604—1684)《柏谷集》。金得臣,字子公,号柏谷、龟石山人,本贯安东。

权諰(1604—1672)《炭翁集》。权諰,字思诚,号八吟斋、炭翁,本贯安东。

申翊全(1605—1660)《东江遗集》。申翊全,字汝万,号花川、东江,本贯平山。

尹文举(1606—1672)《石湖遗稿》。尹文举,字汝望,号石湖,本贯坡平。

赵锡胤(1606—1655)《乐静集》。赵锡胤,字胤之,号乐静,本贯白川。

洪宇远(1605—1687)《南坡集》。洪宇远,字君征,号南坡,本贯南阳。

宋浚吉(1606—1672)《同春堂集Ⅰ》。宋浚吉,字明甫,号同春堂,本贯恩津。《同春堂集》原集二十四卷,目录一卷,合十三册。朝鲜文庙配享。

宋浚吉(1606—1672)《同春堂集Ⅱ》。宋浚吉,字明甫,号同春堂,本贯恩津。

宋时烈(1607—1689)《宋子大全Ⅰ》。宋时烈,字英甫,号右庵,本贯恩津。在金长生门下学习性理学和礼学。金长生死后,在其子金集门下完成学业。27岁时中状元,两年后为凤林大君老师,"丙子胡乱"中,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被捉为人质,他在乡间十年间,全身心投入学问,是朝鲜王朝的性理学大师之一。朝鲜文庙配享。《宋子大全Ⅰ-Ⅸ》包括目录二卷、原集二百一十五卷、附录十九卷,共一百零二册。

宋时烈(1607—1689)《宋子大全Ⅱ》。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华阳洞主、南涧老叟、桥山老父,本贯恩津。

宋时烈(1607—1689)《宋子大全Ⅲ》。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华阳洞主、南涧老叟、桥山老父,本贯恩津。

宋时烈(1607—1689)《宋子大全Ⅳ》。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华阳

洞主、南涧老叟、桥山老父，本贯恩津。

宋时烈（1607—1689）《宋子大全Ⅴ》。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华阳洞主、南涧老叟、桥山老父，本贯恩津。

宋时烈（1607—1689）《宋子大全Ⅵ》。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华阳洞主、南涧老叟、桥山老父，本贯恩津。

宋时烈（1607—1689）《宋子大全Ⅶ》。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华阳洞主、南涧老叟、桥山老父，本贯恩津。

宋时烈（1607—1689）《宋子大全Ⅷ》。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华阳洞主、南涧老叟、桥山老父，本贯恩津。

宋时烈（1607—1689）《宋子大全Ⅸ》。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华阳洞主、南涧老叟、桥山老父，本贯恩津。

俞棨（1607—1664）《市南集》。俞棨，字武仲，号市南，本贯杞溪。

李惟泰（1607—1684）《草庐集》。李惟泰，字泰之，号草庐，本贯庆州。

吴达济（1609—1637）《忠烈公遗稿》。吴达济，字季辉，号秋潭，本贯海州。1636年，“丙子胡乱”起，朝鲜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被后金军捉为人质，吴达济坚决斥和，一并被带走，后于沈阳被杀。《附录》其兄吴达升《祭文》：“六月初，沈阳陪臣状启入来，以君与尹学士，四月十九日，抗言不屈，俱未免惨害”。朝鲜王朝谥号“忠烈”。

赵复阳（1609—1671）《松谷集》。赵复阳，字仲初，号松谷，本贯丰壤。

金益熙（1610—1656）《沧洲遗稿》。金益熙，字仲文，号沧洲、止斋，本贯光州。

尹宣举（1610—1669）《鲁西遗稿》。尹宣举，字吉甫，号美村、鲁西、山泉斋，本贯坡平。

朴长远（1612—1671）《久堂集》。朴长远，字仲久，号久堂、隰川，本贯高灵。

徐必远（1613—1671）《六谷遗稿》。徐必远，字载尔，号六谷，本贯夫余。

李健（1614—1662）《葵窗遗稿》。李健，字子强，号葵窗、命慕堂，本贯全州。李健是朝鲜王族，宣祖之孙。

金佐明（1616—1671）《归溪遗稿》。金佐明，字一正，号归溪、归川，本贯清风，领议政金堉之子。

柳赫然（1616—1680）《野堂遗稿》。柳赫然，字晦尔，号野堂，本贯

晋州。

李殷相(1617—1678)《东里集》。李殷相,字长卿、说卿,号东里,本贯延安。

尹鑴(1617—1680)《白湖集》。尹鑴,字希仲,号白湖、夏轩、冶父,本贯南原。

李徽逸(1619—1672)《存斋集》。李徽逸,字翼文,号存斋、冥栖、楮谷,本贯载宁。

李翔(1620—1690)《打愚遗稿》。李翔,字云举、叔羽,号打愚,本贯牛峰。

洪汝河(1620—1674)《木斋集》。洪汝河,字百源、应图,号山泽斋、木斋、大朴山人,本贯缶溪。

洪葳(1620—1660)《清溪集》。洪葳,字君实,号清溪,本贯南阳。

金寿增(1624—1701)《谷云集》。金寿增,字延之,号谷云、华阴洞主,本贯安东。

李端夏(1625—1689)《畏斋集》。李端夏,字季周,号恋斋、畏斋、松磵,本贯德水。

李惟樟(1625—1701)《孤山集》。李惟樟,字夏卿,号孤山、磨崖、懒庵、芋园、芋圃、四益堂,本贯全义。

丁时翰(1625—1707)《愚潭集》。丁时翰,字君翊,号愚潭、龟潭、法泉,本贯罗州。

金寿兴(1626—1690)《退忧堂集》。金寿兴,字起之,号退忧堂、止堂,本贯安东。

苏斗山(1627—1693)《月洲集》。苏斗山,字望如,号月洲,本贯晋州。曾任观察使,1688年为平安道兵马节度使。

李玄逸(1627—1704)《葛庵集Ⅰ》。李玄逸,字翼升,号葛庵,本贯载宁。《葛庵集》原集二十九卷,别集六卷,附录五卷,合二十一册。

李玄逸(1627—1704)《葛庵集Ⅱ》。李玄逸,字翼升,号葛庵,本贯载宁。

闵鼎重(1628—1692)《老峰集》。闵鼎重,字大受,号老峰,本贯骊兴。

申晸(1628—1687)《汾厓遗稿》。申晸,字寅伯,号艮斋、梦斋、汾厓,本贯平山。

李端相(1628—1669)《静观斋集》。李端相,字幼能,号西湖、东冈、静

观斋,本贯延安。

南龙翼(1628—1692)《壶谷集》。南龙翼,字云卿,号壶谷,本贯宜宁。

南九万(1629—1711)《药泉集Ⅰ》。南九万,字云路,号药泉、美斋,本贯宜宁。《药泉集》原集三十四卷,合十七册。

南九万(1629—1711)《药泉集Ⅱ》。南九万,字云路,号药泉、美斋,本贯宜宁。

金寿恒(1629—1689)《文谷集》。金寿恒,字久之,号文谷,本贯安东。

朴世堂(1629—1703)《西溪集》。朴世堂,字季肯,号潜叟、西溪樵叟、西溪,本贯潘南。

朴尚玄(1629—1693)《寓轩集》。朴尚玄,字景初,号寓轩,本贯顺天。

尹拯(1629—1714)《明斋遗稿Ⅰ》。尹拯,字仁卿、子仁,号明斋、酉峰,本贯坡平。《明斋遗稿》原集等四十六卷,别集四卷,合二十六册。

尹拯(1629—1714)《明斋遗稿Ⅱ》。尹拯,字仁卿、子仁,号明斋、酉峰,本贯坡平。

闵维重(1630—1687)《文贞公遗稿》。闵维重,字持叔,号屯村,本贯骊兴。

宋奎濂(1630—1709)《霁月堂集》。宋奎濂,字道源,号霁月堂,本贯恩津。

李嵩逸(1631—1698)《恒斋集》。李嵩逸,字应中,号恒斋,本贯载宁。

朴世采(1631—1695)《南溪集Ⅰ》。朴世采,字和叔,号玄石、南溪,本贯潘南。《南溪集》包括目录、正集八十七卷、外集十六卷和续集二十二卷,合五十六册。朝鲜文庙配享。

朴世采(1631—1695)《南溪集Ⅱ》。朴世采,字和叔,号玄石、南溪,本贯潘南。

朴世采(1631—1695)《南溪集Ⅲ》。朴世采,字和叔,号玄石、南溪,本贯潘南。

朴世采(1631—1695)《南溪集Ⅳ》。朴世采,字和叔,号玄石、南溪,本贯潘南。

朴世采(1631—1695)《南溪集Ⅴ》。朴世采,字和叔,号玄石、南溪,本贯潘南。

吴始寿(1632—1681)《水村集》。吴始寿,字德而,号水村,本贯同福。

尹推(1632—1707)《农隐遗稿》。尹推,字子恕,号农隐、农窝、聋窝、

青松斋，本贯坡平。

李选(1631—1692)《芝湖集》。李选，字择之，号芝湖、小白山人，本贯全州。李选是朝鲜王族，广平大君后人。

李敏叙(1633—1688)《西河集》。李敏叙，字彝仲，号西河，本贯全州。

金万基(1633—1687)《瑞石集Ⅰ》。金万基，字永叔，号瑞石、静观轩，本贯光山。《瑞石集》十八卷，合九册。

金万基(1633—1687)《瑞石集Ⅱ》。金万基，字永叔，号瑞石、静观轩，本贯光山。

金锡胄(1634—1684)《息庵遗稿》。金锡胄，字斯百，号息庵、节斋、趾斋，本贯清风。《息庵遗稿》卷七《擣椒录》为其"燕行录"，燕行时间为1683年。

申翼相(1634—1697)《醒斋遗稿》。申翼相，字叔弼，号醒斋、六吾堂，本贯高灵。

李世白(1635—1703)《雩沙集》。李世白，字仲庚，号雩沙、北溪，本贯龙仁。

柳世鸣(1636—1690)《寓轩集》。柳世鸣，字尔能、以能，号寓轩，本贯丰山。

赵圣期(1638—1689)《拙修斋集》。赵圣期，字成卿，号拙修斋，本贯林川。

赵持谦(1639—1685)《迂斋集》。赵持谦，字光甫，号迂斋，本贯丰壤。

金万重(1637—1692)《西浦集》。金万重，字重叔，号西浦，本贯光山(光州)。

任相元(1638—1697)《恬轩集》。任相元，字公辅，号恬轩，本贯丰川(西河)。

任堕(1640—1724)《水村集》。任堕，字大仲，号水村、愚拙翁，本贯丰川(西河)。

李箕洪(1641—1708)《直斋集》。李箕洪，字汝九，号直斋，本贯全州。

权尚夏(1641—1721)《寒水斋集Ⅰ》。权尚夏，字致道，号遂庵、寒水斋、黄江居士，本贯安东。《寒水斋集》原集三十四卷，加年谱合十六册。

权尚夏(1641—1721)《寒水斋集Ⅱ》。权尚夏，字致道，号遂庵、寒水斋、黄江居士，本贯安东。

崔慎(1642—1708)《鹤庵集》。崔慎，字子敬，号鹤庵，本贯会宁(丰

川)。

权斗寅(1643—1719)《荷塘集》。权斗寅,字春卿,号荷塘、雪窗,本贯安东。

吴道一(1645—1703)《西坡集》。吴道一,字贯之,号西坡,本贯海州。

李畲(1645—1718)《睡谷集》。李畲,字子三、治甫,号睡谷、睡村、浦阴,本贯德水。

崔锡鼎(1646—1715)《明谷集Ⅰ》。崔锡鼎,字汝和,号存窝、存所子、明谷,本贯全州。《明谷集》共三十四卷,合十五册。

崔锡鼎(1646—1715)《明谷集Ⅱ》。崔锡鼎,字汝和,号存窝、存所子、明谷,本贯全州。

金干(1646—1732)《厚斋集Ⅰ》。金干,字直卿,号厚斋,本贯清风。《厚斋集》原集四十六卷,别集四卷,合二十五册。

金干(1646—1732)《厚斋集Ⅱ》。金干,字直卿,号厚斋,本贯清风。

李玄锡(1647—1703)《游斋集》。李玄锡,字夏瑞,号游斋,本贯全州。李玄锡是朝鲜王族,敬宁君八世孙。

郑澔(1648—1736)《丈岩集》。郑澔,字仲淳,号丈岩,本贯延日。

金昌集(1648—1722)《梦窝集》。金昌集,字汝成,号梦窝,本贯安东。

辛梦参(1648—1711)《一庵集》。辛梦参,字省三,号一庵,本贯灵山。

金宇杭(1649—1723)《甲峰遗稿》。金宇杭,字济仲,号甲峰、坐隐,本贯金海。

林泳(1649—1696)《沧溪集》。林泳,字德涵,号沧溪,本贯罗州。

郑齐斗(1649—1736)《霞谷集》。郑齐斗,字士仰,号霞谷,本贯延日。

崔奎瑞(1650—1735)《艮斋集》。崔奎瑞,字文叔,号艮斋、少陵、巴陵、蚕窝,本贯海州。

金昌协(1651—1708)《农岩集Ⅰ》。金昌协,字仲和,号洞阴居士、寒碧主人、三洲、农岩,本贯安东。《农岩集》原集三十六卷,十八册;续集二卷,二册;别集四卷,四册。

金昌协(1651—1708)《农岩集Ⅱ》。金昌协,字仲和,号洞阴居士、寒碧主人、三洲、农岩,本贯安东。

徐宗泰(1652—1719)《晚静堂集》。徐宗泰,字鲁望、君望,号晚静堂、瑞谷、松厓,本贯达城(大丘)。

宋征殷(1652—1720)《约轩集Ⅰ》。宋征殷,字质夫,号约轩,本贯砺

山。《约轩集》原集十四卷，合七册。

宋征殷（1652—1720）《约轩集Ⅱ》。宋征殷，字质夫，号约轩，本贯砺山。

李衡祥（1653—1733）《瓶窝集》。李衡祥，字仲玉，号瓶窝、顺翁，本贯全州。李衡祥是朝鲜王族，孝宁大君十世孙。

金昌翕（1653—1722）《三渊集Ⅰ》。金昌翕，字子益，号洛诵子、三渊，本贯安东。《三渊集》原集三十六卷，十八册；别集三十二卷，十六册。

金昌翕（1653—1722）《三渊集Ⅱ》。金昌翕，字子益，号洛诵子、三渊，本贯安东。

金昌翕（1653—1722）《三渊集Ⅲ》。金昌翕，字子益，号洛诵子、三渊，本贯安东。

洪世泰（1653—1725）《柳下集》。洪世泰，字道长，号沧浪、柳下居士，本贯南阳。

朴泰辅（1654—1689）《定斋集》。朴泰辅，字士元，号定斋，本贯潘南。

李玄祚（1654—1710）《景渊堂集》。李玄祚，字启商，号景渊堂，本贯全州。李玄祚是朝鲜王族，敬宁君八世孙。

权斗经（1654—1726）《苍雪斋集》。权斗经，字天章，号苍雪斋，本贯安东。

崔锡恒（1654—1724）《损窝遗稿》。崔锡恒，字汝久，号损窝、遁窝，本贯全州。

李喜朝（1655—1724）《芝村集》。李喜朝，字同甫，号芝村、艮庵、志事斋，本贯延安。

朴光一（1655—1723）《逊斋集》。朴光一，字士元，号逊斋，本贯顺天。

宋相琦（1657—1723）《玉吾斋集》。宋相琦，字玉汝，号玉吾斋，本贯恩津。

李寅烨（1656—1710）《晦窝诗稿》。李寅烨，字季章，号晦窝，本贯庆州。

李颐命（1658—1723）《疏斋集》。李颐命，字养叔、仁智，号疏斋，本贯全州。李颐命是朝鲜王族，密城君后人。

李栽（1657—1730）《密庵集》。李栽，字幼材，号密庵、锦水病叟，本贯载宁。

金镇圭（1658—1726）《竹泉集》。金镇圭，字达甫，号竹泉，本贯光州。

金昌业（1658—1721）《老稼斋集》。金昌业，号稼斋、老稼斋，本贯安东，以抗清著称的朝鲜文人金尚宪曾孙。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随冬至使节团来北京，考察清朝各个方面，与中国文士多有交往。著作中有《老稼斋“燕行录”》。

赵德邻（1658—1737）《玉川集》。赵德邻，字宅仁，号玉川、沧洲，本贯汉阳。

李海朝（1660—1711）《鸣岩集》。李海朝，字子东，号鸣岩，本贯延安。

赵泰采（1660—1722）《二忧堂集》。赵泰采，字幼亮，号牛坡、二忧堂，本贯杨州。

金柱臣（1661—1721）《寿谷集》。金柱臣，字厦卿，号寿谷、洗心斋，本贯庆州。

金昌缉（1662—1713）《圃阴集》。金昌缉，字敬明，号圃阴，本贯安东。

李观命（1661—1733）《屏山集》。李观命，字子宾，号屏山，本贯全州。李观命是朝鲜王族，密城君的后代。

李健命（1663—1722）《寒圃斋集》。李健命，字仲刚，号寒圃斋、霁月斋，本贯全州。李健命是朝鲜王族，密城君的后代。

李万敷（1664—1732）《息山集Ⅰ》。李万敷，字仲舒，号息山，本贯延安。

李万敷（1664—1732）《息山集Ⅱ》。李万敷，字仲舒，号息山，本贯延安。

李载亨（1665—1741）《松岩集》。李载亨，字嘉会，号松岩，本贯全州。李载亨是朝鲜王族，德泉君的后代。

梁得中（1665—1742）《德村集》。梁得中，字择夫，号德村，本贯济州。

任守干（1665—1721）《遁窝遗稿》。任守干，字用誉，号遁窝，本贯丰川。

李宜显（1669—1745）《陶谷集Ⅰ》。李宜显，字德哉，号陶谷、陶叟，本贯龙仁。《陶谷集》卷二十九为《庚子燕行杂识》，是作者1720年的“燕行录”。

李宜显（1669—1745）《陶谷集Ⅱ》。李宜显，字德哉，号陶谷、陶叟，本贯龙仁。《陶谷集》卷三十《壬子燕行杂识》，是作者1732年的“燕行录”。

蔡彭胤（1669—1731）《希庵集》。蔡彭胤，字仲耆，号希庵、恩窝，本贯平康。

崔昌大(1669—1720)《昆仑集》。崔昌大,字孝伯,号昆仑、苍槐,本贯全州。

鱼有凤(1672—1744)《杞园集Ⅰ》。鱼有凤,字舜瑞,号杞园,本贯咸从。《杞园集》原集三十二卷,年谱二卷,合十七册。

鱼有凤(1672—1744)《杞园集Ⅱ》。鱼有凤,字舜瑞,号杞园,本贯咸从。

金春泽(1670—1717)《北轩集》。金春泽,字伯雨,号北轩,本贯光山(光州)。

申益愰(1672—1722)《克斋集》。申益愰,字明仲,号克斋,本贯平山。

李真望(1672—1737)《陶云遗集》。李真望,字久叔,号陶云、退云,本贯全州。李真望是朝鲜王族,德泉君的后代。

李德寿(1673—1744)《西堂私载》。李德寿,字仁老,号西堂、蘖溪,本贯全义。

洪泰猷(1672—1715)《耐斋集》。洪泰猷,字伯亨,号耐斋,本贯南阳。

李光庭(1674—1756)《讷隐集》。李光庭,字天祥,号讷隐,本贯原州。

权矩(1672—1749)《屏谷集》。权矩,字方叔,号屏谷,本贯安东。

尹东洙(1674—1739)《敬庵遗稿》。尹东洙,字大源、士达,号敬庵,本贯坡平。

赵泰亿(1675—1728)《谦斋集Ⅰ》。赵泰亿,字大年,号谦斋,本贯杨州。《谦斋集》原集四十五卷,二十册。

赵泰亿(1675—1728)《谦斋集Ⅱ》。赵泰亿,字大年,号谦斋,本贯杨州。

李柬(1677—1727)《巍岩遗稿》。李柬,字公举,号巍岩、秋月轩,本贯礼安。

玄尚璧(1673—1731)《冠峰遗稿》。玄尚璧,字彦明,号冠峰,本贯延州。

李夏坤(1677—1724)《头陀草》。李夏坤,字载大,号淡轩、小金山樵、无忧子,本贯庆州。

李森(1677—1735)《白日轩遗集》。李森,字远伯、茂叔,号白日轩,本贯咸平。

尹淳(1680—1741)《白下集》。尹淳,字仲和,号白下、鹤阴、萝溪、漫翁,本贯海平。

赵文命(1680—1746)《鹤岩集》。赵文命,字叔章,号鹤岩,本贯丰壤。

金德五(1680—1748)《痴轩集》。金德五,字性兼,号痴轩,本贯遂安。

尹凤朝(1680—1761)《圃岩集》。尹凤朝,字鸣叔,号圃岩,本贯坡平。

李縡(1680—1746)《陶庵集Ⅰ》。李縡,字熙卿,号陶庵、寒泉,本贯牛峰。《陶庵集》原集五十卷,二十五册。

李縡(1680—1746)《陶庵集Ⅱ》。李縡,字熙卿,号陶庵、寒泉,本贯牛峰。

朴弼周(1680—1748)《黎湖集Ⅰ》。朴弼周,字尚甫,号黎湖、竹轩、晨门、蓼溪、雨台,本贯潘南。《黎湖集》原集三十卷,十五册。

朴弼周(1680—1748)《黎湖集Ⅱ》。朴弼周,字尚甫,号黎湖、竹轩、晨门、蓼溪、雨台,本贯潘南。

申靖夏(1681—1716)《恕庵集》。申靖夏,字正甫,号恕庵,本贯平山。

郑来侨(1681—1759)《浣岩集》。郑来侨,字润卿,号浣岩、玄窝,本贯昌宁。

李瀷(1681—1763)《星湖全集Ⅰ》。李瀷,字子新,号星湖,其《星湖僿说》为朝鲜实学名著。《星湖全集》原集六十八卷,目录二卷,附录二卷,合三十六册。

李瀷(1681—1763)《星湖全集Ⅱ》。李瀷,字子新,号星湖,朝鲜著名实学家。

李瀷(1681—1763)《星湖全集Ⅲ》。李瀷,字子新,号星湖,朝鲜著名实学家。

申维翰(1681—?)《青泉集》。申维翰,字周伯,号青泉、伽倻樵叟,本贯宁海。

韩元震(1682—1751)《南塘集Ⅰ》。韩元震,字德昭,号南塘、旸谷,本贯清州。《南塘集》原集三十八卷,拾遗六卷,合二十二册。

韩元震(1682—1751)《南塘集Ⅱ》。韩元震,字德昭,号南塘、旸谷,本贯清州。

金崇谦(1682—1700)《观复庵诗稿》。金崇谦,字君山,号观复庵,本贯安东。

林昌泽(1682—1723)《崧岳集》。林昌泽,字大润,号崧岳,本贯谷城。

尹凤九(1683—1767)《屏溪集Ⅰ》。尹凤九,字瑞膺,号屏溪、玉溪、久庵,本贯坡平。《屏溪集》原集六十卷,三十册。

尹凤九(1683—1767)《屏溪集Ⅱ》。尹凤九,字瑞膺,号屏溪、玉溪、久庵,本贯坡平。

尹凤九(1683—1767)《屏溪集Ⅲ》。尹凤九,字瑞膺,号屏溪、玉溪、久庵,本贯坡平。

蔡之洪(1683—1741)《凤岩集》。蔡之洪,字君范,号凤岩、凤溪、三患斋、舍藏窝,本贯仁川。

林象德(1683—1719)《老村集》。林象德,字润甫、彝好,号老村,本贯罗州。

金圣铎(1684—1747)《霁山集》。金圣铎,字振伯,号霁山,本贯义城。

沈鋪(1685—1753)《樗村遗稿Ⅰ》。沈鋪,字和甫、彦和,号樗村、樗轩,本贯青松。1728年出使中国。遗稿原集四十七卷,十八册。

沈鋪(1685—1753)《樗村遗稿Ⅱ》。沈鋪,字和甫、彦和,号樗村、樗轩,本贯青松。

尹东源(1685—1741)《一庵遗稿》。尹东源,字士正,号一庵,本贯坡平。

黄宅厚(1687—1737)《华谷集》。黄宅厚,字子和,号华谷,本贯昌原。

权万(1688—1749)《江左集》。权万,字一甫,号江左,本贯安东。

南克宽(1689—1714)《梦呓集》。南克宽,字伯居,号谢施子,本贯宜宁。

李匡德(1690—1748)《冠阳集》。李匡德,字圣赖,号冠阳、尊斋,本贯全州。李匡德是朝鲜王族,德泉君后人。

姜再恒(1689—1756)《立斋遗稿》。姜再恒,字久之,号立斋、雷风居士,本贯晋州。

吴光运(1689—1745)《药山漫稿Ⅰ》。吴光运,字永伯,号药山,本贯同福。《药山漫稿》二十卷,共九册。

吴光运(1689—1745)《药山漫稿Ⅱ》。吴光运,字永伯,号药山,本贯同福。

赵观彬(1691—1757)《悔轩集》。赵观彬,字国甫,号悔轩、光斋、东湖退士,本贯杨州。

赵显命(1691—1752)《归鹿集Ⅰ》。赵显命,字稚晦,号归鹿、鹿翁,本贯丰壤。《归鹿集》为手写本,二十卷,二十册。

赵显命(1691—1752)《归鹿集Ⅱ》。赵显命,字稚晦,号归鹿、鹿翁,本

贯丰壤。

俞拓基(1691—1767)《知守斋集》。俞拓基,字展甫,号知守斋、渼阴,本贯杞溪。

李宗城(1692—1759)《梧川集》。李宗城,字子固,号梧川,本贯庆州。

赵龟命(1693—1737)《东溪集》。赵龟命,字锡汝、宝汝,号东溪,本贯丰壤。

闵遇洙(1694—1756)《贞庵集Ⅰ》。闵遇洙,字士元,号贞庵、蟾村,本贯骊兴。《贞庵集》十六卷,八册。

闵遇洙(1694—1756)《贞庵集Ⅱ》。闵遇洙,字士元,号贞庵、蟾村,本贯骊兴。

申暻(1696—1766)《直庵集》。申暻,字明允,号直庵,本贯平山。

南有容(1698—1773)《雷渊集Ⅰ》。南有容,字德哉,号少华、雷渊,本贯宜宁。原集三十卷,合附录为十五册。

南有容(1698—1773)《雷渊集Ⅱ》。南有容,字德哉,号少华、雷渊,本贯宜宁。

李天辅(1698—1761)《晋庵集》。李天辅,字宜叔,号晋庵,本贯延安。

吴瑗(1700—1740)《月谷集》。吴瑗,字伯玉,号月谷、观物居士,本贯海州。

金道洙(1699—1733)《春洲遗稿》。金道洙,字士源,号春洲,本贯清风。

尹衡老(1702—1782)《戒惧庵集》。尹衡老,字殷叟,号戒惧庵,本贯坡平。

柳正源(1702—1761)《三山集》。柳正源,字淳伯,号三山,本贯全州。

金元行(1702—1772)《渼湖集》。金元行,字伯春,号渼湖、云楼,本贯安东。

赵载浩(1702—1762)《损斋集》。赵载浩,字敬大,号损斋,本贯丰壤。

宋明钦(1705—1768)《栎泉集》。宋明钦,字晦可,号栎泉,本贯恩津。

李匡师(1705—1777)《圆峤集》。李匡师,字道甫,号圆峤、寿北,本贯全州。李匡师是朝鲜王族,德泉君的后人。因其伯父事被流放二十三年。《圆峤集》是手写本,手写年代不详。共十卷。卷一是《东国乐府》,其中的《黄河歌》赞颂箕子。卷二、卷三是诗歌。卷四是杂著。卷五是书信。卷六是祭文。卷七是碑志铭表。卷八是杂文。卷九是行状。卷十是7254字

的《书诀》。最后是《圆峤先生墓志》。

崔兴远(1705—1786)《百弗庵集》。崔兴远,字太初、汝浩,号百弗庵、漆溪,本贯庆州。

金乐行(1708—1766)《九思堂集》。金乐行,字艮夫、退甫,号九思堂,本贯义城。

李用休(1708—1782)《数敭集》。李用休,字景命,号惠寰,本贯骊州。

尹光绍(1708—1786)《素谷遗稿》。尹光绍,字稚绳,号素谷,本贯坡平。

黄景源(1709—1787)《江汉集Ⅰ》。黄景源,字大卿,号江汉,本贯长水。《江汉集》三十二卷,十五册。

黄景源(1709—1787)《江汉集Ⅱ》。黄景源,字大卿,号江汉,本贯长水。

宋能相(1710—1758)《云坪集》。宋能相,字士能、士弘、士龙,号云坪、东海子,本贯恩津。

宋文钦(1710—1752)《闲静堂集》。宋文钦,字士行,号闲静堂,本贯恩津。

李麟祥(1710—1760)《凌壶集》。李麟祥,字符灵,号凌壶、宝山子,本贯全州。李麟祥是朝鲜王族,密城君的后人。

李象靖(1711—1781)《大山集Ⅰ》。李象靖,字景文,号大山,本贯韩山。目录二卷,原集五十二卷,二十七册。

李象靖(1711—1781)《大山集Ⅱ》。李象靖,字景文,号大山,本贯韩山。

任圣周(1711—1788)《鹿门集》。任圣周,字敬仲、仲思,号鹿门,本贯丰川。

宋德相(1710—1783)《果庵集》。宋德相,字叔咸,号果庵,本贯恩津。

安鼎福(1712—1791)《顺庵集Ⅰ》。安鼎福,字百顺,号顺庵、汉山病隐、虞夷子、橡轩,本贯广州。《顺庵集》原集等二十七卷,合十五册。

安鼎福(1712—1791)《顺庵集Ⅱ》。安鼎福,字百顺,号顺庵、汉山病隐、虞夷子、橡轩,本贯广州。

任希圣(1712—1783)《在涧集》。任希圣,字子时,号在涧、涧翁、静修居士,本贯丰川。

申景浚(1712—1781)《旅庵遗稿》。申景浚,字舜民,号旅庵,本贯

高灵。

申光洙(1712—1775)《石北集》。申光洙,字圣渊,号石北、五岳山人,本贯高灵。

李光靖(1714—1789)《小山集》。李光靖,字休文、景实,号小山,本贯韩山。

李敏辅(1717—1799)《丰墅集Ⅰ》。李敏辅,字伯讷,号常窝、丰墅、会心窝,本贯延安。《丰墅集》为手写本,十八卷,九册。

李敏辅(1717—1799)《丰墅集Ⅱ》。李敏辅,字伯讷,号常窝、丰墅、会心窝,本贯延安。

徐命膺(1716—1787)《保晚斋集》。徐命膺,字君受,号恬溪、保晚斋、淡翁,本贯达城。

安锡儆(1718—1774)《雪桥集》。安锡儆,字叔华,号雪桥、完阳、卓异山人,本贯顺兴。

李献庆(1719—1791)《艮翁集》。李献庆,字梦瑞,号艮翁、白云亭、玄圃,本贯全州。李献庆是朝鲜王族,潭阳君的后人。

蔡济恭(1720—1799)《樊岩集Ⅰ》。蔡济恭,字伯规,号樊岩,本贯平康。1778年,蔡济恭作为陈奏使正使出使中国,其"燕行录"名《含忍录》。其使节团中有朝鲜著名实学家朴齐家。《樊岩集》原集五十九卷,二十七册。

蔡济恭(1720—1799)《樊岩集Ⅱ》。蔡济恭,字伯规,号樊岩,本贯平康。

李福源(1719—1792)《双溪遗稿》。李福源,字绥之,号双溪,本贯延安。

李匡吕(1720—1783)《李参奉集》。李匡吕,字圣载,号月岩、七滩,本贯全州。李匡吕是朝鲜王族,德泉君的后人。

金钟厚(1721—1780)《本庵集Ⅰ》。金钟厚,字伯高,号本庵、真斋,本贯清风。《本庵集》原集十二卷,六册;续集六卷,三册。

金钟厚(1721—1780)《本庵集Ⅱ》。金钟厚,字伯高,号本庵、真斋,本贯清风。

柳道源(1721—1791)《芦厓集》。柳道源,字叔文,号南涧、芦厓,本贯全州。

金履安(1722—1791)《三山斋集》。金履安,字正礼,号三山斋,本贯

安东。

丁范祖(1723—1801)《海左集Ⅰ》。丁范祖,字法正、法世,号海左,本贯罗州。《海左集》原集三十九卷,合目录、附录等十九册。

丁范祖(1723—1801)《海左集Ⅱ》。丁范祖,字法正、法世,号海左,本贯罗州。

金燈(1723—1790)《竹下集》。金燈,字光仲,号竹下、药岘,本贯延安。

洪良浩(1724—1802)《耳溪集Ⅰ》。洪良浩,字汉师,号耳溪,本贯丰山。历任平安道观察使、判中枢府事、大提学。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年)以冬至兼谢恩副使来华,与翰林戴衢亨有诗歌唱和。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年)以冬至兼谢恩使正使来华,与礼部尚书纪昀、翰林李鼎元有诗歌唱和。其诗集和文集都由纪昀作序。近年由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编辑出版的《耳溪集》原集三十八卷,别集十二卷,合五十卷,二十二册。卷六为"燕云纪行",后附"华人题评",卷七为"燕云续咏"。

洪良浩(1724—1802)《耳溪集Ⅱ》。洪良浩,字汉师,号耳溪,本贯丰山。

吴载纯(1727—1792)《醇庵集》。吴载纯,字文卿,号醇庵、愚不及斋,本贯海州。

魏伯珪(1727—1798)《存斋集》。魏伯珪,字子华,号存斋、桂巷,本贯长兴。

宋焕箕(1728—1807)《性潭集Ⅰ》。宋焕箕,字子东,号性潭、心斋,本贯恩津。《性潭集》原集三十二卷,十六册。

宋焕箕(1728—1807)《性潭集Ⅱ》。宋焕箕,字子东,号性潭、心斋,本贯恩津。

赵璥(1727—1787)《荷栖集》。赵璥,字景瑞,号荷栖,本贯丰壤。

金钟秀(1728—1799)《梦梧集》。金钟秀,字定夫,号梦梧、率翁,本贯清风。

黄胤锡(1729—1791)《颐斋遗稿》。黄胤锡,字永叟,号颐斋、西溟散人、云浦主人、山雷、越松外史,本贯平海。

俞彦镐(1730—1796)《燕石》。俞彦镐,字士京,号则止轩,本贯杞溪。

李种徽(1731—1797)《修山集》。李种徽,字德叔,号修山、南川子,本贯全州。李种徽是朝鲜王族,让宁大君的后人。

洪大容(1731—1783)《湛轩书》。洪大容,字德保,号湛轩,本贯南阳,朝鲜著名实学家。洪大容于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来北京,结识了中国文人严诚(1732—1767)。严诚,字立庵,号铁桥,著有《小清凉室遗稿》。两人无话不谈。洪大容回国以后,与严诚书信来往。惜严诚南下时,病死他乡。临死时,他把洪大容的书信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洪大容闻讯,在朝鲜家中设灵位祭奠,且托人送信给严诚家属。洪大容与严诚的坦诚交流与交往,被朝鲜文人称为"洪严之交"。

成大中(1732—1809)《青城集》。成大中,字士执,号青城,醇斋,东湖,本贯昌宁。

俞汉隽(1732—1811)《自著》。俞汉隽,字汝成、曼倩,号著庵、苍厓,本贯杞溪。

朴胤源(1734—1799)《近斋集》。朴胤源,字永叔,号近斋,本贯潘南。

庄献世子(1735—1762)《凌虚关漫稿》。庄献世子李愃是朝鲜英祖之子,字允宽,号毅斋,本贯全州,本是朝鲜王储。其《凌虚关漫稿》七卷,三册。

申大羽(1735—1809)《宛丘遗集》。申大羽,字仪父,号宛丘,本贯平山。

李万运(1736—1820)《默轩集》。李万运,字德而、希元,号默轩,本贯广州。

李东汲(1738—1811)《晚觉斋集》。李东汲,字进汝,号晚觉斋,本贯广州。

朴趾源(1737—1805)《燕岩集》。朴趾源,字美仲、仲美、美斋,号燕岩、烟湘、冽上外史,本贯潘南。其《热河日记》是韩国最著名的"燕行录"。《热河日记》写于1780年,记载朴趾源随朝鲜使节团为祝贺清乾隆皇帝的70寿辰而出使中国游历热河的见闻。该书在我国已有中文本出版。

李令翊(1738—1780)《信斋集》。李令翊,字幼公,号信斋、匏客,本贯全州。李令翊是朝鲜王族,德泉君后人。

李彦瑱(1740—1766)《松穆馆烬余稿》。李彦瑱初名湘藻,字虞裳,号松穆馆、沧起,本贯江阳。

郑宗鲁(1738—1816)《立斋集Ⅰ》。郑宗鲁,字士仰,号立斋、无适翁,本贯晋州。《立斋集》原集四十八卷、目录二卷,合二十四册;别集九卷,四册。

郑宗鲁(1738—1816)《立斋集Ⅱ》。郑宗鲁,字士仰,号立斋、无适翁,本贯晋州。

朴准源(1739—1807)《锦石集》。朴准源,字平叔,号锦石,本贯潘南。

金正默(1739—1799)《过斋遗稿》。金正默初名斗默,字而运,号过斋,本贯光山。

李家焕(1742—1801)《锦带诗文钞》。李家焕,字庭藻,号锦带、贞轩,本贯骊州。

李忠翊(1744—1816)《椒园遗稿》。李忠翊,字虞臣,号椒园、水观居士,本贯全州。李忠翊是朝鲜王族,是德泉君后人。

尹愔(1741—1826)《无名子集》。尹愔,字敬夫,号无名子,本贯坡平。

李德懋(1741—1793)《青庄馆全书Ⅰ》。李德懋,字明叔、懋官,号青庄馆、炯庵、雅亭、蝉橘堂、端坐轩、四以斋居士、注虫鱼斋、鹤上村夫、学草木堂、香草园、寒竹堂,本贯全州。《青庄馆全书》为写本,六十七卷,三十一册。其《入燕记》燕行时间为1778年。

李德懋(1741—1793)《青庄馆全书Ⅱ》。李德懋,字明叔、懋官,号青庄馆等。

李德懋(1741—1793)《青庄馆全书Ⅲ》。李德懋,字明叔、懋官,号青庄馆等。

金载瓚(1746—1827)《海石遗稿》。金载瓚,字国宝,号海石,本贯延安。

柳得恭(1749—1807)《冷斋集》。柳得恭,字惠风、惠甫,号冷斋、古芸堂、冷庵、古芸居士、歌商楼、恩晖堂,本贯文化。1778年随陈奏使来中国,与沈阳书院的孙镐等十几位中国文人相识。回朝鲜后,柳得恭把自己的见闻写成诗,编进了《冷斋集》。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朝鲜正宗十四年),第二次随使臣赴北京,与纪昀、潘庭筠、李调元等建立了深厚友谊。回国后撰写《滦阳录》,收录了他与中国文人之间诗歌的唱和。1801年(清嘉靖六年,朝鲜纯宗元年),柳得恭第三次赴清,再次见到纪昀。其"燕行录"名《燕台再游录》。

黄德壹(1748—1800)《拱白堂集》。黄德壹初名德老,字莘叟,号拱白堂、鲁阳樵夫,本贯昌原。

黄德吉(1750—1827)《下庐集》。黄德吉,字耳吉、而修,号下庐、斗湖,本贯昌原。

徐滢修(1749—1824)《明皋全集》。徐滢修,字幼清、汝琳,号明皋、五如,本贯达城。

朴齐家(1750—1805)《贞蕤阁集》。朴齐家,字在先、修其、次修,号楚亭、贞蕤、苇杭道人、苇杭外史,本贯密阳,朝鲜著名实学家。朴齐家曾多次来中国。第一次是在1778年(清乾隆四十三年,朝鲜正宗二年),他认识了潘庭筠、纪昀、李鼎元等。第二次来中国是在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朝鲜正宗十四年)和1791年。这一次,他除了和老朋友交往外,还认识了阮元、翁方纲、毕元、罗聘等人。朴齐家在1801年(清嘉庆六年,朝鲜纯宗元年)又来北京。这一次,他又认识了陈鱣、钱东垣、黄丕烈等人。回到朝鲜以后,他积极宣传要向中国学习,并撰写了《北学议》一书。

正祖李祘(1752—1800)《弘斋全书Ⅰ》。李祘,字亨运,号弘斋、弘于一人斋、万川明月主人翁,本贯全州。正祖大王是朝鲜王朝历史上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他在位期间所修水原华城,现为韩国"世遗"之一。《弘斋全书》共一百八十四卷,一百册。

正祖(1752—1800)《弘斋全书Ⅱ》。李祘,字亨运,号弘斋、弘于一人斋、万川明月主人翁,本贯全州,1776—1800年在位。

正祖(1752—1800)《弘斋全书Ⅲ》。李祘,字亨运,号弘斋、弘于一人斋、万川明月主人翁,本贯全州,1776—1800年在位。

正祖(1752—1800)《弘斋全书Ⅳ》。李祘,字亨运,号弘斋、弘于一人斋、万川明月主人翁,本贯全州,1776—1800年在位。

正祖(1752—1800)《弘斋全书Ⅴ》。李祘,字亨运,号弘斋、弘于一人斋、万川明月主人翁,本贯全州,1776—1800年在位。

正祖(1752—1800)《弘斋全书Ⅵ》。李祘,字亨运,号弘斋、弘于一人斋、万川明月主人翁,本贯全州,1776—1800年在位。

李晚秀(1752—1820)《屐园遗稿》。李晚秀,字成仲,号屐园、屐翁、书巢主人,本贯延安。1789年文科及第,1801年后为判义禁府使,历任刑曹判书、兵曹判书、大提学。1803年以"坤殿册诰谢恩正使"出使中国。

车佐一(1753—1809)《四名子诗集》。车佐一,字叔章,号四名子,本贯延安。

李颐淳(1754—1832)《后溪集》。李颐淳,字稚养,号后溪、晚窝、兢斋、六友堂、六友轩、杞隐,本贯斐彦。

徐荣辅(1759—1816)《竹石馆遗集》。徐荣辅,字庆世,号竹石、竹石

馆、竹石山人、玉磬山人、药山病吏，本贯达城。

李书九(1754—1825)《惕斋集》。李书九，字洛瑞，号惕斋、姜山、席帽山人、素玩亭、绿天馆，本贯全州。

张混(1759—1828)《而已广集》。张混，字符一，号而已、而已广、空空子，本贯结城。

宋穉圭(1759—1838)《刚斋集》。宋穉圭，字奇玉，号刚斋，本贯恩津。

赵秀三(1762—1849)《秋斋集》。赵秀三，字芝园、子翼，号秋斋、经畹，本贯汉阳。

南公辙(1760—1840)《金陵集》。南公辙，字符平，号金陵、颖翁、归恩堂、思颖、思颖居士、宜阳子、尔雅道人、尔雅堂、古董阁、书船阁、篆经斋，本贯宜宁。

成海应(1760—1839)《研经斋全集Ⅰ》。成海应，字龙汝，号研经斋、兰室，本贯昌宁。《研经斋全集》是手写本，包括原集六十一卷，外集七十卷及续集等，合八十八册。

成海应(1760—1839)《研经斋全集Ⅱ》。成海应，字龙汝，号研经斋、兰室，本贯昌宁。

成海应(1760—1839)《研经斋全集Ⅲ》。成海应，字龙汝，号研经斋、兰室，本贯昌宁。

成海应(1760—1839)《研经斋全集Ⅳ》。成海应，字龙汝，号研经斋、兰室，本贯昌宁。

成海应(1760—1839)《研经斋全集Ⅴ》。成海应，字龙汝，号研经斋、兰室，本贯昌宁。

成海应(1760—1839)《研经斋全集Ⅵ》。成海应，字龙汝，号研经斋、兰室，本贯昌宁。

成海应(1760—1839)《研经斋全集Ⅶ》。成海应，字龙汝，号研经斋、兰室，本贯昌宁。

申绰(1760—1828)《石泉遗稿》。申绰，字在中，号石泉，本贯平山。

吴熙常(1763—1833)《老洲集》。吴熙常，字士敬，人称“老洲先生”，本贯海州。《老洲集》二十七卷，共十四册。由其子孙根据家藏文稿整理，1892年曾孙吴俊泳首次以活字印行。

丁若镛(1762—1836)《与犹堂全书Ⅰ》。丁若镛，字美镛、颂甫，号茶山、与犹堂。原籍罗州，生于京畿道广州郡。7岁即能作汉诗，28岁文科及

第。历任弘文馆修撰、京畿道暗行御史、同副承旨、户曹佐郎、谷山府使等。1800年被贬至康津等地,1818年被释放。《与犹堂全书》是古代朝鲜实学的重要著作,原集共一百五十四卷,七十六册。其中,《与犹堂全书Ⅰ》为"诗文集",二十五卷。

丁若镛(1762—1836)《与犹堂全书Ⅱ》。《与犹堂全书Ⅱ》"经集"四十八卷。

丁若镛(1762—1836)《与犹堂全书Ⅲ》。《与犹堂全书Ⅲ》"礼集"二十四卷。

丁若镛(1762—1836)《与犹堂全书Ⅳ》。《与犹堂全书Ⅳ》"乐集"四卷。

丁若镛(1762—1836)《与犹堂全书Ⅴ》。《与犹堂全书Ⅴ》"政法集"三十九卷。其中的《牧民心书》至今还是在韩国广泛流传的汉文注释读本。

丁若镛(1762—1836)《与犹堂全书Ⅵ》。《与犹堂全书Ⅵ》"地理集"八卷、"医集"六卷。

尹行恁(1762—1801)《硕斋稿Ⅰ》。尹行恁,字圣甫,号硕斋、方是闲斋、蓍泉堂、留余观、弗欺轩,本贯南原。《硕斋稿》是手写本(转写),包括原集二十卷,十册;别集二十一卷,十册;附录一册。

尹行恁(1762—1801)《硕斋稿Ⅱ》。尹行恁,字圣甫,号硕斋、方是闲斋、蓍泉堂、留余观、弗欺轩,本贯南原。

徐有矩(1764—1845)《枫石全集》。徐有矩,字准平,号枫石、五费居士、芙蓉子、蓉洲子,本贯达城。

金祖淳(1765—1832)《枫皋集》。金祖淳,字士源,号枫皋,本贯安东。

金鑢(1766—1821)《薄庭遗稿》。金鑢,字士精,号薄庭、薄士、薄叟、薄翁、薄园累子、寒皋累子、归玄子、海皋,本贯延安。

沈象奎(1766—1838)《斗室存稿》。沈象奎,字稚教、可权,号斗室、彝下,本贯青松。

李勉伯(1767—1830)《岱渊遗稿》。李勉伯,字伯奋,号岱渊,本贯全州。

李学逵(1770—1835)《洛下生集》。李学逵,字惺叟、醒叟,号洛下生、文猗堂、因树屋,本贯平昌。

申纬(1769—1845)《警修堂全稿》。申纬,字汉叟,号警修堂、紫霞,本

贯平山。申纬之诗书画皆精到。

朴允默(1771—1849)《存斋集》。朴允默,字士执,号存斋,本贯密阳。

洪奭周(1774—1842)《渊泉集Ⅰ》。洪奭周,字成伯,号渊泉,本贯丰山。1795年文科及第后,历任吏曹参议、左议政等。1831年以谢恩正使出使中国。《渊泉集》原集四十四卷,二十册。集中有《渊泉燕行诗》。

洪奭周(1774—1842)《渊泉集Ⅱ》。洪奭周,字成伯,号渊泉,本贯丰山。

金迈淳(1776—1840)《台山集》。金迈淳,字德叟,号台山、石陵子、风栖主人,本贯安东。

洪直弼(1776—1852)《梅山集Ⅰ》。洪直弼,字伯应,号梅山,本贯南阳。《梅山集》目录二卷,原集五十三卷,合二十八册。

洪直弼(1776—1852)《梅山集Ⅱ》。洪直弼,字伯应,号梅山,本贯南阳。

柳致明(1777—1861)《定斋集Ⅰ》。柳致明,字诚伯,号定斋,本贯全州。《定斋集》原集三十六卷,十九册;续集十二卷,附录五卷,合八册。

柳致明(1777—1861)《定斋集Ⅱ》。柳致明,字诚伯,号定斋,本贯全州。

赵寅永(1782—1850)《云石遗稿》。赵寅永,字羲卿,号云石,本贯丰壤。

成近默(1784—1852)《果斋集》。成近默,字圣思,号果斋,本贯昌宁。

郑元容(1783—1873)《经山集》。郑元容,字善之,号经山,本贯东莱。

金正喜(1786—1856)《阮堂全集》。金正喜,字符春,号阮堂、秋史、胜雪道人、礼堂、诗庵、果坡、老果,本贯庆州。

赵秉铉(1791—1849)《成斋集》。赵秉铉,字景吉,号成斋、羽堂、菊斋。本贯丰壤。

李是远(1789—1866)《沙矶集》。李是远,字子直,号沙矶,本贯全州。

朴永元(1791—1854)《梧墅集》。朴永元,字圣气,号梧墅、石莱堂,本贯高灵。

卞钟运(1790—1866)《啸斋集》。卞钟运,字朋七,号啸斋,本贯密阳。

宋来熙(1791—2867)《锦谷集》。宋来熙,字子七,号锦谷,本贯恩津。

李晚用(1792—1863)《东樊集》。李晚用,字汝成,号东樊、此山,本贯全州。

李恒老(1792—1868)《华西集Ⅰ》。李恒老,字而述,号华西,本贯碧珍。《华西集》原集三十二卷,附录九卷,合二十二册。

李恒老(1792—1868)《华西集Ⅱ》。李恒老,字而述,号华西,本贯碧珍。

尹定铉(1793—1874)《梣溪遗稿》。尹定铉,字鼎叟,号梣溪,本贯南原。

金进洙(1797—1865)《莲坡诗钞》。金进洙,字稚高,号莲坡、碧芦斋,本贯庆州。

洪翰周(1798—1868)《海翁藁》。洪翰周,字宪卿,号海士、海翁、芸堂、双松漫士、丛桂堂,本贯丰山。

赵斗淳(1796 —1870)《心庵遗稿》。赵斗淳,字符七,号心庵,本贯杨州。

许传(1797—1886)《性斋集Ⅰ》。许传,字而老,号性斋、性庵、孔岩、冷泉、不倦堂,本贯阳川。《性斋集》目录一卷,原集三十二卷,合十七册。

许传(1797—1886)《性斋集Ⅱ》。许传,字而老,号性斋、性庵、孔岩、冷泉、不倦堂,本贯阳川。

申佐模(1799 —1877)《澹人集》。申佐模,字左人、左辅,号澹人,本贯高灵。

奇正镇(1798—1879)《芦沙集》。奇正镇,字大中、大仲,号芦沙、鳌山老人,本贯幸州。

赵秉德(1800—1870)《肃斋集》。赵秉德,字孺文,号肃斋、小学室主人,本贯杨州。

俞莘焕(1801—1859)《凤栖集》。俞莘焕,字景衡,号凤栖,本贯杞溪。

李尚迪(1803—1865)《恩诵堂集》。李尚迪,字惠吉、允进,号藕船,本贯牛峰。

朴珪寿(1807—1876)《瓛斋集》。朴珪寿,字瓛卿 ,号瓛斋、桓斋,本贯潘南。

郑芝润(1808—1858)《夏园诗钞》。郑芝润,字景颜,号寿铜、夏园子,本贯蓬山。

宋达洙(1808—1858)《守宗斋集》。宋达洙,字彦道,号守宗斋,本贯恩津。

柳畴睦(1813—1872)《溪堂集》。柳畴睦,字叔斌,号溪堂、涧谷居士、

老柴散人,本贯丰山。

任宪晦(1811—1876)《鼓山集》。任宪晦,字明老,号鼓山、全斋、希阳,本贯丰川。

李裕元(1814—1888)《嘉梧藁略Ⅰ》。李裕元,字景春,号橘山、墨农,本贯庆州。《嘉梧藁略》为手写本,不分卷,二十册。

李裕元(1814—1888)《嘉梧藁略Ⅱ》。李裕元,字景春,号橘山、墨农,本贯庆州。

张福枢(1815—1900)《四未轩集》。张福枢,字景遐,号四未轩、角里,本贯仁同。

南秉哲(1817—1863)《圭斋遗槁》。南秉哲,字子明、元明,号圭斋、绛雪、欧堂、桂堂,本贯宜宁。

李震相(1818—1886)《寒洲集》。李震相,字汝雷,号寒洲、汕峤、东峤等,本贯星山。目录二卷,原集三十八卷,附录五卷,合二十二册。

李震相(1818—1886)《寒洲集Ⅱ》。李震相,字汝雷,号寒洲、汕峤、东峤等,本贯星山。

姜玮(1820—1884)《古欢堂收草》。姜玮,字惟圣、仲武、尧章、韦玉,号古欢、古欢堂、秋琴、慈屺、听秋阁,本贯晋州。

金平默(1819—1891)《重庵集Ⅰ》。金平默,字稚章,号重庵、兼山,本贯清风。《重庵集》原集五十二卷,目录一卷,别集一卷,合二十八册。

金平默(1819—1891)《重庵集Ⅱ》。金平默,字稚章,号重庵、兼山,本贯清风。

金兴洛(1827—1899)《西山集》。金兴洛,字继孟,号西山、病翁,本贯义城。

金永寿(1829—1899)《荷亭集》。金永寿,字福汝,号荷亭,本贯光山。

韩章锡(1832—1894)《眉山集》。韩章锡,字稚绥、稚由,号眉山、经香、三观子,本贯清州。

柳重教(1832—1893)《省斋集Ⅰ》。柳重教,字穉程,号省斋、存斋、寿春山人、东岳山人,本贯高兴。《省斋集》原集四十六卷,别集四卷,合二十六册。

柳重教(1832—1893)《省斋集Ⅱ》。柳重教,字穉程,号省斋、存斋、寿春山人、东岳山人,本贯高兴。

崔益铉(1833—1906)《勉庵集》。崔益铉,字赞谦,号勉庵,本贯庆州。《勉庵集》原集四十卷,续集四卷,附录四卷,二十三册。

崔益铉(1833—1906)《勉庵集Ⅱ》。崔益铉,字赞谦,号勉庵,本贯庆州。

许愈(1833—1904)《后山集》。许愈,字退而,号后山、南黎,本贯金海。

许熏(1836—1907)《舫山集Ⅰ》。许熏,字舜歌,号舫山,本贯金海。《舫山集》目录一卷,原集二十三卷,合十二册。

许熏(1836—1907)《舫山集Ⅱ》。许熏,字舜歌,号舫山,本贯金海。

金允植(1835—1922)《云养集》。金允植,字洵卿,号云养、苏川,本贯清风。1881—1883年以"领选使"来中国天津。他带来了庞大的留学生队伍,并与李鸿章等多次对谈。参见拙著《王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导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宋秉璇(1836—1905)《渊斋集Ⅰ》。宋秉璇,字华玉,号渊斋、东方一士,本贯恩津。

宋秉璇(1836—1905)《渊斋集Ⅱ》。宋秉璇,字华玉,号渊斋、东方一士,本贯恩津。

李种杞(1837—1902)《晚求集》。李种杞,字器汝,号晚求、茶园居士,本贯全义。

田愚(1841—1922)《艮斋集Ⅰ》。田愚,字子明,号艮斋、畏庵、白山、秋潭、守玄、蛊翁、阳下尪人,本贯潭阳。田愚生于朝鲜末期,社会动荡,国家危亡。他多次搬家,尽量寻找可以读书的地方,甚至到佛寺和海岛去做学问。与其追随者形成了艮斋学派。《艮斋集》前编十七卷,前编续六卷,后编二十二卷,后编续七卷以及别编,合五十二册。

田愚(1841—1922)《艮斋集Ⅱ》。田愚,字子明,号艮斋、畏庵、白山、秋潭、守玄、蛊翁、阳下尪人,本贯潭阳。

田愚(1841—1922)《艮斋集Ⅲ》。田愚,字子明,号艮斋、畏庵、白山、秋潭、守玄、蛊翁、阳下尪人,本贯潭阳。

田愚(1841—1922)《艮斋集Ⅳ》。田愚,字子明,号艮斋、畏庵、白山、秋潭、守玄、蛊翁、阳下尪人,本贯潭阳。

田愚(1841—1922)《艮斋集Ⅴ》。田愚,字子明,号艮斋、畏庵、白山、秋潭、守玄、蛊翁、阳下尪人,本贯潭阳。

柳麟锡(1842—1915)《毅庵集Ⅰ》。柳麟锡,字汝圣,号毅庵,本贯高兴。《毅庵集》原集五十四卷,二十九册。

柳麟锡(1842—1915)《毅庵集Ⅱ》。柳麟锡,字汝圣,号毅庵,本贯

高兴。

柳麟锡(1842—1915)《毅庵集Ⅲ》。柳麟锡,字汝圣,号毅庵,本贯高兴。

郭钟锡(1846—1919)《俛宇集Ⅰ》。郭钟锡,字鸣远、渊吉,号俛宇、幼石,本贯玄风。目录、原集一百六十五卷,续集十六卷,合六十三册。

郭钟锡(1846—1919)《俛宇集Ⅱ》。郭钟锡,字鸣远、渊吉,号俛宇、幼石,本贯玄风。

郭钟锡(1846—1919)《俛宇集Ⅲ》。郭钟锡,字鸣远、渊吉,号俛宇、幼石,本贯玄风。

郭钟锡(1846—1919)《俛宇集Ⅳ》。郭钟锡,字鸣远、渊吉,号俛宇、幼石,本贯玄风。

郭钟锡(1846—1919)《俛宇集Ⅴ》。郭钟锡,字鸣远、渊吉,号俛宇、幼石,本贯玄风。

奇宇万(1846—1916)《松沙集Ⅰ》。奇宇万,字会一,号松沙、学静居士,本贯幸州。

奇宇万(1846—1916)《松沙集Ⅱ》。奇宇万,字会一,号松沙、学静居士,本贯幸州。

李沂(1848—1909)《李海鹤遗书》。李沂,字伯曾,号海鹤、梓谷、质斋、晓山子、南岳居士,本贯固城。

金泽荣(1850—1927)《韶濩堂集》。金泽荣,字于霖,号韶濩堂主人、沧江、云山韶濩堂主人,本贯花开。1891年科举及第,1905年被任命为学部委员。愤于日本人并吞朝鲜的阴谋而出国,到中国南通投奔旧友张謇。在南通他深居简出,编辑朝鲜著名文人申纬(1769—1847)作品,并撰写《朝鲜历代小史》等。1927年自杀。

申箕善(1851—1909)《阳园遗集》。申箕善,字言汝,号阳园、六阳、直斋,本贯平山。

黄玹(1855—1910)《梅泉集》。黄玹,字云卿,号梅泉,本贯长水。

李建昌(1852—1898)《明美堂集》。李建昌,字凤朝、凤藻,号明美堂、宁斋、淡宁斋、洁堂居士,本贯全州。

李南珪(1855—1907)《修堂遗集》。李南珪,字符八,号汕左、修堂、晚修真逸,本贯韩山。

曹兢燮(1873—1933)《岩栖集》。曹兢燮,字仲谨,号岩栖、深斋,本贯昌宁。

参考书目：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韩]《朝鲜王朝实录》。

[韩]《大东野乘》。

[韩]《东国史略》。

[韩]《东文选》。

[韩]金富轼《三国史记》四十六卷，《列传》六。

[韩]一然《三国遗事》。

[韩]郑麟趾《高丽史》卷四十。

[韩]金长生《沙溪先生遗稿》卷三。

[韩]姜柏年《燕行路程记》。

[韩]金宗直《占毕斋集》卷二十一。

[韩]李宜显《陶谷集》卷三十。

[韩]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诗文集第一卷《诗集》。

[韩]洪大容《湛轩书·外集·杭传尺牍》卷二。

[韩]李海应《薊山纪程》。

[韩]金允植《阴晴史》。

[韩]金贞培《韩国民族文化的起源》，高丽大学出版部，1973年版。

[韩]徐敬德《花潭集》卷一，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十四卷，1988年版。

[韩]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十八卷，1988年版。

[韩]卞季良《箕子庙碑铭并序》，《韩国文集丛刊》第八卷，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版。

[韩]东国大学附设韩国文学研究所编《韩国文献说话全集》，太学社，1991年版。

[韩]李睟光著，南晓星译《芝峰类说》，乙酉文化社，1994年版。

[韩]崔滋《补闲集》，圆光大学校出版局，1995年第三版。

[韩]洪万宗原著、安大会译注《小华诗评》，国学资料院，1995年版。

[韩]金甲起译注《三韩诗龟鉴》，梨花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韩]崔南善编译《三国遗事》，瑞文文化社，1999年版。

[韩]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六十六卷，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年版。

[韩]赵东一等著《韩国文学论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日]《日本书记》卷十。

[日]曾根俊虎《北中国纪行 清国漫游志》中译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

《旧唐书·东夷传》卷一百九十九,"百济"条。

《三国志·东夷传》。

郭沫若《殷契粹编》,《自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宗白华《美学散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岑家梧《图腾艺术史》,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

叶舒宪《英雄与太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杨昭全《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杨乃乔《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方起东《好太王碑·解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增订本。

卢庆侠《书写范式的转型》,《中国语文论译丛刊》,2006年第一期。

方晓伟《崔致远思想和作品研究》,广陵书社,2007年版。

后　记

本书是北京语言大学阎纯德教授三年前约我写的，其间阎先生多次与我通信和通电话，热情鼓励。拙作能够被纳入阎纯德、吴志良两位先生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我感到十分荣幸。

书中《高丽的宗教与汉学》一章由卢庆侠同志撰写初稿，我最后修改定稿。与韩国学者李济雨教授的对话是我们二人合作的成果，本书出版前我在字句上有少许改动，如把“汉城”一律改为“首尔”。

自2004年回国以后，做朝韩研究就没有在韩国时那么方便了。好在常有韩国的教授来中国，为我提供些信息。其间，我曾向高丽大学的崔溶澈教授、崇实大学的吴淳邦教授当面请教。成均馆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王蕾同学在读研期间为我邮寄了部分资料。特此一并致谢。

书中浅陋与谬误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刘顺利　志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后第二天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朝鲜半岛汉学史
作者=刘顺利著
页数=205
出版社=北京市：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5
SS号=12283244
DX号=000006752506
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在相互借鉴中发展中韩文化；从箕子到崔致远：半岛汉学的发轫；高丽王朝的汉学；朝鲜王朝的汉学；当代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等。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752506&d=C5C5F41E531E45E00EF4A043E056E7F9